

《远古文化初探》编辑委员会

主 任 都正阳

副主任 陈静茂

委 员 张光业 杨选成 王洪琪 章茨武

远古文化初探

主编：都正阳

开本：680mm×960mm 16开本

印张：20.625印张

字数：214千字

版次：2020年6月 第一版

印次：2020年6月 第一次印刷

印刷：襄阳金彩天彩印广告有限公司

印数：1000册

书号：鄂襄保图内字〔2018〕第080-4号

内容提要

本书重点从专题考察、文物发掘、楚源探讨、远古文明、附录参考等五个方面,对荆山远古文化进行了初步探讨。

王生铁同志三次深入荆山腹地保康专题考察,并做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张硕、朱俊英专家发表了关于保康史前文化与神化传说研究文章,为荆山远古文化研究指明了方向。

通过专题考察和穆岭头文物的发掘,特别是玉璇玑、玉钺、象牙管等高等级文物的首次发现,揭开了五千年史前文明的神秘面纱,对研究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在楚源文化探讨上,对楚都丹阳的考证,对景山楚先祖居地考证,对乔多、京宗、旁岷、夷屯西周时代楚国的都邑进行了研讨,保康不愧是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在远古文化研讨上,重点围绕炎帝、黄帝、西陵母、玄器、颛顼、帝喾、尧、舜等史前传说历史人物在荆山进行分析探讨,还针对他们的出生地、执政地、活动区域和葬地展开分析,保康还是史前文明的富集地。

文章还从理论探讨上确定了大鯀、大禹在荆山治水的线索,而大禹又是夏王朝的开启者,因而也就确定了夏都阳城在荆山的定位。

关于荆山史前文化的理论探讨文章,是研究三皇五帝在荆山的重要参考资料。

目 录

【专题考察篇】

- 高度重视,密切关住保康史前文化研究 …………… 王生铁 (1)
- 统一思想,切实做好文物发掘工作 …………… 王生铁 (21)
- 保康史前文化课题值得探讨…………… 王生铁 (33)
- 关于保康史前文化与神化传说研究的思考 …… 朱俊英 (41)
- 荆山保康史前文化考察的看法…………… 张 硕 (46)

【文物发掘篇】

- 湖北保康穆岭头遗址发现屈家岭文化
 高等级墓葬…………… 湖北考古所 (51)
- 尘封五千年的史前文明…………… 王洪琪 (58)
- 穆岭头出土文物揭秘分析…………… 汪青祥 杨选成 (61)
- 从南河流域近年出土文物看早期楚国
 中心区域…………… 张光业 (89)

【楚源探讨篇】

- 楚始都丹阳考证 都正阳 (97)
- 论荆山与早期楚文化 章茨伍 (105)
- 景山,楚先祖先公的居地 张光业 (119)
- 乔多,西周时代楚国的百年都邑 张光业 (128)
- 多维视角下的楚与都 张光业 (142)

【远古文明篇】

- 炎帝在荆山的初探 杨选成 (160)
- 黄帝在荆山的线索初探 都正阳 (184)
- 论荆山嫫祖文化 章茨伍 (191)
- 黄帝发祥于荆山的探讨 杨选成 (196)
- 对西陵母的寻绎 杨选成 (231)
- 文祖玄器在荆山 杨选成 (250)
- 对颛顼在荆山的释疑 杨选成 (260)
- 寻找帝喾在荆山的踪迹 杨选成 (271)
- 探讨尧帝在荆山 杨选成 (285)
- 荆山创世神话古遗址浅谈 陈静茂 (304)

【附录参考篇】

- 谈中国古史应当重写 季羨林 (313)
- 重写中华古史建议书 季羨林 (316)

高度重视,密切关注保康 史前文化研究

王生铁

根据省荆楚文化研究会的统一安排,由李德华副会长率考察团,专程来保康专题考察古史传说与史前文化。这是第三次到保康考察,第一次是2013年秋,由武清海会长和李德华副会长率团,历时20天考察襄阳区域的荆山文化,重点在保康考察7天。第二次是今年7月,由省社科院楚文化研究所张硕所长带队,在保康考察6天。这两次考察,都有成效。

这次考察,襄阳市委、市政协和保康县委、县政府、县政协高度重视,县委宣传部统一安排,有关职能部门和专门研究史前文化的同志密切配合并参与考察。几天来,我们听取介绍,认真座谈,拜访专家,访问群众,实地察看,查阅史书,选读资料,深研详析,收获很大:使我们对保康史前文化的认识更加清晰,增添了资料,丰富了内容,研究了史实,拓宽了视野,加深了认识,并就深入发掘和撰写创世神话传说进行了探讨。今天座谈会上,大家广泛发表意见,张硕所长和朱俊英教授都客观实在地讲了成绩、问题、主意和办法。陈昆满副会长讲了

重要意见。他们都讲得很好。德华同志还要作总结讲话。近三年来,我密切关注保康史前文化研究。借此机会,谈谈体会和建议,分三个方面谈。

一、探索有功,成绩显著

保康地处鄂西北荆山区域的深山之中,与神农架、房县、夷陵、远安、兴山和谷城、南漳等县(区)接壤,这一区域高山入云,群峰绕雾,层峦叠嶂,碧水长流,可谓水秀山青,景色宜人。她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特别是史前文化线索众多,早期神话传说甚广,由于古代战乱、焚书坑儒、改楚为汉、独尊儒术、祖地迁徙、改朝换代和废旧建新等历史原因,使这一传说中的古代政治文化中心演变成阡陌之丘,荒芜化、边缘化、淡漠化了,使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缺失了分量极重的一块。在社会主义建设新形势下,保康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和县委宣传部的领导同志重视文化工作,历史文化研究者们历经千辛万苦,潜心研究保康历史文化,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改革浪潮中,汪青祥同志辞聘外贸工作,在回乡经商中积极作文化调查,坚持二十多年自费研究保康历史文化。他不辞劳苦,废寝忘食,跋山涉水,走遍了全县的多数村庄,还到周边县市以及陕南的许多乡村进行考察。他攀高山、钻山洞、阅古书、查资料、寻遗迹、找文物、访群众、求专家,对古代文化进行了有益的研究和探索。他在艰苦的工作中,得到了县领导和歇马、马良、两峪、店垭等乡镇领导同志的支持,得到了县史志办杨选成主任等多位历史文化研究者的大力协助并积极参与。近几年,保康的同志考察、收集、整理、撰写和出版了大量的书籍和文史资料,记载反映了保康史前文化,仅我得到的相关资料,厚度达到一米以

上。我每读一份资料,都深受感动和震撼,觉得蕴藏着专家们的心血和汗水。几年来,我通过拜读文章,查阅史书,实地考察,访问群众,听取早期曾来重阳坪考察的陈千万等多位专家的意见,以及这次考察情况,使我感觉到保康县研究史前文化功不可没,成绩显著,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初探了荆山的方位。许多资料表明,很多古人、名人出生、活动在荆山。但全国有多处荆山和沮水的地名,所以弄清荆山的历史和位置极为重要。据《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子革答楚灵王问:“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筦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这段话明确了荆山之名的存在。这一地名来自《尚书·禹贡》,《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之一,《禹贡》是其中重要的一篇,它记载了大禹时期的事情。据白寿彝先生考证,《禹贡》一文是战国时期最早记录我国行政区划、山川地形、物产贡赋、土地等级、交通运输等情况的一篇文章。《禹贡》开篇就讲到,“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就是说禹为了区分九州的疆界,确定各地的贡赋,在山上插木桩作标记,并为高山大河命名。《禹贡》800多个字中曾有四处提到荆山,说明大禹时期的荆山已被列为名山。

荆山的位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第592页中,“南条山脉”注释为“出于《禹贡》导蟠冢至于荆山”;《辞海》中的荆山有两条,分为南条荆山和北条荆山,鄂西北荆山为南条荆山。禹划九州,始有荆州,荆山是荆州与豫州、梁州的分界线。荆山是湖北境内最大的山脉。根据地图和《辞海》标示,荆山

属于大巴山余脉,《辞海》对荆山记述为“荆山在湖北西部,武当山东南,汉江西岸。漳水发源于此,西北至东南走向,主峰聚龙山在保康中部,东南谷地宽广,西北巍峨陡峻,富丛林。西周时楚立国这一带”。此条注解还可以具体些,荆山北部以武当山南面的南河为界,东部以谷城至钟祥段的汉江西岸为界,南部以长江的西陵峡至荆州段为界,西部以兴山香溪河为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标示,“荆山范围为北纬 $30^{\circ}55''$ 至 $30^{\circ}58''$,东经 $110^{\circ}45''$ 至 $111^{\circ}31''$ ”。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保康地名志》记载,荆山有两条主脉,16条支脉,第一条主脉是从茅山岩到木城垭、歇马、九路寨直至宜昌、当阳。保康境内最高点关山,海拔2000米。第二条是自茅山南麓至望佛山,过聚龙山,延至南漳、荆门(即荆山之门),最高点望佛山海拔1946米。各方面资料表明,荆山的范围包括房县、神农架的一小部分,谷城、宜城、襄城的一半,南漳、远安、当阳的全部,保康、宜昌、兴山、荆门的大部,大约纵320公里,横290公里,总区域面积约2万平方公里。还有资料表明,荆山西延豫陕,近靠巴蜀,这些考察只是初探,还要邀请地质部门的专家参与一同考察,最后确定。

(二)揭开了荆山史前文化的面纱。史书记载,在楚国的鼎盛时期,“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饮马黄河,问鼎中原。”在这广袤的荆楚大地,随着考古发掘和发现,史前文化之丰富,令人震惊。远安怪石坡遗址、遗物表明此地有4亿年的历史,该处原来是汪洋大海,后来出现火山爆发才有怪石坡。传说黄帝的妻子嫫祖的故乡是荷花镇苟家垭村,嫫祖在此发现了蚕桑,发明了丝织,古代四海扬名

的埡丝之源就出在此地。建始龙骨堆中牙齿化石表明,这里是 200 万年——250 万年前直立人活动的遗址。郧县古人类头盖骨化石有 100 万年的历史。还有长阳人、樟脑洞人和荆州鸡公山晚期旧石器时代遗址等都表明,人类在荆楚大地活动有很早的历史,特别是湖北境内发掘出旧石器时代遗址 163 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260 多处,京山屈家岭文化遗址、天门石家河文化遗址、枣阳市雕龙碑遗址,尤其在长江流域荆楚段的城背溪遗址和湖南澧县 9000 年前彭头山遗址、江西万年前仙人洞遗址等等,都为我国的史前文化和远古文化及各代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在荆山的中心区域,在鄂北荒山老林,在文化上长期遭遇荒漠化、边缘化、淡漠化的保康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 6 处。特别是保康史志办杨选成主任和汪青祥等几位专门研究历史文化的同志及本地群众提供的资料表明,以保康为主的史前文化及传说故事令人惊奇。盘古开天地、伏羲结网、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羿射九日、精卫填海等等神话故事在民间传说较广,尤其是有关盘古、伏羲、女娲等神话故事和有关黄帝、嫫祖及三皇五帝等历史人物及炎黄合战蚩尤、不周山、重阳坪、沮水之源、卞和献玉等名人、名山、名水重要传说故事引人深思。这些故事和线索,并非空穴来风,有的有权威史书记载,有的有遗物、遗址、遗迹存在,有的与保康周边甚至荆山周边县市的文化线索相连。大量事实说明,在崇山峻岭、深壑野洼之中,在学术上已荒漠化、边缘化的保康逐渐揭开了史前文化的面纱,拉开了研究史前文化的序幕。在保康经济社会发展的热潮中,研究历史文化的氛围较浓,所见所闻使人感到荆山之首、沮水之源的荆风楚韵浓

烈,古代文化丰厚,宝藏资源充足,值得深入研究,以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三)提供了史前文化的线索。根据多方面掌握的情况,有关盘古、伏羲、女娲等神话故事和炎帝、黄帝、嫫祖、颛顼、帝喾、尧、舜、禹等三皇五帝以及周公、卞和、彭祖、鬼谷子、姜子牙等名人出生活活动在荆山的神奇传说,为深入发掘史前文化提供了线索。我们认为,这些线索具有研究的价值,其理由如下:一是有许多权威书籍为依据。如引自《尚书·禹贡》《论语》《诗经》《左传》《国语》《山海经》《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帝王世纪》《四书》《水经注》《黑暗传》《辞海》《地理志》以及部分比较实在的地方志等十多种史书记载。二是有许多遗址存在可做印证。我们几次考察的一些遗址的地名,都是老人传下来的,从古至今都没有改变过。日本学者大雄先生说:“地名是活着的古代语言,是生存到今天的古人,是最能说明古代历史的活化石”。地名很重要,现存的古地名遗址也是重要线索之一。如“神农”,在一较小的区域内就有神农河、神农沟、神农山、神农洞、神农庙、神农溪和远近闻名的神农架,这些地名在一小区域内存在,决不是无中生有,是有渊源的。三是有许多文物佐证。保康已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多处,还有许多石洞、石条、石礮、石柱、石坎等等石器到处可见,更有石斧、石铲、石网坠等新石器时代的遗物,还有青铜鼎、青铜剑、编钟等春秋战国时期的楚文物,印证了这一区域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四是有后人祭祀祖先的遗迹作参考。仅保康范围内,就有祭祀三皇五帝等先辈名人的寺、庙、祠、庵、宫、所、堂、台、洞和墓、碑等各类文化遗存,这些遗迹在保

康可谓星罗棋布。五是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很多。史学界认为,神话故事是历史的根须。群众说到的许多神话故事、神话小说、民间传说有些有文字记载,这绝不是凭空捏造,有的有相关联系,有的有出处,不可忽视,可作为线索参考。六是有些线索左右联系,前后贯通,印证了保康确有早期人类活动。保康的历史文化,从远古、史前到春秋战国的楚文化,链条直接连到以后的各朝各代,先秦时卞和献玉的故事和今人章茨伍先生30多年探究荆山玉的精神和成果,就是璧联古今的神韵,是最好的说明。七是保康在史前有人类生存活动的条件。这里有茂密的森林,丰富的果实,松软的植被、温和的气候、众多的洞穴、长流的河水、肥沃的土地、成群的动物、大片的植物等自然条件,适合古人类生存繁衍和发展。综合分析,保康所提供的远古文化和史前文化的线索确有深入研究的价值。

(四)丰富了楚文化的内容。史书记载“我之先祖(熊绎)辟在荆山,筮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论据就说明荆山是楚文化的源头之一。在古文化发掘中,在紫阳村出土的8把青铜剑,保康博物馆珍藏了一把品相较好的青铜剑,马良西坪村余传敏在砍柴时发现的青铜鼎等遗物佐证,很能说明保康荆楚文化底蕴丰厚。还有丹水的故事和尧治河地名的来源等传说,较多文化遗址的发现都更加丰富了楚文化的内容,说明楚文化之源在这里是有线索、有影响的。除保康的楚文物之外,还有宜城、南漳传说中的几个楚都、楚王城等,众多遗址和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文物都印证了荆山楚文化底蕴丰厚。

(五)研究了历代文化遗存。保康博物馆珍藏的文物说明保康历朝历代的文化没有中断,有的文物历史文化价值较

高。展览的文物及民俗馆陈列的文物,特别是章茨伍先生所探索和开发的荆山玉,都证实了荆山保康的历史文化悠久,有历朝历代文化遗存的连贯性。这也是古代文化的佐证。

综合分析保康历史文化,从荆山地名的定位,到名山、名水、古今地名,从《黑暗传》的神话传说,到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实物,从三皇五帝遗址到先秦时期的楚国青铜器,从名人的遗址、遗迹到历朝历代的遗存文物,说明保康历史文化链条前后相符、左右相连,综合性地反映了保康文化的线索。在发现、收集、整理、研究和对文物的保护中,保康县文史工作者历经了千辛万苦,功不可没。

在成绩面前,还要看到不足之处。一是对重要线索还缺乏有力的证据,比如对三皇五帝等人物,关系全局的、有震动的大事证据不够充分,现有的证据还难以使人信服;二是有的文字依据与遗址、遗物、遗迹联系不紧,举证乏力,有的证据使人有牵强附会之感,觉得不够真实;三是有些引用的资料不可靠,有些记述存在地方主义的偏颇性,神学界里有的迷信色彩较浓,有的使人读后感到有断章取义之嫌;四是对文物的发掘、抢救和保护在保康没有引起重视;五是研究历史文化的措施不够有力,线索很多,难题不小,任务艰巨,组织领导力度不大,研究者人数不多,有的是孤军作战,合力不强,上下沟通不够,经费也确实不足。这些问题影响工作效率和工作进程,要在今后工作中改进和加强。

二、加深认识,统一思想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祖国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根。优秀历史文化是正能量。研究史前文化的意义重大而深远。

(一)党中央和省委非常重视文化工作。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一直重视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非常重视文化工作,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中,把文化提到了应有的高度。总书记指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特别强调要弘扬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添正能量,为实现中国梦作出贡献。省委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文化工作的指示精神,非常重视文化工作,特别重视和支持对历史文化的研究。李鸿忠书记在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荆楚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中华文化璀璨的星空中地位显耀,是全省人民共有的精神家园。传统文化就是我们的根,也是我们打造文化软实力最深厚的母体和源泉,决不能丢,丢了就对不起祖宗先贤,就是历史的罪人。”我们文化工作者要领会精神,增强责任感,把发掘古代历史文化这项工作做好,为丰富中华文化作出贡献。

(二)祖国优秀的历史文化是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了,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总书记还强调指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我们研究的荆楚历史文化从盘古、伏羲、女娲的神话传说故事到三皇五帝的传说和先秦、六朝及后来的许多有识之士,都主导拯救生灵、普济众生、惩恶扬善、除暴安民和以人为本、造福于民的民本思想等等,与我们现在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都是有

利于社会主义的正能量。

(三)研究荆楚文化是为了丰富中华民族的文化。我们荆楚文化研究会正在组织专家学者编撰《荆楚文化八千年》一书,其目的是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充实内容,填补空白、纠正误差、还原真实”。中华民族文化是灿烂辉煌的,但是在一些历史记载中,存在着六重六轻的偏颇,即,重北轻南、重河轻江、重黄轻炎、重龙轻凤、重儒轻道、重秦轻楚,这是很多历史原因造成的。长期以来,我国一直说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但近几十年来,众多的考古发现在长江流域相继面世,举世公认长江与黄河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国学大师季羨林先生参观荆州博物馆和省博物馆时感到震撼,连续两次发表文章提出中国的古代文明史要重写。海内外 100 多位资深专家也签名主张重写中国古代史。同时,通过比较研究,说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与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同相辉耀,从而证实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做出的重大贡献,并在世界历史文化的舞台上为中国争取更大的话语权。

(四)史前文化是中华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前,是指没有文字记录的远古。吕振羽先生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文中论述:“今日的中国史,特别是史前史,即原始公社制度史,还是一块荒莽的天地”。我国记载先秦以后的史籍浩如烟海,记载史前的权威史书少见。现在人们一般认为随州是炎帝故里,河南新郑是黄帝出生地,陕西黄陵是黄帝墓葬地,海内外炎黄子孙前往公祭,人涌如潮。在全国各地,传说盘古出生地众多,女娲出生地早期传说有 260 多处,现还存 6 处,炎帝出生地 2 处,黄帝出生地 5 处,夏禹出生地众多。

关于三皇五帝活动的故事更是纷繁,尽管当时没有文字可记,但都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下功夫深入发掘,以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

(五)荆山保康有研究历史文化的基础。保康地处荆山区域的高山峻岭之中,提出三皇五帝出生、活动在此,令人惊奇。按史学界规则,这里既无有文字可考、也无文物为证,实在难以置信,但遗存的大量线索和资料非常宝贵,确实值得研究。因为这里有古人生存繁衍的条件和基础;有史前文化层、石器、陶器及先秦铜器等历史文物遗存的证据;有从古代保存至今的遗址为佐证;有大量古人活动的遗迹的分析资料;有大量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有历朝历代纵贯和周边横连的相关资料的逻辑性;有举世公认的记载史前文化的历史资料《黑暗传》,有权威史书记载为依据和参考资料。保康引用的众多史书记载有的是根基、有的是依据、有的是佐证、有的是印证、有的是线索,特别是权威史书作为依据,是可信的。如《四库全书》是国家专库珍藏的宝贵资料;《史记》是史学泰斗司马迁撰写的;《禹贡》《山海经》及《水经注》是历史上权威性地理著作;《左传》是《春秋》三传之一;《诗经》是房县人尹吉甫所辑,为最早的诗歌合集;《汉书》是班固著述的前四史之一;《四书》是儒家传道、授业的基本教材;《资治通鉴》是司马光所编撰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还有人们常引用的《国语》《三国志》《辞海》《汉语大词典》和《中国通史》以及前人传唱、后人记叙,已举世认可的《黑暗传》,都是依据性很强的史料来源所在。关于《史记》和《山海经》的详细讲解的举例说明略,虽然有的史书中有的章节有难以置信的杂音,但要认

真分析研究后引用。总体上说,上述书籍是可信、可取的。此外,还有比较严谨的地方志和佛、道典籍,可作为参考。

上述五个方面说明我们研究古代文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也有研究的基础和价值。我们要加深认识,统一思想。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统一到省委决策上来,统一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来,为重视、支持、参与保康史前文化的研究多出成果、多做贡献。

三、敢于担当,推进工作

荆山史前文化研究已经揭开了面纱,拉开了序幕,省荆楚文化研究会先后三次到荆山考察,表明对保康研究史前文化的大力支持。今年7月,由张硕所长率队考察后,专家组对保康饱含深情,讲成绩非常高兴,谈问题客观实在,说建议中肯可行,省、市、县的同志都要认真负责、振奋精神、齐心协力、深入发掘、精心运作。

(一)继续发扬敢于担当的奉献精神。研究史前文化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保康县委、县政府敢于担当,历史文化研究者认真负责、勇于开拓,历尽千辛、不辞劳苦,拨开了层层迷雾,突破重重难关,破解道道难题,揭开了荆山深处史前文化的面纱,探究了我国三皇五帝重要线索,这种敢于担当、勇于探索的精神可贵,要继续发扬,争取更大的成绩。对研究历史文化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薄弱环节、不足之处和面临困难,是工作中的正常现象,要以开拓进取的精神,研究方法,突破难关前进。如炎、黄等名人的出生地与活动的遗迹,要继续找出更有力的证据。王国维先生的“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的印证”的“二重论证据法”,史学研究者必须遵循。现在

虽有史书记载为依据和遗址遗存,但还要找出二者的连接点,进一步弄清文献和遗址的可靠性,以及联接的有力证据或有说服力的理由。有些遗址、遗物、遗迹确实存在,但缺乏深入研究,若要存史,还比较乏力,一定要找出确证。再如,保康还有哪些地方可发掘史前文化层?伏羲和女娲滚石成亲的地址和情节有什么依据?黄帝与嫫祖成亲和去陕西为帝,还有哪些证据或理由?近些年来,对历史文化名人出生地和活动的大事件之争非常激烈,如炎帝、黄帝、屈原出生地都有几处,楚丹阳6处,楚都17处,赤壁之战的地点5处等,各地都是领导出面,专家上阵,争论不休。这种情况下,可能导致误传、误解的问题出现。特别是对史前文化的发掘,研究者常常是孤军作战,社会上有些人不太理解,经常出现热嘲冷讽、攻击甚至是打击,这就要有敢于担当的精神挺住。历史上这样的事例很多,如商鞅、屈原、司马迁和王安石等,当时都备受打压和诋毁,后来事实证明他们是正确的。荆山“卞和献玉”故事也是很典型的例子。在研究荆山保康史前文化中,要有信心,有决心,有毅力,有强烈的责任感,有敢于担当的精神,同时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要下苦功夫真功夫真抓实干,事业才会成功。

有很多重要文物遗址是在不显眼的地方偶然发现的,如建始直立人牙齿化石是农民在荒山古洞中挖龙骨卖钱,出国境后才发现的;屈家岭文化遗址是在阡陌之野、血吸虫窝子中发掘出来的;天门石家河文化遗址是在大片荒丘之中修水渠时发现的;轰动史学界的越王勾践剑是在荆州野外开水渠时无意中发现的;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震惊全球的编钟是军队

在随州建营房基地时偶然发现的；邓国的国都是在广阔原野中发掘的；叶家山大规模古墓群其文物四千多件，是在历朝历代祖祖辈辈居住的村庄下发现的，这样的例子很多。保康地处荆山深处，史前文化线索之多，只要同志们协力同心，开拓进取，一定能取得成绩。

(二)是坚持正确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通过多年的艰苦探索，保康现有史前文化的线索之多，份量之重，内容之杂，令人惊叹。对众多线索的基本态度和思路是：研究有益、肯定乏据，否定缺理、弃之可惜，探之费劲、发掘加力。若研究出更大成果，保康、襄阳和荆山地位将飙升，有利于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为此，应不怕费劲，发掘加力。研究保康史前文化应该是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探索，第二个阶段是求证，第三个阶段是定论。现在线索很多，要进入到深入发掘、精心求证的第二阶段。在精心求证阶段，必须坚持正确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这就要求同志们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一要把握原则。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研究古代文化，在研究中要坚持我们党提出的“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二要辩证分析。就是要坚持唯物辩证法，要在深入发掘中克服思想上的片面性，要全面、客观、正确地分析问题。三要实事求是。就是要尊重事实，真实的材料是研究的基础，保康文化有研究的价值，要客观分析，不能主观臆断，更不能弄虚作假，断章取义。四要刻苦钻研。对历史文化的重要事件和关系全局重大疑难问题，要重视、要慎重、要考察、要思考，细嚼深究，刻苦钻研，不能不负责任地敷衍塞责，信口开河，草率地肯定或否定。一方面往往是提出研究课

题的同志不注意研究历史文化的规则、规定、规矩、规范,急于求成、主观臆断,凑合各种非证据的材料,坚持己见,把线索作为史实定论。这样不坚持原则是不行的。另一方面,也有的同志,在研究历史文化中,满足于早期一般的文化普查,不深入研究变化的情况。还有的历史文化专家对主题材料不看、汇报不听、请示不理、考察不去、线索不研、文物不究,不思不考,唯我正确,对重要事实不负责地大而化之地否定,还自以为是地指责潜心研究者,这种态度对研究古代文化是有害的。一定要发扬民主,扩大视野,更新观念,尊重客观事实,刻苦地、深入地研究出正确的结论。五要秉公定论。每位同志研究问题要出以公心,不能搞本位主义,不能照顾个人关系,不能唯我独尊。要以公正的态度作出正确的结论。六要求同存异。就是要求大同,存小异。要抓住主题中关键性问题讨论,不可为与主题无关的枝节问题钻牛角尖,争论不休而影响全局。要求同存异,维护、服从大局。七要循序渐进。一般来讲,有事业心的同志都愿快出成果,“马到成功”,但对史前文化的研究,是关系到全局和长远的大事,切忌急躁武断。对疑难问题讨论,要有序推进。对有证据,有道理的事,当断则断,定论果断;对证据不足的,要着手深入研究;对有大的分歧,一时拿不出证据,不得强行拍板,要在找到证据后定论;对确定无理由存在的事项,要果断剔除;对个别非常难的问题,留给后人研究。参与研究者要放下“成绩”这个包袱,有依据有线索的,定论了的算成绩;被否定了的,因为弄清了事理,对长远研究有帮助,也算是成绩;暂时不太清楚,对后续研究打了基础,提供了材料的,也是成绩。

(三)认真撰写创世神话传说。针对保康史前文化线索有发掘价值的实际,张硕所长与考察组专家们认真负责地研究后慎重地提出,先把《创世神话传说》编入传世正史。这是张硕所长等专家对事业的认真负责,也是对保康干群和专家们的信任和支持,希望同志们齐心协力,把好事办好。一要高度重视。保康的史前文化入正史是件大事。史前文化从全国到湖北,都只有一些零星的史料,特别是三皇五帝等传说故事的整体反映,全国少有,湖北唯一。这是中国文化的大局,是华人始祖炎黄及史前文化的具体化,是中华史前文化的代表作,是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具体说明,是影响世界的大事,所以我提醒同志们在思想上要高度重视。二要依据充分。撰写此作的每个论点都要有文献依据,争取有遗址、遗物、遗迹为佐证,如果有的证据不足,要通过对线索的综合分析,拿出合情合理合乎规则的材料,使人们对文章读后感到可信。三要融会贯通。就是文章要做到纵向历史贯通,横向周边紧连。历史就是史前与先秦以至之后的历朝历代史实贯通;文章要与周边区域历史事件联系很紧,情节吻合,不能自相矛盾,自我否定。四要合乎逻辑。此文章的内容要使历史前后上下左右,政治、军事、经济、天文、地理、民俗、宗教等传说方面要合乎逻辑,使读者增强可信感。五要结构严谨。文章的主题确定之后,结构要紧扣主题,每个部分要承上启下,内容要前后吻合,使读者很自然地产生历史的真实感。六要认真写作。就是文章的质量严格要求:一是立意要高,是高雅的历史文化,不得低俗;二是道理要深,史实令人信服;三是思想性要强,文章要体现正能量;四是记事要清,不能写成议论文,驳论文,更不能成演义;五是内容要实,不得

虚构;六是文字要精,文笔要通畅,不得拖沓;用词要恰当,要通俗易懂,引用的古文要有注解。文章读后,使人感到真实、可信、文明、振奋、精美、可读。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体现优秀的历史文化,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正能量做出贡献。

(四)继续深入发掘史前文化。在精心撰写《创世神话故事》一书的同时,要继续深入发掘史前文化。要在发掘中写书,在写书中发掘,相互促进,推动工作。如果在发掘中,三年之内发现有史前文化的重要证据,可作史实入书。但不能因此影响写作的质量。在写作过程中,要做好史前文化发掘的各项工作。一要明确目标。就是要对史前文化线索,找到切实可信的、难以驳倒的实证。主要是炎黄等三皇五帝出生、活动、葬地、外迁、大事件等实证。同时对重要名人、名山、名水的重要事件的线索取得实证。二要拓宽视野,在本县之外的周边县市有联系的各种线索,通过考察与当地共同努力发掘找出实证。如黄帝和嫫祖间隔二十多里路,历史上都是一个行政区划,襄阳市的同志要加强联系协调,还可以会同宜昌市一起组织考察。三要深入发掘。就是不能满足于现有线索,更不能以早期文化普查作依据,要开拓创新,突破难关,深入发掘,要从文献、神话、传说、高山、沟壑、洞穴等已有线索的蛛丝蚂迹中找出有说服力的证据。如发掘文化层,探讨卞和墓,查实周公岭,弄清石器源,追溯青铜史,解开铜鼎谜,跟踪大事件……把关系全局的大事查个水落石出,正确结论。四要安排外调。凡是与史前三皇五帝出生、活动相同的地方,要派出得力的专班前往考察,如河南新郑、陕西黄陵、河北炎黄合战

蚩尤,山西、河北尧出生地等等,一句话,就是与荆山史前文化有重叠、有交集的地方,我们都要去现场考察,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弄清文化渊源,若人家说的道理充分,我们就信服;若没有道理,也不要争论,我们继续深入发掘。在外地考察要注意方法和策略,是学习性的友好考察。赴外省的考察,由张硕同志负责,建议保康应有1—3人参加,先组织考察黄陵。五要增加力量。因任务很重,要多方抽调素质较高的人员组成考察队伍,还要挑选三到五人,组建一支荆山史前文化调查勘探队,在专家指导下,到高山、沟壑、洞穴、古墓等史前文化有关的地方探查,弄清情况,寻找史实。六要邀请专家。省里要帮助联系邀请省的专家、国家的专家和外省研究史前文化的专家来保康指导考察研究,支持保康的工作。襄阳考古单位应责无旁贷地积极参与,发掘荆山史前文化。

(五)精心运作落实各项工作。发掘史前文化是一项非常艰巨、十分具体、又很繁杂的事情,要精心运作,狠抓落实,抓好当前各项工作。

一要思想上重视。毛主席曾讲,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习总书记强调,对工作要“踏石留印”“抓铁有痕”,都说明落实的重要性。我们要把史前文化发掘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二要作出计划。发掘史前文化的线索很多,工作繁杂,我建议保康的同志把前段工作总结梳理一下,作出工作计划。按照全局与重点,长远与当前,急迫与暂缓,容易与较难考虑,作出计划,明确任务,把任务分解到部门、到组到人。三要突出重点。我建议:①把伏羲、女娲、炎黄等三

皇五帝的文化发掘取证作为重点;②把卞和献玉作为切入点,把探究墓穴、访问群众、卞族座谈、查阅资料、鉴定宝玉结合进行,抓出成效,推动全局;③积极发掘文化层遗址,首先以重阳坪、紫阳村为重点发掘文化层,再选择一批地点勘探,带动全局;④抓紧访问熟悉古事的老人,采用录音录像的办法抢救一大批活化石,亦为取证;⑤依据法律,制定规章,加强对古文物、古遗址,包括山、寨、洞、村址的保护,抢救和管理,不得损坏和遗失;⑥还有一些关系全局的重点项目,要明确,并研究措施,推进工作。四要抓紧运作。毛主席曾讲:“要抓紧,就是说,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伸着巴掌,当然什么也抓不住。就是把手握起来,但是不握紧,样子像抓,还是抓不住东西。我们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紧,所以工作还是不能做好。不抓不行,抓而不紧也不行。”发掘史前文化要按照先易后难、先大后小、先急后缓的要求,抓紧运作,切实做出成效来。五要解决经费。发掘史前文化的活动经费,以县里为主导安排落实,县长表示支持。市里拿一点,省里也支持一点。在不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况下,企业可以自愿地帮一点。还可以申报项目和研究课题,争取国家政策项目资金支持。

(六)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四大家领导同志,要统一认识,形成整体力量推进工作。县委宣传部责无旁贷,要认真落实县领导的决策,加强指导。参与研究史前文化的专家、专班要统一领导,形成合力,明确牵头领导人,并明确职责。各方面要加强团结,互相支持,推进工

作。因此项工作关乎大局安定,要在发掘史前文化的过程中,只研不宣,低调运作,埋头苦干,扎扎实实地把各项工作做好。

当前,举国上下正在掀起学习、贯彻和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的热潮,我们要认真学习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和省委以及市、县党委的决策部署上来,紧紧围绕“四个全面”的布局,自觉地担当起我们的责任和使命,以发掘保康史前文化的丰硕成果,为实现“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添砖加瓦。

我是保康发展的见证人之一,见证保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财政是检验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保康财政收入前些年只5千万元,现在过了10亿,而保康仅有28万人口,人平可观,比较宽裕。当前,保康经济持续发展,效益不断提高,社会各业进步,城乡面貌巨变,社会安定,政通人和。特别是保康的民众纯朴善良、勤劳勇敢的传统美德正在发扬。这次来保康考察,得到了市、县和有关乡镇及村里同志的大力支持,非常感谢!几天的考察,都是在高兴中、兴奋中、震撼中度过。希望并坚信同志们定会发扬成绩,敢于担当,艰苦奋斗,努力工作,多出成果,为襄阳和保康经济、社会发展再创佳绩,为荆楚文化增添光辉,为丰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作出更大地贡献。

(王生铁,湖北省政协原主席、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此文为2015年11月7日在荆山史前文化考察座谈会的讲话,题目为编者加)

统一思想，切实做好文物发掘工作

王生铁

今天召开座谈会，就是请大家一起讨论保康早期楚文化和荆山史前文化。主题很明确，就是在理顺已有线索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思想，形成共识，切实加大发掘力度。

保康处在荆山之中，周围有华中屋脊神农架、千里房县和秭归殷山移民、南漳的古山古水古林古寨所环抱。原来，我对保康是没有印象的，我在编写荆楚文化的渔鼓词时，当时没有写保康，后来在洪山大礼堂看了《荆山楚源》演出后，才对保康有印象，就加上了保康。2009年又从报上看到武清海主席参加在保康举行的一次“早期楚文化”研讨会，觉得保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渊源。但有人说先楚始都在保康重阳，开始我是不相信的，后来在阅读史籍资料后，组织了几次实地考察，觉得这一课题值得探讨和研究。所以呀，我在红安干部学院讲课时，就正式地提出了丹水上洛和保康重阳同是楚源的观念。为什么又这样定论呢？证据来自哪里呢？来自于我接触到的、看到的、听到的、阅读到的资料。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发展，各地各部门对文化研究给予了有力的支持。保康县委、县政府及有关职能部

门勇于担当,组织保康历史文化研究者,历尽千辛万苦,踏勘地理人文,提出了荆山史前文化和早期楚文化线索。了不起呀!这些线索,令人兴奋。关于三皇五帝及有关历史名人在荆山、楚源,既有线索,也有信史、民风,现在正在进行考古发掘。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有的震惊、兴奋,有的不信、质疑,认为是天方夜谭而彻底否定,有的还指责作者无知,冷嘲热讽,有的专家不闻不听就直接否定。这些情况都是我亲眼所见。对于学术问题,持不同意见很正常,有的人是认真负责的,有些是因为没有接触荆山楚源而提出质疑,这是正常的学术态度,可以理解。

我这些年,通过查阅资料,实地考察,多地走访,广纳谏言,拜师请教,认真分析研究,觉得各类线索有值得深入研究的价值。为什么说有研究价值呢,因为有出土文物,有权威典籍记载,有众多的遗址和遗迹,有民间自古的传说,经综合分析,里面的许多疑点、谜团有待解开。

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出土文物。保康县在历史文化遗址遗存调查发掘、工程建设、民间生产生活中,发现了众多的出土文物。

1. 雷楔石。在重阳及周边区域,民间收藏有出土的大量雷楔石。雷楔石一般是老百姓用来避邪的。本世纪初,望佛山一个农民在挖坟坑时一次性挖出了一背笼雷楔石,交给县文物局;当时县文物局无法收藏,使这些雷楔石下落不明。《四库全书》《梦溪笔谈》记载,“世人有得雷斧、雷楔者云:‘雷神所坠,多於震雷之下得之。’”实际上,雷楔石并不是打雷留下来的,而是古人早期石器遗存的用品,远古时期的重要文物。

2. 旧时期石器。2013年在寺坪度家坪出土了旧石器时代的石器,这对于荆山史前文化来说是个大的突破。

3. 石铲、石斧等石器。紫阳村村民李永兴在砖厂打工,挖到了石铲、石斧等石器6枚;我们去看的时候,他用红布单子包裹了放在箱子里精心保藏。

4. 石网坠。紫阳村出土有石网坠,由此可以证实古人在没有发明金属以前,用石头做网坠,结网捕鱼的事实;也为典籍中记载的伏羲教人结网捕鱼提供了物证。

5. 王湾遗址。位于保康城关镇北侧,面积约1000平方米,采集的有石斧和陶片。陶片以仰韶文化红砂陶为主,还有少量的荔枝红灰陶,纹饰多为云龙纹、熊纹,品类有鬲、斗、罐等。该遗址文化遗物具有中原冀州文化的显著特征,同时又具有成熟期时代的楚文化陶器特征。但到底是西周还是东周遗址,尚待定论。

6. 虾子坪遗址。位于保康寺坪镇,南河南岸的二级平台上,面积约1500平方米,石器、陶器文化层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唐宋时代。是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2013年11月配合麻竹高速公路建设,由省考古所抢救发掘,共有文化堆积层6层:第1、2层为现代耕土层;第3、4层为唐宋文化层,出土了大量的三彩瓷和天青色的钧瓷片,器型为盘、碟、杯、缸等;第5层为西周文化层,出土了少量夹砂爵陶、灰陶和红陶残片;第6层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出土了少量的黑陶、灰陶和石斧、石刀等石器。虾子坪和度家坪直线距离1000多米,距西周遗址的房县孙家坪20千米,这三者具有关联性。

7. 度家坪遗址。位于保康寺坪镇,时期为西周至汉代,属

古聚落遗址。该遗址于2009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面积约15万平方米。2011年配合谷竹高速公路建设,由襄阳市考古所进行抢救性发掘250平方米,出土了西周至东周云纹及熊纹陶件及残损器皿等20余件,另有秦汉五株币、代钱币及陶豆、陶牙、陶狗等物。该遗址的发现为研究荆山地区诸侯国文化和楚文化的源流提供了重要资料。

8. 穆岭头遗址。位于马良镇紫阳村沮水河东岸台壁上,二普时发现。方位呈长方形,南北长约500米,东西宽约100米。第二次文物普查时已见到了屈家岭文化层,整个紫阳汉砖、汉瓦随处可见,地表露出了大量的红砂铜噱陶器残片及鬲足、云纹、熊纹陶片。1966年建保康三中校舍时,出土了“大宋元帅镇征之印”的铜印一枚。2016年春,省考古院笪浩波在穆岭头复查时,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黑陶、兽牙膏化石,及屈家岭时期的云纹、熊纹、红陶、夹沙陶、鬲足等各个时代陶片数千件。文物部门已纳入重点勘察对象。

9. 锅厂遗址。位于店垭镇锅厂村,是东周聚落遗址,面积约17.5万平方米,文化层1米。在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村民肖安宝取土建房,出土较多陶片,器型有鼎、鬲等。根据断面文化层分析,北部为底层,南部为灰坑,并有其它遗址。从出土的器物认定,该遗址为东周时期,这为研究荆山史前和早期楚文化源流提供了实物资料。2016年春,笪浩波又进行复查,又发现了新石器遗物一件,陶片及文化层与东周遗址相符。

10. 青铜鼎。马良西坪村二组村民余传敏于1994年在高家山打柴时发现的青铜鼎,重19.6公斤,鼎纹系蟠虺纹,经省市专家初步鉴定为春秋晚期、战国早期的文物,为国家一级文

物,是王权的象征,是国家的重宝。

11. 青铜剑。已发现和保留的有3把,一把发现于紫阳村委会的原小学院中,现藏于襄阳市博物馆;一把发现于穆岭头遗址,现藏于县博物馆;还有一把发现于紫阳村委会东南50米处,被一朱姓村民在菜园坎边发现,由于此民不懂,将铭文磨光了,现由马良卫生院朱姓司机保管着,我们去看时,他怕我们弄走,只粗略的让我们看了下就赶紧收回去了。还听说,在紫阳村一处古墙的遗址边,村民建水塔同时发现了8把青铜剑,后当废品卖给了供销社。

12. 编钟。1950年店垭格栏坪村一村民在河里抓鱼发现,重约十几斤。属青铜本色花纹编钟,敲之声音悦耳,被当地小学做校钟敲了30多年,1983年不慎敲破,当作废铜卖给了供销社收购门市部。

13. 楚式鬲。在庾家坪村虾子坪被发现,属西周时期,有鬲足、鬲口圆、是典型早期楚鬲的器物特征,有熊纹,特别是出土的车型足、完全符合西周中晚期楚鬲特征。

14. 陶罐、陶豆。在虾子坪、庾家坪和王家湾遗址都出土有陶罐、陶豆等物,为早期楚文化典型组合。

15. 青铜钺。在虾子坪西周遗址附近,一农民耕田时拾得了一枚青铜钺,重约两斤,此物现为该农民珍藏。

16. 东风头村炎城湾遗址。位于羌水(嘉峪河)与沮水之间的结合部,传说是炎帝与老婆听訶的洞房之地,遗址有老虎洞、阿房上城、仙古洞、四方洞、和尚洞、青龙洞、黄龙洞、黑龙洞、白龙洞、姚家洞等48座洞寨遗址。我曾经去过3个,路很难走,其中酆家寨规模很大,洞外有石寨、石城和石门,是明显

古居之地。

17. 西汉祁乡县印。“农业学大寨”中,大约 1976 年,保康黄堡公社大坪大队改梯田时,出土了一枚古祁乡县的古石印,直径尺寸大约 7 寸左右,文字是西汉祁乡县印。历史记载,汉代确有祁乡县。听说当时交给了县里,后来下落不明。

18. 笄浩波教授考古遗址。笄浩波教授在《沮水田野调查报告》中,对保康马良重阳楚都遗址作了详细的介绍,已经讲的很具体,我就不再重复了。

以上所述,有我在荆山考察时见到的、听到的,有阅读文章资料知道的、掌握的。每一个发现我都记在本子上,有这么多的东西客观事实存在,能否定吗?比如这个鼎,不管是皇帝使用还是源自民间,它是存在的;还有这些青铜剑的出土,你能说保康没有文化吗?我们要用事实来说话。从出土文物看,荆山史前文化、保康楚源文化不仅存在,而且从没有断代过,从远古时期的,史前的、先秦的、唐宋元明的,都有文物出土,并且还和史书的众多记载相吻合,你们能说保康的史前文化不存在吗?

二、地名遗址。地名是从古至今一代一代的呼叫传承下来的。日本著名考古大师大雄先生说,地名是活着的语言,是生存到今天的古文,是最能说明古代历史的活化石。保康的远古地名数量之多,无法统计,非常突出的有关于炎帝、黄帝时代的文化地名,基本掌握的有 500 多个。而这些地名,直接与史书记载、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息息相关,可作比对和认证,成为研究史前文化和楚文化源流的重要线索。这里,我只说几个典型例子。

1. 荆山。全国尚存有几个荆山,但最早的荆山是与楚源

相关的,所以,保康的荆山极为重要。荆山的地名来自《尚书·禹贡》,《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资料,《禹贡》是重要的一篇,开篇就讲“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禹贡》800多字,其中有4处提到荆山,说明当时荆山就是一座名山。荆山在哪里呢?《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459页中和辞海都有标识和记载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标注的荆山范围为北纬 $30^{\circ}55''$ 到 $30^{\circ}58''$,东经 $110^{\circ}45''$ 至 $110^{\circ}31''$ 。《辞海》记载的更明了:“荆山在湖北西部,武当山东南,汉江西岸。沮、漳水发源于此,西北东南走向,主峰聚龙山,在保康中部,东南谷地宽广,西北巍峨陡峻。富丛林。西周时楚立国于此一带,有抱玉岩。相传春秋楚国卞和得玉于此。”就今天来讲,正是鄂西北的荆山,范围包含房县、神农架、谷城、宜城、襄州、南漳、远安、当阳、保康、宜昌、荆门的大部分,及荆州的马山、纪南一带,尾部在钟祥的汉水西部。荆山纵320公里,横290公里,总面积在2万多平方公里左右。

2. 伏羲和女娲滚石成亲的地名传说。在保康马良五虎,有伏羲和女娲成亲的石滚崖和滚石坡地名,也有鸿钧老祖做媒的地方,叫黄联池,还有甘泉宫遗址及相关的传说。据了解,全国原有263个女娲出生的地方,通过考证淘汰,目前只有6个了。女娲在保康,虽有一定的地名遗存和传说,但要做实这份历史文化,还需找出更多可以支撑的理由及证据。

3. 炎帝神农。许多古典籍记载,炎帝出生及活动地在荆山。而羌水是炎帝出生及生长的地方。现在荆山、羌水、沮水间的确存有古迹遗址。炎帝的死亡地点,现在一说炎帝葬在

湖南,因为炎帝确实与“湘文化”有关,另一说在宝鸡,可专家们认为宝鸡太牵强。从现在的证据看,保康遗存的古迹遗址,可能是最重要的线索之一,其中神农山、神农洞、神农河和神农架、神农溪、炎城湾等等,这些地名绝非无中生有,存在一定的渊源。不过,要作为论点,还要下大功夫、大气力,需要找出更多的证据,才具有说服力。

4. 卞和得宝献玉。卞和献玉和完璧归赵的故事千古传诵,人人皆知。荆山多荆玉,卞和得玉于荆山中、献玉于荆山下,古籍均有记载。一是《韩非子·和氏》原著“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楚山就是今天的荆山。二是卞和是春秋时期的楚人,生活于保康县马良镇卞家湾,现在卞家湾地名仍存在。三是有卞和墓。卞和墓位于重阳周公岭下,距离卞家湾只有10里之遥。即使现在,卞和墓地附近的村民仍有清明节给卞和插青上坟的习俗。四是卞和庙。与卞和墓相对应,地点在隔河相望的紫阳村,距卞和墓地仅1.5公里,当地人叫“卞和丞相庙”。庙前还立有庙碑,刻有“建庙记”的碑文;建国初,还尚存庙堂为三间正房,正殿供有火王、财神和卞和的泥塑神像。由于历史原因,卞和庙和卞和墓的地面建筑分别于1950年和1970年被毁,目前仅存地下文化遗址。五是荆山玉的发现。保康章茨武投资约五千多万元,先后在荆山各地通过反复考察研究,在荆山山脉古景山一带发现了八种宝石,证实了《山海经》“荆山多金玉”的记载。省地质试验测试中心对“荆山玉”检测后,认定荆山玉颜色丰富,纹理精美,结构独特,硬度大,抗耐磨,具有很高的雕塑性能,已达到玉石评级,具有很好的文化研究、观赏收藏及经济价值。相关专家评

论,荆山玉具有与古书记载的“金玉”及和氏璧的相关特征,在历史文化方面具有重大的研究意义。

5.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黑暗传》。《黑暗传》是保康、神农架、秭归、兴山、夷陵等周边区域口口相传下来的歌本,也叫《混沌传》《混元记》《盘古传》《玄黄始祖记》等。它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世界形成、人类起源的历程,融汇了混沌时期浪荡子、盘古、女娲、伏羲、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等许多神话人物历史事件,被誉为远古文化的“活化石”。20多年来,保康县通过大量的民间调查,获得了《黑暗传》的第一手资料,发现十多种《黑暗传》不同时代的手抄版本,而且保存的完整性令世人震惊。2011年6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黑暗传》的文本在联合国,也被西方国家所震惊。

三、自然环境。荆山,特别是保康一带,完全符合远古生产力发展的自然条件。这里有茂密的森林、有丰盛的果实,松软的植被、温和的气候、长流的河水、起伏的草原、成群的动物,大片的植物、众多的洞穴等先天自然条件,非常适合远古人类生存繁衍和发展。保康有众多的山洞,大都适合人类居住。印象深的一个是舜帝结婚的地方,叫姚家洞,洞很大,洞里悬崖峭壁,一不小心就会掉沟里。还有一个百家洞,里面可以住几千人,我平时走需杵一个棍子,有时还需要人扶着,可在那个洞子里棍子就不起作用了,钻进去看,太震惊了,还有十字街。另一个洞,当地人说里面有很多古尸,可惜因为没有时间而没有进洞去看。

前面重点讲的是保康,下面结合保康的周边地区再讲几点:一是从地理位置和地质结构上看,保康与神农架、房县、兴

山、秭归、夷陵、南漳等山区县毗邻,地质结构相似。神农架是从房县划出去的,保康聚龙山一带及保南是从南漳划出来的。大家知道,“建始人”是距今200万至250万遗留的远古人种,我国在发现建始人化石和“郧阳人”头骨化石后,曾向世界宣称:古老的汉江是汉民族文化的摇篮;古老的“郧阳人”是中国人的祖先。而这些古化石都在荆山或毗邻荆山;另还有宜昌的长阳人化石出土地,丹江的石鼓山、房县的樟脑洞,神农架的犀牛洞等旧石器时代遗址都在这个大区域内。周边地区都有远古人类活动遗址,所以保康在远古时也有人类活动毫不奇怪。二是从历史人物和活动范围看,西陵母与黄帝传说在远安、夷陵留有活动遗迹,保康与它们相邻。颛顼是高阳,兴山有高阳镇;屈原是秭归人,他的作品多涉及三皇五帝,《离骚》开头就是高阳,高阳距保康不远,屈原的故里也在荆山之中,这些基因都相关联。还有宜昌万福埡遗址,也是人类早期活动的见证,炎黄之战的板桥,也有个说法在南漳,有跑石岭、跑石寨等遗址。三是从楚都“丹阳”和迁徙路线看,楚都“丹阳”多次迁徙是史学界公认的,现在丹江有丹阳,枝江有丹阳,荆山及周边有6个丹阳。保康重阳古称“丹阳”,坐落在沮水(古称丹水)之畔,山南水北为阳,符合古地名传统,值得深入考证。假设保康是最早的楚都,后来随着楚国的发展壮大,楚都才多次迁徙;南漳、宜城等周边区域的史前文化或早期楚文化,可以与保康史前文化互为支撑和印证。这些地方,地理相近,民间相往来,很多故事相关联,如“和氏璧”的诸多情节,就已经把南漳与保康关联在一起。

今年,我们组织了两次考察外省史前文化,由主要领导同

志带队,考察的结果是,没有一个可以拿出确切理由的凿证,证明炎帝就在哪里的事实,也没有谁能拿出一个过硬的证据说黄帝在哪里的的事实。就像前些年到南阳考察诸葛亮一样,没有确凿证据说诸葛亮出生在南阳。综合保康历史文化分析,从荆山地名的定位,到名山、名水、古今地名的比对,从《黑暗传》等历史记载的神话传说,到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实物,从三皇五帝遗址传说到先秦时期的楚国青铜器,从名人的遗址、遗迹到历朝历代的文物遗存,说明保康历史文化链条前后相符、左右相连,综合反映了保康史前文化的线索。基因有符合炎、黄二帝出于荆山、楚源的信息。

四、深入发掘。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把历史文化提到了应有的高度。总书记指出:没有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特别强调要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添正能量,为实现中国梦作出贡献。省委也认真贯彻了中央关于文化工作的指示精神,特别重视和支持对历史文化的研究。

史前文化是中华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史料不足,一直不能权威定论,存疑很多。保康在明确为论证为早期楚国发源地的基础上,发现众多的史前文化遗址、遗物、相关线索,以及周边区域文化现象等相互关联,值得探索研究。一定要坚定文化自信,深入推进研究,加大力度发掘。党中央把文化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看作成理论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刻的自信,凸显了文化自信的特殊重要性。楚国早期始都是不是在保康,三皇五帝是否在荆山,要通过研究和发掘找出更多的线索和佐证。

具体在工作中,一是要多寻找线索,推进研究。在继续访问群众,广泛寻找线索的基础上,对有重要线索的遗址、洞穴、山寨等都要加大考察力度,力争把它搞清楚。二是突出重点,谋求作为。组织力量深入查证,做实第一手资料。三是加强管理,注重保护。对一些具有价值的遗址遗物要强化保护和管理,对已经出土的文物要调查,依法征收保管,不能让它散落在民间。四是深入发掘,培养人才。省文化厅、省文物局在抓紧发掘的同时,要挑选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参与这项发掘,培养人才,积蓄力量,增强后劲。最后一点要加强领导,统一思想。特别是保康、省文化厅、文物局、考古队等等要统一思想,不能有多此一举的糊涂认识。还要请相关专家、大学教授来协助指导论证、考察。希望保康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足够的信心。多年来,大家一直老说楚文化楚文化,但楚文化的根基从来就没找到过,所以大话空话不要讲,还是多做些实实在在的事。保康要组织团队力量,明确研究主题,保障工作经费,多做基础性工作。今年,我计划再次到保康,根据情况邀请些专家深入论证。总之,大家要把观点搞清楚,把主题弄明确,研究出重点来。

荆山史前文化研究是保康的一件大事,也是湖北的一件好事,更是荆楚大地的一件盛事。我们一定要做好做实,不然对不起祖宗啊!

(本文系王生铁同志2016年12月14日在保康史前文化汇报会上的讲话,题目为编者加)

保康史前文化课题值得探讨

王生铁

我们一行这次到保康来,主要是了解穆岭头遗址历史文物发掘的情况,并与襄阳和保康的同志共同研究保康的史前文化和早期楚文化的源头问题。对这次活动襄阳市委市政府、保康县委县政府都非常重视,保康县委书记张世伟同志在万忙中挤出时间参与共同研究,在此,我表示感谢。

昨天,我们实地考察了穆岭头遗址和县博物馆、马良民俗文化馆,今天的座谈会上,张世伟同志全面介绍了保康县的情况,各位专家介绍了保康古文化的研究工作和成果,同志们的发言站位很高,思想性很强,讲得很好,我听了很受启发。现在我谈点体会和建议,供大家参考。

从汪青祥同志提供第一本《讲古话重阳》起,近十年来保康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研究荆山古文化,保康的历史文化研究工作者们艰苦努力,推进了史前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工作,成绩显著。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专家们深入实际,不辞劳苦,历尽艰辛,踏遍保康的山山水水,钻山洞,爬陡坡,在丛林中穿梭探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专家们的可贵精神真了不起,值得我学习。在此我真诚地向各位专家们送上祝福,祝愿

大家健康长寿,再创辉煌。

我这次到保康来非常高兴,特别是穆岭头遗址在省博物馆领导的重视和精心运作下,发掘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方勤馆长具有很强的敢于担当风险、勇于开拓进取的精神,笪浩波教授尽职尽责,秉承楚人筚路蓝缕、艰苦奋斗的踏实作风,带领考古队在穆岭头遗址发掘出丰硕的成果,出土石器、陶器、玉器、骨器等近500多件,仅陶器就有400多件,特别是玉璇玑、玉钺、玉斧等文物,全省少有,襄阳唯一,填补了历史空白。尤其是玉璇玑标示了当时的等级制度和重要权力的象征。这些文物的出土把保康的历史文化提到了5000年以前,比夏朝还要早800多年。更重要的是这些出土文物得到了国家权威专家的肯定和认可,很不简单。在古代荒芜的深山之中能够出土这么多重要遗存文物,不敢想象,真是了不起啊。

现在可以说,穆岭头遗址的考古成果为荆山史前文化研究打破了坚冰、开通了航道,增强了信心,探索了门路,创出了经验。方勤馆长冒风险、敢担当,勇于开拓的使命感和笪浩波教授长达5个月的时间扎根考古工地,在荒山野岭中发现了瑰宝,劳苦功高。穆岭头遗址文物的出土,省博物馆和保康的历史文化研究工作者们功不可没。

下一阶段怎样推动保康历史文化研究,我谈几点建议:

一、深化认识,统一思想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深刻认识文化的重要性并统一思想,才能深入发掘和研究出保康历史文化的更多成果。

我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非常重视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文化建设排到了重要的位置。

习总书记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还着重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习总书记陪同印度总理莫迪在参观湖北省博物馆时指出:“荆楚文化是悠久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地位举足轻重”。习总书记把荆楚文化提到了国家高度,从国家层面来重视荆楚文化。成语“筚路蓝缕”就出自荆山,习总书记在系列讲话中多次为这一古老的词汇赋予了新的使命。比如“以筚路蓝缕的精神来建设这个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要永远保持清醒头脑,继续发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那种精神……敢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挑战”等等,我们作为荆楚文化工作者,值得骄傲。

保康是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是楚文化的重要源头,是荆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说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枚瑰宝。由于历史的原因,秦楚之战、秦始皇焚书坑儒;楚汉之争,汉武帝独尊儒术;再加上“黄河文化中心论”,大量的楚文化被损毁、被淹没了。因此在我国史学研究中存在着一些偏颇。主要现象就是六重六轻:重北轻南、重河轻江、重黄轻炎、重龙轻凤、重儒轻道、重秦轻楚。六重是应该的,六轻就有失偏颇,泯灭了辉煌灿烂的楚文化,使中华文化失去了非常重要的一枚瑰宝。我和武清海主席曾到国家博物馆参观,里面与楚文化相关的文物寥寥无几,我们感到非常遗憾,辉煌灿烂的荆楚文化在国内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展示。为此我们一定要深入发掘荆楚文化,填补、充实、丰富中华民族的文化。

省荆楚文化研究会原来组织撰写《荆楚文化八千年》一书就是为中华民族文化充实内容、填补空白、纠正误差、还原真实，在国际上为中华民族文化争话语权。研究荆楚文化是湖北的史学专家们以楚人的爱国情结、楚人的执着精神写好荆楚文化的历史。

荆山保康历史文化在荆楚文化中不可缺少。但由于历史久远，沧桑巨变，保康处于荆山之中的深处，史学家们难以涉足阡陌古坵的深山之中，辉煌灿烂的文化被历史遗忘，在现代民众中尚不了解保康历史文化，不知道保康就是荆山；甚至某些专家对保康史前文化有怀疑、有微词，尤其是本县及县直有的领导同志中有较多的杂音，这都可以理解。有些同志缺乏调查研究，又听不进专家们的正确意见。更有对历史不负责任的同志对研究保康历史文化泼冷水，甚至冷嘲热讽，阻碍研究工作。庆幸的是还有一大批热心保康历史文化的研究者，在冷嘲热讽中披荆斩棘向前推进。经保康历史文化研究者历经千辛、艰苦探讨，分析保康有出土文物、有古传遗址、有典籍记载、有遗物证明，有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有与周边区域文化因子相关联的印证。就目前已知的出土文物：有重阳区域雷楔石，庾家坪旧石器，有紫阳村李永新家存放六件新石器，有紫阳村网坠，有王垮遗址西周至东周聚落群，有虾子坪新石器时代至唐、宋六层文化层石器和陶器，有庾家坪西周至东周大量陶器，有穆岭头紫阳村沮河东岸台地上东周至汉的陶器和汉墓群，有锅厂遗址大量陶片和聚落群，有西坪村余传敏在高架山砍柴得到的青铜鼎，有重阳村委会台旁出土的三把青铜剑，有紫阳村古城墙遗址台地发现八把青铜剑，有栅栏坪村民

捞虾捞起的编钟,有庾家坪、虾子坪发现春秋楚式鬲,有王湾遗址早期楚文化陶器组合,有虾子坪农民耕地发现西周青铜钺,有炎城垆遗址,有仙古洞等 48 洞寨遗址和大中型石器,有大坪村出土祁乡县石印,有余家岗老屋场东周古陶片,距今 3000 多年。第三次考古发现保康 40 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以上 19 处出土文物,是我近些年考察看到、听到、阅文知道的实物铁证。这次穆岭头遗址文物的发掘就是一个铁的证明。因对保康研究历史文化的杂音很多,影响深入发掘的工作,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出土文物铁的事实和古代遗址、史书记载、遗物遗迹等有关条件的大量证明材料来深化认识,统一思想,高度重视对保康历史文化的深入发掘、研究、弘扬和利用。

二、明确任务,深入发掘

现阶段,发掘,研究保康历史文化的主要任务有四项:一要发掘史前文化丰厚的实证;二要找出更多黄帝在荆山的可信依据;三要弄清早起楚都和楚文化铁证;四要重视历史文化发掘和收集。

深入发掘就是要以穆岭头遗址为重点开展发掘。一要在紧靠穆岭头遗址的边缘以洛阳铲进行探测;二要向国家文物局提交第二次深入发掘报告;三要做好本县教育局和穆岭头学校的工作,并与省教育厅联系,以保证发掘工作和学校教学工作不相冲突,运作中注意保密,保持安定;四要清理历史文化的线索,有计划地推动发掘;五要认真做好穆岭头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工作;六要弄清周公岭、卞和墓、滚石坡等地名历史情况后,树立明显的标识进行保护和有计划的发掘工作。

三、健全班子,精心运作

尽快将已拆散的工作专班恢复起来。根据县委书记张世伟同志和许多领导同志及众多专家的举荐,提出请原政协主席肖定佐同志牵头。定佐同志历史积淀厚、文化底蕴深,有才华、站位高、看得远,熟悉保康的县情,是最合适的人选。组成班子要安排好,要把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文化爱好者纳入到史前文化研究队伍中来,制定工作计划、规章制度、按章办事。襄阳市要确定少而精的班子为保康提供支持,抓好保康源头文化的发掘工作。省博物馆要主动作为,与研究班子配合好。请方馆长继续高度重视,负责领衔支持保康历史文化的发掘和研究。按照方馆长的安排,笄教授继续专门抓好穆岭头遗址发掘工作,并安排几位有事业心、有培养前途的年轻专家参与,由笄教授负责指导工作。

四、安排场所,保证经费

县研究会要有办公场所。要解决好省考古队的办公场所和食宿问题。市县乡镇几级参与考古工作的同志们的办公场所和食宿问题也要安排好。要保证历史文化发掘工作的正常运转。基本经费以县里为主,市里要安排专项资金大力支持,省里要酌情给予适当补贴。同时县研究会要制定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按章办事。要尽量节省开支,一定要严防资金的流失和浪费。

五、统筹兼顾,全面安排

当前要认真抓紧抓好几项相关重要的工作:

1、精心办好县博物馆。一是基建要保证安全,尽快完善;二是布展要突出远古,特别是五千年文化的历史特色;三是展

出的文物要有年代的连续性；四是依法收集遗存在民间的文物；五是展出的文化说明和讲解词要详细，营造出保康浓厚的文化氛围。

2、重视史前文化的宣传工作。一是对已有的出土文物和史记记载、遗址等要进行多次综合报道；二是对穆岭头遗址要进行重点报道，省博物馆提供稿子，可以举办新闻发布会，邀请一批权威专家参加；三是定期发布有关保康历史文化的文章；四是关于将研究成果出版一事，要慎重，要重视质量、抓重点，不要面面俱到，先出单行本、专题、短篇，内容要真实可信，逐步推进。

3、联系权威专家，敬请支持。一是省荆楚文化研究会要有计划地向省内文化专家宣传保康古文化发掘的情况；二是邀请省内历史文化专家到保康开一次历史文化研讨会，研讨内容要注重实效；三是要联系国家和外省的权威专家，邀请他们来保康考察、研究保康文化，取得他们的支持。

4、依法维护文化古迹。要按照法律规定保护文物、遗址、遗物。对已经发掘出来的文物，要保护好，不能遗失。具体要求是：一要有计划地宣传国家保护文物的法规；二要对重点文物、古迹定向保护；三要对保护文物、古迹明确责任人，具体责任人要在编在册。

六、加强领导，明确职责

一要把握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坚持两为方向，双百方针。研究历史文化要有利于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有利于与各级党委政府保持统一，有利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保持社会安定，有利于国家文

化的安全,有利于实现祖国的统一。二要认真负责。职能部门具体负责抓落实。三要高度重视。市、县、乡和有关职能部门、特别是县里四大家的领导要统一思想。四要开拓进取。应以楚人的开拓创新和执著精神研究历史文化,不得无所事事,要有所作为;不能因循守旧,要大手笔的干;不要粗枝大叶,要精心运作。五要严格要求。当前,党中央强调要进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我们文化研究者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中华民族文化增光添彩,在国际上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争话语权。我深信同志们定能严格要求自己,在政治上与中央保持一致,在经济上一尘不染,在工作上遇到艰难险阻要披荆斩棘地前进。六要加强团结。大家能够走到一起,共同为发掘、弘扬和利用荆楚文化而奋斗,这就是缘分。团结就是力量。欢迎各方人士在学术上争鸣,但不能闹无原则的纠纷,将共同努力发掘的真实成果,从根本上自我否定。现在正是文化发展的大好时机,我们要十分珍惜,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撸起袖子干,在深山老林中建设一个文化强县,努力奋斗,为振兴乡村,为扶贫攻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新的贡献。

(本文系王生铁同志2019年5月30日在保康史前文化汇报会上的讲话,题目为编者加)

关于保康史前文化与神话 传说研究的思考

朱俊英

史前文化,就是指人类使用石器的文化。近些年来,保康本土专家学者研究认为,荆山地域尤其是保康境内遗存有众多史前文化遗迹。最近,在省老领导王生铁同志的率领下,省荆楚文化研究所和省文物考古研究紧密协作,开展了为期5天的荆山史前文化考察。下面,我从文物考古角度谈谈看法。

一、保康史前文化在全国考古学文化谱系中的位置

全国考古学文化谱系基本形成,江汉文化谱系最早的是彭头山、城背溪文化:公元前7000年—前3500年,分早晚两期,以釜、罐、圈足盘、钵、碗、瓮、支座为代表。

然后依次是大溪文化:公元前4400年—前3300年,分五期,以釜、盘、曲、腹、杯为代表。

屈家岭文化:公元前3000年—前2600年,分二期。以双腹器为代表,器类有鼎、壶形器、蛋壳彩陶,孟形圈足杯、双腹碗、双腹豆、喇叭形杯、卷沿或折沿大盆、厚胎白、敞口斜壁碗、蛋壳彩陶碗、三角形钮和圈足钮器盖、管形器。双腹碗、双腹

豆腹部较浅，仰折明显，鼎足多卷边，高领罐为圆鼓鼓肩，形体较肥，肩部大都饰整齐的凸弦纹。

石家河文化：公元前 2600 年—前 2200 年，分二期。麻面鼎、高领罐、红陶斜腹杯、粗柄豆等为代表。

夏代遗存：公元前 2200 年—前 1900 年，分二期。三角形罐形鼎、盆形鼎、深腹罐、中口罐、有领罐、釜、有领瓮、圈足盘、细高柄豆、碗、擂钵、大口尊、缸。

保康史前文化所处的时间，约在公元前 3000 年—前 1900 年之间，处于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夏文化时期。

二、全国有关炎黄尧舜禹遗迹的寻找、发现的考古学研究概况

1. 关于黄帝。民间和官方都祭陕西的黄帝陵，但学者王光镐梳理了文献与考古材料，列举了 10 端理由，得出黄帝与美玉有关。王著以“黄训玉”，由此寻找黄帝之名，与美玉崇邦有关。认为黄帝源出于燕山以北，崛起于燕山以南，再迁于中原之地。他以为黄帝将北狄、东夷、西戎和中原集团凝结成一个共同体，黄帝是人文始祖，民族始祖。

2. 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郭静云在《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书中提出夏源于江汉，包括荆山。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国是由多民族组成的，江汉是最早的、一脉相承的、没有中断的文明，这是跟稻作起源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3. 考古学对古史传说时代的寻找与论证。放眼全国，学术界公认的文明起源与形成阶段的最具代表性的特大型城址和遗址有 6 处。分布在我国北部的有陕西神木的石峁龙山文化遗址，山西襄汾的陶寺龙山文化遗址和辽宁牛河梁的红山

文化遗址；分布在我国南部的有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湖北石家河文化遗址和浙江良渚文化遗址。这些城址及遗址分别代表了我国北方及南方不同区域在文明起源和形成阶段多元一体的格局。

现在学术界已初步判断石峁古城是黄帝的都城，陶寺古城为尧都，三星堆古城是古蜀国都城。那么，我们似乎可以推定石家河古城是三苗的都城。

三、对保康境内史前文化遗址的了解与认识

1. 据保康县博物馆王洪祺同志介绍，保康境内已发现 20 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应远不止这些遗址。

2. 据我从文物地图集中统计，可以确定的有 16 处：寺坪虾子坪、寺坪二河滩村、过渡湾三汊河、店垭白蜡村、马良张家岭村、马良紫阳村等遗址。虾子坪遗址位于寺坪镇岗子村虾子坪南岸二级台地上，2013 年 11 月配合麻竹高速公路建设，省考古所进行了发掘，第 6 层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出土有黑陶、灰陶和石器，其年代可能相当于屈家岭文化时期。

3. 此次调查了 6 个地点，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有马良的重岐，最上层为六朝文化层，堆积厚约 30 ~ 50 厘米，其下还有更早的文化堆积，且在遗址上采集到有新石器的石斧，这石斧经多人证明，为寻找神话传说中黄帝、伏羲、女娲提供了线索。

4. 保康的史前文化为三重证据，比王国维的二重证据多了一重证据。一是神话传说、民间传说；二是文献记载；三是地下的实物资料。说明历史文化底蕴丰厚。

四、保康寻找神话与古史传说的意义

1. 文化遗产保护与发掘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化是人类文

明的精神家园,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对于研究人类文明的演进具有重要意义,保护文化遗产还有利于继承和发展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培育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品格;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

2. 保康遗址遗存值得深入发掘。过去,保康曾多次发现古代文化遗物,如重阳西坪村民余传敏在打柴时,无意中发现一鼎,现存放在襄阳市博物馆中。这次考察,初步认为有些遗存遗址值得进行考古发掘,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不便一一展开细说。

3. 加强传统文化的保护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文化遗产是先人创造的沉积与结晶,镌刻着一个民族国家文化生命的密码,蕴涵着民族特有的精神机制、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维护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加强传统文化的保护,不仅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文明对话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传统文化是衡量一个领导的层次与标尺。

五、今后的工作任务方向与目的

一是要学习研究全国相关专家已发表的有关史前传说的文章与研究成果,特别是重点阅读并研究徐旭生先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二是要通过正规渠道对保康境内的史前文化遗址进行调查、钻探、试掘,基本掌握保康境内史前遗址的数量、位置、地点、文化堆积状况、年代、规模等级、文化因素。

三是要加强卞和墓地保护。卞和是历史文化名人,保康马良的卞和墓地,位置和环境好,这是保康一张很重要的名片。如果通过发掘勘探确定为东周时期的楚墓,特别是春秋早期楚文王时的楚墓就更好了,它将强有力地拉动保康生态旅游发展。所以,即使暂时不做发掘工作也要切实加强墓地保护,防止人为破坏和损毁。

(朱俊英,湖北省博物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国家考古领队,湖北省人事厅文博系列高级职称评委。本文系2015年11月7日在荆山史前文化考察座谈会上的发言)

荆山保康史前文化考察的看法

张 硕

荆山史前文化考察自 2013 年启动以来,在 2013 年 11 月、2015 年 7 月和 2015 年 11 月已相继进行了三次考察活动。这三次考察,学会领导高度重视,考察组阵容强大整齐,保康县各级领导组织、接待安排热情、有序,使三次非常成功、圆满的学术考察活动,取得了许多新的重要的成果。我有幸参与了后两次考察活动,现就这两次考察实践,以及平日科研中的一些思考,谈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第一,保康县委、县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地方历史文化建设,其独到的眼光、有力的举措,令人敬佩。从“楚源地”无形资产品牌的打造,到“楚文化长廊”、博物馆、文化馆等文化设施硬件的建设,无一不体现了保康县领导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的信心与决心,这在一个山区县、贫困县尤其难能可贵。

第二,保康县各级文化宣传部门领导、同志对地方历史文化高度自觉、自信,令人钦佩。保康的同志克服重重困难,致力于保康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发掘、整理、弘扬及利用,取得了一大批令人瞩目的成就。如大型歌舞剧《荆山楚源》,如梦如幻,其剧本、舞台、灯光、表演非常专业,很难相信它们出自

一个县级文化团体,对于提升“楚源地”品牌起到了积极作用。所以。尽管多年过去,《荆山楚源》首演时的盛况、来自全国各地的赞许、在武汉演出时王生铁主席和宋育英主席的连声称好,犹历历在目。又如《和氏璧》杂志,年刊六期,全彩印刷,既有王生铁、武清海等领导的重要讲话,又有刘玉堂、吴成国等著名学者的重磅文章,还有本土学者的心得之作,可谓阳春白雪,雅俗共赏,这样的气势、这样的格局在省内是不多见的。其他如《荆山楚源文集》(上、下)《荆山旅游文化丛书》(5卷)《黑暗洪荒传》(包括“连山易”的发现)《卞和传奇》《荆楚春秋》等一系列成果,立足保康,扎根荆山,影响深远。又如以汪青祥、杨选成先生为代表的一批保康地方文史专家,出于爱土爱乡的质朴情感,不计名利,跋山涉水,餐风露宿,深挖保康地方历史文化的根脉,相继推出了《讲古话重阳》《黄帝在荆山》《荆山古文化之谜》《荆山探祖》等系列丛书,他们坚韧执着的精神,值得我们专业科研人员学习。

第三,保康厚重的人文底蕴、传承有序的文脉、淳朴的民风,令人艳羡。踏足保康山山水水,那一些充满古意的地名(如神农洞、神农村、嫫祖庙等),让人难免发思古之幽情;《黑暗传》《沮水巫音》神话传说等,充满神秘色彩,让人欲罢不能;特别是保康人民热情、质朴,更应该是远古文明的遗风流韵。总之,保康是一块充满人文魅力的神奇土地,每每让人流连忘返。

第四,对保康历史文化的定位。对一个地方历史文化的定位,首先要摸清家底,然后反复揣摩,最后精准定位。对保康地方历史文化的定位,我在大家研究的基础上,斗胆提出来

自己的看法,即:保康是“史前文明的富集地”和“楚文化的发祥地”。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所谓“史前文明的富集地”,在保康,炎、黄二帝的神话传说流行甚广,保康境内的有关史前文明的古老地名比比皆是,应该是史前文明的富集地。

所谓“楚文化的发祥地”,目前在学术界,该论题仍是一个讨论热烈却没有达成一致的课题,说法较多。但是保康拥有包括《左传·昭公十二年》《史记·楚世家》《汉书·地理志》《韩非子》以及楚简中如“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筮路蓝缕……”“江汉沮漳,楚之望也”等文献记载,拥有境内出土的青铜鼎、剑、镞等文物,拥有楚人卞和、楚厉王、楚武王、楚文王等的传说,即具备文献、文物、口述史料的“三重证据法”,目前可基本上确认保康为“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第五,关于今后开展保康历史文化研究的几点小建议。在对保康地方历史文化基本定位形成共识后,下一步的任务就是深入发掘、深度研究、传播利用,最终成为保康的文化名片和软实力。在这个阶段,我们的建议是:

1. 克服地方保护与地方功利主义。一些地方领导和地方文史专家出于爱乡心切,恨不能将中华民族优秀遗产统统归于自己的家乡,如“名人故里”之争,就是明显的例子。从炎、黄、尧、舜、老子、姜子牙、诸葛亮、赵云、李白,到文学名著中的人物如孙悟空、西门庆都不放过。这样急功近利、违背史实的名实之争,不仅不能提升地区知名度,有可能还弄巧成拙,成为笑柄。所以,我们在经过三次考察、寻找大量线索后,进入小心求证阶段,务必小心、小心、再小心,形成证据链,办成

“铁案”！

2. 切忌将神话传说与信史混为一谈。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但有文字记载的信史始自殷商,夏朝的历史尚在艰难探索中。神话传说尽管不是信史,但其历史文化价值也是不容抹杀的。我们有专门的学科“中国古代神话研究”,著名学者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对于古史传说时代华夏民族的起源、发展考察详尽,对于中国史前文明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3. 要有广阔的学术视野。研究古代史特别是史前文明,特别要克服眼光狭隘的缺点,跳出如今行政区划的束缚。如考察炎帝神农,我们不妨将随州、神农架、房县、谷城、当阳纳入研究视野;考察嫫祖,不妨将远安纳入研究视野;考察女娲,要将竹山纳入研究视野;考察《黑暗传》,要将房县、神农架纳入研究视野,等等。

4. 要有科学严谨的研究态度。科学研究要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容不得半点虚假,不能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断章取义,任意裁剪,甚至伪造材料,为我所用。在我们此前的研究中,不乏这样的遗憾之处,我们在第二次考察后,针对保康学者的研究文本逐条做了校误订正工作,如《黄帝在荆山》一书引《诗经·商颂》“维汝荆楚,居国南乡”,目前所见任何一个版本,都是这8个字,可作者将“汝”改成“女”,把“乡”改成“襄”,就是为了将“女”说成玄女,即“西陵母”,将“南乡”改成“南襄”,即远安阳平镇沮水河的南襄阳城,可谓极不严谨的改动。如果多处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不得不怀疑这项研究的科学性、严肃性、权威性。

第六,感动之余的表态。面对荆山如此厚重的文化、荆山人如此执着的精神,我被深深感动了。作为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的一名成员、荆楚文化的一名研究者、《荆楚文化八千年》第一卷的作者,我愿意在王生铁名誉会长、陈昆满副会长、李德华副会长等领导下,和保康的同志一起,筚路蓝缕,推进荆楚文化研究再上新台阶。

(张硕,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硕同志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湖北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撰写、主编、参编的著作有《楚市商贾》《惟楚有材》等及多篇学术论文。此外,还主持或参加多项国家社科基金、省社科基金以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招标课题项目。此文系2015年11月7日在荆山史前文化考察座谈会上的发言)

湖北保康穆岭头遗址发现屈家岭 文化高等级墓葬

湖北考古所

穆岭头遗址位于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紫阳村七组,北距保康县城约 45 公里,遗址地处重阳盆地的紫阳台地上。重阳盆地为荆山山脉中的一个椭圆形盆地,呈西北—东南向,面积略 2 平方公里,沮水由西北向东南横穿整个盆地。紫阳台地处于盆地的北部,台地北高南低,北依雒山余脉,南临沮水,西临重溪河,沮水南边有一洞河注入沮水。遗址主要分布于紫阳台地西南部,大致呈长方形,南北长约 400 米,东西宽约 200 米,面积约 80000 平方米,距沮水面高 3~5 米。

该遗址在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被发现,1982 年被保康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4—1995 年,保康重阳楚鼎出土后,襄樊市博物馆在对重阳一带的古文化遗址进行调查时,在穆岭头遗址采集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和东周时期的陶器和石器 etc 等遗物。2016 年 3 月,为配合国家社科基金“清华简《楚居》与楚国都城研究”项目,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沮漳河流域的楚文化遗存进行了系统调查,在对该遗

址进行复查时,发现有新石器时代和西周时期遗物。

2017年8月至2018年1月,为配合国家文物局“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课题项目,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穆岭头遗址考古队,对穆岭头遗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目的是通过科学细致的勘探和发掘工作,进一步弄清遗址的分布范围、文化层堆积、文化内涵和起始年代等,为进一步的考古工作和遗址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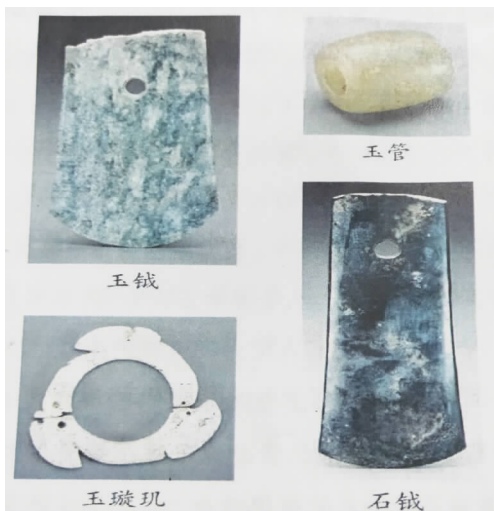
本次发掘采用方位布方法,选取重阳小学南教学楼的东南角作为永久基点,进行整体布方编号,以5米×5米规格作为一个探方单位,便于以后长期的考古发掘工作。根据发掘区的位置分为东西两个发掘区,相距90米。东区布探方14个,因发掘效果不好(皆为后期垫土,无文化层),实际发掘4个,发掘面积64平方米;西区布探方12个,实际发掘11个,加上扩方,实际发掘面积约240余平方米。

遗址文化层分四层,第1层为耕土层,第2层为扰乱层,有西周、汉、宋及近代文化遗物。第3、4层属文化层,为屈家岭时期文化遗存。

本次发掘的文化遗存主要包含新石器时代和已扰乱的古周文化层,遗迹主要有屈家岭文化房址3座、灰坑11个、灰沟1条、墓葬23座,西周灰坑1个,东周墓葬3座,汉代灰坑2个、墓葬2座,宋代灰沟1条,清代墓葬8座。

屈家岭文化遗存分布于整个发掘区,属遗址第3、4层。文化层堆积较厚,厚0.6~1.4米,灰黑色土夹杂大量红烧土块、红烧土颗粒、少量木炭、动物骨头等,出土陶片和石器较多。墓葬分布

于遗址上,皆为长方形或梯形竖穴土坑墓,分布较为密集,少有打破现象。头向以南北向和东西向居多,极个别西南向。葬式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少量二人合葬和三人合葬。多为一次葬,少量二次葬,无葬具,人骨大多保存不完整,易碎。各墓随葬品数量都较多,主要以陶器为主,还有少量石器、玉器、和骨器。随葬器物大多分为三排分置于人体的头部及左右两侧,按一定的规律摆放,也有少量置于人体之上的。出土的陶器中以杯形器最多,可修复完整的约 400 余件,以泥质黑陶、灰陶居多,红陶和彩陶较少,夹砂陶数量也较少。陶器以素面为主,少量饰弦纹、划纹和附加堆纹,也有少量彩陶器。可辨器型有陶鼎、双腹豆、双腹碗、高领罐、圈足碗、高足杯、壶形器、孟形器、器盖、陶钵、陶杯、小陶罐、纺轮、陶环等。石器皆通体磨光,制作精美,有穿孔石钺、石圭、石斧、石铤、石镞、石刀、石凿等。玉器数量较少,皆出土于墓葬中,制作精美,有穿孔玉钺、玉璇玑、玉斧、玉管等。骨器数量较少且破碎,有象牙管、骨锥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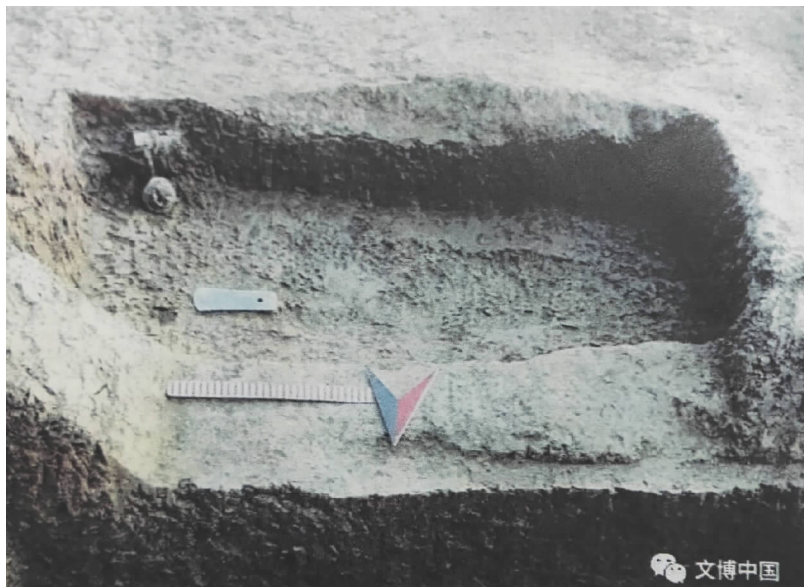
这次发现了几座屈家岭时期的高等级墓葬,出土了一批重要的器物,对同时期高等级墓葬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M26 与 M33 为一对异穴合墓葬。

M26 开口③层下,打破④层,上部被 H10 打破。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 75°,墓坑东西长 230 厘米,南北宽 160 厘米,深度为 84 厘米,坑壁光滑、底部平坦,有生土二层台。未发现葬具,人骨痕迹明显,仰身直肢葬,四肢伸直。人体长 180 厘米。随葬玉器有玉钺一件,长 22 厘米、宽 16 厘米,压于右肱骨及背部下;玉璇玑一件(分为二片),置于右手掌上;玉斧一件,置于右小腿一侧;象牙管一件,置于头部右侧。随葬陶器大多置放于生土二层台上,也有凌乱摆放于人体上面及两侧,猜测应有葬具。陶器皆破碎,复原 20 余件,可辨器型有高足杯、双腹豆、壶形器、盂形器、罐、缸及彩陶豆、罐、器座等。



M33 开口③层下,打破④层,上部被 H10 打破。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坑东西长 210 厘米、南北宽 92 厘米、深 72 厘米,坑壁光滑、底部平坦。未发现葬具,人骨痕迹不明显,仅见牙齿碎片。随葬陶器较破碎,可辨器型有高足杯、盂形器、双腹豆、罐等,在头部位置随葬有一石钺,石钺长 26.1 厘米、刃宽 9.5 厘米。



M23 开口③层下,打破④层,西南角被东周墓(M15)打破。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 340° 。墓坑南北长245厘米,东西宽95厘米,深度为88厘米,坑壁光滑、底部平坦。未发现葬具,有人骨痕迹,腐朽严重。人骨左手臂下随葬有玉钺一件、玉璇玑一件,脖子处有玉管二件。随葬陶器较破碎,置于人体两侧及身上,推测存在葬具。复原陶器30余件,有鼎、孟形器、壶形器、罐、双腹豆、豆、高足杯、碗及缸等。



此外 M34、M36 也出有石钺。

此次发掘的区域为屈家岭文化时期的一处氏族墓地。墓葬随葬品数量之丰富、器物之精美是以往屈家岭时期墓葬所不曾见的。玉钺、玉璇玑、象牙管等器物更是屈家岭文化的首次发现。从随葬玉钺、玉璇玑等权力象征物的 M23 及 M26 看,墓

主应该为一酋长级别的首领。而从每座墓葬随葬陶器数量都很丰富看,该墓地应为一处较高级别的氏族墓地,表明穆岭头遗址在屈家岭文化时期为本区域的一处较高级别的聚落。

穆岭头遗址屈家岭文化时期高等级墓地系屈家岭文化考古的首次发现,它对于屈家岭文化时期墓葬的等级葬制研究无疑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玉钺、玉璇玑等权力象征物的发现,对于今后同时期高等级墓葬的认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墓葬中随葬大量的高足杯、盂形器和壶形器等,这些器物显然是身份等级的象征,使我们对于这些器物的功能有了重新认识。

这次考古发掘首次揭露了荆山区域的屈家岭文化遗存,表明荆山区域仍属屈家岭文化的控制范围,其与京山屈家岭和郧县青龙泉两遗址的屈家岭文化存在文化特征上的共性,表明区域文化类型之间的交流与影响。同时,该遗址也有较多的地方文化特色,对于屈家岭文化的地域类型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材料。

(本文原载湖北省博物馆、考古所办公室2019年1月10日
《简报》第一期)

尘封五千年的史前文明

王洪琪

在荆山古文化的艰苦探寻中,种种远古文化传说,不时出土的早期文化遗物,一直困惑着研究人员,这里到底隐藏着什么,是否存在鲜为人知的早期文明?

2013年,王生铁同志带领省相关部门进行的荆山古文化研究,推动了荆山地域专业考古进程,为考古研究带来转机。省市考古专家孟华平、朱俊英、王先福、叶植等先后来到了保康实地调查,2015年以来,省考古所安排笪浩波研究员等常驻保康,持续开展荆山历史文化研究。在对荆山南北详细调查后,笪浩波将考古重点锁定在重阳盆地。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积极争取国家文物局“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课题项目,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由笪浩波领队,于2017年8月—2018年1月,对穆岭头遗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此次发掘成果丰硕,揭开了五千年史前文明的神秘面纱。

穆岭头遗址位于保康县马良镇紫阳村七组,地处重阳盆地西北部的紫阳台地上。该盆地为荆山山脉中的一个椭圆形盆地,面积约3平方公里,沮水由西北向东南横穿整个盆地。紫阳台地北高、南低,北依雒山余脉,南临沮河,西临重溪河,

东部山中有一条小溪流出,注入沮水。遗址分布于紫阳台地西南部,大致呈长方形,南北长约400米,东西宽约200米,面积约80000平方米,海拔高程306米。

该遗址在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被发现,1982年被县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4—1995年,襄樊市博物馆在对遗址进行调查时,采集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东周时期的陶器和石器 etc 遗物。2016年3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对遗址进行复查时又发现有新石器时代和西周时期遗物。

穆岭头遗址考古发掘面积250平方米,发掘的文化层主要为新石器时代和已扰乱的西周文化层,共清理房址3座,灰坑14个,灰沟2条,墓葬35座。遗迹、遗物的年代主要为新石器时代屈家岭文化、西周、东周、汉和清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现22座,多呈叠压状,共出土器物400多件,主要以陶器为主,还有少量石器、玉器和骨器。陶器有泥质黑陶、灰陶、红陶和彩陶,器形有陶鼎、双腹豆、双腹碗、高领罐、高足杯、壶形器、盂形器、陶环等。石器皆通体磨光,制作精美,有穿孔石钺、石镞、石鏃、石刀、石凿等。墓葬出土玉器数量较少,但制作十分精美,有穿孔玉钺、玉璇玑、玉斧、玉管等。还有少量象牙管、骨锥等骨器。

2018年,考古工作转入文物整理、修复和深入研究阶段。共修复出土陶器380余件,专业机构正对出土石器、玉器和墓葬残留物进行检测鉴定。2018年10月,中国新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学者专家齐聚保康,举办“保康县穆岭头遗址考古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科学院、社科院、北京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的专家先后对出土文物进行解析:玉钺、玉璇玑、象牙管等器物系屈家岭文化的首次发现,为该时代权力象征物。陶器石器等集中出现,其形制、

制作工艺既有同时期文化特征,又有地域文化特点。公认穆岭头遗址为屈家岭文化时期一处较高级别的聚落遗址,存在较为发达的史前文明,时间距今约4600—4800年。

这次考古发掘,首次发现荆山区域的屈家岭文化遗存和高级别墓葬,对于屈家岭文化的地域类型研究、墓葬的等级葬制研究、社会形态研究意义重大。同时该遗址出土了大量的西周遗物,印证了文献记载的楚兴国之地,与楚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对于早期楚文化的研究具有重大的价值。

屈家岭文化得名于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年代为距今5300—4500年,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其分布范围北到了鄂西北、豫西南,中心区域在湖北的江汉平原和湖南的洞庭湖周围。屈家岭文化时期社会分工较细,原始农业、手工业、纺织业发达。农作物以种植粳稻为主,家庭饲养普遍。手工业主要以制陶、磨制石器为主,已熟练掌握钻孔技术。其房址形状多为方形、长方形的地面建筑,有单间和双间之分,以单间房址居多。反映了屈家岭文化是偶婚家庭和家长制家庭。该时期社会的基层组织一氏族尚未发生太严重的分化,但社会上层贵族却已出现,他们利用特权侵占集体劳动成果,成为少数富裕者,其他氏族成员则属平民阶层。

虽然考古研究还在紧张进行,遗址生活、作坊等相关区域还未显现,但岁月的尘封已漫漫抹去,穿越时空我们能触摸到,在距今约五千年的史前时期,古先民们植根荆山沮水,辛勤劳作、智慧创造,铸就了高度发达的史前文明,谱写了地域文化壮美的诗篇。

(王洪琪,保康县博物馆馆长)

穆岭头出土文物揭秘分析

汪青祥 杨选成

2018年11月3日,《湖北日报》登载了一条消息:保康穆岭头遗址发现新石器时代氏族墓葬。原文为:“从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近日在襄阳市保康县穆岭头遗址,发现一处较高级别氏族墓葬,随葬品数量丰富、器物精美,玉钺、玉璇玑、象牙管等出土器物,更是屈家岭文化考古首次发现,对研究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有突破性意义。”此条新闻有3个关键词,即穆岭头遗址、屈家岭文化、玉璇玑。笔者作为荆山史前文化研究人员,试从以下四个方面揭秘穆岭头出土文物。

一、对穆岭头遗址、屈家岭文化、玉璇玑的简要介绍

(一)对穆岭头遗址的简要介绍

穆岭头地名来自我国农业之祖后稷,后稷为帝喾的元妃姜源所生,而帝喾是黄帝的孙子,在五帝中排位第三。后稷与尧帝是同父异母兄弟。由于他喜爱观察粮食作物的生长过程,摸索种植规律,获得了成功,尧时便任命其为农师,大舜接任后继续委任后稷担任这一职务。后稷先在荆山推广农业,并在今两峪乡龙潭河办起了农业讲坛;后来又来到尧帝执政地平阳,即今马良镇西坪任职。此时经过尧帝的治水,重阳湖

泊水位下降,露出了大片台地,后稷在此推广农业,又取得了粮食的好收成,人们尊其为“穆公”。他死后的埋葬之地称穆陵,穆岭头应为穆陵头或穆林头。因而《史记·五帝本纪》有“舜曰:‘弃,黎民始饥,汝后稷播时百谷’”之句。《帝王世纪》也曰:尧“始封稷、契、咎、繇,褒进伯禹,纳舜于大麓。”又记“老人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力于我哉!’”也说明尧时荆山地区已开启了农耕文明。

穆岭头遗址位于我县马良镇紫阳村七组,属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发现的新石器遗址。据《保康县志》(1991年版)记载:该“遗址南北长180米,东西宽90米,属屈家岭文化,距今在4000年以上”。2017年秋,为配合“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课题项目,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穆岭头遗址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经过数月的努力,在仅三百平方米的发掘面积中,出土文物竟达500件之多,且众多新石器时代屈家岭阶段文物;所探测到的文化层最早可达距今7000年至8000年。

(二)对屈家岭文化的知识连接

《辞海》(1989年版)对“屈家岭文化”注释为:“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文化,1954年发现于湖北省京山屈家岭,故名。以薄如蛋壳的小型彩陶器、彩陶纺轮和长颈圈足壶、高圈足豆为特征。主要分布于江汉平原。当时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已能种植梗稻,并饲养猪狗等家畜,狩猎亦占相当重要的地位。据碳—14法测定,该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750—前2650年。”

《湖北文化掠影》对“屈家岭文化”介绍的比较系统和具

体,为屈家岭文化是长江中游继大溪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考古学文化,也是长江中游地区发现最早、最具代表性的大型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其年代距今约 5100 年至 4500 年,因最早发现于湖北京山屈家岭而得名。

屈家岭文化分布以江汉平原为中心,遍布长江中游地区,东起大别山南麓,西至三峡,北到豫西南,南抵洞庭湖北岸。此外,在江西修水、河南许昌、陕西商县等地也有屈家岭文化的分布。可以看出,屈家岭文化分布范围基本上与大溪文化重合,并有所扩大。经过调查和发掘,湖北境内屈家岭文化遗址有 100 多处。

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遗址面积比大溪文化时期的遗址更大。以屈家岭遗址为例,该遗址面积至少有 50 万平方米。说明屈家岭时期人口不断增多,聚落村庄规模随之进一步扩大。屈家岭文化时期的聚落村庄多分布在平原地区,水网密布,土地肥沃,更适于农业生产。

屈家岭文化时期经济活动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还发现了许多猪的牙齿、陶塑小鸡,说明家禽和家畜饲养也是当时重要的经济活动。屈家岭文化的手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以制陶业和原始纺织业的成就最为突出。

在屈家岭文化中心区域,先后发现了天门石家河城、天门龙嘴城、石首走马岭城、荆门马家垸城、应城门板湾城、应城陶家湖城、公安鸡鸣城、江陵阴湘城等多座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古城。这些史前古城的出现,表明当时社会已有了高度分化,古城所在的部落已经出现不同的阶层,迈入阶级社会的门槛。古城的出现是该区域原始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预示着国家即将诞生。以屈家岭文化为标志,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开始了中国早期文明的历程。

穆岭头遗址考古队发现,屈家岭文化遗存分布于整个发掘区,遗址墓葬分布密集,皆为长方形或梯形竖穴土坑墓。各墓随葬品数量都较多,以陶器为主,还有石器、玉器和骨器。其中,出土陶器以杯形器最多,可修复完整的约400余件,以泥质黑陶、灰陶居多。石器皆通体磨光,有穿孔石钺、石圭、石斧等。玉器制作精美,有穿孔玉钺、玉璇玑、玉斧、玉管等。

考古队领队笪浩波教授称,从每座墓葬随葬陶器数量都很丰富看,该墓地应为一处较高级别的氏族墓地,表明穆岭头遗址在屈家岭文化时期为本区域的一处较高级别的聚落。

从以上介绍的情况来看,首先是穆岭头遗址的文化形成时间要早于大溪文化,因为已发现的文化层距今7000至8000年之久;其二是就出土的文物而言,已经可以确定为五帝时期的遗物;其三是遗物制作精美,说明工艺水平高,技术成熟,所折射出当时该地手工业相当发达。

(三) 玉璇玑的出土意义重大

值得惊奇的是,此次考古出土了一件三皇五帝时期的圣物璇玑,引起了考古界的震惊。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称,穆岭头遗址这些高等级墓地,系屈家岭文化考古的首次发现,对于同时期墓葬的等级葬制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玉钺、玉璇玑等权力象征物的发现,对今后同时期高等级墓葬的认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何为璇玑?简言之,为观察天体所用的仪器,是古代帝王神权、皇权、皇极的圣物。穆岭头遗址出土的璇玑是由上等玉

石制作而成，薄片，圆形，中空，由2块合成，外边带3个钜齿，工艺十分精美。

查阅有关典籍的记载，璇玑起码有三种用途：一是观测天体所用。《帝王世纪》曰：“伏羲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汉书·律历志》记：“权与物钧而生衡，衡运生规，规圆生矩，矩方生绳，绳直生准，准正则平衡而均权矣，是为五则”。二是规划天圆地方所用。我国的行政区划起源于天圆地方。“天圆”指今我县两峪朝元山；“地方”指今我县马良镇重阳坪。《周髓》记，伏羲女娲开辟天地时，“伏羲持规，女娲握钜”，《吕氏春秋·序意》记：“黄帝所以（教）海颡项矣，爰在大圆在上，大矩在下”。在发掘的汉代墓室中，就有伏羲持规、女娲持矩的图画。《周髓》又记：“环钜以为圆，合矩以为方，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由此形成了“天圆地方”的概念，也是“规矩”一词的缘由。三是显示权力所用。《汉书·律历志》记：“石者，太也，权之大者也”。《史记·天官书》载：“权，轩辕也；轩辕，黄帝也。”《汉书·律历志》曰：“衡权者，衡，平也；权，重也。衡所以任权而均物平轻重也。其道如底，以见准之正，绳之直，左旋见规，右折见矩。其在天也，佐助璇玑，斟酌建指，以齐七政，故曰玉衡。”又记：“自伏羲画八卦由数起，至黄帝、尧、舜而大备。三代稽古，法度章也”。从帝王治世的角度来讲，“璇玑”为“玄机”，成为约束人们的思想道德或法规制度。所以说，璇玑是早期中国皇权统管万物的法器，是权力的物证。

保康穆岭头出土璇玑文物为我国的史前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我县自上世纪末开展“早期楚文化”研究以来，时

间虽短,进展很快,成效显著。首先是以充足的理由被省确定为楚国发祥地,找到了荆楚文化之根;紧接着发现了一系列史前文化的线索,省有关专家已把保康定为“史前文明的富集地”。我县的研究突破了“北来说”“西来说”“晋西南说”的固有观点,搭起了三皇五帝在荆山的历史骨架,使“荆山说”日渐丰满。

按照王国维“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的印证”的“二重证据法”来研究史前文明史,这项研究已进入求证阶段。在省荆楚文化研究会特别是王生铁同志的推动下,重阳区域的考古工作纳入了国家十三·五《长江中游地区考古规划》,进而成为“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的组成部分。在省考古研究所方勤所长的主导下,历经3年的努力,可以说初战告捷,此璇玑的出土,无疑为荆山保康是史前文明的富集地找到了有力的物证。

二、穆岭头遗址西周文化揭秘

省考古研究所穆岭头遗址考古队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西周时期遗物,这无疑是又一重要发现。而这一发现意义同样重大,笔者围绕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

(一)穆岭头遗址西周时期文物的意义

穆岭头遗址考古队在发掘报告中说:西周时期遗存破坏较为严重,均未发现保存较好的地层。西周时期的遗物主要为陶片,主要见于探方第2层扰乱层中,与汉及近现代遗物等混杂在一起,器型有鬲、豆、罐,从西周陶器的特征看,时代早于万福埡遗址。

西周遗址系沮河上游的首次发现,时代可至西周早期。

虽然发掘区地层遭到破坏,但仍出土了大量的西周遗物。此次在文献记载楚兴国之地——荆山中发现的西周遗存,无疑与楚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对于早期楚文化的研究具有重大的价值。

上述内容虽然很简略,但背景却十分重大,因为提出了西周文化线索,恰我国的历史研究对西周的丰邑、洛邑遗址在哪里没有结论,有关专家仍在奋力寻找,白寿彝先生将丰、镐遗址定在一起解释不通。穆岭头遗址考古发现的西周文化起码有4条价值:一是周族的始祖为后稷,从而与五帝时期相连接,可解决西周文化的源头问题。二是为探寻西周初期的丰邑、洛邑在何处提供了重要线索。三是为探讨西周时期周王朝与楚国的微妙关系提供佐证。四是为探讨周平王东迁的出发地提供了新线索。这4个问题都是我国历史研究的重大课题,将起到纠正误解、填补空白的作用。

(二)对西周历史的溯源

关于周族的历史,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记载的比较清楚,这里只作梗概介绍:周族的始祖是后稷,名叫“弃”。如果往前追溯,后稷的父亲就是啻,啻的父亲是蟠极,蟠极父亲是玄器,玄器的父亲便是黄帝。后稷的母亲是有邠氏的女儿,叫“姜源”,是帝啻高辛的原配夫人。后稷生下来时是个血球,他母亲认为不吉利,让仆人扔掉几次没扔成,所以称“弃”。

后稷长大很有志向,喜爱观察作物的生长规律。故《史记·周本纪》曰:“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

焉，民皆法则之。尧帝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后稷去世，儿子不窋即位，由于夏后氏衰败，废弃农业而失去官职，逃到了南方戎狄部落之间汾地；不窋去世，儿子鞠继位；鞠去世，儿子公刘继位。公刘在戎狄中重修后稷事业，致力于耕种，因地制宜使用土地。在终南山一带采集木材，从漆水、沮水下流到渭水一带加工利用，造福于当地人民，也集聚了不少财富，许多部落都顺从周部落，这样，周族的势力渐大。

公刘去世，儿子庆节即位，在汾邑建立国都。庆节之后有皇仆、差弗、毁瑜、公非、高圉、巫圉、公叔祖，到古公共九代。周古公重振后稷、公刘的事业，推行仁政、德政，人民非常拥护他。獯鬻这个北方戎族（今马良镇水田、断疆一带）想得财产，古公给了他们；不久又来进攻，想得土地和民众，民众要抵抗，古公不忍心杀戮，就举族涉过千山万水，迁到陕西岐下定居下来；岐下即岐山下，即今扶凤县西北和岐山县东北。汾地的老百姓又扶老携幼到岐下去归顺古公。故《史记·周本纪》又曰：周古公（亶父）“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

又记：“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岐下周围的各部落听说周古公仁爱，也都归顺古公。古公废除夷狄部族游牧的习俗，营建城廓和房屋，形成邑落的居住环境，建立司徒、司马、司空、司土、司寇五种官职和机构，在西北地区（岐山）站稳脚跟并迅速强盛起来。后来，果然古公传位于季历，季历还与殷王朝

攀上了姻亲，殷王朝封季历为西伯，季历传位于姬昌，即周文王。其势力范围为王朝覆盖面积的三分之二。

当历史的车轮滚动到公元前 1100 年的时候，商王朝逐步衰败，纣王失道，诸侯国反，周武王顺应历史潮流，高举反商灭纣大旗，终于在公元前 1040 年前后推翻商王朝，在镐京建立起西周王朝。

上述介绍的一系列地名都在荆山，“有郃氏”为在今两峪乡大包寨；“汾地”为远安县螺祖镇；“漆水”为今鸡冠河；“沮水”即今沮河；“梁山”为今神农架地区大山的统称；“渭水”为今沮河的盘龙至马良段；“终南山”为中南山，即今歇马镇欧店一带。这些地名一是与典籍记载相吻合；二是符合荆山地理，证实周族的祖居地在荆山。

（三）西周的丰邑、洛邑在荆山

丰邑和洛邑是西周初期的两个重要地名，因为王权象征的九鼎安放处，实际上的都城，所以我国历史研究的专家学者一直在寻找此两处所在。《白寿彝史学二十讲·上古时代》对“丰、镐城都”的介绍是这样的：“丰、镐是周王之两个城都，是在今陕西西安市的西郊。现在丰河犹存，丰、镐二京当在他的两岸。20 世纪 30 ~ 40 年代，考古工作者就曾在沔水两岸作过调查与发掘。现已基本查明，丰、镐的位置大体可以确定在沔河的中游地区。沔河两岸，在客省庄、张家坡、西王村和冯村之间，总面积约 6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普遍地发现了先周和西周居址、墓地，有的地方还发现了铜器、陶器、骨器等作坊遗址。在张家坡的东面还曾发现几处已经被破坏的房屋基址，有的还有下水的陶管道。附近两个窖藏坑，出土了 70 ~

80件铜器。从这些发现来看,这里很可能是丰邑的中心地区。”我对白老这一观点提出质疑。经过我们考证,西周王朝末期的执政地不是西安镐京,而在荆山的洛邑。这个判断有以下依据:一是三皇五帝在荆山,周族的始祖在荆山,到周古公时才北迁陕西岐山,周文王时又迁回,这是总前提。二是《史记·周本纪》有“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的记载,很明显,伐崇国和建丰邑是紧密相关的行动,西安的丰邑之地是否有崇山及崇国的遗址?实际情况是,周族在陕西仅过了两代,到周文王时因为时常要回荆山敬神和祭祖,非常不方便,因而在讨灭了崇国后在崇山下建丰邑。三是《史记·周本纪》所记:“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审视,卒营筑,居鼎焉。曰:‘此天下正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帝王世纪》也有记载:“四年,始伐殷为天子,以木承水。自丰徙都镐。”由此说来,周武王灭纣后在西安建镐京只是辟雍之举,类似设的前线指挥部,但同时在荆山建设丰邑和洛邑,象征着帝王权威的九鼎并没有移走,因而丰邑为都,镐京为雍。四是周公曾言洛邑为“天下正中”,而西安镐京在当时属边僻之地,达不到天下正中的条件,荆山却符合。五是自周昭王三次南下伐楚后开始衰落,诸侯国不朝,贡赋困难,两头顾导致两头误,到了周孝王或夷王时干脆完全迁回荆山,《史记》上称“复都丰镐”,“复都”即恢复旧都;“丰镐”说明迁回后丰邑也称作镐京。

(四)周平王从荆山东迁今洛阳

《史记·周本纪》明确记载:“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又:“平王立,东迁于

洛邑，辟戎寇。”《帝王世纪》也有：“平王元年，郑武公为司徒，与晋文侯股肱周室，夹辅平王，率诸侯，戮力一心，东迁洛邑”，记的就是这件事。

我们现在还存在另一个认识误区，以为武王规划、周公占卜决定、召公营建的洛邑是今河南省洛阳，这是严重误导，而且误导了人们 2000 多年之久。其实西洛邑就是今荆山洛邑。西周立国 200 多年后，即公元前 781 年幽王时结束，周平王无法在荆山立足，才迁都东洛阳。周武王时绝对没有这个先见之明，在镐京时就筹建东洛邑。司马迁也澄清了这件事，他在《史记·周本纪》中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之前我国的专家学者，大都误认为丰邑和西安镐京在一起，而西洛邑也在陕西洛水之畔，从没有想到丰邑和洛邑在荆山，这个误解导致了史学家的困惑。

还有一则记载可以佐证，那就是《史记·郑世家》所记：郑武公东迁时，“虢、郟果献十邑，竟国之”这句话，如果说召公所建的洛邑在今洛阳，那地盘在哪里？谁人所献？无地盘何以建城廓？如果说既然已先建了城，那虢、郟后来“献十邑，竟成国”，岂不成了多此一举的马后炮？！

再者，从《帝王世纪》的“成王定鼎于郊鄩”记载来看，此九鼎必是大禹时的九鼎，“郊鄩”之地必在荆山，而平王东迁必然要带走九鼎。不幸的是，此九鼎在泗水丢失一只，《史记》记载了这件事。以致于约 500 年后，“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以前的解

读为在今江苏省泗水捞鼎令人生疑：一是平王东迁，无论是从西安或荆山洛邑，都不可能经过今江苏泗水一带。若从西安镐京东出，出潼关顺黄河东出即可，若从荆山迁都洛阳，出汉水，溯浙水，翻越伏牛山便是洛阳，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绕道几千里的泗水。二是“过彭城，在泗水求鼎”，这样说来此泗水必然距彭城很近，从地图上看，江苏的彭城（今徐州市）距泗水尚有一段距离，而荆山中既有彭城（马良镇彭家埡）又有泗水（沮水的马良至重阳段），而且泗水就在彭城之下，相距仅1公里。

由此可以分析，丰邑是老都，镐京是新都，大概在周夷王时从镐京迁回荆山。丰邑和西洛邑在一起，周平王东迁极有可能是从荆山丰邑出发的。丰邑和镐京的关系是老都和新都的关系，西洛邑和东洛邑是西周和东周的关系。至于陕西的泮水和洛水，江苏的彭城和泗水，则很好解释，前者是周古公北迁、后者是周武王分封时齐鲁两国时带过去的地名，这种现象在古时很普遍。

三、穆岭头遗址曾为郑国的封地

前文中提到正中与周平王、郑武公，这又将拽出重大的历史线索来，这条线索便是郑国在荆山的来龙去脉。

（一）郑国立国的大背景

司马迁在《史记·郑世家》中交待的比较清楚：“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公元前806年），友初封于郑。封三十三岁，百姓皆便，爱之。幽王以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说。河洛之间，人便思之。”这段话的意思是，郑国的开国之君为郑桓公，名字叫友，是周厉王的

小儿子，周宣王的庶弟。周宣王继位二十二年，友才被封到郑地建国。受封三十三年，老百姓都喜欢他。周幽王任命他做司徒，他便安抚周室的百姓，百姓都很欢欣，黄河、洛河之间，人人都怀念他。

《史记·郑世家》又记：“为司徒一岁，幽王以褒后故，王室多治邪，诸侯或畔之。”接着是郑桓公和周太史伯的一段对话。“于是桓公问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对曰：‘独洛之东土，河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对曰：‘地近虢、郟，虢、郟之君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为司徒，民皆爱公，公诚请居之，虢、郟之君见公方用事，轻分公地。公诚居之，虢、郟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对曰：‘昔祝融为高辛火正，其功大矣，而其于周未有兴者，楚其后也。周衰，楚必兴。兴，非郑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对曰：‘其民贪而好利，难久居。’公曰：‘周衰，何国兴者？’对曰：‘齐、秦、晋、楚乎？’夫齐，姜姓，伯夷之后也，伯夷佐尧典礼。秦，嬴姓，伯翳之后也，伯翳佐舜怀柔百物。及楚之先，皆有功于天下。而周武王克纣后，成王封叔虞于唐，其地阻险，以此有德，与周衰并，亦必兴矣。”桓公曰：‘善。’”于是卒言王，东徙其民洛东，而虢、郟果献十邑，竟国之。

这段对话的大体意思是，郑桓公担任司徒职务后，发觉西周王朝的形势不妙，想给郑国找条出路，于是就向太史伯请教。太史伯说，黄河以南，洛水以东的地方可以住，因为虢、郟两国的国君贪利，老百姓不拥护他们，你去了以后，老百姓会拥护你，让地给你。郑桓公说，我想到南方的长江边上住，太史伯说，不行，那是楚国的势力范围，周王朝衰败后，楚国必然

强盛,你去了以后对你不利。郑桓公又问,我想迁到西边去住,太史伯又说,西方之人也贪利,不能长久居住。郑桓公又问,周王朝衰落后,哪些国家要兴盛?太史伯说,主要有齐国、秦国、晋国、楚国,并且说出了各自兴盛的道理。郑桓公称赞太史伯分析的好,便按照他的建议去做。

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对话,也是对西周末期时局的分析,其背景十分重大,对了解郑国的来龙去脉很有帮助。一是需要考证对话之地,也就是说西周王朝当时所在地;二是要了解郑国当时所处的位置;三是弄清楚虢、郟两国的位置;四是弄清楚当时齐、秦、晋、楚的方位,才能对郑国的大背景以准确把握。关于对话之地,我认为在荆山洛邑,因为郑桓公与太史伯都是周王朝的官员。郑国的封地也在正中,紧邻洛邑。虢、郟两国起初在荆山,后被周武王封到今河南省中部地区。齐国即姜太公之子所建,已被封至今山东;秦国此时仍在荆山今和平、断疆一带;晋国可能已迁至山西;楚国此时在我县店垭镇格栏坪一带,距洛邑仅10公里。

(二)封郑于京畿之地

有了上述大前提,所以郑公友只能在荆山受封,初封之地也在荆山的京畿内。“京畿”即都城。《汉语大字典》对“鄭”字的注释为:“古国名,姬姓。本周西都畿内地,周宣王封弟友于此,在今陕西省华县西北。平王东迁,郑徙于溱洧之上,是为新郑,今河南省新郑县。《说文·邑部》:‘郑,京兆县。周属王子友所封……宗周之灭,郑徙溱洧之上,今新郑是也。’清·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引《汇纂》:‘朱子诗传,郑本在西都畿内咸林之地。武公得虢郟之地,乃徙其封,而施旧

号于新邑，是为新郑。’”另据《辞海》对咸林之“咸”的注释也有“都”的含意。《后汉书·郡国志》有“古有郑国，黄帝之所都”的记载，与楚都重阳是黄帝正地相吻合。再从繁体字的“鄭”字考证，由“奠”和“邑”组成，这个背景也不简单，分析为祭奠之地。祭奠谁呢？荆山史前文化研究撰文说：“‘新郑’，旧为正中，黄帝的都邑之地。今人称郑家台、郑家庄、郑家坎3名，周围近百亩面积，古称郑城，合《周礼》三百雉标准。其历史应追踪至郑公洧（友）时代，受周宣王之封，封地在黄帝与方雷氏居住的“方正宫”正地一带，又曰穆陵。担负有守望黄帝正地之责，故以“正”为“鄭”，史曰新郑，意思是守护和祭祀之意。”再从《辞海》对“咸”字的注释有六十四卦之一，艮下兑上。《易·咸》：“象曰，山上有泽，咸。”孔颖达疏：“泽性下流，能润于下；山体上承，能受其孕。以山感泽，所以为咸。”恰丰邑和洛邑是建设在故雷泽之地。所以说，郑国的初封地只能在荆山，不可能在今陕西或河南，以前的注释属误判。

（三）郑国的封地在今紫阳村

关于郑地的准确位置，前面已交待。因郑桓公是周厉王的儿子、周宣王的弟弟，而且是周宣王二十二年才封于郑地。考证当时的郑地就在今马良镇紫阳村穆岭头处，仍遗有郑家庄地名。也就是说，西周末期的风雨飘摇之中，郑国先一步迁往虢、郟之地打前站。27年后，西周完结，周平王在楚国的挤压下无法在荆山立足，才实施了东迁洛邑（今洛阳）的行动。

据悉，河南省新郑县在探讨“黄帝都有熊”等文化过程中，也引用了《帝王世纪》《后汉书》等有关记载，笔者认为今

河南“新郑说”的观点有下列破绽：一是河南省地名起源于“豫州”，在《易》象中称合南，在地理上位于合州之南，这个合州来源于伏羲女娲滚石成婚的传说，在今我县马良镇紫阳村，而不在今新郑县。二是黄帝称“盖楚”，是楚人，这也是历史的一个定位，而荆楚的地理至明、清两代指定在南漳县范围内，远古时期指定在重阳、思安范围内，今新郑在地理上已大大超出了荆楚这个范围。三是“荆山九州之险”“九州方千里”的行政区划，从人皇时代一直沿革到西周时代，地理座标在南条荆山，而现代版的新郑一不在南条荆山内，二不在九州方千里范围内，这个误差更大。四是“新郑”二字，起源于黄帝的“正地”。是郑氏尽守黄帝正地之责，封为郑国的。五是郑桓公与太史伯的对话中提到了楚国和长江，试想，如果说郑国在今陕西华县或今河南新郑，楚国远隔千里之外，何以能产生威胁？长江距郑国更远，何以使郑桓公产生迁至长江边的念头？只能说当时的郑国距楚国和长江都不远。六是郑国封于“京畿”之地，此地即是黄帝、尧、舜之都，还是夏都阳城与商都南亳之地，又与西周王朝的丰邑和洛邑为邻，称“京畿”当之无愧，而陕西华县和河南新郑都不具备上述条件，却与我县的重阳之地十分吻合，所以说在穆岭头出土新石器时期与西周文物顺理成章，为解决几个历史研究的悬案提供了过硬的佐证。

四、穆岭头考古发现为尧帝墓葬的分析

探讨三皇五帝发祥地在何处是我国史学界至今没有解决的问题，全国各地都在奋力探寻。位于鄂西北的保康县在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极为罕见的玉钺和玉璇玑，被分析

为极有可能是尧帝的随葬品,这一发现为我国史前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线索。

(一) 穆岭头考古的缘起及简要情况介绍

发掘背景。2016年3月,为配合社科基金“清华简《楚居》与楚国都城研究”项目,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沮漳河流域的楚文化遗存进行了系统调查,在对该遗址进行复查时,发现有新石器时代和西周时期遗物。

2017年8月—2018年1月,为配合国家文物局“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课题项目,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北省考古研究所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穆岭头遗址考古队,对穆岭头遗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目的是通过科学细致的勘探和发掘工作,进一步弄清遗址的分布范围、文化层堆积、文化内涵的起始年代等,为进一步的考古工作和遗址保护提供科学依据。考古方式为先调查勘探再布方发掘。

发掘情况。本次考古调查以重阳盆地为中心,向四周幅射近2平方公里。调查采取徒步踏查和钻探相结合的方式,对田地耕土的包含物及田垄断面取样观察,对钻孔土样进行仔细辨别,判断是否存在文化遗物和文化层,并探明文化层的厚度。发现一处同时期遗址——上街遗址,位于重溪峡河与沮河交汇处,与穆岭头遗址隔河相望,面积约为1000平方米。

勘探则是对紫阳台地的全面勘探,勘探范围面积约50万平方米,勘探采取梅花式布探法,孔距最大50米,最小5米。基本探出遗址的分布范围及文化层堆集情况。遗址位于台地的西南面,北部堆积较薄,文化层厚度约为30厘米,南部堆集较厚,最厚可达2米。遗址的中心位置集中于西南角,遗址主

要堆集为新石器 and 西周时期文化遗存,此外还有汉代、宋代等时期遗存。

本次发掘采用方位布方法,选取南教学楼的东南角作为永久基点,进行整体布局编号,以5米×5米规格作为一个探方单位,便于以后长期的考古发掘工作。根据发掘区的位置分东西两个发掘区,相距90米。东区布探方14个,因发掘效果不好(皆为后期垫土,无文化层),实际发掘4个,发掘面积64平方米;西区布探方12个,实际发掘11个,加上扩方,实际发掘面积约240平方米。本次发掘严格按照新《田野考古操作规程》进行,从上至下、由晚及早的逐层揭露。并结合邻方的实际情况,同步进行发掘。在发掘过程中注意了对土质土色的区分,以及对包含物的收集。对出土小件均按地层统一编号并收集,对遗迹均由工地负责人统一给号后发掘。同时做好文字记录及照相摄影工作。

发掘的文化层主要包含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和已扰乱的古周文化层,共清理房址3座,灰坑14个,灰沟2条,墓葬36座。遗迹遗物的年代主要为新石器时代屈家岭文化、西周、东周、汉和清代,其中,屈家岭文化房址3座,灰坑11个,灰沟1条,墓葬23座;西周灰坑1个,东周墓葬3座;汉代灰坑2个,墓葬2座;宋代灰沟1条;清代墓葬8座。

屈家岭文化遗存分布于整个发掘区,属遗址第3层。文化层堆积较厚,约0.6~1.4米,灰黑土夹杂大量红烧土块、红烧土颗粒、少量木炭、动物骨头等,出土陶片和石器较多。墓葬分布于遗址上,皆为长方形或梯形竖穴土坑墓,分布较为密集,多有打破现象。头向以南北和东西向居多,极个别西南

向。葬式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少量二人合葬和三人合葬。多为一次葬,少量二次葬,无葬具,人骨大多保存不完整,易碎。各墓随葬品数量都较多,主要以陶器为主,还有少量石器、玉器和骨器。随葬器物大多分三排分置于人体头部及左右两侧,按一定的规律摆放,也有少量置于人体之上的。出土的陶器以杯形器最多,可修复完整的约 250 余件。以泥质黑陶、灰陶居多,红陶和彩陶较少,夹砂陶数量也较少。陶器以素面为主,少量饰弦纹、划纹和附加堆纹。可辨器形有陶鼎、双腹豆、双腹碗、高领罐、圈足碗、高足杯、壶形器、盂形器、器盖、陶钵、陶杯、小陶罐、纺轮、陶环等。石器皆通体磨光,制作精美,有穿孔石钺、石圭、石斧、石镞、石鏃、石刀、石凿等。玉器数量较少,皆出土于墓葬中,制作精美,有穿孔钺、玉璇玑、玉斧、玉管等。骨器数量较少,有象牙杯、骨锥等。

重要墓葬。M26 开口 3 层下,打破 4 层,上部被 H10 打破。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坑东西长 230 厘米,南北宽 160 厘米,深度为 84 厘米,坑壁光滑,底部平坦,有二层台。未发现葬具,有人骨痕迹明显,保存较好。仰身直体葬,四肢伸直。人体长 180 厘米。方向 75 度。随葬玉钺一件,长 22、宽 16 厘米,压于右肱骨及背部下;玉璇玑一件(分为二片),置于右手掌上;玉斧一件,置于右小腿一侧,象牙杯一件,置于头部右侧。随葬陶器大多置放于生土二层台上,也有零乱摆放于人体两侧。陶器皆破碎,可辨器有高足杯、壶形器、盂形器、罐、缸、彩陶罐、彩陶器座,此外还有象牙杯、骨椎等。

M33 开口 3 层下,打破 4 层,上部被 H20 打破。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坑东西长 210 厘米,南北宽 92 厘米,深 72 厘

米,坑壁光滑,底部平坦。未发现葬具,人骨痕迹不明显,仅见牙齿碎片。陶器较破碎。

(二)出土文物符合尧帝的身份

尧帝身份简介。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五帝的排列为:第一位是黄帝,第二位是颛顼,第三位是帝喾,第四位是尧帝,第五位是虞舜。

《史记·五帝本纪》记:“帝尧者,放勋。”《帝王世纪》所记:“帝尧陶唐氏,祁姓也。母曰庆都,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名曰放勋。”

《帝王世纪》又曰:尧“年十五而佐帝挚,受封于唐,为诸侯。尝(常)梦攀天而上之,故年二十而登帝位。以火承木,都平阳。置敢谏之鼓,天下大和。命羲和四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岳。”

《白话史记》对尧帝的评价说:“他的仁爱如天之涵养,他的智慧如神之微妙。……能够宣明恭顺的德行,因而能亲密地团结九族。九族既已团结和睦,就能够明确地划分百官的职责。百官资绩昭明卓著,万邦诸侯融洽和谐。”

尧是我国古代最圣明、善良的帝王。尧为帝时,以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而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他所住的宫殿是用粗木料垛成的,椽木檩条都是粗糙的木料加工而成,屋顶用茅草铺盖修葺而成。因而《淮南子·精神训》称:“茅茨不翦,采椽不斫;朴桷不斫,素题不杆。”他吃的是粗糙的米饭,喝的是野菜汤,穿的是用葛麻布织成的衣服,冬天为了御寒,常披着一张普通的鹿皮。平常使用的锅碗瓢勺等用具,也都是自己亲手制作的。由于他勤俭朴素,见微知著,任人为贤,非常关

心老百姓的疾苦,将天下治理的井井有序,政通人和。

尧以自己的以身作则带动了大家的艰苦创业。比如司徒舜、司马契、农师后稷等官员,都能够做到尽职尽责。特别是尧的弟弟、周族的祖先后稷,尽力发展农业,广种粮食,解决了食物短缺的问题,使百姓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在尧为政期间,无论是水旱灾害,还是酷暑严寒,老百姓都毫无怨言,团结友爱,和睦相处,共度难关。以致于后人熊绎以他为艰苦创业的榜样。

出土文物印证。M26 墓葬的出土文物除陶器外主要有 4 件,即玉钺、璇玑、象牙杯、玉斧。通过探讨,这 4 样随葬物都非同小可。一是玉钺即是古代帝王权力的象征。二是璇玑既是权力的信物,又是观测天体所用的仪器。这与尧安排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别在阳城四周的旸谷、昧谷、明都、幽都观察天象、制定 24 节气的记载相一致。三是玉斧、象牙杯在当时为贵重物品,非一般民众所拥有,而尧帝作为帝王的高贵身份,拥有上述贵重物品不足为奇,作为随葬品顺理成章。要知道,此时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物质生活仍很匮乏,封建礼仪尚未形成,不可能象海昏侯那样高规格墓葬和丰富的随葬品。

(三)在血缘关系上与尧帝的线索相吻合

尧帝属黄帝的后裔。《史记·五帝本纪》所记:“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蟠极,蟠极父曰玄器,玄器父曰黄帝。自玄器与蟠极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高辛于颛顼为族子。”通过上述记载,尧的血缘关系已明确,为喾之子,黄帝的四世孙。而《史记·封禅书》曰:“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又曰:“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经考证,

这个“首山”指社首山，即今重阳崇家山；崇家山麓莲花台设有祭祀土地神的祭坛。“荆山”即南条荆山，今我县两峪乡和南漳县板桥镇一带。

尧帝为颛顼之侄孙。而颛顼在荆山的线索更清晰。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黄帝崩，葬骄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

而河南新蔡出土的楚简甲三 11 号、24 号简记：“昔我先自颛顼，宅兹沮漳，以徙迁处；”甲三 268 号简记有“及江汉沮漳，遂至于淮；”乙四 9 号简记有“渚沮漳，及江，上逾取。”作为出土文献，这条记载的原始性更强，已经准确界定在荆山。江、汉、沮、漳 4 水加上荆山，此地理坐标唯鄂西北独有，其它任何地方也争不去，更否定不了。

尧的兄长为后稷，封地在穆岭头。《史记·五帝本纪》记曰：“帝啻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嫫訾氏女，生摯。帝啻崩，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帝王世纪》所记：啻有 5 个儿子，长子曰摯，次子曰弃，三子曰契，四子曰尧，五子曰台玺。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尧帝接任长兄摯的职务而称帝；而次兄为后稷，被尧封为农师，因推广农业有功，称穆公，其封地在穆岭头；其三兄为契，商人的始祖，因协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商丘，其地在今南漳县板桥镇境内的龙王冲。因而《史记·殷本纪》曰：“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

(四) 尧帝的几个关键节点都在荆山重阳

出生地。《帝王世纪》曰：“母曰庆都，孕十四月而生尧于

丹陵。”庆都也称陈锋氏女，其父曰伊祁侯，陈锋即陈峰，今重阳村陈家山。这里有一个细节，就是庆都和父母乘船在一个湖泊里游玩时突遇赤龙，感而受孕。经考证这个湖泊就是雷泽，今重阳盆地。丹陵为丹山之陵，即陈家山的山丘，紧邻雷泽。山丘之下有西庵遗址，即尧帝的出生地。

都城。《帝王世纪》所记：“故年二十而登帝位。以火承木，都平阳。”尧帝都平阳，那么“平阳”在哪里？答曰就在马良镇的西坪村。依据有三：一是地理位置好。尧帝在两峪山上执政，而其妃子庆都却住在娘家，其娘家居住于丹陵，和西坪仅一水之隔。西坪即西平阳，位于重阳以西，后人称西坪，唐朝时曾在此设过平阳县，是今南漳县名的起始。二是重阳当时为大泽，水未退尽，还不能居住，相比之下，平阳条件优越，适合建都。三是方便管理。因此时沮水两岸的部落很多，平阳处于相对中心的位置，所以尧设都于此。

禅让之处。《史记·五帝本纪》对尧舜禅让记载的很详细。尧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岳应曰：鄙德，忝帝位。尧曰：悉举贵戚而疏远隐匿者。众皆言于尧曰：有矜在民间曰虞舜。尧曰：朕闻之，其何如。岳曰：盲子者；父顽，母嚚，弟傲，能和以孝，丞丞治，不至奸。尧曰：吾其试哉。于是尧妻之以二女，观其德于二女。舜飭下二女于妫汭，如妇礼。尧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遍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召舜曰：汝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女登帝位。”又曰：“正月上日，舜受终于文祖。文祖者，尧大祖也。”这条记载说明，尧舜的禅让

仪式在文祖庙举行。文祖庙在今紫阳村一台地上,距都城平阳仅5公里,遗址尚存。

葬地。《帝王世纪》所记:“舜摄政二十八年,尧与方回游阳城而崩,《尚书》所谓‘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是也。”又:“葬于济阴之成阳西北,是为谷林。”从以上这两段话所提供的地名信息,分析如下:“阳城”即以重阳为中心的区域,后来是大禹的居地,也是夏朝的都城。距尧都平阳仅2公里之遥。“谷林”地名分析距水较近,重阳为四水归池之地,很可能尧时这里已经开始种水稻了;但这个“谷”也可能为苞谷,即玉米,与后稷在这里推广农业有关系,我县农村至今还有“苞谷长得象竹林”之方言。“城阳”指方位,即都城之阳,都城之南,重阳位于西平阳的东南方,暗指阳城。“济阴”也是指方位,“济”为济水,即姬水、汜水,为今流入重阳的重溪峡河。济阴即济水之南,而平阳位于重溪峡河之南,今紫阳村穆岭头却刚好在重岐峡河之北。

(五)从尧帝的施治来看适合荆山地理

治理水患。《史记·夏本纪》记载:“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尚书·尧典》上说:“尧之时洪水为患为甚”。探讨尧时的发洪水之地,“怀山”和“襄陵”是重要的地标,经过我们的考证,“怀山”就在今南漳县巡检镇境内,“怀”通“淮”,有淮山就有淮水,最早的淮水在今沮河下游,也就是新蔡楚简中的“遂至于淮”的记载。襄陵之“襄”,来源于西陵母在此襄助黄帝打败蚩尤部落,其地在今远安县洋坪一带,即南襄阳之地。由此可见,尧时的洪水为沮水发洪水,恰尧都平阳正在沮水之侧,即从尧开始已经着手凿通雷夏泽的工程。尧

委派大鲧治水之处就是流入重阳的今白龙洞河，古称沁水，即流入中心(雷泽)之水。后来大禹治水处也都是荆山之中的大小9条河流，见《尚书·禹贡》这篇文章便知。

询问四岳。《史记·五帝本纪》有“尧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此记载中的“四岳”指管理四岳的地方官员，四岳即重阳八宝山四周的4座高山。这么贵重之山，其周围必安排护卫之山。因为八宝山是伏羲、女娲、黄帝、西陵母居住之地，古时为中岳，也称嵩山，所以有“崧高维岳”之称。《毛传》：“岳，四岳也。东岳，岱；南岳，衡；西岳，华；北岳，恒。”“东岳”为今南漳板桥镇的荆山顶，称岱连山；“南岳”为今宜昌市夷陵区的太平顶，称衡山，故荆衡连用；“西岳”为今歇马镇的望佛山，古称泰华山；“北岳”为今保康龙坪镇的聚龙山，亦称恒山。与《毛传》的注释相一致。

流放四凶。《史记·五帝本纪》曰：“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讙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此段内容很清楚，即舜向尧帝提的流放建议，尧做出的决定。

“迁三苗于三危”：三苗部落原居住在江淮、荆州一带，但此江淮、荆州不是今江淮、荆州，而是大禹以前的江淮、荆州。“江”为沮江，今沮水；“淮”为淮水，在今当阳市、远安境内；“荆州”为荆山之山麓，为今远安县洋坪、苟家垭和南漳县的巡检、峡口一带，这一带属丘陵地带，条件要比山区好。至于“三危”地名的来历，我分析有多处危崖耸峙的地形，意为地势险要，荒无人烟。三危地区在今歇马镇百峰、九里及兴山县

榛子树岭一带，正处于平阳的西部，这里原是九黎部落的住地，自然条件比较差。尧把三苗部落迁来这里，有两个意图：一是将条件好的地方腾给帝王的后裔居住；二是开辟蛮荒之地，以改变西戎的人口结构。

“放讎兜于崇山”：崇山即今崇家山，位于重阳（雷泽）以南，这里原来居住着南蛮各部落。从“放讎兜于崇山，来改变南蛮的习俗”这句话来分析，与其说贬，不如说分封，因为讎兜还承担有“改变南蛮的习俗”的责任，他有这样的责任，必定委任以相应的职务。从放讎兜到崇山到周文王灭崇国，其间整整 1000 年时间差。在原始社会，早期多处于游牧状态，经常迁徙，但到了奴隶社会，部落方国一般情况下有较稳定的居住区域。尧帝以后这里的南蛮部落变成了崇部落方国，殷商末期其国君崇侯虎为纣王的宠臣，因其在纣王面前献谗言而招祸，其国被周文王所灭。

“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共工是炎帝后裔，同时又是职务名称，在颛顼为帝时为负责治水的官员，因为他治水的方法有弊端，所以尧帝要流放他。流放在哪里呢？在幽陵。幽陵即大禹时的幽州，在我县城关镇一带，相传共工在此建了康回国。今城关镇有九皇山，相传共工在此筑台，疑为烽火台，有遗址。

“殛鲧于羽山”：在尧帝时属于流放，但到了大舜为帝时，为了立威或者是治水的需要，派祝融诛杀大鲧于羽山。这个羽山就在重阳陈家山之南，为黄帝儿子翼龙的封地。

南蛮战于丹水之浦：据《竹书纪年》所记：“帝（尧）使后稷放帝朱于丹水”。史籍多记载尧帝之子朱的“不肖”行为，由

于他出生于帝王的家庭,各方面条件都好,从小娇生惯养,长大后没有严格管教,结交了一帮不三不四的朋友而学坏了,得不到人们的拥护,因而失去了继承帝位的资格。尧帝把位传给舜以后,为了让舜有一个好的执政环境,于是便把他的这个不争气的儿子下放到丹水之浦做了个地方官。

《吕氏春秋·召类》有“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的记载。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丹水》中也说:“丹水之浦在今河南淅川县西南,那里就是丹朱受封之地。”但近年来我县荆山史前文化研究提出,荆山之内也有丹水,就在马良镇鸡冠河出口处,是因丹霞山而来;而且在丹山之南还有丹阳,后为楚熊绎所居。当年尧帝在今平阳坐位,把他的儿子朱下放到鸡冠河河谷地带,两地相距仅10公里。相比之下,保康的理由更充足。

丹朱避舜难于房陵:《竹书纪年》记曰:“帝陟于陶,帝子丹朱避于房陵,舜让弗克,朱遂封于房,为虞宾。”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尧帝辅佐帝舜二十多年后,不幸在他的老家去世,虞舜正式即位。尧帝的儿子丹朱因名声不好,怕人们说他想和舜争夺帝位,便躲到了很偏僻的房子国。舜再三推让帝位,但老百姓和各部落首领们都拥护舜,不拥护丹朱,舜只好就位。于是他顺水推舟地封丹朱为管辖房地的官员。房地也叫房子国,因房南有一山洞,其石室如房,是原始人居住的好去处,取名房山,也称吴房;后来又因丹朱之子名陵,继承丹朱的封地,房陵地名由此而生。《房县地名志》记有“尧子堙”“丹朱坟”地名。

综合分析则更符合情理:一是先由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然后交给朱来管理;或者说丹朱在这里惹了乱子,尧帝

来替他摆平。二是两地相距很近,便于帝王控制,都城平阳距丹水之浦的地方仅 10 公里,这在远古人来说符合情理。如果说尧都平阳在今山西省临汾,以尧的仁爱之君,无论如何不会将自己的儿子流放于千里之外淅川丹水,再说尧时九州方千里,辖区很小,全部在荆山,今山西相距太远。三是丹朱避舜难于房陵,即从山内向山外迁徙,距离也不远。在明朝保康建县以前,房陵的边界至界山,距马良丹水之浦不到 10 公里,符合逻辑。因为在此以前,尚没有部落外迁的信息,其实五帝统治时期的范围很狭小,不可能一下子跳跃式外迁几百里。至于河南省淅川的丹水,则是荆山部落外迁带过去的地名,而且还极有可能为楚人外迁所带。

主要依据:一是楚人的祖先鬻熊居丹阳,在此北上投靠周文王,后来其子熊丽又讨在睢山;二是楚熊渠在讨伐位于房县城的庸国,订立城下之盟后,又乘势伐扬、越,至于鄂,也在这一带,《荆楚地理新探》有考证;三是相传麇国为楚人季连之后所建之国,其位置在今郧县,与丹淅为邻。

综上所述,尧帝在荆山留下的线索是很多的,死后葬于今紫阳村穆岭头证据是充分的。我们欢迎广大学者来荆山考察,共同探讨华夏民族的发祥之地,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贡献。

(汪青祥,保康县马良镇紫阳村村民,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会员;杨选成,保康县史志办退休干部,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会员)

从南河流域近年出土文物 看早期楚国中心区域

张光业

南河是汉江中游南岸的主要支流,其中上游流域包括位于荆山主峰景山(望佛山)东、北、西三面的保康、房县和神农架的大部分。南河流域近年发掘的3处西周遗址出土文物比较丰富。本文从近年西周遗址出土的主要文物着手,对早期楚国中心区域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楚人推测凶吉的占筮物——甲骨

商周时期楚人推断吉凶占卜之风盛行,并对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江汉地区自古即为龟的盛产之地,商周时期这里就流行占卜这一习俗。清华简《楚居》记载:“至畬狂亦居京宗,至畬绎与屈紃,使都嗑卜徙于夷屯。”“若嗑:都氏之卜者,名嗑。”“《楚居》篇中的都皆当是湖北宜城之都。”楚先公熊绎从“京宗”迁徙到“夷屯”而“使都嗑卜”,说明迁“都”是国之大事,必须占卜以确定。同时也可知,至迟熊绎时的楚人

还没有占卜的习俗。

2010年11月,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发掘保康县寺坪镇庾家坪西周遗址时,“发现了一批甲骨卜骨”,“遗址灰坑内相继出土甲骨卜骨,是首次发现的该山区县属于楚文化区的实物证明。”以上两篇报道都没有说明出土甲骨卜骨的具体数量、形制、规格、是否烧灼等。目前,此批甲骨现藏襄阳市博物馆,还未见详细的发掘报告,尚难以判断其时代特征。据清华简《楚居》所载,熊绎迁徙于夷屯,“使若(都)啗卜之”,楚人占卜之习俗当形成于熊绎之后。熊渠是熊绎第五世孙,熊渠徙居发渐,也即保康县寺坪镇虾子坪、庾家坪,在此发掘出土甲骨卜骨,正与熊渠所处的时代相吻合,也与简载文献相合。

江汉地区在保康庾家坪西周遗址、虾子坪西周遗址卜用甲骨出土以前,以襄阳地区所出最为集中。襄阳地区所出共3批21片,这包括枣阳毛狗洞遗址1片、宜城肖家岭遗址2片、襄阳真武山遗址约18片。

毛狗洞遗址所出的一片卜骨,“以方凿为特征,与其它较晚甲骨明显相异。这种卜骨出土地域,过去常有曾国铜器出土,A型卜骨也可能就是曾国占卜的遗物。”“真武山——肖家岭的双联圆钻甲骨所代表的族居主体明显区别于周人的直系,这一类甲骨分布的地域包括襄宜一带及沮漳河流域。正可能是春秋早期前后楚人活动的重要地带。从文化因素上分析,这一区域文化所表现出与晚期楚文化的密切联系,为我们探讨早期楚文化提供了明确的线索。”保康县寺坪镇庾家坪西周遗址、虾子坪西周遗址所出土的甲骨卜骨,应该就是楚人的遗物,并且其时代不晚于熊渠时期,这为南河流域是早期楚

国中心区域提供了实物佐证。我们期待早日见到庾家坪西周遗址、虾子坪西周遗址详细发掘报告和所出土甲骨的研究成果,以便为研究楚国早期中心区域提供新的佐证。

早期楚文化的标志物——楚式鬲

“楚式鬲”在春秋以前是楚文化一种有代表性的器物。“楚式鬲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大体也就是楚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南河流域几处西周遗址发掘出土了一批鬲及大量的鬲足、鬲口沿等残片。除庾家坪、虾子坪遗址出土的两大袋子鬲的残片未经整理外,与之相关联的房县青峰镇孙家坪遗址出土的鬲及鬲足业已整理,报告也已公开发表,使我们的探讨得以进行。

孙家坪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有石器 17 件,石锥 1 件、石刀 15 件、石镞 1 件;有陶器 5 件,陶拍 2 件、纺轮 3 件。出土的生活用器全部为陶器,器形主要有鬲、罐、盘、甗、鼎和大口尊等。其中:鼎足 3 件,鬲足 1 件,鬲足 26 件,罐 15 件,甗 4 件,盘 4 件,盆 3 件,鬲口沿 25 件,鬲 8 件,大口尊 2 件。“就出土遗物的器形而言,鬲的数量占绝对优势。从鬲足来看,既有类似于郟县辽瓦店子遗址和十堰张湾区大东湾遗址西周早期陶鬲的扁足;又有袋状、柱状和截锥状鬲足。有学者认为:‘西周中期开始,随枣地区的早期袋足鬲几乎全部被柱足鬲所取代,而汉水中游谷地也在此时开始全面流行柱足鬲。’孙家坪遗址亦地处汉水中游谷地,该遗址中各式鬲足并存,显示出一种特殊性。”

早期楚国的中心区域长期无定论。当前,似乎越来越多

的专家学者倾向于楚国早期的中心区域位于丹淅地区。他们的主要依据是过凤楼类型文化的不断东迁与南下,其路线是商洛地区、丹淅地区、襄阳地区而后达襄宜平原。其代表遗址分别为过凤楼遗址、辽瓦店子遗址、大东湾遗址、下王岗遗址、真武山遗址、郭家岗遗址等。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先福先生最近发表的文章可谓是此观点的代表。“至熊绎时,……楚国国力较弱,国境离都较近,该“都”应为下都,处今陕西商密附近,正在丹水流域。……其后的熊只至熊渠时期,《楚居》记尽居‘夷屯’,此‘夷屯’应在周昭王南征前迁徙到了汉水以南。……虽然发渐、房岍、乔多难以确考,但可大致确定不出今蛮河流域。熊仪所迁之都已是上都了,由位于丹水流域的下都迁移而来,位于今宜城东南,已到了蛮河的下游汇入汉水处以南区域。西周晚期至东周时期,襄宜平原密集的文化遗存为当时的楚国中心在此范围作了很好的诠释。”王先福先生得出的以上结论,与他对南河流域密集分布的西周遗址视而不见有关。“不过,目前在汉水以南尚未发现西周早期遗存,最早也是西周中期遗存,且仅发现一处,即真武山遗址。”因此其结论的可靠性值得商榷。

“H6 为遗址中的典型单位,出土了 7 件陶鬲和 1 件大口尊,经修复后器形基本完整。这 7 件器形较为完整的陶鬲,既具有中原地区西周中期鬲的形态特征,又带有浓郁的晚商做器风格。其中,H6:9 与湖北襄阳真武山周代遗址中出土的 H36:4 较为相似。因此,我们推测孙家坪遗址的年代为西周中期。”由此可知,汉水以南西周中期遗址就不止真武山一处。也许南河流域就有多处,因为保康县鹿家坪和虾子坪西

周遗址的时期还未定论。

孙家坪遗址为何呈现出各种鬲和鬲残足并存而显示其一种特殊性呢？这恐怕与周宣王伐楚并封尹吉甫为太师食邑于房有关。据《房县志》载：“周宣王（公元前 827 - 782）封尹吉甫为太师食邑于房，死后葬于房县青峰山”。孙家坪遗址西去 3 公里即为青峰山。《竹书纪年》记载：周宣王三十九年，“王征申戎，破之。”申戎，姜姓，地在南阳，扼楚国北上的门户。宣王破申，旋命方叔伐楚。破申与伐楚，是一气呵成的，乃同年所为。《诗经·小雅·采芑》为宣王时诗。《毛传》云：“《采芑》，宣王南征也。”孔颖达正义云：“谓宣王命方叔南征荆蛮之国。”对此，历代无异词。宋朱熹《诗集传》即承此说曰：“宣王之时，蛮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郑玄（笺）云：“方叔先与吉甫征伐玁（xian）狁，今特往伐蛮荆。”吉甫即尹吉甫，亦即兮伯吉父，有青铜器“兮甲盘”铭文可证。周宣王伐楚的史实，由山西曲沃晋侯墓出土的楚公逆编钟可证。楚公逆，孙诒让考定即熊鄂，在位九年（公元前 799 - 前 791 年），据《楚居》记载楚公熊鄂居乔多，当在南河流域。因此，我们推定，周宣王时尹吉甫跟随方叔伐楚并占据了以孙家坪遗址为中心的区域，为加强统治，周宣王封尹吉甫食邑于此，由此形成了周楚文化的融合，孙家坪遗址各种鬲足并存也就成为了必然。

楚国王权的象征物——青铜钺

2015 年 4 月我们在保康县寺坪镇进行早期楚文化调研时，听说虾子坪西周遗址附近一农民在耕田时，拾得一件青铜

钺,重2斤多,现为此农民珍藏。10月29日笔者获得此青铜钺的多张照片,为寺坪镇干部黄克波所拍摄。虾子坪西周遗址出土青铜钺得以证实。现仅根据照片对此青铜钺进行初步探讨。

钺,《说文》释为大斧;《疏》说钺大而斧小。甲骨文中的王字乃作斧钺形状。《太平御览》卷三四一行《字林》曰:“钺,王斧也。”不仅证实了“王”字源于斧钺之形的观点,而且直接说明了斧钺与王权的关系。斧钺作为王权的象征,与王者如影随形,征国立国皆少不了斧钺。西周孝王时的虢季子白盘铭文中也有“赐用钺,用征蛮方。”《左传·昭公十五年》载:“鍼钺……文公受之,抚征东夏。”由此可见,斧钺在西周时期几乎已经成为王权的代名词。

保康虾子坪西周遗址出土的青铜钺,它所代表的是哪国王权呢?最有可能的是楚国。就目前所见的青铜钺而论,与虾子坪西周遗址出土的青铜钺相似的还有两件:一件是桂林市恭城战国青铜钺,一件是郑州紫荆山铸铜遗址 F5 出土的商代青铜钺。

“5月22日,恭城两位农民相约到村子附近一个大型溶洞中钓鱼,意外捡到一件外形有点像斧头的奇特金属器具。经桂林市文物工作队专家鉴定,为2000多年前战国时期的冷兵器青铜钺。”桂林在古代春秋战国的时候属于楚国,这件青铜钺是楚国的青铜钺。

1954年和195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先后两次对郑州商代紫荆山铸铜遗址进行了发掘。紫荆山青铜冶铸作坊遗址位于商城北城墙外(今河南饭店院内),有工作房五座,

每座房中分为两间,房内后墙处筑有取暖或炊食用的长方形火台(池)。出土有冶铜坩锅、炼渣及铸造青铜器的陶范等。同时出土有一件青铜钺,位置在“紫荆山铸铜遗址 F5(无尺寸记录)”。这是一件商代的青铜钺。

综上所述,在不同的地点出土了不同时代的、但形制相同的三件青铜钺,绝非偶然。这正反映了楚族或楚国,殷商时期先处中原、商末周初辟在荆山、春秋战国拓土南疆的史实,这与文献记载也相合。因此,可以说南河流域是早期楚国的中心区域。

注: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

子居:《清华简〈楚居〉解析》,《学灯》第十八期,《简帛研究网》,2011年3月31日。

孔祥福、王承鼎:《保康出土甲骨卜骨——证明保康是楚文化发源地之一》,《湖北日报》,2011年1月28日七版。

安富斌:《度家坪虾米坪遗址灰坑内出土罕见甲骨卜骨(图)》,《襄阳日报》,2011年1月27日。

参见拙作:《保康县虾子坪西周遗址与熊渠徙居发渐》,《荆楚文化网》“首发文章”,2015年4月23日。

张昌平:《论湖北襄樊地区西周甲骨》,《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5期。

杨传喜:《江汉地区的鬲与楚式鬲》,《江汉考古》,2011年第1期。

王先福:《襄随地区西周遗址出土的陶鬲分析》,《江汉考古》,2002年第4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房县孙家坪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2年第3期。

王先福:《汉水中游西周考古遗存与早期楚国中心的探索》,《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湖北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房县孙家坪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2年第3期。

湖北省房县志编纂委员会:《房县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7月第一版。

文烨、梁剑:《广西新闻网》、《桂林晚报》,2011年5月25日。

刘晨:《中国北方地区青铜斧钺研究》,2013年4月。

(张光业,保康县政协三级调研员)

楚始都丹阳考证

都正阳

《史记·楚世家》载：“熊绎当周成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于是，专家学者以此为主要依据考证认为，熊绎为楚始封君，丹阳为楚之始都。那么，丹阳究竟在哪里？

一、丹阳地理坐标

丹阳地望的说法在学术界有五种，即安徽当涂说、湖北秭归说、枝江说、南漳说、河南淅川说。但《左传》载：“汉江沮漳，楚之望也。”据此，即锁定了早期楚国的地理坐标，为汉水、沮水、漳水。早期楚国还有一个学术界普遍公认的重要地理坐标就是荆山。而能与汉江沮漳和荆山同时在一个地方出现的只有保康。因为沮水、漳水同时发源于保康，荆山主峰聚龙山就坐落于以保康为核心区的荆山腹地，海拔 1852 米，而且整个荆山接近 3000 多平方公里，基本覆盖保康县域绝大部分地区。据此，安徽当涂说、湖北秭归说、南漳说、枝江说、河南淅川说均不攻自破。

二、解析众多纷纭

值得研究的是，历届学者为什么会有丹阳五说？根本原

因是以下三种现象很容易将研究者带入泥滩。

第一种现象,丹阳究竟是不是地名?《史记》记载:“鬻熊子事文王”。鬻熊辅佐周朝有功,方有丹阳之说。丹阳在当时不仅是地名,也是一种荣誉和行政管辖的称号,熊绎受封后就带着这个荣誉来到荆山。《诗经·大雅·卷阿》记载:“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凤是指黄帝后裔祝融氏(《白虎通》: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凤凰随之成为楚人的图腾,也就有了“丹凤朝阳”之说,简称“丹阳”。明朱善《诗解颐》释:“凤凰者,贤才之喻;高冈者,朝廷之喻;梧桐者,贤君之喻;朝阳者,明时之喻也。”喻示楚先人来到史封地,恰逢贤才遇明君。综上所述,丹阳不仅是地名,更是朝廷对封地的一种寄寓、荣誉。如此解释,正回答了清华简《楚居》众多研究者的共同疑问,为什么一部专门反映楚人迁徙的专著,竟然从始至终没有提到丹阳。

第二种现象,丹阳究竟是一处还是多处?地名是历史的活化石。大凡研究历史的同志都知道一个基本规律,就是地随人迁现象。譬如,就早期楚文化而言,仅荆山就有5座,即北条荆山、南条荆山、东条荆山、西条荆山和中条荆山。沮水至少有2条,即陕西富平和湖北保康。更为奇特的是,在湖北保康和河南西峡同时存在连片相同的地名,即在保康马良镇有重阳、紫阳、西坪村,而且村与村相连;在西峡县同样有重阳、紫阳、西坪镇,而且镇与镇相连,仅仅不同的是,前者为村,后者为镇。更为费解的是,湖北保康重阳一带和河南丹水与淅水一带都出土了大量早期楚国文物,都被部分专家学者认为是早期楚文化遗址。而作为与丹阳相同的地名,在全国可

谓比比皆是。这些现象充分说明,早期楚人有一个重要规律,就是地随人迁。这种现象可谓扑朔迷离,为研究者获取真知布下天罗地网。比如,河南淅川县,不仅出土有大量楚国文物,而且《史记》还有“丹阳大战”的典故记载。这里,不仅有丹水、丹阳,还有丹山。安徽、山东、江苏等省份,都有丹阳,不胜枚举。第一次提出迁徙说的当属唐代杜佑。他在《通典》中释“归州秭归县”时说:“楚熊绎初都丹……后移枝江,亦曰丹阳。”同时释“荆州枝江”时又说:“江陵枝江,古之罗国,汉旧县。楚文王自丹阳徙都,亦曰丹阳。”按照杜佑的说法,楚旧都为丹阳,后迁都枝江时仍沿袭旧称丹阳,楚文王再迁江陵,称楚都为郢的同时亦曰丹阳。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说:“盖诸侯迁都,常仍旧名,故有两丹阳。”

第三种现象,南漳说与保康说的矛盾焦点究竟在哪里?清宋翔凤《过庭录》主张楚之丹阳先在淅川,后迁南漳。张正明《楚文化史》认为,楚丹阳原在淅川,后迁至南漳。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丹阳郢都考》说:“楚丹阳当先于鬻熊时在淅川,后于熊绎时迁至今南漳县东北。”刘彬徽《试论楚都丹阳和郢都的地望与年代》一文认为,楚国初封之丹阳在秭归,熊渠时迁至枝江,仍称丹阳。顾铁符《楚三邑考》一文认为,楚都丹阳的地点应先在丹淅,后迁荆山。因为历史缘故,导致楚源地究竟是在南漳还是在保康,学术界争论的也是一塌糊涂。其实,根本就不存在矛盾。保康建县于明弘历 11 年,而建县之前的保康南部地区(以荆山为界分为保北保南两个部分)过去一直归南漳县管辖,而这一地区正处于早期楚国发祥地的核心部分,尤其是重马店部分(过去的重阳、马

良、店垭)更是早期楚国核心之核心。不管历史上,还是当今,楚文化专家一直沿用历史的说法,把早期楚国的地望说成是南漳。

三、丹阳地望的重要依据

第一,必须全面认识早期楚国的地理坐标。《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右尹子革对楚灵王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萆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供御王事。”《史记·楚世家》载:“析公对曰:其予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筮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王事。”毋容置疑,荆山是早期楚国特别重要的地理坐标。历史上有很多关于“江汉”与“江汉沮漳”楚国地望的相关记载。《左传》载:哀公六年楚昭王说“江汉沮漳,楚之望也”,《史记·楚世家》载楚昭王说:“自吾先王受封,望不过江汉”。《史记·楚世家》又载:“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等。近现代也有不少关于“江汉沮漳”的青铜器楚简等出土文物。新蔡楚简中也有多枚提到“江汉沮漳”,如甲三11号、24号简“昔我先自颛顼,宅兹沮漳,以徙迁处”;甲三268号简记有“及江汉沮漳,遂至于淮”;乙四9号简记有“渚沮漳,及江,上逾取”。可见“江汉沮漳”在楚国地望上的重要地位,与“荆山”一起,共同锁定了早期楚国的地理坐标。也就是说,离开了“江汉沮漳”与“荆山”谈早期楚国丹阳地望,谓妄谈也!

第二,必须明确楚人的迁徙路线。笔者认为,荆山应该是楚人迁徙路线的重要参照物。我国有五座荆山,分别在湖北

省南漳县西部,陕西省阎良区、三原县、富平县三地交界处,河南省灵宝县阌乡南(亦名覆釜山),安徽省怀远县西南,甘肃省灵台县。荆山在楚人心中的位置非常高,所以荆山又被认为是楚人的祖山、圣山。据清华简《楚居》载,楚国早期居荆山和沮漳河流域“京宗”“夷屯”“都”(今宜城郑集一带)等,从夷屯至都的连线看,楚国应该是沿蛮河逐渐向东迁移,后沿汉水向南发展,至楚武王时徙居大郢,开启了在江汉地区的大发展。“京宗”这个地名非常重要,季连、鬻熊、熊丽、熊狂、熊绎都曾居住于此。对于“京宗”的考证,有以下几种意见:竹简整理者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学勤认为:“地名,疑与荆山之首景山有关。”宋华强认为:“京宗即楚人先祖创业之地荆山,意思是荆山为四方所宗。”黄鸣先生认为:“京宗之地,当在今南漳、保康所在的荆山山脉之中。”在这段文字中,关于熊绎的事件主要是三个:第一,从京宗迁移到夷屯;第二,建造“榭室”(是祭祖安神、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第三,窃牛祭祀。从简文来看,楚人居住在夷屯的时间从熊绎到熊渠等十多位楚公尽居于此,这一段时间也是楚人艰苦创业、积蓄力量、逐步扩张的时候,可以说楚国的政治核心就在这里,经济上也逐渐复苏繁荣,呈现“白日千帆过,夜间万盏灯”的景象。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认为,夷屯近于都,屯指土阜,或即夷陵。李学勤根据青铜器铭文“王涉汉伐楚……”的记载指出:“熊绎时楚都与周昭王十六年伐楚对照,只能在汉南,另根据简文中楚与都相邻近,可以推断夷屯应与宜城相邻。”湖北省博物馆考古学者笄浩波撰文认为:“夷屯在今南漳县武安镇界。”其一,从传世文献记载来看,夷屯应与荆山

相近,应与夷水有关。《水经注·沔水》篇记有:“夷水出自房陵县,东流注之。夷水,蛮水也,晋荆州知府桓温父名夷,改曰蛮水。夷水导源中庐县康狼山与荆山相邻。其水东南流,历宜城西山,谓之夷溪,又东南迳罗川城,故罗国也,又谓之鄢水。”由此可知,夷水、蛮水、鄢水是一水多名。“屯”,还有一种解释是船只聚集停靠的地方。古时南漳地界森林茂密,涵养雨水能力很强,蛮河长年行船,武镇历来是靠船的码头,武安镇恰恰是夷水边可停船的码头,本名夷屯。公元前 279 年,秦楚战争打响,战神白起在这里“凿渠灌鄢”取得完胜,秦昭王大喜过望,封白起为武安君,取“以武安民”之意,并将夷屯古镇更名为武安镇。其二,《楚居》记载熊绎迁居前让都人啗进行了一次占卜,以断吉凶。据清华简《楚居》载:“至熊绎与屈,思(使)若啗卜徙于夷屯,为榭(便)室。室既成,无以纳之,乃窃都人之犝以祭。……若敖裔义(仪)徙居都,至焚冒裔帅自都徙居焚。”意思是楚先人南迁途中沿水路经过都时,让都人来占卜,并最终选择夷屯(博士南溪推定为今南漳武安镇)这个地方建宗庙,因找不到供品,于是偷窃了都国的犝牛来供奉。显然夷屯与都相距不远,甚至是近邻。换言之,楚人迁于夷屯后,只需顺今蛮河而下即至都地。试想若此地是河南淅川之都(商密)的话,没有必要从夷屯又跋山涉水返回河南都地“窃都人之犝以祭”的道理。楚居的记载说明楚国与都国相近。郭沫若先生通过对若国铜器的考证,认为西周晚期应该有上、下两个都国并存,下都在陕西商密,上都在湖北宜城,为都之本国。熊绎盗牛不可能跑到周王朝附近的商密,从生存环境看,楚人走出荆山只能逐步向平原过渡。本人

认为此都应该就是邻近武安镇的宜城之郡。熊绎这个善射的山地部落不可能一下子抛弃山地生活习惯,其适应平原生活还有一个过程,因此,迁都到离荆山不远的夷屯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关于居住时间,从公元前 1040 年熊绎从京宗迁都,经过熊绎、熊只、熊旦、熊樊、熊赐、熊巨等到武王熊通,尽居夷屯,到公元前 689 年楚文王都郢,一共 351 年。在这 351 年里,熊渠、熊通两任君王在文功武治上都显示出雄才大略,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有楚右尹子革回答楚灵王的一段话,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筦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供王事”。熊绎既建都于丹阳,又“辟在荆山”,可见丹阳距荆山应不太远,甚至可以认为丹阳就在荆山脚下。古有楚山三座(秦王山、刘岭、商山),楚水二条(南秦河、三十里铺河)。另外,丹江上游北部偏东诸水源中,又有名荆水和大荆川、西荆川者。而且这些楚山楚水早在魏晋六朝时已见于文献记载,其历史渊源之久,可以想见。“荆”“楚”二字,上古通用,则楚山亦可称之为荆山。“以供王事”的“桃弧棘矢”(弓材)和用以滤酒的“苞茅”(龙须草)。据刘玉堂(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徐少华(师从石泉教授,长期从事楚文化的研究与探索)的研究,古“丹阳”位于今湖北西北部保康至南漳荆山一带。

第三,丹阳地望。楚史学界一般认为荆山是在古南漳以西八、九十里之处(今湖北保康县境内)。《续汉书·郡国志》引《南都赋注》说:“汉水至荆山东,别流为沧浪之水。”《水经注》引《地说》:“(沔)水出荆山东,南为沧浪之水,最近楚都。”沧浪之水即今襄阳市以西、上至均县、老河口一带的汉

水河段的别称。按这两段记载表述的荆山和汉水的地理位置，荆山必定在保康重马店区域。如《水道提纲》说：“《禹贡》荆州之荆山，在（南漳）县西北八十里，漳水所出，即今清凉河也。”这就说明古荆山与漳水源都出自今南漳西北八十里处，即湖北保康县境内。根据王生铁（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等人 2013 年以来对保康县马良镇重阳村的考古发掘，以及周边地理地貌的勘探分析，可以推测这里可能就是古“丹阳”之所在。楚国早期都城的地望是学者们经常讨论而又悬而未决的问题，据《史记·楚世家》记载：“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因此都把早期都城称之为“丹阳”。关于丹阳的地望，有两段材料很重要：《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右尹回答楚灵王：“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筦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左传·哀公六年》记载有关楚王祭祀之事：“楚昭王有疾，曰‘河为祟’。夫请祭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沮、漳，楚之望也。’”学者们多根据荆山和江、汉、沮、漳的地望与丹阳的关系来探讨丹阳的位置。

（都正阳，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

论荆山与早期楚文化

章茨伍

内容摘要：中国先后出现了5座荆山，实际上只有4座荆山，北条荆山是指陕西富平一带至河南灵宝，北条荆山文化主体是以黄帝时代的部落活动和铸鼎而闻名，南条荆山以早期楚文化与卞和得玉而闻名，南条荆山的京宗是以炎帝神农部落而得名。早期楚人利用南条荆山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优势资源为基础，披荆斩棘、艰苦奋斗，深入研究发挥自然资源的作用，来促进当时的发展。他们将大自然规律和人类的生活健康、道德准则融为一体，转化为治国育人的文化。早期楚人沿着忠孝诚信、思想纯洁、坚韧不拔、忠贞不渝、团结奋进、艰苦奋斗、争显智慧、不求名利、德理服人的法则轨道迅速走向强大。

关键词：早期楚文化、京宗、景山、荆山、五色石、荆山玉、荆条、芭茅

一、远古文化与早期楚先人的关系

《国语·晋语》载：“昔少典娶于有蟠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黄帝和炎帝属兄弟关系，炎帝的理念主要是研究利用大自然与人类相结合，充分

利用大自然赋给人类的产物农耕制药。见《淮南子·修务训》记载：“神农乃始教民，尝百草之滋味，当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由此医方兴焉”。《神农书》载：“正月上朔，有风雨。三月谷贵，石五百钱。”《吕氏春秋》引《神农之教》曰：“土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织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而黄帝的理念是以德治国，“修德振兵”，以“德”施天下。见《史记》记载：“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

《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於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教熊罴貔貅羆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根据记载黄帝与炎帝联手共同擒杀了蚩尤，获得胜利，统一了中原各部落。黄帝结盟炎帝后奠定天下，一直影响着华夏文明数千年。

楚先祖出自哪里呢？《史记·楚世家》中记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帝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综合史书记载理清了楚先人的来历，楚先祖季连乃黄帝第七代后裔，约在公元前20世纪受朝廷指派，从北往南迁移，来到景山的京宗，并封此地为荆

山,因黄帝的图腾是“熊”,这里最早叫熊山,故季连后代也称熊氏。季连是第一代披荆斩棘、挽草为业的楚人,他也成了当时楚部落首领,当时楚部落活动面积不过百里,楚先人以南条荆山为基础艰苦奋斗数百年,奠定了楚部落的根基。一直到商朝末期,季连的第28代后裔鬻熊(鬻熊,季连之苗裔,季连乃吴回之孙,季连传附沮、穴熊、熊完、熊服、熊元、熊机、熊杼、熊怀、熊胤、熊靡、熊祖、熊潜、熊仅、熊绅、熊克、熊成、熊单、熊辅、熊佐、熊文、熊浩、熊杰、熊启、熊苞、熊越、熊亶、熊俊、鬻熊)投奔了时任商朝“牧师”的黄帝后裔季历,后辅助姬昌并担任火师,为大周的建立创下了汗马功劳。道家《鬻子》22篇,班固自注:“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史记》也称:“鬻熊子事文王”。因熊氏辅佐有功,而荆山是早期楚部落发源地,所以周成王时,王封鬻熊曾孙熊绎为楚子,从而诞生了楚国。《地理志》明确记载:“周成王时,封文、武先师鬻熊之曾孙熊绎于荆蛮,为楚子,居丹阳。”熊绎是祝融氏后代,吕尚乃神农氏后代,他们先后辅佐文王和武王,将炎、黄文化和嫫祖文化融为一体,形成了道德文化,楚人就利用这一文化在华夏大地上兴盛了八百年之久。

二、北条荆山与远古文化的关系

我国在历史上先后出现了5座荆山,据史料记载陕西富平荆山属北条荆山,因黄帝活动范围,又将河南灵宝的山脉,命名为荆山,这两个荆山直线相隔距离百十公里,所以后人记载历史都划为北条荆山。《史记·封禅书》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这个荆山是指北条荆山,见书《禹贡》:“导岍及岐,至于荆山。”“北条荆山在南,山下有荆渠,即夏后铸九鼎处也。”这个记载说明了北条荆山主要在今陕西富平一带。“荆”应该

解释为长满荆丛的原始森林,没有被任何人类占领的地方。谁先在这里开山挽草为界就属于他的地盘,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封了“荆”的山脉就是黄帝及他的后代占领地盘的标志,以辟荆为界。以此论断北条荆山是中国最早的荆山,也是黄帝活动最频繁的地方。各种史料记载:黄帝最繁盛阶段就在这一段,死后也葬在陕西黄陵县乔山。因此北条荆山由黄帝铸鼎而成名,这一点就充分说明北条荆山起源于黄帝。东西部的荆山是因黄帝后裔建立的楚国强大而得名。

三、“南条荆山”、“景山”、“京宗”的地名关系

《楚居》记载:“季连,初降於隈山,氏于空牢前,出于乔山尾,位爰波,先位于京宗,穴畬(鬻子、穴熊、鬻熊)迟达於京宗。”《史记》记载:“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黄帝的后裔季连熊氏,从北条荆山一带向京宗方向迁移,并将北条荆山的文化带到京宗,如地名:荆山、沮水、凤凰山等。

为什么说“京宗”就在景山呢?其依据是:

1、“京”的甲骨文形状看上去像一座瞭望台,类似后来的“阙楼”,事实上“京”的本义就是指“高耸的建筑物”。《公羊传》载:“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由此可见,封了京的就是当时部落最高首领或帝王居住的地方。远古时期,人们虽然发明了房子,但仍然避免不了野兽或自然灾害的侵袭,便想到将房屋加高,即所谓高“住”无忧,“高楼”便应运而生。京就是标志至高“屋”上和居住者的身份,宗就是在远古时期宗神供奉或居住的地方。如《诗·大雅·思齐》记载:“惠于宗公”,毛传:“宗公,宗神也。”宗神意思是:祖先供于宗庙,称“宗神”。据史记注释,炎帝是姜氏供奉的“宗神”。结合“神农架

木尝百草”的记载,这样就证明京宗起源于炎帝,所以这里先有了京宗,后才有景山。史书记载,这个景山就是南条荆山的首峰。

2、《墨子》记载:“子以攻伐为不义,非利物与?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沮)山之间。”可见熊丽最初在沮水发源地的山间。《左传》昭公十二年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跋涉山川,以事天子。”由此说明熊绎封在荆山,那么京宗、景山、荆山、沮水有什么关系呢?《史记》记载:“江汉沮漳,楚之望也”。《诗·墉风·定之方中》记载:“望楚与堂,景山与京。”通过这段记载可以证明景山与京宗的关系。《水经注》记载:“沮水出东汶阳郡沮阳县西北景山,即荆山之首也。”《山海经》也记载:“荆山之首曰景山。”这就锁定了长江和汉水之间荆山山脉的首峰属景山。《湖北建制沿革》引用《禹贡》记载得出:“湖北西北部属郢阳管辖,东南属荆州管辖,即景山,荆山之首也。”并以地图形式锁定沮水起源于景山,这就说明楚先人来到京宗,封此山为“景山”。景山的意义就是:在此山首峰插上了旗杆,标志着占有此山,人人崇敬的含义,所以后来就有了“孝景”之说;还有一层含义是站在高楼,观景四方的意思。根据多方面史料记载,景山指湖北保康南、沮水发源地至神农架,南条荆山山脉从湖北南漳西一带山脉起,长江以北,汉江以南,贯穿保康全境至神农架,这就是现在南条荆山的整体山脉。

3、景山是荆山之首,景山在古代还称为:南山、神农山、熊山。《韩非子》、《荆州记》记载:“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还有诸多史书记载景山为楚山,因楚先人来到京宗命名为:“景山”,后来就淡化了对京宗的记载。

4、在历史上有很多学者对“丹阳”这个地名有争议。《诗经·大雅·卷阿》记载：“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明代朱善的《诗解颐》有详细的释义：“凤皇者，贤才之喻；高冈者，朝廷之喻；梧桐者，贤君之喻；朝阳者，明时之喻也。”因此有“丹凤朝阳”之说，简称“丹阳”。那么“丹凤朝阳”是什么意思呢？凤是指黄帝后裔祝融氏，见《白虎通》说：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因此凤凰随之成为楚人的图腾，也称“凤楚”。因鬻熊辅佐有功，就有了“贤才遇明君”的说法，所以丹阳成为了楚人的最高荣誉称号。以后楚人居在哪里都有丹阳或带“阳”的地名，甚至楚人迁移路过的地方，如现今陕西商南、湖北丹江口至保康的重阳一带都是早期楚人的互通走廊，都有丹阳的记载。后来熊绎封在荆山，他依托南条荆山的地理环境和物质基础，迅速发展，壮大后灭掉了周边的诸侯国，然后选择长江中上游巴郡一带，也就是现在的巴东建立了楚国国都，并以“丹凤朝阳”的美名封其为丹阳城。据此记载说明，楚先祖来自北条荆山，楚部落的发展在南条荆山—景山一带。“熊绎辟荆山”就指南条荆山，而“熊绎居当阳”就是指熊绎在达到了一定条件时，迁出深山，建立楚国。这也是“熊绎辟荆山”和“熊绎居丹阳”的来历。

以此论断，楚人首居地就是荆山首峰—景山，后人为了纪念先祖也称为“楚山、沮山、茅山、皇界”，直到如今“皇界”和“茅山”的地名仍然在这里存在，还留下了不少古观和古栈道遗迹。

据《楚居》、《史记》、《山海经》、《水经注》、《左传》、《荆州记》、《诗经》、《湖北建制沿革》等诸多历史文献的记载论证和近年考古发现，这一带有以炎帝为主体的远古文化遗迹，南

条荆山周边有商朝晚期和周朝早期大量的文物遗迹,特别到西周时期这里成了主要活动区域,是西周文化的聚集地,早期楚国的发源地。这里在历史上也叫“皇界”,在明朝弘治十一年前东南属荆州府南漳管辖,西北属郧阳府房县管辖,这就是早期楚人发展史的地名关系。以此论断楚先人源于北条荆山,南条荆山是楚国建立的发源地,所以南条荆山因楚国强大和卞和献玉而得名。南条荆山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发现。

四、早期楚人发展的物质基础

南条荆山环境宜人,气候温和,属亚热带地区,动、植、矿物资源丰富,如山漆、桐油、葛、菌类等都是当时的稀缺物资。荆山山脉海拔高度 200—3100 米,自然形成盆地、洼地和适合种植的肥沃土地有数万亩。泉水从岩缝中涌出,汇成溪流,流向土地和山林。荆山山脉悬崖陡壁、群山环绕,形成了天然屏障,易守难攻,避免了其他部落的侵略,还能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所以楚先祖在这里精心研究、开发、应用,使他们逐渐强大。

物质支撑一,荆山山脉坐落在长江和汉水中游之间,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生长着各种中药材和药食两用野生植物,被智慧的楚人发现并应用。如:腐婢,它是马鞭草科药食两用植物,含有大量的果胶、黄酮、19 种氨基酸、木栓酮、木栓醇、十八碳酸、柚皮素、香草酸、多糖类等多种成分。《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和《本草纲目》都记载了它的药、食用价值:性寒、味苦涩、归肝、大肠经、治痲症、寒热、邪气、泄利、阴不起、病酒、头痛、肿毒、治丹毒、无名肿毒、刀斧创伤、毒蛇咬伤、蜂蛰伤及酒醉不醒等。因这种植物能充饥治病、美容养

颜,功效神奇,还能制成跟豆腐一样的凉粉,古人就给它封为:“观音草”、“观音豆腐”、“神豆腐树”。这种植物早期生长在荆山,树叶散发着一种气味,叶子成熟后变成黄色,古人也给它封了个雅称叫:“臭黄荆”,这种野生植物至今在这个地方大量存在。像这样名贵中药材在这一带有上千种,特别是几味珍贵药草称为“荆山八宝”,也叫:“神农八宝”：“五彩石”、“金钗(石斛)”、“腐婢”、九死还阳草、头顶一颗珠、江边一碗水、文王一支笔、七叶一枝花。但更重要的是这里有一种五色石,也叫:荆石、荆虹,它是道家炼丹制药的主要材料。《神农本草经·金石部》、《本草纲目》等诸多历史医学名著都有记载,石脂“主治:心腹邪气,女人心腹痛,镇心,胃中冷气,益毛发,悦颜色,治惊悸,安魂定魄,壮阳道,下乳汁。随脏而治,青治肝,赤治心,黄治脾,白治肺,黑治肾。”通过现代科学手段得出这种宝石主要含有变质二氧化硅,还含有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如石脂),可通过一定环节转化为偏硅酸。在春秋时期,人们发现这种五色石英,颜色丰富,又出自荆山,就给它封了个美石名称:荆山玉。这种五色石英质玉矿物质在这个地方至今还存在。楚人充分发挥研究应用,做成人们佩戴身上的天珠和其他饰品,通过人体皮肤摩擦和吸收,可产生“生物磁”,调整人体的阴阳平衡,达到治病养生的效果。楚人道医、巫医利用前人炼丹制药之术的经验,充分发挥利用天然资源,成为了当时楚人经济发展的第一物质基础。

物质支撑二,荆山还有一种植物叫荆条(荆棘),后来也叫荆竹,属禾本科植物。《楚居》记载:“穴禽迟徙于京宗,爰得妣湛,逆流哉水,厥状聂耳,乃妻之,生亓叔、丽季,丽不从行,溃自胁出,妣湛宾于天,巫并赅其胁以楚,抵今日楚人。”

在当时有身份的人殡葬时,必须用荆条编制的棺材下葬,后来的木质棺材也必须用八块荆条箍固在寿棺上,才可以抬棺下葬,荆条箍也叫八发箍,这一民俗文化在本地区一直延续至今。《左传》记载:“熊绎,辟在荆山,篳路蓝缕…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为什么说荆条、荆棘就是荆竹?篳指荆条、竹子。楚人用自己编造的车子来运送弓箭等贡品,供奉给朝廷。此类弓箭是用山桃木做弓架、荆条制作成弓箭,在当时传说中,这种弓箭可降妖避邪。荆条还有教育文化传递,就是把荆条做成戒尺,不听话的学子要受到夫子的惩戒。这种植物生长特殊,一年砍一次,一年长一次,人们称为“节节高”“代代发”。而且是一节一节生长,人们也称为“荆条育人节节高”。楚人把这一自然规律作为一种文化来传递,后来也有了“负荆请罪”之说。楚国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封了“子爵”的相当于皇亲国戚。刑罚的刑具也有等级划分,什么样的人犯罪就用什么样刑具。那么荆条就是用来惩罚子孙后辈的,就有了“荆条教子节节高”“荆条教子望成龙”的说法。荆条是荆山土生土长的植物,后来受到外来物种侵袭,长得也很像,都属禾本科植物,在这里大面积繁殖,后来被称为“荆竹”。这种荆竹比其它任何竹子的韧性都要好,生长寿命也比其它竹子长。荆竹从外表看很结实,上面还长有像“毛”一样的灰璞,人们也叫它“毛荆竹”。荆条就成了当时军事、农业、生活、文化的必须品,在当时的军事上用于弓箭、盔甲、水上运输工具、陆地搬运工具、高档建筑材料。在农业生产和生活中,这种植物也是…缺少不了的,农作物的晾晒器具、家具,遮风挡雨,铺垫睡觉,都用这种植物制作而成。在文化上用来做成“笔”“筒”,后来用于造纸。荆条的嫩笋,是一种药食两用美

食佳肴,《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均有记载,也封为“美食山珍”。通过现代科学手段得出这种植物含有:蛋白质、钙、碳水化合物、多种维生素等。所以荆条成为当时的贡品,定期定量上缴给朝廷,楚人利用这种植物编制成条排,从沮水和粉水运出汉江和长江。所以荆条成为楚人发展第二物质支撑,这种植物在这个地区至今大面积存在。

物质支撑三,荆山还有一种植物叫苞茅(荆草、小白茅草),属禾本科草本植物,生长在荆山海拔500-1500米,至今也大面积存在。这种植物在《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中有记载:“味甘,寒。主治劳伤虚羸,补中益气,除瘀血,血闭,寒热,利小便。”通过现代科学手段得出这种植物含有:芦竹素、白茅素、黄酮类化合物等,是一种药食两用植物。苞茅在当时是战马、牛羊的最佳饲料,也是房屋建造的最佳材料,每年的阴历3月份左右是最佳采摘季节,连根采摘,茅草长有肥壮的柳胎,柳胎还包在草叶中,没有露出来的时候,叫苞茅,可以生吃,清甜可口,也可以做成营养丰富的可口菜肴,具有清热解毒功效。这种植物过了季节,就长出像狐狸尾巴一样的白毛,这个时候就失去了营养和造酒等药食用价值。在古代人们发明了发酵酒的工艺,因当时发酵酒的材料紧缺,粮食产量低,早期楚人就寻找一种可以保温透气的造酒材料,而发现野生苞茅草具备这些优点,可保温透气,又可滤酒、清酒、出酒,这种材料后来就应用到蒸馏酒的工艺上,在这里还有少量蒸馏酒在应用。《左传》记载:“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说明苞茅缩

酒价值非常高。这一利用,他们就发现了用这种材料做的酒清甜可口,出酒率高,还可以强身治病,楚人就将这种苞茅作为造酒的主要材料,这就是楚人苞茅贡酒的来历。我们通过多年研究实验,这种植物作为酿酒透气材料,可以提高酒的口感和质量,是一种不可代替的酿酒材料。当时楚人的这个创造发明,就成了楚人发展的第三物质基础。

五、精神文化

楚先祖季连在荆山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楚祖鬻熊延续楚先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并代代相传,其后熊绎更是沿着这一精神信念封为子爵来到荆山。一方面完成朝廷交付的任务,一方面着手建设自己的家园,不靠外援,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合理利用手中掌握的资源,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熊绎以他的雄心壮志和超人智慧,带领楚人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开创楚国,总结出一套艰苦奋斗、以德服人、赏罚分明的精神文化典范。后来各代楚王沿着这一文化继续发展,楚文王就是这一文化的典型继承人,他充分研究远古文化的五色分五帝、五方、五行、五脏、五福,并利用卞和寻玉和三献的精神发挥应用,将三献精神、美石文化提升到治国方略,来规范人们为人做事的准则,进而将这一文化深化到各个领域。利用大自然规律、道家思想神话、天理文化,将这一文化神奇化、人性化、攻心化、生活化,从而规范人的意识形态、道德规范。以石玉文化治国育人,将人体的肝、心、脾、肺、肾,对应自然界的木、金、水、火、土,形成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以石玉的颜色:红、黄、绿、紫、白,称为“玉德五脏”,对应福、禄、寿、喜、财,立定忠孝为福,饮食为禄,健康为寿,事业为喜,成果为财。后来就有了“百善孝为先”的育人之说,并

延伸出玉德文化：仁、义、礼、智、信。

为什么说“美石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将石玉制作成佩、玺、圭、璋等，随身佩戴或者重大礼仪的时候拿出来，来彰显自己涵养礼仪，这就是楚文化，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楚人将这一文化注入内涵并发扬壮大深化应用，形成一个纯洁执着、艰苦朴素、勤劳致富、坚韧不拔、忠贞不渝、团结奋进的民族。楚文王得到了卞和献的玉璞，封为“和氏璧”，因这种玉石出自荆山，也叫荆石、荆虹、荆山玉。他又把这一文化升级了一个层次，封这块玉为和氏璧，其寓意是：“和”象征着以和为贵，天下太平，氏指以姓氏代表的氏族，璧是“内方外圆”的准则，其意义是团结各氏族，依这一准则建立成和平繁荣的国家，所以就有了“玉出盛世”之说。他还将雷、电、雨、水、火、山等，同样神圣化、生活化，巧用到治国育人的文化中，这就是远古文化传下来的“天理不可违”文化。

楚人就是利用独特的地理环境、丰富的物质基础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奋勇向前，成为了“春秋五霸”之一。这就是楚人的精神文化，这一文化渗透到中华大地，影响亚洲，辐射全球，所以楚人精神成为了华夏历史文明的典范。

注：

《国语》相传为春秋末鲁国的左丘明所撰，但现代有的学者从内容判断，认为是战国或汉后的学者托名春秋时期各国史官记录的原始材料整理编辑而成的。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刘安子》，是西汉皇族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集体编写的一部哲学著作，属于杂家作品。

《神农书》相传为炎帝神农氏所撰，分八谷长生篇、占篇、数篇、法

篇、教篇、求雨篇、杂篇等。

《吕氏春秋》是在秦国丞相吕不韦主持下，集合门客们编撰的一部黄老道家名著。成书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夕。《左传》原名《左氏春秋》，汉代时又名《春秋左氏》、《春秋内传》，汉代以后才多称为《左传》。

《史记》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

《鬻子》旧题周鬻熊撰。《汉书·艺文志》道家类有《鬻子》二十二篇，小说家类有《鬻子说》十九篇。刘勰《文心雕龙·诸子第十七》：“至鬻熊知道，文王咨询，余文遗事，录为《鬻子》。”内容“阐域中之教化，论刑德之是非”。

《地理志》《汉书·地理志》包括上、下两分卷，是班固新制的古代历史地理之杰作。历史的时、空不可分，故写历史必记及地理。中国最早以“地理”为书名的著作。

《禹贡》是中国古代名著，属于《尚书》（一作《书经》，简称《书》）中的一篇，其地理记载囊括了各地山川、地形、土壤、物产等情况。

《楚居》是2008年7月入藏清华大学战国竹简（又称“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63篇书中的一篇。

《公羊传》又名《春秋公羊传》，儒家经典之一。是专门解释《春秋》的一部典籍，其起讫年代与《春秋》一致，即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

《诗经》作者佚名，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墨子》七十一篇，注曰名翟，宋大夫。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汉代又名《春秋左氏》、《春秋内传》，汉代以后才称为《左传》。

《水经注》作者北魏晚期的酈道元。是古代中国地理名著，共四十卷。

《湖北建制沿革》作者潘新藻，湖北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该书已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韩非子》韩非（约公元前 280 年—公元前 233 年），又称韩非子。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散文家，法家代表人物。

《荆州记》作者是南朝宋的盛弘之。此书南北朝齐、梁、西魏间著述中颇见注称，唐、宋地理典籍中尤多征引。

《白虎通》又称《白虎通义》、《白虎通德论》。东汉汉章帝建初四年（79 年）朝廷召开白虎观会议，由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陈述见解，“讲议五经异同”，意图弥合今、古文经学异同。汉章帝亲自裁决其经义奏议，会议的成果由班固写成《白虎通义》一书，简称《白虎通》。

《神农本草经》作为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约起源于神农氏，代代口耳相传，于东汉时期集结整理成书，是中医药药物学理论发展的源头。

《本草经集注》古代药学著作。共七卷。南北朝梁代陶弘景所编著于（约公元 480—498 年前）。

《本草纲目》作者李时珍，明代名医，世称药圣，另有著作《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

（章茨伍，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理事，保康荆山玉文化研发中心，高级工程师）

景山，楚先祖先公的居地

——保康楚源地初探之一

张光业

引言：保康是楚国的发源地？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不然何以树起广告牌、打起广告语，还建起了楚城，并每每向人乐道。但要是问个为什么，却又不免心虚，勉强说出个子丑寅卯，还自不觉闹了笑话。难得近年来闲适，搜阅了早期楚文化的相关书籍和文章，偶有心得。特择其几条理据，撰此小文三篇，名其为“保康楚源地初探之一、之二、之三”。权且抛砖引玉，以飨读者。

司马迁的《楚世家》载：“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正是这条记载，使楚都丹阳地望在何处，论争了几十年，至今仍未有结论。而由楚人自撰于公元前 305 年 ± 30 年、属于战国中期偏晚的、专门记述楚公楚王世系和居地的清华简《楚居》，却没有丹阳。《楚居》记载的“楚都”，属早期且时间较长的有“京宗”“夷屯”“乔多”。其中：“京宗”居住的是楚始祖季连至熊绎；“夷屯”居住的是熊绎至熊渠，时间长达一个半世纪；“乔多”居住的是熊延至都敖熊仪（公元前 860 年——公元前 764 年）共 96 年，若计算到楚武王徙郢，则长达 154 年以上。保康楚源地初探之一，先说“京宗”。

京宗即景山

清华简《楚居》：“季连初降于隈山，抵于穴穷，前出于乔山，宅处于爰波，逆上洲水，见盘庚之子，处于方山，女曰妣佳，秉兹率相，詈胄四方。季连闻其有粤（聘），从及之盘，爰生盈（或赢）白（伯）、远中（仲），游徜徉（佯），先处于京宗。穴禽（熊）迟徙于京宗，爰得妣列，逆流哉水，厥状聂耳，乃妻之，生亘叔、丽季。……至禽绎与屈紃，使若嗑卜徙于夷屯。”从楚始祖季连、楚近祖鬻熊乃至熊丽、熊狂、熊绎诸楚先公都居住在共同的居地——“京宗”。“京宗”是楚民族的起源和诞生之地，是楚族之祖先圣地，是楚国的发源地。“京宗”，清华简《楚居》整理者认为：“地名，疑与荆山之首景山有关。这是很高明的见解。李学勤先生还进一步论述说：“鬻熊、熊丽都居于京宗，简文还说，‘至熊狂亦居京宗。’对照葛陵简的‘宅兹睢漳’，不难推想京宗所在的范围。《墨子·非攻下》：‘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讨’《说文》训为‘治’，可知熊丽是在睢水一带的山间，所以京宗之名有可能与《中山经》的景山有关。”

李家浩先生认为：“‘景’从‘京’得声，故二字可以通用，《楚居》把‘景山’称作‘景宗’，犹如古书把岱山称为‘岱宗’，原因是景山在《中次八经》中为荆山之首。”

黄鸣先生认为：“京宗之地，应在今荆山山脉中的景山附近，……其地约当于今天湖北保康县中部一带。景山之北有南河，北入汉水，楚人定都如此，既可由汉水上至陕南，亦可北上淅川进入南阳盆地以至河南中部。楚人于此休养生息，终于在殷末周初开始发展壮大，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入春秋后成为南方大国。”

牛鹏涛先生举《新蔡葛陵楚墓》发掘报告中编号为甲三11.甲三24的一支竹简：“昔我先出自川卩□□□追，宅兹睢漳，以选迁处”为例，指出：“该简所讲的应即妣佳之后‘徙于京宗’的事情，‘京宗’对应于‘睢漳’。葛陵楚简的内容，合于《墨子·非攻下》所载：‘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由此可以推断，鬻熊、熊丽、熊狂一直所居的京宗，地望在睢漳上游的睢山一带。”按：睢山是指睢水源头两旁的山。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原始社会夏商时期》将睢山标注为保康县歇马镇西北诸山，这是非常准确的。景山是睢水的源，睢水的“睢”从且从佳，且是声旁，而佳则有可能来自楚先祖母妣佳的“佳”，季连“先处于京宗”的“京宗”可能就是景山一带，即现在的保康县歇马镇。

笄浩波先生认为：“楚简中提到的荆山与沮、漳二水才是探寻楚国早期中心区域的关键依据，依此考察以上三处荆山，陕西商县荆山及河南淅川荆山虽然有丹阳，但都无沮、漳二水，故可排除，与文献中所记荆山和沮、漳二水的位置及水系情形相符的只有今天湖北西北部的大荆山和发源于该山的沮、漳二水。”

以上列举诸家对“京宗”的论述，“京宗”即“荆山之首景山。”但学术界对此仍有不同意见。如宋华强先生认为：“然而古书从未见到楚人提到‘景山’，颇疑‘京宗’就是指荆山。荆山是楚人先祖创业的著名地点，……‘京’属见母阳部，‘荆’属见母耕部，声母相同，韵部也有关系。……把荆山称为‘荆’宗，大概和《尚书·尧典》称‘岱宗’一样，意思是荆山为四方所宗。”高崇文先生认为：“目前学术界多认为‘京宗’即‘荆山’，或指荆山之首‘景山’，这似乎已成为一致性的意见。但若仔细分析之，仍有些不易理解的问题。《楚居》中

‘山’字屡见，如记载季连所居之处有驩山、乔山、方山等，紧接其后的[彡呈]伯、远仲、穴禽等假如又迁居于‘荆山’或‘景山’，何必不直书之反而用‘京宗’来假借；荆山之‘荆’字在西周时已是常用之字，战国楚简中也多见，又何必用‘京’字来代替。……然同是战国楚人写的《楚居》为什么不直接写‘荆山’而写‘京宗’。所有这些不好理解的问题，总使人感到用声韵通假之法来解释‘京宗’即‘荆山’或‘景山’似乎有些牵强，难以信从。……厘清了‘京’、‘宗’在周时期的含义，便可知《楚居》中的‘京宗’似不可能凭声韵通假之法指‘荆山’或‘景山’，而可能是指镐京宗周之地。”

高崇文先生提出的问题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但得出京宗即宗周(镐京)的结论是靠不住的。探讨京宗地望需要与楚国西周时期的另外几个居地夷屯、发渐、旁岍、乔多等，进行全面、综合考虑。发渐、旁岍、乔多都在南河流域，正如黄鸣先生所说“景山之北有南河，北入汉水”。同时，还要与乔山相联系，乔山在景山东北百五十里。李学勤先生说：“骄山位置虽不易确指，总在汉水以南荆山一带，近于睢漳二水的发源地。从那里向北，过了汉水，正好逆均水北上”。

对“京宗”的不同解读，正是楚国早期中心区域难以确定的关键所在。我们认为包山、新蔡葛陵、楚居等楚简中提到的荆山与沮、漳二水才是探寻楚国早期中心区域的关键依据，沮水的发源地景山即荆山之首，才是“京宗”所在地。

景山乃沮水之源

景山是沮水的发源地。《水经》：“沮水出汉中房陵县景

山。”《水经·沮(睢)水注》：“沮水出汶阳郡沮阳县西北景山，即荆山首也。”王国维《水经校注》：“沮水出东汶阳郡沮阳县西北景山，即荆山首也……杜预注云：水出新城（即汉中郡，秦置，莽曰新城。详《汉书·地理志》第八上——作者）郡之西南发阿山，盖水异名也。沮水东南流，迳沮阳县东南……”东汶阳郡为东晋时所设，治所在高安县（北周改远安县，今湖北省远安县西北旧县镇），《南齐书州郡志》：“桓温平蜀，治江陵。以临沮西界，水陆纡险，行径裁通，南通巴、巫，东南出州治，道带蛮蜚，田土肥美，立为汶阳郡，以处流民。”同时，置沮阳县治于歇马白果树坪。清同治《房县志》载：“（沮水）在东南二百里。《水经》说：沮水出汉中房陵县。酈道元注曰：出东汶阳郡沮阳县西北景山，即荆山首也。按景山东为保康，西为房县，沮水导源此山。保康旧为房陵地，故《水经》说‘沮出房陵也。’尔后自螃蟹溪折而南，经界牌岭境，绕南漳地，曰马良坪、西坪、重阳坪，皆沮水所经。”《禹贡锥指》：“《元和志》云：‘沮水出房州永清县西南。’景山、永清，本汉房陵县地也。”

上引汉中房陵县、东汶阳郡沮阳县、房州永清县等沮水发源之景山，都是指同一个地方。房陵，秦置县，即今湖北房县。东汉房陵郡、曹魏新城郡治所。唐为房州治所。元废房陵县入房州，明降州为县。明天顺《襄阳郡志》（1459年）版载：“房县，东至南漳县界司空山二百五十里；西至竹山县界一百里；南至夷陵州兴山县松柏岩二百里；北至均州界窝二百二十里；东南到南漳县界界山四百里。”明代以前保康县域属房县，明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始析房县东境宜阳、修文二里置保康县。县南在歇马镇界山（界牌岭）与南漳县交界。1949年4月原南漳所辖的马良、店垭、重阳三个乡928平方

公里划归保康县辖。自秦置房陵县、明置保康县以来，景山及沮水源都属现今的保康县。

睢水即今沮河，源出荆山山麓的湖北省保康县欧店村王家大岩（古祖山），流经保康、南漳、远安、当阳、枝江等县市，于荆州市李埠镇临江寺入长江，长 230 公里，支流有 67 条。石泉先生却认为：齐梁以前，沮河即今蛮河。“概言之：古沮、漳应是汉水中游西面、流经宜城平原上的汉水重要支流，今蛮河流域。古沮、漳既然在今蛮河流域，则齐梁以前位于沮、漳下游的楚郢都、古江陵城自不能出今宜城南境。”石泉先生的观点一度影响颇大，丹阳南漳说即以此为依据。现在看来，睢水还是那条沮河，发源于荆山之首景山，古今未变！

景山地望

保康的景山是楚先祖先公的居地，是楚国历史上的重要地名，是楚人先祖创业的著名地点。景山是荆山之首。荆山位于湖北省西部、武当山东南、汉江两岸，东南谷域宽广，西北巍峨陡峻，呈北西—南东走向。北始房县青峰镇大断崖，南止荆门—当阳一线，长约 150 公里；西至远安沮水地堑，东到荆门—南漳一线，宽约 20—30 公里，总面积约 3100 平方公里。荆山的主体在保康县境内。保康县地名领导小组 1984 年编印的《保康县地名志》中，无景山的记载，所列高山以关山为最，海拔 2000 米。其它高山依次为歇马望佛山，海拔 1946 米；后坪老架山，海拔 1926 米；欧店天鹅池，海拔 1914 米；马桥茅山岩，海拔 1896.5 米；龙坪聚龙山，海拔 1852.1 米。景山是指哪座山峰呢？

笄浩波先生认为：“楚国早期中心区域只能在江汉平原

西北部的大荆山范围之内。观荆山之首叫聚龙山,位于湖北省保康县境,位于沮、漳水之间,与《楚居》及新蔡简所记楚人早期居地相符。《楚居》所言‘穴熊迟徙于京宗’的‘京宗’应该就是指的金保康聚龙山一带。”

聚龙山不是景山。其一,《中山经·中次八经》:“荆山之首曰景山……睢水出焉,……东北百里曰荆山……漳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睢。”聚龙山不是荆山之首,比它高的山还有关山、望佛山、老架山、天鹅池、茅山岩等诸高山。尤以关山为最。景山为沮水的发源地,位于保康县的歇马镇欧店。前文引黄鸣先生文:“景山之北有南河,北入汉水。”聚龙山所在的保康县龙坪镇则是漳水的发源地。

其二,景山和荆山分别在“湖北省房县西南二百里”,“新城郡沔乡县。”《明史稿》:“沔乡县,在房陵南,水以县得名,在今房县南山中。”现今保康县就包括在汉代房陵县区域内,但景山和荆山有别,一个在其西南二百里,一个在其南山中,二者方位不同,所指之山是有区别的。

其三,景山在沮阳县西北。东晋沮阳县治在今保康县歇马镇白果树坪,沮水在此折向南流,因地处沮水北而得名。沮阳县西北所指诸山应是关山、天鹅池、茅山岩等。

景山就是现今的关山。关山或谓官山,官方之书所载之山。关山海拔 2000 米,为荆山诸峰之最,地处沮阳县西北,房县西南二百里,与典籍记载相符合。关山位于现今保康、神农架和兴山三县区交界处。其方位与前引《房县志》“景山东为保康,西为房县,沮水导源此山。”正相符合。西面的房县地域,现已改为神农架林区所辖。其山势险峻、陡峭,站在关山之巅,可远观到神农架林区新华镇所在地。东面现为保康县

歇马镇合作村千家坪,地势似丘陵,云锦杜鹃分布其间,时现高山草甸,一条小溪从草甸间穿过,流水潺潺,这或许正是沮水的源头。南面从保康的合作村至兴山县榛子镇绵延 20 多公里是烟叶和蔬菜基地,宽阔平坦,在未开垦时的古代,则是土肥草茂的高山草甸,正是大象、犀牛、牦牛等野生动物的乐园,也是楚人的狩猎场。在此保康与兴山不远的交界处,有一白龙潭,地处一小山坳中。潭略呈圆形,直径约 20 米,深不可测。水自潭中溢出,冬温夏凉,农人争相引水灌溉,千年不涸。楚人在此自然发展壮大,可谓天时地利。

结语:保康县的关山即景山,也就是《楚居》中的京宗。以关山为中心的区域是楚先祖先公的居住地。这不仅为出土的战国楚简所证实,在先秦的文献中也有记载。《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筮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左传》哀公元年记楚昭王说:“江汉沮漳,楚之望也。”尽管如此,仍需要更多的考古材料相印证,以尽早论争出结果。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笄浩波先生带领黄尚明先生的两个研究生,于去年底今年初,先后在马良、歇马等地进行田野考古调查,我们期待着有新的发现。

最后,附诗一首:关 山

群峰竞举天,楚源首景山。草甸舞溪水,丽人云杜鹃。

注: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0 年。

李学勤:《论清华简〈楚居〉中的古史传说》,《中国史研究》,2011 年第 1 期。

李家浩:《谈清华简〈楚居〉的“夷屯”及其他——兼论仓山楚简的“埽人”等》,《出土文献》第2辑,上海文艺出版集团,2011年版。

黄鸣:《清华简〈楚居〉一至四简的历史地理考察》,《简帛网》,2011年7月20日。

牛鹏涛:《清华简〈楚居〉与楚都丹阳》,《文史知识》,2013年第6期。

笄浩波:《从近年出土文献看早期楚国中心区域》,《江汉考古》,2011年第2期。

宋华强:《清华简〈楚居〉1—2号与楚人早期历史传说》,《文史》,2012年第2辑。

高崇文:《清华简〈楚居〉所载早期居地辨析》,《江汉考古》,2011年第4期。

杨守敬:《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694—2695页。

王国维:《水经校注》第102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第一版。

《禹贡锥指》卷七“荆及:衡阳惟荆州”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00页。

参阅石泉《齐梁以前古沮(睢)、漳源流新探——附荆山、景山、临沮、漳(章)乡、当阳、麦城、枝江故址考辨》,原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2期,见《新探》,第211~257页。

清·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十八卷,光绪十二年,上海还读楼校刊本,《山海经》第五,中山经,第29页。

清·万斯同:《明史稿》,宁波出版社,2008年版。

乔多，西周时代楚国的百年都邑

——保康楚源地初探之二

张光业

乔多是西周时代楚国的百年都邑。清华简《楚居》：“禽渠徙居发渐。至禽辞、禽挚居发渐，禽挚徙居旁岍。至禽延自旁岍徙居乔多。至禽甬及禽严、禽霜及禽雪及禽训、禽号及都敖禽仪，皆居乔多。都敖禽仪徙居都。至焚冒禽率自都徙居焚。至宵敖禽鹿自焚徙居宵。至武王禽达自宵徙居免，焉始□□□□□福。众不容于免，乃溃疆涅之波而宇人焉，氏今曰郢。”

据简文可知，熊渠孙熊延自旁岍迁居乔多，及至若敖熊仪等楚公都居乔多。整理者云：“禽甬及禽严，即《楚世家》之‘熊勇’和‘熊严’”。又云“禽相(霜)及禽雪及禽训，即《楚世家》之‘熊霜’、‘熊雪’和‘熊徇’兄弟三人。又云“熊训’，《楚世家》作‘熊徇’，训、徇音近。”

熊渠于公元前 886 年即位，在位 10 年。熊渠之后，楚世系比较混乱，《楚居》与《楚世家》所载世系不同。渠卒，其子熊毋康即位。熊毋康早卒，由其子熊挚即位，迁居旁岍。熊挚有疾，其弟“弑而代立”。根据《楚居》记载，结合《楚世家》，大致可以推定：熊挚即位后，其弟熊延发动政变，推翻了熊挚

政权,熊挚奔夔,熊延也另迁到了乔多。其时代如徐少华先生所论:“西周晚期周厉王时,楚熊挚嫡嗣被其叔父熊延代立,约公元前860年左右。都敖熊仪(公元前790年——公元前764年)先居乔多,后徙居都。以熊仪在位下限公元前764年计算,乔多作为楚国的都邑达96年。若以楚武王徙郢的时间算,则达154年以上。武王徙郢的时间,清代宋翔凤《过庭录》卷四“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从楚武王对外拓展疆土的历史背景出发,推测楚自丹阳迁郢都的时间在楚武王三十五年(公元前706年)。石泉先生认为:“楚武王(公元前740年——公元前690年)晚年即自丹阳迁都郢,更符合实际。”

作为楚国百年都邑,乔多的地望,由于文献无记载,学术界多以为已不可考,但也有专家曾试作推论。如笪浩波先生认为,乔多应该在蛮河流域沿线,“从夷屯至都的连线看,楚国应该是沿蛮河逐渐向东迁移,也即发渐、旁岍和乔多都应该在蛮河流域沿线”。

牛鹏涛先生认为发渐在宜昌、当阳至枝江一带,“文献中的早期楚都‘丹阳’,内涵相当于《楚居》中的京宗、夷屯、发渐、旁岍、乔多、都、焚、宵等一组地名。其大体的迁徙过程是:京宗在睢漳上游的荆山一带,夷屯在宜昌一带,发渐、旁岍、乔多在宜昌、当阳至枝江一带,都、焚、宵则位于睢漳水与汉水之间的平原地带。”

那么,乔多的地望在哪?本文试作以初步探讨。

从“乔山”看“乔多”的地望

清华简《楚居》中有乔山，“季连初降于隈山，抵于穴穷，前出于乔山，宅处爰波。”“乔山”与“乔多”同处一篇简文中，似有关联。乔山，“整理者：即《山海经》之‘骄山’。”《山海经·中次八经》：“荆山之首曰景山，……睢水出焉，东流注入江……东北百里曰荆山，……漳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睢……又东北百五十里曰骄山。”这个“骄山”近睢漳，位在汉水以南。这是楚人自道家园，详细而准确，其中的山名水名都有史可征，特产也相吻合。《楚居》的“乔山”自然也可以读为“骄山”。李学勤先生认为：“骄山位置虽不易确指，总在汉水以南荆山一带，近于睢漳二水的发源地。从那里向北，过了汉水，正好逆均水北上。”陈民镇认为：“整理者认为乔山即《山海经》的骄山。当可相信。……这段文字所出现的地名，均与楚先民有关，如‘荆山’‘睢水’‘漳水’‘睢漳之渊’‘骄山’亦是。”《中次八经》曰骄山在景山东北，杜预注引李善注《文选》曰骄山在景山西，与《山海经》不同。李善生活于唐李显时期，李显及幕僚被流放房陵就生活在现今的保康县马桥镇至神农架林区阳日湾镇一带，应该对此地的山水地理非常熟悉。李善所注《文选》，重新当上皇帝的李显是审读过的，李善将骄山注为景山西，或许有凭据，或许据实而注。故而骄山在景山西，也完全不是没有可能。我们认为保康的望佛山至房县的桥上乡一带的山，可能就是《山海经》所指的骄山。以现在的关山即古景山为坐标观之，也与《山海经》“又东北百五十里”的记载相吻合。这一带现今仍有许多含“桥”字的地

名,如“桥上乡”“高桥河”“马桥”等,绝非巧合。“桥上乡”之“桥上”,顾名思义,桥山之上。古无“桥”字,“桥上乡”即“乔上乡”或“骄上乡”(按:桥上乡现今已改为野人镇);马桥镇之“马桥”或为“骄”字之拆合,读为“马乔”,地正处乔山之中。“马桥”为《楚居》所载之“乔多”?

从周楚间战争看“乔多”的地望

综观西周时期的300多年间,周楚关系非常复杂,周王朝对楚国存有疑心,时时提防,而楚国基本上维持着名义上的臣服,但一旦力量强大,便称王自立,实际上处于判服不定的状态,因而周楚间发生过多次数战争。从这些发生的战争中,或许能窥见“乔多”的地望。

西周早期,楚依附于周,周楚关系较好。楚近祖鬻熊在周初投奔周文王(约公元前1113——公元前1062年)。《史记·楚世家》:“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又,楚武王“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至熊绎也为周王朝做事。周成王举行“岐阳之蒐”时,楚子熊绎亦在会,并行其祖先祝融以来所擅长的“司火”之职,与鲜牟之君一起守燎。《国语·晋语八》载:“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牟守燎,故不与盟”。甲骨卜辞也载有周楚关系事,1977年陕西周原出土甲骨卜辞H11:83载:“曰今秋,楚子来告,父后哉。”《史记·楚世家》:

“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右尹子革语：“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筮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

以上例举文献所记楚与周诸事，说明楚依附于周，为周王朝做事，受封，纳贡，朝拜，但地位低下。虽有不满，也只能忍气吞声，实力使然。自熊绎之后，周楚关系常处于紧张状态，并发生过多次战争。究其原因不外是苞茅不贡、征伐邻国、擅自称王，坐大“四方首”。因而，楚屡遭周的讨伐。现在的问题是，周所伐之楚在哪里？楚国百年都邑“乔多”又在哪里？

周昭王所伐之楚在汉南。

周昭王时正当楚熊绎之子孙辈前后。周昭王南征时，楚国国君不是熊绎子熊艾（只），就是熊绎之孙夬。此间未闻有迁都之事。其都邑为夷屯，夷屯在汉水之南。从文献记载看，《古本竹书纪年》：“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十九年春，有星孛于紫微。祭公、辛伯从王伐楚。天大暋，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吕氏春秋·音初》也记载有“周昭王亲将征荆蛮”。周昭王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也有确凿的记载。如陕西扶风出土的《墙盘》：“弘鲁君（昭）王，广筴荆楚，唯狩南行。”可见周昭王亲领军队南征，声势浩大。周昭王时期的另一件青铜器《京师峻尊》铭文：“王涉汉伐楚，王又亦（掖）工（功），京师峻克斤，王（赉）贝，用作日庚宝尊彝。”铭文的大意是：王渡过汉水征伐楚国，王褒奖有功者，京师峻竭力辅佐，王赏赐贝币，铸造了先祖日庚的祭器。对“京师峻尊”铭文，李学勤先生结合《古本竹书纪年》“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

有过精辟的论述,认为:“楚应当在汉水的南面,从而昭王必须渡过汉水,才能攻击楚人。因此,不管成王时所封熊绎的丹阳是不是丹淅一带,昭王时的楚都只能是在汉南了。”也就是说至迟昭王十六年(公元前985年),楚都已经在汉水以南了。西周早期的地理形势和后世多有不同,用晚出文献材料来推论,有时不能符合实际。铜器铭文“王涉汉伐楚”,是有关其时楚国地望的标志性线索。西周中、晚期,楚不可能将都城由汉水以南再迁到汉水以北的、位于丹淅地区的所谓的楚都“丹阳”。因此,时处西周晚期的楚国百年都邑“乔多”,自然是位于汉水以南了。

周宣王所伐之楚在汉南南河流域。

周宣王于公元前827年至公元前782年在位,此时楚国当是熊霜、熊徇、熊鄂、若敖熊仪四任国君,其都邑正是“乔多”。熊鄂是楚国的一位有作为的君王。在位期间,不断拓并四周濮蛮之地,成为“四方之首”,称霸一方,控制着周边许多诸侯国,同周王朝发生了直接的利益冲突,不断挑战周王朝的权威。周宣王对此则直接出兵征伐,打压其发展。文献《诗经·小雅·采芑》记载: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方叔涖止,其车三千,师干之试。方叔率止,乘其四骐,四骐翼翼。路车有奭。簟茀鱼服,钩膺鞶革。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乡。方叔涖止,其车三千,旂旐中央。方叔率止?约軹错衡,八鸾玲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珌葱珩。

歟彼飞隼,其飞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车三千。

师干之试，方叔率止。钲人伐鼓，陈师鞠旅。显允方叔，伐鼓渊渊，振旅闐闐。

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戎车啍啍，啍啍焯焯，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玁狁，蛮荆来威。

《采芑》为周宣王时诗。《毛传》云：“《采芑》，宣王南征也。”孔颖达正义云：“谓宣王命方叔南征荆蛮之国。”宋朱熹《诗集传》即承此说曰：“宣王之时，蛮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郑玄笺云：“方叔先与吉甫征伐玁狁，今特往伐蛮荆。”方叔以元老贵重之地位，以“不逊王命，侵伐邻国，与大邦为仇”为由，率三千乘的兵力攻伐荆楚，迫使楚臣服宣王统治。

周宣王伐楚，同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也有记载。

1993年，在山西曲沃北赵晋国墓地的第四次发掘中，64号墓出土了一组八件楚公逆编钟，其中两件为后配，属于不完整的一套。编号为I11M64:93的一件编钟钲及鼓部右侧铸有铭文，李学勤先生的释文如下：

唯八月甲午，楚公逆祀厥先高祖考、大工、四方首。楚公逆出，求厥用祀四方首，休，多擒。鎮内乡赤金九万钧，楚公逆用自作穀燮锡钟百□。楚公逆其万年用，保□大邦，永宝。

楚公逆，孙诒让考定即是熊鄂（公元前799——公元前791年）。“大工”意思是大臣。“大”或作“夫”，古文字通用。“内乡”读为“纳享”。“四方首”即四方方国的首领。整句铭文是说楚公逆担任四方方国的方伯，享有征伐、监督、祭祀等大权，楚公逆铸编钟以示纪念。

楚国国君的青铜器怎么到了晋侯的墓中呢？楚公逆编钟

出现于晋穆侯墓显然是有原因的。熊鄂为西周宣王时期的楚国国君,即位于周宣王二十九年(公元前799年),卒于周宣王三十七年(公元前791年),在位9年。楚公逆编钟所在的M64的墓主晋穆侯,即位于周宣王十七年(公元前811年),卒于周宣王四十三年(公元前785年),楚公逆所处的年代恰好与晋穆侯相当且稍短些。所以李学勤先生指出:“楚公逆编钟出在晋穆侯墓内,可能是当时馈赠,也可能是战事所得。”鉴于楚国国君不可能馈赠给晋侯一套不完整的编钟,最大的可能就是通过战争所得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在周宣王之世及以前,楚与晋并没有发生关系,更没有发生过战争,显然不属于晋伐楚俘获所得。其实,楚公逆编钟出现于晋穆侯墓,正如《诗经·小雅·采芑》所载,是周宣王命方叔及尹吉甫伐楚所俘获。周宣王鉴于晋伐西戎有功而赏赐于晋穆侯的。

周宣王伐楚当发生在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年)。同年,宣王抽调南国之师至西北伐戎,“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南国之师一并覆灭,南国防线顿陷崩溃,毫无守备可言,这才使自周厉王以来一直不敢反叛的楚国有了对外扩张的机会,才敢于与“大邦为仇”。楚若敖熊仪娶郟国女子为妻,实行远交近攻的策略,统率楚国大军,从“乔多”出发,翻越景山,顺沮水南下,趁机侵占其邻国都国,进军沮水中游沿岸地区至宜城、钟祥、当阳之领地,也即《楚居》所载都、宵之地。据文献记载,方叔与尹吉甫伐楚,正是在宣王三十九年。《竹书纪年》记载,周宣王三十九年,“王征申戎,破之”。申国地望在河南南阳。随后南渡汉水伐楚,攻占“乔多”“执讯获丑”,毁其宗庙,迁其重器。所俘获而去的正是熊鄂宗庙

之器,其中就有熊鄂所作的楚公逆编钟,由方叔献于王庭。周宣王以晋穆侯伐西戎有功而赐予晋穆侯。这就是楚公逆编钟出土于晋穆侯墓的缘由。

周宣王伐楚得胜,楚若敖熊仪被迫向西退往神农架阳日湾等大山里,或避敌于荆山深处。鉴于伐楚有功和巩固所占之地以拒楚,周宣王将南河流域的大片土地封赏给尹吉甫为食邑地,尹吉甫也作《采芑》以颂周宣王。据《房县志》载:“周宣王封尹吉甫为太师食邑于房,死后葬于房县青峰山。”现房县尹吉甫镇仍存有尹吉甫墓。

综上所述,周昭王所伐之楚在汉水以南,周宣王所伐之楚在汉水南面的主要支流南河流域。熊延“自旁岍徙居乔多”,“旁岍”即房陵,地处南河支流马栏河流域,且近庸。尹吉甫食邑于马栏河下游房县青峰镇(现已改为尹吉甫镇),以防拒楚。那么,乔多当地处南河干流的上游,最大可能就是现在保康县的马桥镇。楚在此休养生息近百年,逐渐强大,至周宣王时已为“四方首”。至若敖熊仪时,楚国大军越过景山,灭掉了邻国都国,向平原进击,“与大邦为仇”,招致了周宣王的征伐。楚国遭受此次打击,至蚡冒时,楚土“仍不过同”。蚡冒时,周室衰微,南方防线收缩,蚡冒又全面收复南河流域,蚡冒之“蚡”即与粉水(即南河)有关。蚡冒收复南河流域还有一条证据,就是楚灭蒋国后,将其遗民迁于保康县寺坪镇蒋口。蒋国《公元前1040年——前617年》,子爵,在今固始县东蒋乡。最早的记载是《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的一段话:“凡、蒋、邢、茅、昨、祭,周公之胤也。”《唐书·宰相世系表》认为:“周公第三子伯龄封于蒋,子孙因以为氏。”蒋国于公元前617

年“约一同时被楚所灭,遗民迁于湖北保康县西六十里蒋口,子孙以蒋为氏。”纵观整个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乔多”始终是楚国攻城略地、称霸汉南的根据地。

从“丹阳”看“乔多”的地望

楚都“丹阳”一词最早见于《史记·楚世家》。司马迁只是说熊绎居“丹阳”,未涉及“丹阳”地望之所在。其后世的文献记载虽具体,但分歧比较大,主要有:

安徽当涂,汉代丹阳郡治所,《汉书·地理志》:“丹阳郡:丹阳,楚之先熊绎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河南淅川,《史记·楚世家》:“(楚怀王)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湖北南漳,《墨子·非攻下》:“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枝江,颖容《春秋传例》:“楚居丹阳,今枝江故城是也。”《续汉书·郡国志》:“枝江,侯国,本罗国,有丹阳聚。”;秭归,《山海经·海内南经》:“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郭璞注:“今建平郡丹阳城,秭归县七里。”酈道元:“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丹阳城,楚子熊绎始封丹阳之所都也。”

根据文献的不同记载,“丹阳”的地望也产生了多种说法。这些说法,一方面总是纠结于丹山、丹水。“丹阳这个都邑的名称,如同许多‘某阳’的地名一样,应当因河流或山岭而得名,丹阳系指丹水之阳(北)或丹山之阳(南)。寻找楚都丹阳的地望不能脱离丹水或丹山的所在,二者的地望应当共同成为确定楚都丹阳的线索之一。”另一方面所依据的文献,“都是后世人们的追述而非当时的实录,这些认为楚都丹阳

在某地的记述既可能是记述人援引的更早的原始资料,也可能是记述人综合了当时各种材料后的一种判断,持这种观点的人也没有交代他作出这种推断的理由——是确有更早的史料和实物依据?是根据一些民间传说的附会?还是出于地方主义的编造?”当涂说、秭归说已经被论否了。“丹淅说”与“枝江说”,尹弘兵先生曾作过对比研究,“枝江地区并无丹山或丹水,这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而丹淅说的明显漏洞,就是丹淅流域无沮、漳。”楚都丹水之阳的说法并不可靠,因为这与楚国的发展史有着明显的矛盾。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南漳说”,是由“丹淅说”发展而来,将“丹阳”定为南漳西北八十里的古荆山东麓一带。依据是“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石泉先生将现今的蛮河(古夷水)论定为古睢(沮)水,也就成为“南漳说”的主要依据或论说基础,这当然是靠不住的,何况南漳并无西周遗址。对此,罗运环先生有过精辟论述,“睢水、漳水即今鄂西注入长江的沮漳河,景山、荆山是二水的发源地,在二水之北。……如此,不在此间的丹阳地望说如当涂、商县、丹淅、秭归四说均当排除在外,余下的枝江和荆山二说是值得重视的。

在楚都“丹阳”论说至今无结论的情况下,清华简《楚居》的面世,或许使“丹阳”之争划上句号。因为专门论述楚国世系和居地的《楚居》中,却没有“丹阳”。再结合包山、新蔡葛陵、望山、安大等出土战国楚简的记述,楚都“丹阳”地望在丹水之北、丹山之南诸说,就更加不可靠了。正如笱浩波先生所说“出土文献的时代都在春秋战国之前,最晚也是战国中晚期,早于提出丹阳为楚开国之都的《世本》和《史记》等传世文

献。也就是说,丹阳作为楚国开国都城的说法至早是战国中晚期以后产生的,不知本自何处。但有一点,其出现的时间远晚于这些出土楚文籍的时间,自然可信度也就不如楚文籍了。”

《史记·楚世家》所载之“丹阳”,并非指“丹水之北、丹山之南”的丹阳,也不是指“丹阳郡”、“丹阳聚”的丹阳,而是指丹朱所居房陵的阳日,即现今的神农架林区阳日湾镇。“丹”指丹朱。清·徐靖《竹书纪笺》卷二,于“帝子丹朱避舜于房陵,舜让,不克。”下笺曰:“按《地理志》:房陵县,属汉中郡。颜师古曰:‘今谓之房州,此丹朱所避也。’附注云:‘房陵是。据《世本》舜封丹朱于房’。《一统志》:‘房县在隕阳府城西南三百一十里,舜封尧子丹朱于房,即此。’”“阳”指阳日。阳日湾也是一个很古老的楚地名,《鄂君启节》:“逾江,庚彭,庚松阳。”彭即彭水,现今南河;松即松柏镇,阳即阳日,现今神农架林区阳日湾镇。南河是西周时代巴盐入楚进入中原的重要通道。《左传》桓公九年:“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邓。邓南鄙郁人攻而夺之币,杀道朔及巴行人。”这是巴通过楚境卖盐与邓换币贸易的明证。

阳日湾毗邻马桥,也即“丹阳”毗邻“乔多”。“乔多”是楚国走出荆山、开拓沮、漳河中游地带、进入平原地区的最后的根据地。由于司马迁写作《史记·楚世家》时所依据的材料有限,根据自己的判断而将楚熊绎初封之地记载为“居丹阳”,也在情理之中了。

马桥即乔多,与地形方位相符。乔多之“多”,读为“沱”。包山楚简第170号简有“彭沱”。《诗经·召南·江有汜》:

“江有沱。之子归，不我过。”高亨注：“小水入于大水叫做沱。”地处荆山之中的马桥，地形地貌素有“五虎上山、九龙入水”之称。南河流经此，形成宽阔的冲积小平原，依山势分布有多处台地。同时有高桥河、堰垭河等9条小河在此汇入南河，“沱”的特征比较明显。

马桥即乔多，与楚史实相合。熊挚即位居旁岷，后自窜于夔，其路线是从房县经兴山到秭归，马桥为必经之地。或许马桥本来是熊挚之子的居地，熊延“弑而代立”，占据马桥，加之旁岷近庸，熊延徙居乔多也就成为必然。从叔堪避难于濮看，无论濮在楚西南枝江或是西北武当山地区，濮都与乔多邻近，与蚘冒始启濮而有之的史实相合。楚与郢邻近，郢敖熊仪自乔多徙居郢，也就是自马桥翻越景山，沿沮水南下，便可攻占郢国。荆襄平原进四川的“大道”，即是从远安的旧县镇，经南漳峡口、保康重阳、马良南垭、歇马胡家店、简槽、马桥至堰垭进入房县。马桥堰垭与尧治河交界的长岭上，至今仍保留有石板铺就的古驿道。

马桥即乔多，与南河流域西周遗址遗存相佐证。南河流域分布有较密集的西周遗址。房县青峰孙家坪遗址为西周中期。保康寺坪虾子坪西周遗址出土有甲骨、青铜钺、石磬。2015年10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笪浩波先生，在虾子坪西周遗址第5层（西周文化层）又发现了一件石磬。这些出土文物都不是一般贵族所能拥有和使用的。这进一步佐证了虾子坪就是《楚居》所载熊渠所居的“发渐”、马桥就是熊延等诸楚公所居的“乔多”。

注: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行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0。

徐少华:《夔国历史地理与文化遗存析论》,《中国史研究》2012年02期。

石泉:《楚都何时迁郢》,《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

笄浩波:《从近年出土文献看早期楚国中心区域》,《江汉考古》2011年第2期。

牛鹏涛:《清华简〈楚居〉与楚都丹阳》,《文史知识》2013年第6期。

李学勤:《论清华简〈楚居〉中的古史传说》,《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

陈民镇:《清华简〈楚居〉集释》。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第10期。

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正》,《古本竹书纪年》附四,齐鲁书社,2000年。

李学勤:《由新见青铜器看西周早期的鄂、曾、楚》,《文物》2010年第1期。

李学勤:《论楚公逆编钟》,《文物》1995年第2期。

湖北省房县志编纂委员会:《房县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7月。

何光岳:《楚国灭国的移民与民族融合》。

孙华:《楚国国都地望三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尹弘兵:《楚都丹阳“丹淅说”与“枝江说”的对比研究》,《江汉考古》2009年04期。

罗运环:《楚都丹阳地望考论》,武汉大学“中国地域文化研究所”网,2010年5月11日。

笄浩波:《从清华简〈楚居〉看楚史的若干问题》,《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

多维视角下的楚与郢

——保康楚源地初探之三

张光业

楚与郢邻近,传世文献、青铜器铭文和出土文献均有记载。但早期楚国和郢国的地望,却分别有南、北两说和上、下郢之争,且分歧颇多。本文试从历史、地理、考古等多个角度,通过解读楚与郢邻近关系,廓清西周时期郢国的地望,并推论了早期楚国的中心区域。不妥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传世文献中的楚与郢邻近

史籍中最早提及郢国历史的是《左传》。《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载:“秋,秦、晋伐郢。楚斗克、屈御寇以申、息之师戍商密。”杜预注:“郢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国,其后迁于南郢都县。”孔颖达疏曰:“正义曰‘言本在商密者,据在后移都,称旧郢。以为本耳。其实此地时在商密,后始迁于都县,国至彼县而灭,故彼县专得郢名。当此秦、晋伐郢之时,国名为郢,所都之邑名商密,楚以申息之师戍商密者,正谓戍郢国也。析是郢之别邑,戍人居析地,为商密之援。’”郢国地望,历代史家

多沿袭西晋杜预此注秦、晋所伐“都”“南迁说”，即本国在商密，后徙秦汉所置之南郡都县。当代学者仍多有持此说者。又据《左传·文公五年》载：“初，都叛楚即秦，又贰於楚。夏，秦人入都。”此后都国历史在文献中再也不见记载。说明在此前后都已被楚所灭，而将其迁往南郡都县。

都本在商密，楚以申息之师伐商密，楚与都邻近，这是无疑义的。问题是僖公二十五年即公元前635年，文公五年即公元前622年，时在春秋中期。杜预注说“都本在商密”，但并没有论说都在什么时间在此地建国，也即“本”到什么时候。当代一些学者却在“本”字上做文章，推测西周时都就在商密，也就“本”到了西周或更早些时候。既然楚与都邻近，那么，楚在西周甚或商末周初也在商密邻近的丹、淅地区，并引传世文献记载为依据。《世本》载：“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史记·楚世家》：“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有些学者据此认为，“丹阳”即丹、淅，还相当于清华简《楚居》中的“夷屯”。这种观点刘彬徽先生称之为“北系或者中原地区说”，而持沮、漳二水发源地之荆山的观点，则被其称之为“南说”。

“北系说”依据之一的都本在商密以及楚与都邻近，有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其一，商密之都时在春秋中期，只能与此时邻近的楚互证，西周早期时的都是否在商密，尚不可知，因而不能与西周早期的楚互证。换句话说，要肯定西周早期的楚在丹、淅，尚需要证明西周早期的都也在商密。其二，与西周早期周昭王所伐之楚地理方位不符。仅以传世文献记载为例。《初学记》卷七引《古本竹书纪年》：“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

大兕。”；“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暘，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西周早期楚已地处汉水以南，不可能与春秋中期的商密之都邻近。其三，与楚国春秋早期史实不符。《左传·哀公十七年》（公元前478年）载：“子谷曰：‘观丁父，都俘也，武王以为军率，是以克州、蓼，服随、唐，大启群蛮。’”这是楚太师子谷在回答叶公子高时说的，是追述春秋早期楚武王（公元前740—前706年）间史事，说明楚武王曾伐都人，并俘虏都人观丁父。由此可知，都人是入春秋以后，见于文献记载最早与楚交兵的人。春秋初叶，楚始兴起，向外扩张，先向南攻伐，然后由南向北攻城略地，涉彭伐绞，渡鄢战罗、卢戎，伐申、息，灭邓。楚国在商密与都邻近，当在伐申、息之后。综上所述，都在商密是春秋中期，而楚居“丹阳”则在西周早期，两者的邻近关系不在同一个时期。因此，不能证明“都国故地在今河南省淅川县西北，则初期楚国必在丹淅地区，与都国相去不远。”

青铜器铭文中的楚与都邻近

传世和出土有铭文青铜器中，记载有楚与都邻近的是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的士山盘。2002年第1期《中国历史文物》上，朱凤瀚先生发表《士山盘铭文初释》一文，首次刊布了士山盘，并将其定为西周共王时器。此后黄锡全、董珊、杨坤、陈英杰、晁福林、黄爱梅、李学勤等先生都对其释文及意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释文如下：

唯王十又六年九月既生霸甲申，王在周新宫。王各大室，即位。士山入门，立中廷，北向。王呼作册尹册命山曰：于入

中侯,遂徵都、荆、方服,暨大虐服、履服、六孳服。中侯、都、方宾贝、金。山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不显休,用作文考釐仲宝尊盘,山其万年永用。

释文中的“荆”指楚国;“都”指都国。楚、都并提,则说明两国邻近。因此,知道“都”地就能找到楚地。在此还要说说“方”,因为,楚、都相邻,有可能变成楚、都、方三国相邻。“方”与甲骨文字形一致。“都荆方”,诸家均以“方”为地名,由铭文意思看,其地望与楚、都相邻。黄锡全谓“方”与“彭”二字音近,可能就是从武王伐纣的彭国,地点在今湖北房县一带。李学勤先生认为“方”在湖北省竹山县东南。也有解读为“方城”的,位于邓以北。若此,“都、荆、方”即为三国邻近。黄爱梅认为“方”不为单独存在的地名或国名,“都、荆方”即读为“荆方”“都方”。董珊也以为“都方”就是“都”,“方”犹言方国。这也算一家之言。

春秋以前的都国,古文献缺乏记载,只能通过传世和考古发掘获得的部分都国铜器及铭文材料,来探寻都国的地望。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先生根据“都”国铜器铭文的考释,提出都国有上、下之分,并存发展,“秦晋所伐者实为下都,上洛后为晋邑,盖下都为晋所灭也。……南郡之都为本国,故称上,上洛之都为分枝,故称下……上下相对,必同时并存。”?所论与杜注截然不同。徐少华先生则对“都”国铜器研究后提出西周中期开始,上、下“都”才并存发展,认为“上、下都之并存,应是自商以来的都部族发展到西周中期分植而来。”只不过“上都”非南郡之“都”,而是商密之北的西峡之“都”。认为“郭老以上、下都为一宗分为二支,甚有灼见,以商密之

都为下都,也可信,但将上都定在宜城,似有不妥。”

“上都”“下都”,铜器铭文有载,“下都”为商密学界也无疑义。但上、下都之并存发展,把他看作是两个国家名而不是都国在不同时期的居邑地名,却多有说不通之处。其一,西周早期楚即与都邻近,都有两个,楚与哪个邻近?或许会有人认为,楚国先居丹、淅,后迁汉南荆山,先后与都分别相邻,矛盾自能解决。但楚自熊绎至熊渠早期皆居夷屯,凡一百多年,未曾迁都。迁徙之说不能成立。假设夷屯在丹江流域,丹江流域没有楚人自述的沮、漳二水,山水地望条件也不符。其二,青铜器铭文佐证周昭王南征已过汉水。青铜器《京师·尊》,昭王时器,记的是昭王南征之事,其铭文:“王涉汉伐楚,王又[左医右戈]工,京师(师)斤,王鼈(赐)贝,用乍日庚宝[耳刀加尊]彝。”铭文中不仅明言昭王南征涉过了汉水,而且指明所伐对象为楚国。李学勤先生认为“尊铭说‘王涉汉伐楚’,意思非常明确,楚应当在汉水的南面,从而昭王必须渡过汉水,才能攻击楚人。因此,不管成王时所封熊绎的丹阳是不是在今丹淅一带,昭王时的楚都只能在汉南了。”西周早期的楚在汉南荆山,楚与都邻近,都也当在汉南荆山或其附近。高崇文先生认为:都的地望很明确,在今南阳盆地西部的淅川境。楚熊绎到熊渠时期的楚国地域,应在都之西部的丹江流域。李凯先生即赞同高崇文先生的意见,“高崇文指出楚人主要活动在丹水流域,至昭王伐楚,楚临时逃避到汉水之南,而楚都‘丹阳’仍在淅川。此说甚是。”高崇文先生曾力求解决“王涉汉伐楚”的有关问题。他在《从曾、鄂考古新发现谈周昭王伐楚路线》一文中说:“从周成王时期的熊绎到周夷王时期的

熊渠凡六代均居丹水之阳的夷屯,而周昭王则是在丹江之南的汉水‘涉汉伐楚’,这就涉及到周昭王伐楚路线的问题。我曾认为,楚为了躲避周的攻伐而转移至汉水之南,所以才有周昭王‘涉汉伐楚’之举(按:高文自注:《清华简〈楚居〉所载楚早期居地辨析》,《江汉考古》2011年第4期)。现在看来,这种解释的确有些牵强。……如上述分析不误的话,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昭王‘涉汉伐楚’了,那就是昭王从成周出发,经南阳盆地各国而到达汉东的曾、鄂之地,亲率驻守在曾、鄂的王师,由‘汉东’向‘汉西’进发‘涉汉伐楚’。”若按此伐楚路线,正好与楚武王涉汉伐随的路线方向相反,楚及邻近的都的地望,也就不言自明了。

出土文献中的楚与都邻近

近年来,出土文献中记载有楚与都邻近的内容,为我们探索楚与都的历史和地理提供了新的线索。《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所收《楚居》一篇,共简16支,内容叙述楚国先祖列王直到悼王、肃王时的居地都邑。其中,记载有楚与都邻近的内容。《楚居》载:“至畚绎与屈紃,使若嗑卜徙于夷屯,为榭室,室既成,无以内之,乃窃都人之犝以祭,惧其主,夜而内尸,抵今日夕,夕必夜。”据简文可知,熊绎之时,请都人卜居,并窃都国犝牛来祭祀楚人祖先。这段记载说明,西周早期都国就已经存在,且地望近邻熊绎居地“夷屯”。西周早期楚与都邻近,学界对此毫无疑义。问题是在哪个地方邻近呢?目前仍存在着“北系说”和与之对应的“南说”。笄浩波先生曾

“假设‘丹江之都’和‘宜城之都’是本国的可能性都存在，”对楚国的中心区域所在的合理性进行过推演。就熊绎时楚国的中心区域——“夷屯”位于丹江流域的合理性和“夷屯”位于宜城平原附近的合理性，分别进行推演，得出“夷屯”不可能位于丹江流域和“夷屯”近“宜城之都”更为合理，“也即西周早期，宜城平原或其附近就有一个都国，此时楚国中心区域在荆山山系之中。”笱浩波先生的推演方法值得信从，但其在推演过程中忽略了罗国的存在，楚都之间还隔着一个罗国，蚡冒的都邑也到不了汉水以北的今襄阳市樊城。

“都”在商密，出土文献也有记载，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系年》第38——40号简曰：“秦人起师以纳文公于晋。晋人杀怀公而立文公，秦晋焉始合好，戮力同心。二邦伐都，徙之中城，围商密，止申公子仪以归。”类似的记载又见于《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秋，秦、晋伐都。……秦人过析隈，入而系舆人，以围商密，都而傅焉。”简文及《左传》之“都”，应即下都。上述下都在商密，即今河南淅川西南，目前已成学界共识，这由上引《系年》简文也可进一步确定。但此下都时在春秋中期，与《楚居》所载西周早期楚与之邻近的都，不在同一个时期。

认为“夷屯”在汉南荆山山系之中并与都相邻，也即“上都”在宜城，也有绕不开的矛盾需要解决，那就是“都”在什么时候、由谁将其迁徙到丹江流域的？胡刚先生曾认为，西周晚期，都国北迁至商密附近的“下都”，“西周中期，楚国兴起，熊渠开始以武力征服江汉小国。都国因地界近楚，可能最先遭到了楚国的攻伐。《楚居》记载‘若敖徙居都’。都国被楚国占领，都土成了若敖的居地，都国只好迁徙它处。都国所迁之

处应该就在‘下都’，其地界与商密接近。”都自汉南或汉西自行迁往汉北周之领地，似也有说不通之处。

楚与都邻近：楚处荆山而逐渐扩张，都地四个因不断迁徙。从传世文献、青铜器铭文、出土文献记载的楚与都邻近的情况看，楚与都邻近是因时而异。从楚国地望的角度看：西周早期楚国地处汉南荆山，西周晚期后地域逐渐扩张。都敖向南攻伐，占领部分都地。蚡冒时始启濮，后又退回荆山腹地。至楚武王才大举攻城略地，向南俘都人观丁父，向北涉彭伐绞，向东伐随，而后灭罗、卢戎、谷。楚文王伐申、息，灭邓。楚国在伐绞或者伐申、息之后，其势力范围才到达丹江流域。楚灭“下都”后将其迁往南郡都县。楚与都邻近，据前文所述，自在情理之中。

从都国地望的角度看，则应因时因地具体分析。第一，西周早期最迟至周共王时期，都国地处汉南荆山附近并与楚国邻近。都，《世本》曰“允姓国，昌意降居为侯。”“至殷商时期，都已成为一个地位较高的方国，居住在若水（今河南汝水）旁。”都何时迁徙到汉南荆山附近，已不可考。或许为周所迫南迁，或许为周所封。同为商遗族，情形大概同鄂相似，鄂居汉东随州，都居汉西宜城及其西南，或可达沮、漳河流域。都要与楚邻近，中间隔有罗国，必须地处罗国之西南，也即蛮水（鄢水）之西南。我们认为都国西周早期的疆域，东隔汉水与鄂相望，北以蛮水（鄢水）与罗国为界，西达保康境内的界山。界山地处保康县歇马镇与马良镇交界处，沮水从此峡谷中穿过，地势十分险要。之所以划定这么一个区域，是因为这个区域内的方言将牛（niu）读成尤（you）。保康县的歇马镇读作

牛(niu),而马良镇则读作尤(you),以界山为界十分明显。界山以北即为沮水发源地“景山”也即“京宗”所在地,属于楚的领地,界山以南则属于都国了。西周早期的都国与西周晚期若敖所居之“郟”,二者所指其实是同一地,应该在现今宜城、南漳、保康、远安四县市之间的某个地方。这样楚与都邻近的关系才能成立。都国北迁后,都人才能在此山地间立足,楚武王俘都人观丁父也才有可能。倘若都人此时地处宜城平原,早被罗国吞并也未可知。

第二,西周中晚期都迁丹江流域,始分上、下都。西周中晚期,上、下都是否已在丹江流域,史无记载。陈朝霞认为,“西周恭王时期‘土山盘’中尚还称‘郟’,而到了西周夷、厉王时期的‘下都雍公口鼎’中则明确的有‘下都’之称,可以推测上、下都之分上限在西周中期,且不晚于夷、厉王时期。”从都国青铜器西周中晚期已有明显的上、下之分看,都当于西周中晚期迁于丹江流域,所迁之处应该就在“下都”。

都因何故迁于丹江流域呢?这要从西周中晚期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去探寻。第一种可能,是周王朝将实力较强的都迁往丹江流域,以屏淮夷。周昭王南征以后,江汉地区的形势趋于稳定,而南淮夷常处于叛服不定之中。周厉王时期,南淮夷曾入侵伊、洛地区。青铜器《敌簋》(《集成》04323)载:“唯王十月,王在成周。南淮夷迁及内,伐昴、参泉、裕敏、阴阳洛。王命敌追御于上洛谷,……唯王十又一月,王格于成周大庙,武公入佑敌,告擒馘百、讯四十。王蔑敌历,使尹氏受敌圭瓚、贝五十朋。……敌也对扬天子休,用作尊敦。敌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陈鹏宇先生认为,“对于敌簋反映的淮

夷入侵路线,学界多有争论,但无论如何,簋铭中的‘伊、阴阳洛、上洛’肯定是指伊、洛地区。可见淮夷直逼成周,应、邓诸国皆不能藩屏。”因此,我们推测周厉王时期,周王朝将实力较强的都迁往丹江流域,将鄂迁往南阳地区,以屏淮夷。第二种可能,是都跟从鄂叛乱遭到周王朝的征伐,周王朝将都迁往丹江流域,将鄂迁往南阳地区,加以监视。鄂国叛乱有《禹鼎》所记史事为证。《禹鼎》(《集成》02833)铭文载:

“禹曰:‘不(丕)顯(桓桓)皇且(祖)穆公,克夾(紹)先王,(奠四)方,(肆)武公亦弗段翌(遐忘朕)聖且(祖)考幽大弔(叔)、弔(懿叔),命禹仆(肖朕)聖且(祖)考政于并(邢)邦。(肆)禹亦弗(敢忤),賜(錫)共(朕)辟之命。’烏虜(嗚呼)哀哉!用天降大喪于下或(國),亦唯噩(鄂侯馭)方,(率)南淮尸(夷)、東尸(夷)廣伐南或(國)、東或(國),至于歷內。王廼命西六(師)、殷八(師),曰:‘(撲)伐噩(鄂侯馭)方,勿遺(壽)幼。’(肆師)彌甸(怵會恆),弗克伐噩(鄂)。(肆)武公廼遣禹(率)公戎車百乘、斯(厮馭)二百、徒千,曰:‘于(匡朕)肅慕,夷(唯)西六(師)、殷八(師)伐噩(鄂侯馭)方,勿遺(壽)幼。’(零)禹(以)武公徒?(馭)至于噩(鄂),(敦)伐噩(鄂),休,隻(獲厥)君(馭)方。(肆)禹又(有)成。(敢)對(揚)武公不(丕)顯耿光。用乍(作)大寶鼎。禹其萬年子子孫寶用。”

鄂侯馭方叛乱平息后,鄂国并未灭亡,在今天南阳一带继续存在,南阳夏响铺鄂侯墓出土文物可证。都跟从鄂叛乱虽无直接证据,但周王朝有前车之鉴而将其迁往丹江流域,也是有可能的。都与鄂关系密切,南阳夏响铺鄂侯墓出土有都国青铜器可证明这一点。2012年南阳夏响铺鄂侯墓出土有《上

都太子平侯匱》，其铭文：“上都太子平侯作盨匱，子子孙孙永宝用。”此鄂据目前的材料来看应系姬姓贵族改封，上都太子平侯匱出自鄂侯墓，或系助鄂侯之丧的赠器。这同随州曾侯乙墓出土楚国青铜器一样，表示两国关系交好。丹江流域地处周王朝成周至南国的交通要道上，都国不可能因楚所逼自行迁居至此，定当与周王朝迁而监视之有关。

至于上都，因都分而又迁所致。清华简《系年》云：“二邦伐都，徙之中城。”此“中城”，很可能就是“上都”。徐少华先生认为，上都在下都以北，两者相距四十公里，在今西峡县城以西十五公里的丁河古城，与下都南北相望。

第三，春秋中期楚灭都后，将其迁入辖地南郡都县。商密之都何时灭于楚，又何时南迁，史无明文。据《左传》文公十四年记载，楚公子燮与子仪在楚郢都作乱，胁持初即位的楚庄王“如商密”，商密即都都，此时已成楚邑，则都之南迁当不出文公五年（公元前622年）秦入都至文公十四年公子燮如商密的九年。据可考的15件都器中，有5件属于楚国铜器，其中上都公簠、上都府簠、都儿鬯三器出土于淅川、襄阳境内，这里在春秋中期已经是楚国的领地。南郡都县也有宜城、钟祥等多地之争，由于都已属楚，在此也就没有讨论的必要了。

从楚与都邻近关系看早期楚国中心区域

廓清了都国的地望，以楚与都邻近关系为视角，便不难推知早期楚国的中心区域所在。早期楚国的中心区域在以景山为中心、方圆不过百里的区域内，包括沮水上游、蛮水上游、南

河中、上游的区域。这一区域内,不仅有乔山、景山、睢山、沮水、夷水等早期楚人自述的山水地理,而且与早期楚国重大历史事件有较高的关联度,较之“北系说”的丹江流域,理据更充分,很多疑难问题也能予以合理的解释。

(一)楚先祖先公所居住的“京宗”即荆山之首景山。清华简《楚居》所载楚先祖先公季连、鬻熊、熊丽、熊狂、熊绎所居住的“京宗”,就是《山海经·中次八经》中的“荆山之首曰景山”的景山。清华简《楚居》整理者认为:“地名,疑与荆山之首景山有关”。这是很高明的见解。李学勤先生还进一步论述说:“鬻熊、熊丽都居于京宗,简文还说,‘至熊狂亦居京宗。’对照葛陵简的‘宅兹睢漳’,不难推想京宗所在的范围。《墨子·非攻下》:‘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讨’《说文》训为‘治’,可知熊丽是在睢水一带的山间,所以京宗之名有可能与《中山经》的景山有关。”睢山是指睢水源头两旁的山。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原始社会夏商时期》将睢山标注为保康县歇马镇西北诸山,这是非常准确的。黄鸣先生也认为:“京宗之地,应在今荆山山脉中的景山附近,……其地约当于今天湖北保康县中部一带。景山之北有南河,北入汉水,楚人定都如此,既可由汉水上至陕南,亦可北上淅川进入南阳盆地以至河南中部。”景山也叫关山,位于保康县的歇马镇境内,其西、南分别与神农架林区、兴山县接壤,海拔2000米,为荆山最高峰,沮水发源于此。

(二)熊绎辟在荆山,先秦文献与出土文献记载相符。《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筦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这

说明熊绎辟在荆山时还很困难，给周王朝纳的贡无非是些苞茅、桃弧棘矢之类，与邻近的都相比，经济、文化都落后。据清华简《楚居》记载，楚人不会占卜，遇受封迁都大事，还要请都人占卜，以选都地。都人选择距己稍远之地“夷屯”，也即从沮水选迁到蛮水（古夷水），也在情理之中了。榭室即成，却无以为祭，于是便偷都国的犝牛来祭祀自己的祖先，还怕都人发现，改在夜里祭祀。可见此时的楚人经济还很落后，仍处渔猎阶段，家畜饲养特别是养牛还没有开始。从相距不远的峡江地区考古遗存可知，处于渔猎阶段的楚人主要食物来源是鱼，而南河中从汉水逆流而上的鱼群，也是取之不尽的。楚与从中原南迁的都国在经济文化上有较大的差距，这正说明楚为山地民族，与蛮夷身份正相符合。这也是楚处汉南荆山、远离中原文化的佐证。

（三）熊渠“伐庸至于鄂”与汉南荆山地理方位相合。

熊渠是一位有作为的楚王，生活在周夷王、厉王之时。《史记·楚世家》：“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在这样的背景下，熊渠开始了西征南伐，开疆拓土。《竹书纪年》周夷王七年载：“楚子熊渠伐庸，至于鄂。”向西伐庸没有问题，庸在楚之西竹山县，两国相邻。“鄂国”过去有“东鄂”鄂州和“西鄂”南阳之争，两说皆误。熊渠时的鄂国当在今随州市安居镇，地处楚国东，与楚中间还隔着卢戎、罗国。鄂国当时很强大，楚要越国伐鄂，恐怕也没有那个实力。倘若楚处于丹江流域，那就更不可能了。鄂在今随州市，也间接证明了楚当在汉南荆山。其实，熊渠主要是向南征伐，那里是濮蛮之地，终西周之世，也未见楚向北征伐的记载。所以，司马迁在《史记·楚世

家》中说：“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杨粤地处楚之南。再往东“至于鄂”，也就是到达了鄂处于汉西的领地。熊渠以南河流域为根据地南征，势力影响南达长江，东抵汉水，并在这里分别封其子为越章王、鄂王。熊渠虽畏周厉王因此而伐楚，自去其王，但对后世楚王经营沮漳河流域奠定了基础。正因为如此，熊挚才能自窜于夔，另立夔国。枝江市万福垸遗址出土楚国有铭文青铜器，也证明该地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属于楚国的势力范围。

（四）汉南荆山分布有较密集的西周遗址

在以往的认识中，汉水以南属楚文化范畴的西周遗址，主要是襄阳市真武山遗址。汉南荆山在我们划定的早期楚国中心区域内，分布有较密集的西周遗址。东起南漳县长坪镇，西到房县榔口乡，沿湖北省 305 省道，在不到 100 公里距离内，分布有南漳县长坪镇大堰、保康县黄堡镇中畈、城关镇王湾、寺坪镇庾家坪、虾子坪、房县榔口乡孙家坪等西周遗址。这些西周遗址，有些是文物普查时发现，有些是考古调查时发现，有些已经发掘。大堰西周遗址位于蛮河（古夷水）上游的南漳县长坪镇黄潭村一组，是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于 2015 年 10 月 12 日—11 月 18 日在考古调查时发现的。采集的标本器型有盘、鬲等，时代为西周。“以往蛮河流域的西周遗址多见于下游的襄宜平原，而这次的发现则说明蛮河上游同样存在西周遗存的可能。清华简《楚居》中记载熊绎徙居‘夷屯’，大堰遗址的发现则增大了‘夷屯’位于蛮河上游的可能性。”中畈西周遗址、王湾西周遗址、庾家坪西周遗址，文献中也有介绍，“经文物普查，顺南河而上，在南河（彭水）上游

的保康庾家坪遗址、王湾遗址和蛮河南支上游岷峪河旁的保康中畷遗址中发现有西周晚期遗存,均采集有夹砂红陶细绳纹陶鬲、甗等残片。”虾子坪西周遗址位于保康县寺坪镇岗子村,地处南河南岸 100 米处的二级台地上,遗址分布面积 1500 平方米。出土文物有甲骨、青铜钺、石磬等。2013 年 11 月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 150 平方米。“第 5 层为西周文化层,出土少量陶片,主要为夹砂褐陶、灰陶和红陶残片,火候低,陶质极差。纹饰以中粗绳纹为主,其余皆为素面,器型有鬲口沿、侧扁形鬲足和罐口沿等。……从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诸方面,推测寺坪镇至马栏河下游地区是楚先公熊渠所徙居的发渐所在地。”孙家坪遗址位于湖北房县榔口乡玉堤村四组孙家坪自然湾,遗址分布面积 2500 平方米。2010 年 10 月至 12 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在遗址中心区域布 5 × 5 米探方 5 个,发掘面积 125 平方米,获取了一批西周遗存。出土的生活用器全部为陶器,器形主要有鬲、罐、盘、甗、鼎和大口尊等。其中:鼎足 3 件,鬻足 1 件,鬲足 26 件,罐 15 件,甗 4 件,盘 4 件,盆 3 件,鬲口沿 25 件,鬲 8 件,大口尊 2 件。“H6 为遗址中的典型单位,出土了 7 件陶鬲和 1 件大口尊,经修复后器形基本完整。这 7 件器形较为完整的陶鬲,既具有中原地区西周中期鬲的形态特征,又带有浓郁的晚商做器风格。其中,H6:9 与湖北襄樊真武山周代遗址中出土的 H36:4 较为相似。因此,我们推测孙家坪遗址的年代为西周中期。”以上所述这些遗址遗存,增大了南河流域是早期楚国中心区域的可能性。

注:

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王谟辑本《世本》,载《世本八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59年。

《史记》卷四〇《楚世家》,第1691~1692页,中华书局,1959年。

刘彬徽:《关于清华简《楚居》的思考之二——楚族起源及其地域变迁》,《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八辑。按:“北系说”和“南说”近来都有人重申自己的观点。徐文武先生在《第二届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荆楚文化网》,2017年11月28日。)一文中概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高崇文教授认为:“楚人迁徙的路径:楚人最初在丹水之阳的‘夷屯’建国立都,后沿汉水向东迁徙,至西周末徙居丹浙之汇的‘郟’地,到春秋时期,进入宜城平原一带,开启了东周时期在江汉地区的大发展。”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笪浩波研究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认为:“清华简《楚居》所记的‘夷屯’在宜城平原的可能性要大于在丹江流域的可能性。西周早期时,楚国中心区域在荆山山系之中。西周末至春秋初年,宜城平原是楚人活动的中心区域。”

方诗铭、王修龄校注:《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第43~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

尹弘兵:《地理学与考古学视野下的昭王南征》,《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

黄锡全:《士山盘铭文别议》,《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2期;陈英杰:《士山盘铭文再考》,《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6期;董珊:《谈士山盘铭文的服字》,《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1期;杨坤:《士山盘铭文正谊》,《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6期;晁福林:《从士山盘看周代服制》,《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6期;黄爱梅:《士山盘铭补议》,《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6期;李学勤:《论士山盘——西周王朝干预诸侯政事一例》,《文物中的古文明》,第195~198页,商务印书馆,2008年。

黄锡全:《士山盘铭文别议》,《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2期;

李学勤:《论士山盘——西周王朝干预诸侯政事一例》,《文物中的古文明》,第195~198页,商务印书馆,2008年。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174——175页。

徐少华:《郟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研究》,《江汉考古》1987年第3期。

李学勤:《由新见青铜器看西周早期的鄂、曾、楚》,《文物》2010年第1期。

李凯:《从〈士山盘〉看西周中期周王室的南方经营》,《四川文物》,2015年第四期。

高崇文:《从曾、鄂考古新发现谈周昭王伐楚路线》,《江汉考古》,2017年第4期。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

笄浩波:《多维视野下的春秋早期楚国中心区域——清华简《楚居》之楚王居地考》,《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第40卷第4期,2017年07月。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图版第58——59页,释文注释第150页。

胡刚:《有郟铜器与郟国历史新论》,《文物》2013年第4期。

《世本》(秦嘉谟辑补本)卷7《氏姓篇下》,《世本八种》,第308页。

田昌五:《夏文化探索》,《文物》1981年第五期。

陈朝霞:《从近出简文再析郟国历史地理》,《江汉考古》2012年第4期。

陈鹏宇:《西周厉王时期战争铭文的对比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7期。

李学勤:《论清华简〈楚居〉中的古史传说》,《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

黄鸣:《清华简〈楚居〉一至四简的历史地理考察》,《简帛网》2011年7月20日。

周才彬编:《楚风遗韵——早期楚文化研究文集》,第229~236页,(北京)团结出版社,2017年。

司马迁:《史记·楚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第1692页。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城市博物馆、南漳县博物馆:《蛮河流域楚文化遗址调查简报》,《江汉考古》2017年第4期。

王先福:《汉水中游西周考古遗存与早期楚国中心的探索》,《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另见:范文强:《襄阳史迹扫描》,(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2页。

张光业:《保康虾子坪西周遗址与熊渠徙居发渐》,长江大学楚文化研究院《荆楚文化网》,2015年4月23日。

湖北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房县孙家坪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2年第3期。

炎帝在荆山的初探

杨选成

炎帝是华夏民族的祖先之一,对人类贡献巨大。然而,几千年来,由于文字发明晚,资料流失严重,对炎帝的记载很抽象,也很简略,史学界至今无法结论。保康县在近几年的荆山史前文化研究中,发现了许多关于炎帝的线索,而且这些线索与古籍上的记载相吻合,笔者予以初步探讨。

辞书典籍对炎帝记载

《辞海》(缩印本,198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下同)1758页对“炎帝”的注释为:“传说中上古姜姓部落首领。号烈山氏,一作厉山氏。相传为少典娶有峤氏而生。原居姜水流域,后向东发展到中原地区。曾与黄帝战于阪泉(今河北涿鹿东南),被打败。一说炎帝即神农氏。”

《辞海》(缩印本,1790页)对“神农氏”的介绍为:“传说中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相传远古人民过着采集渔猎生活,他用木制作耒、耜,教民农业生产。反映中国原始时代由采集渔猎进步到农业的情况。又传他曾尝百草,发现药材,教人治病。”

《神农本草经》即是依托他的著作。一说神农氏即炎帝。”

《辞海》(缩印本)2306页“黄帝”条的记载说:“传说中中原各部落的共同祖先。姬姓,号轩辕氏、有熊氏,少典之子。相传炎帝扰乱各部落,他得到各部落的拥戴,在阪泉(今河北涿鹿东南)打败炎帝。”

湖北辞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汉语大字典》(缩印本)918页在“炎帝”条注释为:“即传说中上古时代的神农氏,因以火为德,故指炎帝。《吕氏春秋·荡兵》:‘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高诱注:‘炎,炎帝也。’《汉书·魏豹田儋韩信传赞》:‘周室既坏,至春秋末,诸侯耗尽,而炎、黄、唐、虞之苗裔尚犹颇具存者’。”

辽宁教育出版社《帝王世纪》介绍神农说:“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峤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农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为氏。有圣德,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为炎帝。”又:“尝别草木,令人食谷以代牺牲之命,故号神农,一(亦)号魁隗(委)氏,是为农皇。”

吕思勉著《中国通史》(中国华侨出版社)第7页有这样两段话,一段说“三皇的次序,应当从《尚书大传》,燧人在前,伏羲次之,神农最后。”另一段说:“谓之神农何?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

在保康县和神农架林区流传的、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黑暗传》中有1000多字叙述神农,如:“神农

之母娇氏女,封号安登老夫人。名媒正娶嫁少典,伏羲时代称贤能。一日安登游华阳,观看沿路好风光。正在欢悦惬意时,一条神龙从天降……”;“神农出生厉山上,厉山就在姜水旁。又将水名取妨姓,才有神农本姓姜。神农出生兆吉祥,九泉同时涌出水。九井相通水汪汪,真是吉祥从天降。生下三天能说话,五天走路不晃荡。七天牙齿全长齐,身高八尺七寸长。三岁便知耕耘事,后有五谷传四方。”

归纳上述记载,明确下列基本概念:1. 神农被列为三皇之一;2. 神农对人类贡献巨大;3. 神农是号,炎帝是职,魁隗是名(还有后代多人);4. 神农为少典之子;5. 神农被称为厉山氏、烈山氏;6. 神农居于姜水。

炎帝世系与血缘

据保康县荆山史前文化研究者汪青祥的考证,神农为燧人氏之后。也就是说,神农之祖是我国发明火的燧人氏,燧人氏也曾被定为三皇之一。而燧人氏的活动区域为今南漳县板桥镇至保康县马良镇和两峪乡一带,依据是此一带有许多与“火”有关的地名,如:燧火山、白日山、火石垭、火龙山、炎城湾等等,为荆燧,即荆山之燧人,后人书写成荆随。

神农之父为少典,娶有娇氏之女为妻。而《帝王世纪》记载:“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宝,其先为炎帝。母家有娇氏之女,世与少典氏婚,故《国语》兼称焉。”皇甫谧(《帝王世纪》作者)以为:“少典为有娇氏诸侯国号。然则姜、姬二帝同出少典氏,黄帝之母又是神农母氏之后代女,

所以同是有娇氏之女也”。

《帝王世纪》所记：神农之后凡八世，即“帝临魁、帝承、帝临、帝明、帝直、帝来、帝衰、帝榆罔。”又记：“据诸子及《古史考》，炎帝之后凡八代，五百余年，轩辕氏代之。”据《帝王世纪》记载分析，神农之号的起始要早于黄帝几百年，到榆罔时才与黄帝同时代。在保康县马良、两峪一带有神农后代的线索，如：丽连、柱、泾、咎繇等住地的地名遗存。

荆山祝融为炎帝之后，地位十分显赫。《山海经·海内经》曰：“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訖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此记载说明。神农的后裔曾为荆山祝融，远古时期司火之官，是职务称呼。主持重大祭祀等；与帝王关系密切，地位显赫。《山海经·海外南经》又有记：“南方祝融，兽面人身，乘两龙。”这条记载准确地说出了荆山祝融所在之地，即此文中的“南方祝融”，指荆山山脉之南，而不是中原之南方。因为据我们考证，《山海经》是以荆山为地理座标的。所谓“乘两龙”，分析认为“两龙”的位置在今紫阳村朱家湾，属“二龙戏珠”之地。此山腰猪头垭处古时建有纪念祝融的火神庙，遗迹尚在。而楚人的祖先为睢山祝融，其主要职责为观天授时，指导农耕；保管火种，放火烧荒。两个祝融是有明显区别的。

共工：《山海经·海内经》又曰：“祝融降处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壤以江水。”有典籍记载，在黄帝时期，共工是负责治水的官员，在同颛顼争夺帝位中怒而撞倒不周山。分析认为，是共工在治水过程中图省工省力，指挥民工挖开今两峪乡新崩岩，导致洪水下泄，毁田坏屋。此共

工被黄帝贬至北方建康回国。据荆山史前文化研究者汪青祥考证,康回国在今保康县城关镇土门一带。《史记》曰:“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国语·鲁语》(上)记曰:“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水土,故祀以为社。”这是氏族神而成为土地神的例子,恰城关镇土门村有九皇山,其上有共工台遗址。分析认为,“冀”字的形成与共工有关,“冀”字是由“北”、“田”、“共”三个字组成,意为共工在北方开辟土地,恰共工在古冀州(今远安)活动过,后来被贬之幽州。

榆罔:《帝王世纪》所记,榆罔为神农第八代孙,仍称炎帝。到榆罔执政时,神农部落已衰弱,黄帝部落崛起,于是炎黄部落为地界之争引发了阪泉大战。在这场战争中炎帝部落战败,被迫俯首称臣,两个部落实行联盟。

姜子牙:姜子牙姓姜名尚,字子牙。生于姜水,封于吕,因而也叫吕尚。是殷商末期和西周初期著名的历史人物。《通志·氏族略二》:“吕氏,姜姓侯爵,炎帝之后也。虞夏之际,受封为诸侯。”《国语·周语下》所记:“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肱股心膂,以养物丰民人也。”《说文·吕部》:“吕,昔太岳为禹心吕之臣,故封吕侯。”《线装经典·夏商周》在“韬略鼻祖姜太公”文中说:“姜尚,名望,字子牙,出生于东夷。相传,姜尚的祖上是贵族,在舜统治时期当官,因有功被封到吕这个地方……后来家世败落,到姜尚出生时吕氏已沦落为贫民。……他听说西伯昌求贤若渴,广纳贤才,便果断离开无法施展抱负的商朝,来到渭水之畔的西周境内,在蹇溪隐居,终日垂钓,冷眼旁观世事变换,伺机出山。”

追溯姜子牙的一生也可以判定其为荆山人,理由如下:一是他的祖宗为大舜时管理四岳的官员。此四岳全部在荆山之内,为朝元山(天台仙山)四周的四座护山,分别为东青龙(青龙山)、南朱雀(朱雀坡)、西白虎(白虎山)、北玄武(玄武关即今红岩寺)。二是大禹在阳城坐位,姜姓被封在今紫阳村吕家台,为吕氏部落方国,后人以封地为姓,因而姜子牙又叫吕望。三是“东夷”指部落方位,即以都城重阳为坐标,东方为夷族,故为东夷。东夷族因与商朝祖籍殷家山为邻,与商王朝的确发生过战争。四是古渭水在沮水的歇马至马良段,蹯溪也叫螃蟹溪,位于保康县歇马镇盘龙村,为姜子牙的钓鱼之处。五是姜子牙协助文王所灭掉崇国、密须国,此两国也在荆山内。崇国在今马良镇崇家山(今姚家沟村);密须国在今五虎(乡)。至于陕西的岐水,可能是周古公北迁时带过去的地名,有专文分析。

姜子牙得到周文王、武王重用后果然不同凡响,先是用计成功地救出了文王;扩展了文王的势力范围;灭掉了崇国、密须等国,剪除了纣王的帮凶;后又辅佐周武王伐商灭纣,平定叛乱,为巩固西周政权立下汗马功劳,被封为公,故称之姜太公。

炎帝出生地和成长地

《中华开源大圣·炎帝肇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第8页)书中注释说:“烈山:炎帝出生地,迄今尚无定论,主要有陕西宝鸡说、湖北随州说、湖南酃(零)县说等。”多种典籍涉及到神农的出生地和成长地,其主要依据如下:

《通志·氏族略三》记：“姜，姓也；炎帝生于姜水，因以为姓。”据我们考证，姜水在今保康县马良镇境内，今与南漳县板桥交界的峡峪河，尧舜时期曾叫妫水。

《国语·晋语四》记：“……黄帝以沮水成，炎帝于姜水成。”据我们考证，黄帝的出生地姬水为两峪乡聚流河，距姜水仅15公里，符合情理。

《中华开源大圣》(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书中载：姜水的来源为神农所采到的第一种药是姜，后人便把采药那条河叫姜水。

我们再通过神农夫人听訖来证实。《山海经·大荒南经》所记：“大荒之中有不姜(听訖)之山，黑水穷焉。又有贾山，乞(屹)水出焉。又有言山，又有登备之山。有愬愬之山。又有蒲山，澧水出焉……”经考证其记载与峡峪河地形相符。古“黑水”在今马良镇五虎柳毫下河，当地群众叫黑沟；“言山”是不姜(听訖)出嫁时山神在说话；“屹水”出自羌屹崖，这个地名仍存在；贾山下有羌屹崖、仙女洞遗址，还有不姜氏出嫁的传说；神农夫人出嫁前住仙女洞，与神农的住地仙古洞仅4公里，遗址仍在。

羌族是姜族的分支。《后汉书·西羌传》曰：“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分析认为，羌族和姜族同宗，原居荆山中的五虎一带，因参加周武王伐纣有功，被封到大西北去的。

与马良镇厉山为邻有姚家沟村，也叫炎黄子孙沟，是当年炎黄子孙混合居住之处，地名仍存。

保康县店垭镇有神农庙(殿)遗址，当为神农登基之处，

而且还保留着神农村的村名。在马良镇东风头村,有“炎城湾”地名,当为炎帝居处。以上均可以作为寻找神农在荆山的线索。

判断神农(炎帝)的出生地,“华阳”也是一条重要的地理线索,因为《帝王世纪》和《黑暗传》都说神农之母女登在游华阳时,遇神龙附体而孕。那么华阳到底在哪里?以往的传统解释为陕西华山之阳,我们认为是不准确的。这个华山应该是泰华山,即保康县境内的望佛山。因此山为华胥女生伏羲、女娲之山,山上建有华盖宫。“华山之阳”即为泰华山之南,应在保康县歇马、马良镇一带,距姜水很近。

现在看来,宝鸡说和酃县说都依据不足,主要是不符合原始社会的社会状况。考证炎帝,需要把方方面面的因素都纳入考虑,而不是凭一两条所谓证据就妄下结论;再就是与炎黄大战和炎黄联盟的条件不符合,缺乏相关佐证,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原始人没有那么大的能耐,跑几千里去外打仗,也不合逻辑。

和我们争议最大的可能是随州厉山,因《三皇记》注曰:“郑玄云:‘厉山,神农所起,亦曰有烈氏。’皇甫谧曰:厉山,今随之厉乡也。”由此看来,寻找厉山所在成为确定炎帝出生地的关键。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中“厉山”的记载有11处之多:即察哈尔涿鹿县西南、山西厉城县南、山东濮县东南、山西翼城县东南、山西永济县东南、江苏无锡县惠山、无锡县舜山、安徽东流县东、安徽和县西北、浙江余姚县西北、浙江永康县南。但是,神农(炎帝)出生地的厉山

只一处,这就需要进行分析和甄别。1. 繁体字的“厉”为“厂”下作“万”,其字义为崖下有十千,或作极其多、极其甚讲,这里特指崖下的人口极其多之意。2. 繁体字的“历”字也是个象形字,由“厂”、两个“禾”、止字组成,其字义为崖下种了很多庄稼,庄稼下又住着许多人家。这就意味着从神农起到大舜时这里都是人们集居之地。3. “厉”又可作“砺”用,其意为此地产磨刀石。4. 因皇甫谧曾把厉山与“随”联系在一起,因此必须把“随”的因素纳入考虑。如果按照主流说法,神农在随州的厉山,但那里是否具备神农生活的相关地理条件?比如:一是那里是否具有很高的崖?二是是否有神农之妻居住的涂山?是否有言山、羝山、羌屹崖地名?三是附近是否有神农采药的姜水?四是是否有神农发现粟子的羊头山?五是那里是否有炎黄大战的阪泉、跑石寨地名?六是那里是否有雷泽?若再加上发明火的燧人氏和大舜居历山的因素,需要的佐证则更多。若无上述线索,那么其真实性就要大打折扣。5. 神农居厉山与虞舜居历山本是一座山,因为从居住地特征上分析神农和虞舜是同一座山,有一系列的佐证证实神农和大舜居住在荆山之中的厉山,将“厉”为“历”,为后人书写错误而致。分析后认为,随州的厉山为神农一支后裔迁徙时而带去的地名,因为最早的曾国也在荆山中。至于其它各地的地名,或是其后代带去的,或因其它因素造成的。

《汉书·地理志》所记,岳崇、岳历、岳竹为阳城附近的三座山。从字义上讲,高大的山为岳,而崇山、历山、竹山(大竹园)都在今重阳附近;从地理上讲,此山脉从荆山主脉聚龙山右支脉延伸而来,止于重阳坪,其中崇山和历山具有崖山地

形,对重阳盆地形成关门之势。原来两山连接在一起,这就是神农作《连山易》的地域背景。大禹治水时,凿山放水,才使两座山分开。

再者,寻找厉山,应结合“随”字。《象》曰:“泽中有雷,随。”意思是大泽中有雷神,随山在雷泽旁。《周易》(卦十七)随:“元亨、利贞、无咎”。荆山古文化研究者对此卦解释为:“元亨”为元(原)始人之后;“利”为船利,汉船托宝处,“贞”为瀛女,神农之母;“无咎”乃陶咎,舜臣皋陶的居地。陶咎、陶邑、厉山之地为“荆随”。最早的“随”字为“燧”,是发明火燧人氏的居地,也说明了荆山之中有随山,厉山从属于随山。保康县发现的线索表明,上述条件都具备,说明此处才是炎帝真正的出生地。

炎帝的社会关系

听訖。听訖是炎帝的夫人,所有典籍没有记载听訖的事例,仅仅留下了几个可供考证的地名。《山海经·大荒南经》已记,前面已引用,不再赘述,上述记载与峡峪河地理相符。

黄帝。黄帝为五帝之首,其住地与炎帝部落为邻。到炎帝榆罔时,其部落已经衰弱下来了,而黄帝部落兴旺发达。《史记·五帝本纪》曰:“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执五德,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驱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我们认为,此战是由黄帝部落向东扩张而引发的,最终是黄帝部落战胜炎帝部落,炎帝部落被迫联盟。

对于历史上很有名“阪泉大战”的地点，司马迁只提地名，没指明在何处。但以太史公考察路线看，似乎在北方，以前带倾向性的说法在河北省涿鹿市东南，后世专家学者多指河北涿鹿黄帝城东；《线装精典·夏商周》（云南教育出版社）上提了两处：一处在今山西运城解州镇，一处在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台湾学者周光斗认为：“他（黄帝）跟姜姓部落的首领烈山氏，曾在阪泉打了一仗，烈山氏败走荆山，他便在荆山立鼎示威，以此为界，然后退回黄土高原。”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都值得商榷，主要是与情理和逻辑上不符。既然黄帝部落在北方，炎帝部落在南方（随州厉山、荆山），那应该是炎帝部落北上两千里去侵略黄帝部落，在阪泉前线被打败了，然后又退至荆山。研究者不仅要问，这场战争的动因是什么？在原始社会时期，交通靠腿、通讯靠嘴，交战双方有那么大能量吗？几千里的征战，后勤保障是怎样解决的？再说，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都在黄河流域和江淮流域，凭什么把战场设在河北之北？再就是炎帝部落被打败，黄帝部落理应至追到黄河边上即可，为什么要追至江汉腹地的荆山，还立鼎示威？荆山与这场战争是什么关系？有人会说炎帝部落原来也在北方，那在阪泉附近为什么没有线索？有人会说炎帝被打败以后来随州的，那北方回旋余地大，他被打败以后不败走别处，偏偏看好几千里外的荆山？既然他在随州，那么黄帝在相距几百里之外的荆山立鼎是什么意思？这些都是很值得怀疑的、经不起推敲的情节。

汪青祥在《讲古话重阳》书中讲述：炎黄阪泉大战的地点在保康县两峪乡至南漳县板桥、澧泉一带。其依据是：荆山主

峰至保康县两峪、南漳板桥一带原是炎帝部落的活动范围,厉山即丽山,炎帝有后人叫丽连,就住在这一带;大禹时的青州(九州之一)是以炎帝的大本营青龙山命名的。黄帝的活动范围在保康县店垭至马良和平、重阳一带;阪泉大战是黄帝部落东出扩张与炎帝部落为争地界而引起的冲突。第一,是因为原始社会时期,一切活动都是为了生存,两个部落邻近,只有活动地界或劳动果实之争,才有可能引起冲突;两峪乡的芭桃、白庙村是黄帝母亲、祖母的白民氏国住地,与南漳板桥炎帝部落的青龙山连山接界,与此为邻的还有南漳县板桥镇青龙寨遗址,都证实阪泉大战发生在这一带;第二,是黄帝之妻西陵女所属的西陵氏部落在今远安、宜昌一带,黄帝部落在今店垭、马良一带,都与南漳的板桥、巡检为邻,所发生冲突引发战争符合情理;第三,是有遗址、地名体现。《史记》所记,炎黄的阪泉之战主要发生了三次大的战斗:第一次是黄帝部落受到夹击而失利,地点不明;第二次是黄帝部落引水击破火攻,肯定在河溪边,可能为灋泉;第三次是黄帝部落用“星斗七旗阵”破解了炎帝部落的“跑石阵”。“星斗七旗阵”是指用旗语联络指挥进攻,恰南漳县板桥、东巩镇有跑石寨、跑石岭地名,分析就是那次战争的遗迹。第四,说明原始部落从山区向丘陵地带过渡的趋势,这是生产力发展后对外扩张的必然。其实,“阪泉”二字系组合地名,即阪桥和灋泉各取一字组成,犹如我国解放战争时期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此二地名都在板桥镇境内。道理很简单,既然是大规模的战争,而且打了三仗,就不可能只在一个地方,只记载一个地名。

蚩尤。《帝王世纪》记载了炎帝与蚩尤的战争。如:“蚩

尤氏强，与榆罔争王于涿鹿之野。”“榆罔居空桑，空桑为陈留，故《归藏》启筮云；蚩尤伐空桑，帝所居也。”“炎帝戮蚩尤于中冀，名其地曰绝轡沟之野。”《御览》：“蚩尤氏强，与榆罔争王于涿鹿之野”。

对于蚩尤，后世多认为是南方（或东方）九黎族首领，有兄弟八十一人，能以金（铜）作兵器，并能呼云唤雨，个个骁勇善战；对于战争之地的“涿鹿之野”，多认为在河北省涿鹿市东南；对于战争过程，《中华开源大圣》则认为初战中炎黄部落士兵死伤严重，黄帝一愁莫展，幸遇灵山十巫老用十种兵阵相助，力克蚩尤及九黎军队，蚩尤最后在绝轡沟涧被黄帝部将应龙、常先所杀。综合后世所提供的信息，令人产生以下质疑：一是如果说涿鹿在今河北省涿鹿市东南，九黎族的活动地域在江淮一带，那等于蚩尤部落也北上几千里侵犯炎黄部落，这怎么可能？而《史记》明示是蚩尤属叛乱而不是侵犯，意思是蚩尤部落原属炎黄部落，既然炎黄部落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那凭什么又把战场设在河北以北？二是黄帝在束手无策时巧遇“灵山十巫老”，这样说来涿鹿附近必有灵山，可事实上河北涿鹿附近并无灵山，巫术的起源地在川东或鄂西北。

保康县荆山古文化研究者汪青祥在《讲古话重阳》一书中，也有一则专门讲述黄帝战蚩尤的故事：黄帝部落在今西河一线，兵都在今黄龙观；炎帝部落在今南漳板桥镇，兵都在青龙观；蚩尤部落在今南漳县巡检、峡口一带，兵都在南襄、白云一带；先由黄帝之子应龙引水淹了南襄城，消灭了蚩尤的有生力量，蚩尤部落被逼迫逃出阳平关。在阳平关外的五鹿，炎黄军队同蚩尤军队摆开了战场，黄帝用十巫老所授的“十阵

法”，历时三年，打败了蚩尤军。蚩尤独自一人逃到深山黄界（今保康九路寨一带）躲藏，被黄帝之子常先和应龙射杀。绝讐沟即决战沟，就是现在保康县百峰（乡）的战口河，此地还留有“杀人尖”地名，可以为证。“涿鹿”二字也系组合地名，即潘涿山和马鹿岩，分别在南漳县和保康县境内。

赤松子。《辞海》（缩印本）对“赤松子”的介绍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仙人。相传为神农时雨师，一说为帝喾之师，后为道教所信奉。《汉书·张良传》：‘愿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耳。’颜师古注：‘仙人号也，神农时为雨师。’”在《中华开源大圣·炎帝肇基》书中，赤松子是炎帝的左膀右臂，经常随炎帝一起活动。在袁珂编著的《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中是这样介绍“赤松子”的：“赤松子，上谷人，病厉入山，导引轻举假上也。”“《列仙传》卷上：‘赤松子者，神农时雨师也，服水玉以教神农，能入火自烧。往往至昆仑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随风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

从上述记载中得到两条信息：一是赤松子经常去昆仑山，到西王母石室。经过考证，文中的昆仑山即今马良镇重阳的陈家山，亦称八宝山，因女娲和西陵母都在此山上居住过，黄帝去世后，西陵母立地成佛，被尊为西王母，是被神化的结果。二是赤松子经常服水玉，能入火升天。后来他在厉山得病后升天，炎帝的大女儿瑶姬因暗恋赤松子，便追随而去，成语“瑶池添座”就是指这件事。重阳八宝山亦称碧瑶山，古人在山上建有碧云宫、瑶池，后周文王在此修建灵台，遗址仍存。

精卫。《山海经·北次三经》：“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名自啸

(音)。是炎帝之少女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又,《述异记》卷上云:“昔炎帝女溺死东海中,化为精卫……”上述记载了一个重要的地理座标,即东海。经分析,古“四海”全部在荆山区域内,以子午线交汇处保康重阳为中心,东海则位于重阳以东,厉山正在这个范围里。东海之下有雷泽,是个大湖泊,女娃溺死于此的可能性很大。

炎帝治世

炎帝之时,人民众多,生活困难重重,故炎帝带领人民想了很多办法化解困难,留下许多美谈。

建国家。《山海经·大荒东经》曰:有东口之山,有君子之国。其人衣冠带剑”。《山海经·海外东经》曰:“君子国在其北,衣冠带剑,食兽,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让不争”。根据上述记载,证实历史上的确有个君子国。

为什么叫君子国呢?由于神农勤俭礼让,济富救贫,敬老爱少,加之他“架木为城,采尝百草,救民疾夭……”,深受人们的敬重。因为这个国家的风气很好,人们互相谦让,有君子的风度,人们都很拥护他。所以,他所创建的部落方国叫君子国。

神农为“东君”,也叫东王公。《宋书·乐志三》魏武帝《陌上桑》曰:“济天汉,至昆仑,见西王母,谒东君。”东君与西王母对称,则东君亦为东王公。因为神农的君子国在重阳的东方,又因为他经常活动于今两峪芭桃一带,这里有建有聚仙

宫(洞)遗址;又因为神农的母亲叫瀛母,所以后人在巨仙宫旁建了东瀛庵,这两处都有遗址可寻。在以前的典籍中,东君和东王公是分开表述的,实际上都是指神农。

那么,这个君子国位于哪里呢?就在今保康县马良镇的五虎和两峪乡芭桃一带。有下列依据:其一、文中“使二大虎在旁”是指地理特征,即山的形状似虎。五虎的地名来历为五虎擒羊之地,又称五色斑斓之虎,有白虎山、黑虎山。其二、在今两峪乡芭桃有聚仙宫和东瀛庵遗址,相传巨仙宫为神农和部落首领居住过的山洞,东瀛庵为后人纪念神农母亲(瀛母)的建筑。其三、文中所记的“东口之山”,即指今马良镇的东风头山,也叫东口之山。其四、有炎黄子孙沟地名遗存,简称子孙沟。为什么叫子孙沟呢?相传炎黄实现部落联盟后,他们的后代在这个地方混合居住,黄帝和炎帝经常结伴来看望。子孙沟位于重阳村的东南部,崇山脚下,距厉山仅1公里之遥,今叫姚家沟村,1984年版《保康县地名志》上有标注。其五、文中有“济天汉”之句,“济”为济水,也叫岐水,“天汉”为天河端,古汉水发源之地,在南漳县板桥镇境内,正是君子国的区域。

种粮食。《中国通史》(吕思勉著)引用《易系辞》曰:“……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揉之利,以教天下。”《辞海》(缩印本)这样介绍神农氏:“传说中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相传远古人民过着采集渔猎生活,他用木制作耒、耜,教民农业生产……。”《中华上下五千年》(山西古籍出版社)说:“神农氏,他勇尝百草,教民农耕,在传说中是远古时代贡献最大的一位领袖。在神农时代,人口繁衍得已

经够多了,仅仅靠打猎已经填不饱肚子了,氏族中常常有人因分不到食物而生病甚至饿死,人们陷入了极度苦恼之中。就在这十分困苦的情况下,神农氏出现了……”

保康县流传《黑暗传》的唱词有:“神农治世少食粮,日夜便把办法想;一日天遣神鸟来,口含五彩五谷样;此鸟便是布谷鸟,飞进深山把身藏。神农遍把五谷访,四山五岳都走光;遇到河流把水淌,遇到高山攀登上;一日爬上羊头山,粟子一颗寄树上;此时枣子正结果,满树枣子红堂堂。神农忙把粟米取,就近开出田一方;造下木犁带手耙,翻开泥土播种忙;从此才有粟谷长,小米做饭喷喷香。”

这些记载都充分说明了神农是我国农业生产的始祖,因为他制造犁田的工具和“教民稼穡”。考证神农发现粟子一事,有一条重要的地名线索,那就是羊头山。经过考证,在今南漳县巡检镇通城河村和我县店垭镇垭子口邻近处、恰有一个似羊头的山头,因而取名羊头山,1984年版《保康县地名志》上标注。而且这里距神农所居的厉山仅7公里之遥。神农在这里发现了粟子,开始了粮食生产,而《黑暗传》的编者熟知这个典故,将其编入歌词中。

在荆山地区,有一则“安安送米”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了几千年。神农是安登夫人的儿子,乳名叫“安安”。相传神农从小就孝敬父母,首先发现了粟子,种出粟谷来,用石片碾成米,给母亲送去。这则故事也能从侧面证实神农在荆山。

造居室。即建造简易的房子。《易·系辞》(下)曰:“上古穴居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过》”。神农“架木为城”实际上是建造房屋的开始。因

那时人们还不会建造土墙房屋,更不会建造砖屋,开始仿照“有巢氏”搭建房屋的方法,只能用木料搭成窝棚之类房屋,但这类房屋的缺点是矮小,容纳不了多人,且容易失火。后来取比较粗壮标直的木料垛(架)成房屋,也叫垛壁屋,比窝棚先进一步。不过,文中的“上栋下宇”,很可能是指吊脚楼之类的房屋。这种房屋的好处一是防潮,二是防毒虫野兽,三是容量大、宽敞,即为楼房的起始,文明的进步。

兴贸易。《易系辞》曰:“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至炎帝之世,原始社会已经有了明显进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明确。例如青壮年男子多打猎、建居室;妇女多纺绳织衣、食品加工;老年、壮年男子种粮食、采集野生食物等,基本上处于自劳自食、自给自足状况。一天,有老者向炎帝反映,今年风调雨顺,粮食有余,无处可储。再者,天天吃饭团,很乏味,想吃点鱼、肉,调剂生活。有一妇女向他反映,家里的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具已损坏,自己不会修理和制造,很不方便。又有一渔民反映,自己捕的鱼很多,吃不了,烂掉了很可惜。炎帝征求各部落酋长的意见,如何将这些部落吃不完、用不了的东西换取别部落正需要的东西,于是想到了交易,即交换易手。神农同部落酋长们商定,就在他居住门前的场子里进行交易。考虑到有的部落隔的远,需要赶几十里的路程,所以定为日中为市,也就是说到中午的时候进行交易,各自换取了所需要的物品,满意而去。

考证炎帝所设的交易地点,分析认为可能为下列三处:一是马良镇东风头村炎城湾,与炎帝住厉山相吻合,地名仍存。

二是两峪乡芭挑村巨仙宫，相传为神农居住过的山洞，神农和部落酋长们在此议事，谓巨仙，遗址仍在。三是店垭镇神农庙，相传神农在这里登基称帝。保康县还有“串换垭子”的地名遗存，分析可能为古时交易之所。

尝百草，兴医药。《淮南子·修务训》记曰：神农氏“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遇七十二毒”；“始有医药”。《线装经典·夏商周》在介绍神农时说：“神农氏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三皇之一，他是继伏羲之后，又一个对中华民族有颇多贡献的传奇人物。他不仅发明了农耕技术，更遍尝百草，发明了医书。”

神农“采尝百草”也就是采集药草，《黑暗传》里也有这方面的内容。如：“神农上山挖草药，要用百草治百病。神农五岳都走遍，尝草三百六十名。一日遇毒七十二，几乎一命归天庭。天降药神来相助，还有赫鞭显神灵。……自古良药平地生，毒药尽在山林存。神农穷追不道停，判出毒药众姓名。以毒攻毒办法好，还阳草药有来因。神农又撰《本草经》，教民尝草识药性……”

相传神农采集药草之地在今神农架，其实神农架是一个区域概念，喻意为神农曾到过的大山。以神农顶为中心，幅射周边县区，保康县与之相邻，应在该区域范围内。分析后认为，神农多在保康境内采药，有三条依据：其一，神农所采集的第一味药是姜，所以把所处的那条河叫姜水。古姜水就是保康县与南漳县交界的峡峪河，前面已有介绍。其二，神农在此建有君子国，“救民疾夭”便是为其国人治病，保康与神农架邻近，所以推论采药和治病之地多在保康县境内，不可能在神

农架的原始森林里。其三，保康县店垭镇还保留有神农村村名，相传此处为神农登基之处，古时建有神农庙，距神农出生地厉山比较近，可以佐证神农的确在此活动过。

兴封禅。封禅和祭祀都为古代的重大礼仪。《传》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废；三年不为乐，乐必坏。”《史记·封禅书》(第六)记载有：“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之语。《辞海》对“封禅”一词的注释为：“帝王应到泰山祭祀，登泰山筑坛祭天曰‘封’，在山南梁父山上辟基祭地曰‘禅’。如秦始皇、汉武帝都曾举行过这种大典。”又载：“战国时齐鲁有些儒士认为五岳中泰山最高，帝王应到泰山祭祀。”由此可见，封禅是古代帝王祭天地的一种仪式，其意为帝王代表百姓感谢天地赐于之功。

对封禅问题需要厘清的是：一是山东泰山是战国齐鲁两国所兴起来的封禅之地，并不是最早的泰山。那么，比这要早2000年的三皇五帝时期的封禅之地在何处呢？二是炎帝和黄帝均封泰山，这个泰山何所指？炎帝“禅云云”、黄帝“禅亭亭”，这两座山又在何处？

我们通过探讨后认为，炎帝和黄帝封禅都在荆山内，没到荆山以外去，因为泰山、云云山、亭亭山都在他们住地的附近。依据有：《汉语大字典》对“泰”字的注释有“极大”“极远”“大中之大”之意。《淮南子·原道训》称：“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盘古被称为泰古，伏羲所居的山被称为泰华山，也称西泰山，即今望佛山。因为盘古开天地的故事起源于荆山，荆山有盘古身躯和内脏的地名照应，雷神是盘古的化身，和华胥女结合生伏羲和女娲，然后是伏羲和女娲成婚，繁殖人类。这个

神话故事实际上就是告诉人们，泰山之名最早起源于荆山，与人类始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所以历代君王都要到此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不过，根据《史记·封禅书》“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又据：“初，天子封泰山，泰山东北址古时有明堂处，处险不敞”的记载，考察分析认为，荆山之中应还有一个泰山，这个泰山就是东泰山，即我县两峪乡朝元山。这里是黄帝祖先的发祥地，所以黄帝必须到此山祭祀。那么，云云山在哪里呢？云云山即重阳村八宝山，因为伏羲、女娲、西陵母都在此山居住过，山上建有碧云宫，此山山锐而高，经常云遮雾绕，所以称云云山，黄帝必须到此山参禅。亭亭山即鸡头山，在紫阳村峡谷处。

问题是为什么现在山东的泰山十分出名，而荆山中的泰山却鲜为人知呢？分析是在西周初期的大分封中，周王朝中两个地位显赫的重臣，周公和姜太公的后人，被封到今山东、江苏一带建齐、鲁二国时，将泰山之名带过去的。后来又因来荆山祭祀路途遥远，便在东部建相应的寺庙，才冷落了荆山的封禅地。

注八卦。《帝王世纪》记曰：“庖牺作八卦，神农重之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引而申之，分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作《归藏》，文王广六十四卦，谓之《周易》。”又：“炎帝时，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炎帝退而修帝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炎帝。营都于鲁，重八卦之数，究八八之体为六十四卦。”《辞海》对“八卦”的注释为：“亦称‘经卦’。《周易》中的八种基本图形，用‘一’或‘——’符号，每卦由三爻组成；以‘一’为阳，‘——’为阴。名称是：乾、坤、

震、巽、坎、离、艮、兑。《易经》64卦皆由八卦两两相重组成。八卦起源于原始宗教的占卜。《易传》作者认为八卦主要是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每卦又象征多种事物，并认为‘乾’、‘坤’两卦在‘八卦’中占特别重要的地位，代表阴阳，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切现象的最初根源。”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八卦也一样，必然也反映出其时代背景和地域背景。从八卦作者上看，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周文王；从三皇到西周，就是其时代背景，在卦象中必然有所体现，例如，在《爻辞·九三》中就引用了高宗伐鬼方的事例。在地域背景上，8种名称或许就是荆山中的8个地方，只是目前尚不能确定而已。

2014年荆山古文化研究又获得了一重大突破，这个突破就是《黑暗洪荒传》出版。这本由13个歌本综合而辑的民间唱本中，就叙述了玄元老祖《连山八卦》的图案和内容：为“艮为天，艮三连；巽为地，巽六断；乾为火，乾中虚；坤为水，坤中满；兑为风，兑下缺；坎为泽，坎上断；离为雷，离仰孟；震为山，震覆碗。其数同其先天数。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此为玄元老祖连山卦。现于夏。”本书对《连山易》一词的注释为：“是一种已失传的古籍，据《周礼》记载，相传为伏羲或神农氏所创，成书于夏朝。《连山》《周易》《归藏》并称为占卜三易的三易之法。”该书第八回“注连山八卦、演浑天甲子”，用了318句、2200多字来叙述玄元老祖发明《连山易》和《浑天甲子》的内容，其中涉及到三皇五帝。可以说，此书的出版，为荆山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增添了一份过硬的佐证。

炎帝活动范围

炎帝作为一个部落的首领，而且这个部落在炎黄没联盟前已经形成了500多年，肯定有其活动范围。遗憾的是，司马迁将炎帝列为三皇之一，所以在《五帝本纪》上没有涉及。《帝王世纪》的记载也很简略，仅仅涉及到了几个地名，如厉山、姜水、羊头山、涿鹿、空桑、中冀、长沙等。根据上述地名的位置分析炎帝的活动范围应该是：“厉山”为炎帝的出生地和生长地，经考证可能在今马良镇东风头村，前面已分析；“姜水”在厉山旁，也就是今马良镇与板桥镇邻的峡峪河；“羊头山”是炎帝发现栗子的山头，为今南漳巡检镇通城河和店垭镇垭子口交界的山；“涿鹿”是一个组合名词，也是战场范围，战场范围上至保康县歇马、马良、店垭等镇，下至南漳县板桥、巡检、峡口镇、远安县洋坪镇，及西至兴山县东部这一广泛的区域。《帝王世纪》记载：“榆罔居空桑，空桑为陈留”，“炎帝自陈营都于鲁曲阜”，“空桑”指空心桑树，地标之一，此处可能为今重阳村的陈家山。因为这里是一处台地，重阳坪此时为雷泽，是无法居住的，所以只能在台地上居住，黄帝也有“都陈”的记载，后来是陈国在此建都。分析最早的“曲阜”是今店垭镇白蜡村一带，这里的地形很好，适合一个部落生存，在后面的文章里作具体分析。

“中冀”这个地名也是指范围。因为古冀州的历史悠久，从黄帝时设“九州十二国”起都有冀州，每个帝王都继承，但时大时小，所指区域各有不同。通过研究《禹贡》这篇文章，发现大禹时的九州全部在荆山内，因而推论炎帝时的冀州不

可能在荆山以外。有“中冀”就有“上冀”、“下冀”，“上冀”在今保康县土门一带，“下冀”在远安县洋坪一带，那么中冀极有可能在今马良集镇一带。因为这里与蚩尤部落的老巢九里（黎）较近，蚩尤部落要从山上到河谷地带，这里是首选，必然要和炎帝争夺这一地区的主导权。

因《中华开源大圣·炎帝肇基》上讲，炎帝在采药中误食断肠草而亡，为水葬，葬长沙。分析认为，炎帝即然是采药，那就不会去的太远，不会超出荆山的范围。“长沙”这个地名暂无线索可寻，不过，既然是水葬，分析肯定在河边。今沮河古时曾叫过沮江、沮水，又是炎帝活动的中心，不会是他处。重阳有“长沙州”地名，也可以作为一条重要线索。

综上所述，炎帝的活动范围为保康县南部、南漳县西南部、远安县西北部、兴山县东部这一区域里，比黄帝的活动范围略小。

黄帝在荆山的线索初探

都正阳

在人类文明进步和发展的长河中,黄帝和炎帝始终被尊为华夏民族共同的祖先,故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但长期以来,黄帝的历史渊源至今没有准确定论。当年司马迁著《史记》,以《五帝本纪》为首篇,记载了远古传说中相继为帝的五个部落首领的事迹,确立了历史发展的根基。文章最后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这段话的意思说,学者们很多人都称述五帝,五帝的年代已经很久远了。《尚书》只记载着尧以来的史实;而各家叙说黄帝,文字粗疏而不典范,士大夫们也很难说得清楚。

所以,几千年来,关于炎帝和黄帝的研究和探索一直在延续,也一直没有定论。多年来,笔者因工作之故,得以结缘早期楚文化,进而触摸到史前文化。初步认为,黄帝在荆山有史料记载,有线索潜在。特此撰文,以求教于方家,欢迎展开讨论。

从历史文化线索看,可信程度较高

资料表明,很多古人、名人出身、活动在荆山。如《史记·封禅纪》:“黄帝采首山铜,荆山下铸成鼎。”《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子革答楚灵王问:“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筮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据考证,“荆山”地名源自《尚书·禹贡》,《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之一,《禹贡》是其中重要的一篇,它记载了大禹时期的事情。《禹贡》800多个字中曾有四次提到荆山,说明大禹时期的荆山已被列为名山。

新世纪以来,国家着眼文化建设,发展旅游经济,“荆山作为楚国源头”的历史人文价值倍增。一时间,全国多处荆山介入纷争,交锋激烈。2009年9月,来自全国各地的120名专家学者汇集保康,经过认真考察和深入研讨,专家认为,荆山和沮水是早期楚国地望的标志性参考点,由此论证:湖北省保康县重阳就是楚国的发源地。保康地处荆山内之,境内沮水蜿蜒流长,这片土地既然是楚国的发源地,在此之前也必然是人类的渊薮地。由此向前推溯,就可能抵达五帝时代。

马良镇汪青祥自幼酷爱地理文化,并在前清遗老的指导下,潜心研读相关史书,惊奇发现荆山腹地尤其保康境内众多的山川、河流地名与《史记》《山海经》等古籍资料记载的三皇五帝活动背景相吻合。钻研愈深,意志愈坚,汪青祥干脆辞去工作,在回乡经商中积极作文化调查。二十多年来,他坚持自费研究保康历史文化,经常跋山涉水进行田野调查,栉风沐雨进行文化考察,对荆山史前文化进行了有益的研究和探索,也

得到了县领导和歇马、马良、两峪、店垭等乡镇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在他的感召下,县史志办退休干部杨选成也积极参与,先后整理、撰写和出版了大量的书籍和文史资料,引起了原湖北省政协主席、省荆楚文化研究会名誉主席王生铁同志的关注和重视。自2013年以来,王主席先后委派专家队伍三次深入荆山考察史前文化;2015年11月,王主席亲自率由省社科院楚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硕,省博物馆文物考古研究员、国家考古领队、省文博系列高级职称评委朱俊英等重量级人物组建的专家队伍,再次深入荆山实地考察。全程考察十余天,其中围绕保康县的城关、马良、两峪、店垭、歇马等地,重点勘察遗物、遗址和遗迹6天,会议研讨两天,初步认为:保康是早期楚国发源地,也是史前文化富集地。

从氏族部落渊源看,谱系脉络清晰

追寻中华上古文明,三皇五帝是最灿烂辉煌、也最亟待破译的密码。三皇,历来说法不一,百度百科中指:燧人(燧皇)、伏羲(羲皇)、神农(农皇);而荆山民间认为,三皇是天皇、地皇和人皇;其中,天皇是伏羲,亦称魁宝、金天氏、大皞等;地皇是黄沮,亦称少典、天宝君、元始天尊、天昊、天昊、水伯,即黄帝、炎帝先祖;人皇是女娲,亦称凤翔、大宝、金陈。至于五帝,主要有三种说法:一说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第二种说法指大皞(伏羲)、炎帝、黄帝、少皞(少昊)、颛顼;第三种说法指少昊(皞)、颛顼、高辛(帝喾)、尧、舜。

其实,三皇五帝并不是真正的帝王,仅仅是原始社会中后

期出现的为人类作出卓越贡献的部落首领或部落联盟首领，后人追尊他们为“皇”或“帝”。人民则把他们敬为神灵，以各种美丽的神话传说来宣扬他们的伟大业绩。但近现代考古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证明三皇五帝的历史时期确实存在。

据说，黄帝约生活在公元前 2717 年—公元前 2599 年，是少典与附宝之子，本姓公孙，后改姬姓，故称姬轩辕。居轩辕之丘，号轩辕氏，建都于有熊，亦称有熊氏。也有人称之为“帝鸿氏”。史载黄帝因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黄帝以统一华夏部落与征服东夷、九族而统一中华的伟绩载入史册。黄帝在位期间，播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始制衣冠、建舟车、制音律、创医学等。

研究认为，人类历史在荆山曾经主要存在盘古、定光（又称黄耄）两大氏族部落，其中伏羲氏西陵母是盘古部落的后人，炎帝和黄帝是定光等部落的后人。两部落共同并存，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部落间互相联姻。炎帝和黄帝两兄弟娶邠连氏和伏羲氏西陵母两异性姐妹为妻。到黄帝时，两部落深度融合，成为华夏先祖。黄帝之后，其儿子玄器（又称青阳、文殊）接位，该时代出现仓颉造字，开始萌现文明的曙光。很多史书记载，玄器在位时，因潜心造字而荒芜朝政，出现了“共工霸九州”的历史，引发炎帝（共八代炎帝，第一代为神农、伊耆氏、烈山氏、魁槐、石年、太子、太岁、东君、太上老君、常覆、武圣、关圣帝君、连山氏、鳌广、李老君、隗氏）后裔共工与玄器之侄颛顼争夺帝位，虽未果但导致共工失败被贬。其后，玄器后人白帝啻、尧帝等延续，白帝和尧帝是殷商、周朝等宗室王朝的先祖；而颛顼的后人有舜帝、大禹等延续，可以认为是奴隶社会的开始。舜帝、大

禹是后来楚、秦等诸侯王国的先祖。

由此可见,从氏族部落渊源看,“黄帝”在荆山谱系脉络清晰。

从典籍文献资料看,记载非常明确

《五帝本纪》载:“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意思说,黄帝被诸侯尊奉做天子,取代神农氏后,天下有不归属的,就前去征讨,平定之后再离开,一路上劈山开道,从来没在哪个地方安宁地居住过。在历史文化研究中,专家公认,楚人一直奉祝融为始祖,而祝融部族是炎黄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支部族可能随着炎黄联盟征伐而不断迁移。

当时,荆山地域乃至江汉流域生活着相当多的土著民族,如三苗、庸、巴、陆浑、百濮等。在当时条件下,征伐势必旷日持久,祝融部族作为炎黄联盟的主力军,可能被留下来收拾残局或巩固局势,就与当地土著民族相互融合,最终发展成为一支强盛的荆楚大族。所以,现在的湖北被称为荆楚大地,《诗·商颂·殷武》说:“维女荆楚,居国南乡。”这句话潜藏着两个信息:一是当时“荆楚”已经联称;二是也从时间上表明荆在前楚在后,或者说荆为主楚为次。直白地说,“荆”的历史早于“楚”,在当时的影响力也远远大于“楚”。

除了历史上的大事件外,关于“黄帝与荆山”、“黄帝与楚”的记载也零星散落在很多的典籍册页中。《史记·封禅纪》记:“黄帝采首山铜,荆山下铸成鼎。”这个记载表明了黄

帝在荆山铸鼎的事实。《钢鉴》引《周书·文选·张华答应昭》记：“盖楚，黄帝之作。”《帝王本纪》记载：“黄帝建楚祖。”同时，《说文》《钢鉴》《山海经》《论语》《诗经》《左传》《国语》《山海经》《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帝王世纪》《四书》《水经注》《黑暗传》《辞海》《地理志》以及部分比较实在的地方志等，均有“黄帝在荆山”的文字记载，在此不一一列举。

从地理遗址遗存看，值得深入考证

荆山森林茂密，植物果实丰富，气候变化温和，从地理和物质条件方面适宜古人类生存繁衍和发展。根据多方面掌握的情况，有关盘古、伏羲、女娲等神话故事和炎帝、黄帝、嫫祖、颛顼、帝喾、尧、舜、禹等三皇五帝以及周公、卞和、彭祖、鬼谷子、姜子牙等名人出生活动在荆山的神奇传说，为深入发掘史前文化提供了线索。

专家考察发现，仅保康范围内，祭祀三皇五帝等先辈名人的寺、庙、祠、庵、宫、所、堂、台、洞和墓、碑等各类文化遗存、遗迹星罗棋布，至今遗存有“神农（神农架、神农河、神农溪、神农村、神农观、炎城湾）”“夏禹河”“轩辕山”“轩辕丘”“黄龙观（黄帝称黄龙）”“子孙沟”“王子山”“猿翼沟”“西陵”“夷陵”等众多地名与史前文化关联性强，且有当地传说印证。汪青祥在马良重阳调查“古阳城”时听说，大约在1994年，当地村民余传敏在打柴时，无意中发现一鼎，现存放在襄阳市博物馆中。鼎重39斤，鼎纹是蟠虺纹。初步怀疑该鼎可能是周平王迁都时九鼎所丢掉的那一尊鼎，但有待进一步考证。

三皇五帝的传说,几千年来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心里,被当作贤君圣主的楷模历代传颂。“炎黄子孙”早已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亲切称呼,“人皆可以为尧舜”“六亿神州尽舜尧”,也早已成为鼓励和呼唤人们贤能为善的口碑。

综上所述,“黄帝在荆山”的说法存在合理性,历史脉络很清晰,且有说服力,史书也有记载可查、也有遗存遗址可证,建议从更高层面关注和着力,进一步深入探索求证。

论荆山嫫祖文化

章茨伍

内容摘要:提到远古文化,在中华儿女心目中,我们就是“炎黄”子孙。但在历史记载中,却少见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伟大“祖母”,她就是嫫祖。

嫫祖,中国远古时期人物,为西陵氏之女,轩辕黄帝元妃。《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嫫祖。嫫祖为黄帝正妃,生两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姜)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

关键词:嫫祖、祖母石、五色石、荆山、荆山玉

正文

一、古西陵国的来源

关于西陵国,《战国策·秦策》、《史记·楚世家》中均有记载:“顷襄王二十年,秦将白起拔楚西陵。”由此可见,西陵国就是春秋时期楚国的古西陵,即现在长江中游以北,神农架、宜昌、襄阳接壤部的荆山山脉。而后嫫祖随黄帝转战南

北,因其怀念故乡,在很多地方都留下了她和古西陵部落的痕迹,所以现在还有很多地方都有“西陵”地名和嫫祖的记载。受嫫祖伟大功绩的影响,古西陵部落一直延续到战国末期,秦灭楚国时,古西陵部落国才随之湮灭。古西陵的起源还需进一步考证,但其在长江中上游一带居住的时间最长、文化遗迹最多,也是古西陵部落最繁荣的阶段,据考古发现当时这一带的石文化和陶文化都非常发达,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层。

二、嫫祖的功绩

嫫祖居荆山深处,她研究利用大自然资源,结合上古文化记载,发明了养蚕织布、烹煮调制,从而改变了人类的饮食起居,逐渐远离了茹毛饮血、衣不蔽体的蛮荒时代。

唐代著名韬略家、大诗人李白的老师赵蕤所题《嫫祖圣地》碑文称:“嫫祖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谏诤黄帝,旨定农桑,法制衣裳,兴嫁娶,尚礼仪,架宫室,奠国基,统一中原,弼政之功,歿世不忘。是以尊为先蚕。”

可见嫫祖的功绩绝不仅限于种桑养蚕,其最重要的功绩是利用自然科学转化、促进人类进步的同时,促成了西陵氏与黄帝联盟,并辅佐黄帝登基称帝,充分利用她的善良和贤德,将黄帝和炎帝联合在一起,统一中原各部落,共同灭掉蚩尤,建立了稳定的大统天下。从此就有了“许亲结盟取和”的来历。

嫫祖和黄帝共生有两个儿子,她分别让他们在姜水和若水接受艰苦环境的磨练。至于青阳的儿子颛顼,嫫祖早就看出他能担当重任,便建议黄帝选择他为继承人。所以说嫫祖是一个识大体的贤妻圣母,后来就有了“贤妻良母”之说。

“家有贤妻田万顷,国有良相天下安。”同时嫫祖提倡婚

姻,让民众开始有人伦观念,她还兴起了八拜成婚,是婚姻文明的首创者。并制定了团结友爱、知书达礼、诚信智慧的育人家规,父传母授,而后延伸发展,就有了“家规国法”。

嫫祖又发现了色彩辨认及应用,从此就有了“察言观色”的说法。她还结合上古文化研究应用大自然形成的五色石,后也称“祖母石”,因这种石头产在荆山,春秋时期又称之为荆山玉。用五色制成皇袍来顺应自然,暗合天理,分五色:青、赤、黄、黑、白,五行:金、木、水、火、土,五福:福、禄、寿、喜、财,五方:东、南、西、北、中。黄色象征着五行的中央土,五行相生相克,却都离不开土的融合。祖母用她的智慧,推行这一天理来育人治国,将五色分五行、五方、五脏、五福、五帝。其分别解释为:赤属火代表福,青属木代表禄,黄属土代表寿,白属金代表喜,黑属水代表财。这也是远古文化的传承,并由此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框架。

用这一自然色彩规律应用到人们的生产生活、等级划分以及规范人的行为准则。“五色”在嫫祖身上体现了五种重要的人生价值:善良、智慧、包容、孝道、育人。并以此作为育人治国的方略,从而将人类的文明发展史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说华夏文化的根脉从此由石器文化演进为石玉文化,由石玉文化演变成色彩文化、美德文化,而后衍生出更多的文化。为什么后来和氏璧成为了天下至宝呢?其来源就是这个文化!嫫祖以五色为美,以美生德,以德分仁、义、礼、智、信,后来就有了玉德文化等诸多道德行为准则。这也是“金玉良言”之说的来历。

三、祖母石的来历

在荆山古西陵部落嫫祖种桑养蚕的地方,有一种神奇的黑色石头,像蚕丝环绕的球团一样,里面包裹着幼蚕形状的白色角砾,用它制作容器长期盛水而不变质。人们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祖母,就把它命名为“祖母石”,后来扩展到玉石界,常将最美的石头颜色誉为“祖母色”,就是这个道理。这种石头在很多考古遗迹中都有发现,如古石玉编钟、河姆渡部分文物以及近年在沮水一带发现的屈家岭文化遗迹中的玉钺都是这种石头,用器物敲打会发出金属一样的清脆声音。以此论断,出现这种石头的地方应该就是古西陵部落所在地。

结 论

我们要对这远古时期的三位伟人合理评价。炎帝利用大自然天气变化、季节划分结合人的生活需要,农耕、制药,是一位综合性的发明首领。黄帝兴兵修德、治理国家、一统万民,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军事首领。这两个首领联合建立了国,结束了当时连绵不断的战乱,为华夏人民和平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嫫祖的贡献更加不容忽视,她用她的智慧和美德,让人们有了审美观、等级制和为人做事的道德准则,并遵循这一道德准则建立了所谓的“家”。所以说国家的来历与这位“祖母”的奉献是分不开的。

“嫫”字就是为嫫祖特创的文字,取意为积累了各方面丰富经验的伟大古代女性。为了纪念嫫祖为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后人塑造了王母娘娘等诸多神话故事形象,来传颂这位圣

母的功德。

在中国古代,通过女娲炼五色石补苍天和其它诸多史书记载,以及多位专家研究推测,中国的石玉文化,发源于古西陵部落,从女娲到有娇氏,再到嫫祖,都是利用美石文化来提炼规范人类美德文化的根源。从美石到美德,象征着对美好的生活的向往。

所以对中国远古文化的定位,其中奉献最大的应该有嫫祖,她是华夏文明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是我们先祖女性中的杰出代表,母仪天下,福祉万民,和炎黄二帝开辟鸿荒,告别蛮夷,功高日月,德被华夏,与炎帝、黄帝同为人文始祖。

注:

《史记·五帝本纪》,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创作的一篇文章,记载的是远古传说中被后人尊为帝王的五个部落联盟首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事迹,同时也记录了当时部落之间频繁战争,以及部落联盟首领实行禅让制,远古初民战猛兽、治洪水、开良田、种嘉谷、观测天文、推算历法、谱制音乐舞蹈等多方面的情况。

《战国策·秦策》,是一部国别体史学著作。书中记载了西周、东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各国之事。记事年代起于战国初年,止于秦灭六国,约有240年的历史。《战国策》分为12策,33卷,共497篇。该书亦展示了东周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

黄帝发祥于荆山的探讨

杨选成

黄帝的发祥地问题在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有河南新郑说、山东曲阜说、陕西黄陵说、甘肃天水说以及山西晋南说等。位于鄂西北荆山的保康县,在近几年荆楚史研究中发现了许多关于“三皇五帝”的线索,与有关典籍的记载相吻合,可为探讨黄帝发祥地的问题提供新观点。

荆山,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江汉西岸、武当山东南,在学术界被称为“南条荆山”。荆山呈西北—东南走向。西北始于保康县马桥镇的茅山,东南部止于荆门、当阳一线。平均海拔一般为800~1200米,最高点海拔2000米以上,主峰望佛山1946米。长江支流沮漳河源于山南,江汉支流蛮河源于山北。《辞海》注曰:“荆山,……西周时楚立国于此一带,有抱玉岩。相传春秋楚国卞和得玉于此”。荆山不仅是楚国的立国之地,而且是古人类的重要发祥地之一。通过众多的古代遗址、地名、文物可以证实这里史前文化非常丰富,是华夏先民早期活动的地方,省有关专家已将荆山定为史前文化重要富集地。而且从新石器以来,文化层没有断代。特别是史前关于伏羲、女娲、黄帝、嫫祖、炎帝、蚩尤等人的传说和线索,为

研究荆山古文化、汉水文化、甚至是长江流域的文化,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黄帝是五帝之首,《史记》《帝王世纪》《山海经》等典籍均有记载;但关于黄帝的生平和活动范围问题,因典籍上记载模糊,多年来一直困惑着学术界。保康遗存有许多古地名和民间传说,能补充、佐证典籍的记载,从而为解决黄帝的有关问题提供有价值的线索。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

从黄帝的血缘关系上认定都在荆山生活

一般来讲,血缘关系是最过硬、最稳定的社会关系,探讨黄帝的踪迹,必须从血缘关系上搞清楚其来龙去脉。

黄帝的始祖是黄耄,叫定光,也叫元阳铁师。《四库·异人》载:“河图玉板云:龙伯国人长三十丈,生万八千岁而死。”定光古称龙人、龙伯,后人称其为“鸡冠大王”。居基隆山,就是今荆山中部的聚龙山。单从这个“元阳”二字来讲就很不简单,“元”字可当“人头”“为首的”“开始”“本来”“大”“玄”字讲;“阳”字为“阴”的对立面。就地形来讲,山南水北为阳;就时辰来讲,白天为阳;就人世间来讲,人活着的时候指在阳间,泛指大千世界。如果将“元阳”二字组合成词,可以理解为阳间(人间)的起始,头领。从“耄”字来讲,是指年龄很大之意,这里喻为非常古老。

我县整理出版的《黑暗洪荒传》歌本有:“玄元坐在莲台上,观看左边一阳山;名为青护山一座,顶上放道白气光;由如青烟飘渺起,冲向虚无缭绕缠。又见右边山一座,名为昆仑一

阳山；山尖放出一赤气，赤气中间见红黄。一如香烟荡荡起，旋转缭绕冲虚空。只见白气并赤气，白赤二气冲空中。悠悠慢慢两相就，两气相就缔一团。随风飘落玄黄山，顿时化作一个人。”根据上述内容分析，与荆山地区流传的盘古开天地、人类起源的故事相吻合。《千字文》上的“玄黄”二字来源于此，客观上宣示此地就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

黄帝的远祖是黄耆(祈)，也就是鸿钧老祖。《辞海》(缩印本)对“洪(鸿)钧”二字的注释为：“指天。《文选·张华答应劭诗》：‘洪钧陶万类，大块稟群生。’李善注：洪钧，大钧，谓天也；大块，谓地也。”《黑暗洪荒传》对“鸿钧”的注释为：“即弘钧老祖，是与玄元同时期的、由白妃所生的兄妹三人之一，其中弘儒和弘皓为男(兄)，弘钧为女(妹)；后白妃嫁给定光，弘钧拜定光为师修道……”“耆”字也指年岁大之意。

《黑暗洪荒传》唱词也有：“……一番洪水泡了天，鸿钧老祖把身现；二番黑水泡了天，昊天圣母走灵山；三番清水泡了天，末叶仙师他先占。”又：“……三番洪水三分天，鸿钧她才把身现。鸿钧来到蓬莱山，只见洪水又泛滥；鸿钧驻足仔细看，还是黑龙五个干；抱着葫芦闹翻滚，倒出黑水浪滔天。鸿钧忙把五龙喊，畜牲胆敢发黑难；黑龙五个闻声看，才知鸿钧到阵前；黑龙一见鸿钧到，赫得魂魄四处散；兄弟五个赫破胆，丢下葫芦忙逃窜。鸿钧叫声哪里去，还不弃命赴黄泉；鸿钧斩了五龙怪，从此天庭才平安。”从这段唱词可以看出，是天地间的剧烈变化，诞生了鸿钧老祖，但是遇上了洪水泡天，五龙闹水，鸿钧老祖斩五龙，平息水患，才迎来万物萌生，三皇出世，治理乾坤。此段中的几个地名都在今两峪乡朝元山，“大

块”即两峪乡中学处，地名仍在；“蓬莱山”即朝元山，古时山门上写明“蓬莱仙山”；“灵山”即是神灵之山，朝元山本来就诸神云集之山。荆山有9灵，朝元山为其一。

黄帝的近祖是黄沮，也叫元始天尊。探讨认为，黄沮其名应以“黄”为姓，意为崇尚黄土；“沮”为居住地，即古沮水，就是今聚流河。有一种说法，黄沮同伏羲、女娲被并称三皇，伏羲为天皇，黄沮为地皇，女娲为人皇。

鸿钧老祖是白民氏部落的人，生黄沮，黄沮随母姓氏，称白民，证明此时属母系社会。《辞海》（缩印本）介绍黄沮为：“全称为玉清元始天尊。亦称天宝君，虚皇。道教最尊的天神，为三清尊神之首。谓生于太元之先，故称‘元始’。居天界最高的‘玉清’仙境。始见于晋葛洪《枕中书》，后道书多称他比道教始祖老子更尊。道书说他‘常存不灭’，每到天地初开，便以秘道授诸天仙，以‘开劫度人’。与灵宝天尊、道德天尊并为三清教主。道教宫观多有供奉，塑像手持‘宝珠’，象征混沌未分之洪元世纪。”

黄帝的父亲为少典、母亲称附宝，也是白民氏国的人。《帝王世纪》曰：“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宝，其先即炎帝。母家有蟠氏女，世与少典氏婚，故《国语》兼称焉。及神农氏之末，少典氏又取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附宝，孕二十五月，生黄帝于寿丘。”《黑暗洪荒传》唱词有：“轩辕之父有熊氏，母亲附宝老夫人；附宝夫人荒郊游，游山玩水观风景。只到傍晚回府院，沐浴洗漱解乏困；回到寝宫更衣睡，随得一梦好吃惊。只见虹霓现天庭，绕着北门不留停，倾刻之间降地上，紧紧缠着附宝身。附宝此刻动春

心,心慌身软面红润。从此自觉身有孕,怀孕二十四月零,两年之后才临盆,生下轩辕一奇人。”《山海经·大荒东经》载:“有白民之国。帝俊(少典)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有大泽之长山,有白氏之国。”以上记载证实,从两峪朝元山、白果园到长埡、再到鹫峰都是白民之国的地界,是黄耆、黄沮的居住地。“大泽”指重阳湖泊;“长山”指今两峪乡长岭;“白氏之国”指氏族部落,神农和黄帝之母皆此部落人。

黄帝的儿子玄器。是黄帝的直系亲属。《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嫫祖。嫫祖为黄帝正妃,生两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器,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而《帝王世纪》记载:“女节梦接意感,生少昊,是为玄器。降居江水,有圣德,邑于邛桑,以登帝位,都曲阜。”《辞海》(缩印本)对“玄器”的注释为:“传说中黄帝之子。黄帝正妃嫫祖所生,一名青阳,居于江水。一说为黄帝次妃方雷氏所生,与青阳非一人。”

《山海经·大海东经》有:“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于此,弃其琴瑟。有甘山者,有甘水出焉,生甘渊。”此段地名注释为:“东海”在今重阳以东的区域;“大壑”即峡谷河大峡谷;“甘水”即鹫峰的滴水;“甘渊”即羲和浴日处,在今两峪乡的东汉河。郝懿行说:“白帝少昊其神居长留山”。“长留山”就在今两峪乡的白庙、长埡、芭桃一带。

典籍上讲玄器居于江水,探讨认为,此是指沮江,即今沮水。因《汉语大字典》对“江”字的注释除了特指长江以外,还

泛指大河流的通称。孔颖达疏：“江以南，水无大小，俗人皆呼为江。”如《尚书·禹贡》有“九江孔殷”，实际上指的是九条河流。因为沮水是黄帝部落居住之地，称其为“沮江”不足为奇。

黄帝的孙子颛顼。颛顼在五帝中排名第2位，是一位影响深远的帝王，在荆山的线索也很多：1.《史记》记载：“……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又：“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知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2.《中华上下五千年》所记：颛顼“为人聪明，懂得许多事情，有智谋，善于利用鬼神迷信来管制部族成员，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3.《辞海》对“颛顼”条的注释为：“传说中古代部族首领。号高阳氏，生于若水，居于帝丘。”4. 在河南新蔡出土的楚简甲三11号、24号简记：“昔我先自颛顼，宅兹沮漳，以徙迁处；”甲三268号简记有“及江汉沮漳，遂至于淮；”乙四9号简记有“渚沮漳，及江，上逾取。”5.《线装经典·夏商周》上说，“颛顼号高阳氏，他文武双全，有着非凡的经历、超人的力量，以及至高无上的权力，是一位泽被宇内、功德盖世的帝王。”6.《山海经》所记，颛顼死后葬于附禺山。这个附禺也就是濮阳，在今马良镇境内，距黄帝活动的中心重阳仅15公里。7. 在保康流传的《黑暗传》的唱词中有：“提起颛顼也有名，他是轩辕后代根，他是昌意所亲生，母亲昌意女佳人，夜得奇梦祥瑞生，不觉腹中有了孕，生下颛顼一帝君。孙接祖业把位登，国号高阳氏，封为水德君，七十八年把位登，葬于濮阳一座城。”

根据上述线索综合分析，黄帝的祖先黄沮、父亲少典、儿

子玄器、孙子颞顼的出生地和活动地，都在荆山中的今两峪乡和马良镇一带，这是没有疑问的。

从黄帝的社会关系上确定都在荆山活动

西陵母。西陵母是黄帝的正妃，与黄帝的关系十分密切。“西陵”这个名词包含非常厚重的文化根基及理念，是解释“玄元”及“三皇五帝”文化非常重要的线索和依据。相传西陵母是伏羲氏和女娲之后裔，出身于昆仑世族。其实，宜昌的“西陵”蕴藏着极其深厚的、鲜为人知的文化背景，此地就是远古时期的西陵之国，仅从伏羲、女娲和昆仑氏族这几个名词就令人震撼。《水经注》所记：“西域的昆仑是山名，南海的昆仑是国名。”首次提出了昆仑国在南海，并且与西陵氏国相联系。古西陵国和夷陵氏族都属“南海”范围。最早的“昆仑山”指西灵（陵）山，其地点在今保康县重阳村的陈家山和万寿一带。灵山即神灵之山，相传今重阳还是一片雷泽的时候，伏羲和女娲便在这座山上修仙。因此，后人在山顶上建碧云宫纪念，就是个证据。

再从字义上分析，夷陵的“夷”为冯夷，是从熊耳山（今龙坪镇冯家岭一带）迁去的一支部落，成为南蛮部落，蛮夷由此而来；“陵”为高丘，就地形来讲，属丘陵地带；但也陵墓的含义。《汉语大字典》关于“夷陵”的第一注释为“楚先王墓名”，已经客观上证实此一带为楚国发祥地。从“汉置夷陵县，三国吴改曰西陵，晋复改为夷陵，故城在今湖北宜昌县东”的记载来看，行政区划名这样改来改去，肯定为上述两种

因素的结果。

因为古西陵国的祖先可追溯到伏羲和女娲,是这一带最早的氏族部落。后来,西陵女又是这个部落最杰出的代表,这样造就了一桩伟大的婚姻。《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嫫祖。嫫祖为皇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此处记载了黄帝和西陵女的婚姻情况。

这里的“西陵女”是指西陵古国的女子。《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关于“西陵”条的解释是:“古国名,《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嫫祖。’”湖北宜昌(地区)地属远古西陵国土,是西陵部落的中心区域,也是“西陵之女”嫫祖的故乡。今湖北远安县、宜昌西陵峡口风景区的西陵山上、仙人溪畔的嫫祖洞里,以及黄牛岩上的轩辕洞和玄器洞中,处处留有嫫祖的遗迹。

古西陵国的地界已深入到今保康县境内,今远安县嫫祖镇、宜昌市夷陵区与保康县店垭、马良镇地界相连。黄帝部落虽居住两峪(乡),但触角已经伸到了古泗水(重阳到马良街段),与西陵氏隔河相处。此时西陵女为西陵国的首领,黄帝为轩辕国的部落首领,久而久之两个氏族部落必然产生通婚,黄帝入赘来到西陵国,和聪明、美丽、擅栽桑养蚕的西陵女结为夫妻,应是合情合理之事。

到黄帝后期已经统一了荆山和雒(西)山区域,安排昌意到“若(同弱,代表太阳落山之意)水”,主管西山区域,延伸到今长江三峡,所以这一带属西陵国的范围,古时也称其为“西域”。在今兴山县有“高阳”的地名,就是颛顼的封地。

按照典籍所记,第一西陵峡应在今南漳县峡口镇至今重

阳(乡)这一段,途经丸山,穿白云、通城河(古称通阳河),全长约20公里。《水经注》曰:“江水(沮江)又东经西陵峡,山水纡曲,两岸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见明,绝壁或千许丈,林木高茂,猿鸣至清,山谷传声,泠泠不绝。所谓三峡,此其一也。”《荆州纪》曰:“自夷陵(今重阳潮水桓都)沂江二十里入峡口,名为西陵峡,长20里。”“……故城在今湖北宜昌县东”,关键是“县东”二字把方位定死了。而从葛州坝水利枢纽以上的西陵峡属于县西,只好屈就第二西陵峡。

炎帝。炎帝与黄帝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才炎黄并称。按《帝王世纪》的记载,神农下传八代才是炎帝榆罔,但目前大部分学者都认同神农与炎帝是一个人。

《帝王世纪》所记:“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如人。《册封元龟》又作任已。有娇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农首感,女登于尚(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氏焉。”又:“神农氏本起于厉山,或时称之。”《三皇记》注曰:“郑玄云:‘厉山,神农所起,亦曰有烈氏。’皇甫谧曰:厉山,今随之厉乡也。”

在保康流传的、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黑暗传》用了1000多字来叙述神农,这里仅择其两段:“神农之母娇氏女,封号安登老夫人。名媒正娶嫁少典,伏羲时代称贤能。一日安登游华阳,观看沿路好风光。正在欢悦惬意时,一条神龙从天降……”;“神农出生厉山上,厉山就在姜水旁。又将水名取妫姓,才有神农本姓姜。神农出生兆吉祥,九泉同时涌出水。九井相通水汪汪,真是吉祥从天降。生下三天能说话,五天走路不晃荡。七天牙齿全长齐,身高八尺七寸

长。三岁便知耕耘事,后有五谷传四方。”

除以上的叙述外,还有多种典籍涉及到神农的出生地和活动地,为分析提供了依据,列举如下:一是《通志·氏族略三》记:“姜,姓也;炎帝生于姜水,因以为姓。”姜水在今马良镇境内。二是《周易》(卦十七)“随:元亨、利贞、无咎。”意思是:元亨乃元始之后;利为船利,汉船托宝处,贞为瀛女;无咎乃陶咎、陶邑、厉山处,三处合一为荆随。三是《周易·象》曰:“泽有雷,随。”意思是大泽中有雷神,随山在雷泽旁。四是《尔雅·释水》记:“繇带以上为厉。”意思是舜臣皋陶居地以上为厉山。五是《水经注》曰:“厉山,妫汭二水出焉,南曰妫水,北曰汭水。”根据地图分析,妫汭二水既今马良镇峡谷河上游;厉山位于今马良镇东风头村。六是《说文·女部》:“妫,虞舜居妫汭,因以为氏。”《书·尧典》所记:“降二女子于妫汭。”此二女为尧的两个女儿娥皇与女英。在重阳,历来就有“大舜厉山葬父母”之说。当地的文化老人杨德斋也曾对当地历史研究者汪青祥说过:“峡谷河古称姜水,尔后才称妫水。”大舜就是妫水河畔人。由此推论,神农所住的厉山与大舜所住的历山是一个地方。七是《中华开源大圣》(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上讲:神农所采到的第一位药是姜,后人便把采药那条河叫姜水。八是杨采华在《汉水流域文明曙光显现及古国分布》一文中在介绍卢戎国中讲:“妫姓之国,西周之初已存在;卢戎地在今南漳西,漳水西头。”所言方位正在今两峪、重阳这一带。九是通过神农夫人听訖来证实,前面已叙述。十是羌族是姜族的分支。《后汉书·西羌传》曰:“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正因为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为邻,才具备炎黄部落的战争和最终实现部落联

合的基本条件。

蚩尤。《汉语大字典》(缩印本)对“蚩”字的注释为无知、丑陋、欺侮、悖乱,姓氏,并没有提到蚩尤这个人。而《辞海》(缩印本)对“蚩尤”的注释为:“传说中远古作难之人和制造兵器之人,又传为主兵之神。一说为东方九黎族首领。有兄弟八十一人,相传以金作兵器,并能唤云呼雨。后与黄帝战于涿鹿,失败被杀。”《史记》中讲:“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中华上下五千年》几乎用了1000字来介绍黄帝战蚩尤,情节与《史记》大同小异。《线装精典·夏商周》也讲述了黄帝和蚩尤恶战于涿鹿的故事,而且还提炼出5个观点:其一为蚩尤氏族坚强有力,骁勇善战;其二为武器先进;其三为炎黄部落劳师远征,不适应作战地环境;其四为黄帝毕竟足智多谋,逐步掌握了作战规律;其五是蚩尤兵败被,部落被瓦解。民国年间著名的历史学家吕思勉所著《中国通史》,也提到了黄帝和蚩尤的战争,他所提出的新观点值得注意。“近来的人说,蚩尤是三苗的酋长;三苗,就是现在所指的苗族;他们占据中国本部,在汉族之先,后来给汉族驱除掉的。黄帝和蚩尤的战争,就是其中的一事。这句话不很精细,三苗是古代的一个国名,不是种族之名;他的民族,却唤作黎;黎族的君主,起初是蚩尤,后来才是三苗。”“……这一族人和汉族竞争,从黄帝时代起,直到尧舜时代止,不可谓不久,然而曾到过黄河流域与否,毫无证据”。

而保康关于蚩尤的传说很具体。相传蚩尤是伏羲和女娲的儿子,出生在泰华山,也就是今歇马镇望佛山。因其长相丑

陋、凶恶，伏羲怕他危害人类，于是就把他封在望佛山黑龙洞。女媧思儿心切，让人偷偷把他放了出来，果不出所料，一放出来就放荡起来，收拾不住。《龙华经》唱出了这个缘由：“谁想儿女贪恋酒色财气不肯回头，又贪恩爱无有了休，沉落苦海永转轮回，痛哉，哀哉。”又：“为娘终日悬望，儿女不得回家，无奈差上太上老君，化生三皇之时，设立青阳大会，度回二亿元灵归西。”沮水皮影戏《探朝》开场白中，就有“雾气带来老祖根，浪荡子出世是妖精，女媧炼石把天补，他在华滩把天吞”的台词。“浪荡子”就是蚩尤，充分反应了蚩尤的凶恶本性。无奈之下，女媧便请神农出面制服蚩尤，神农起初想用教化的办法，可蚩尤根本不吃那一套；神农（李老君）看到蚩尤不堪教化，只好对蚩尤进行讨伐。经过几番交锋，蚩尤终不是对手而被降服，称臣纳贡，当地老百姓总算过了一段时间的太平日子。不料蚩尤部落在烧炭中发现了铜液，遂制成兵器，训练兵丁，又吞并了周围的小部落，形成了一股势力，对炎黄部落产生了严重威胁，引发了战争。

岐伯。《帝王世纪》曰：黄帝“又使岐伯尝百草，医典疗疾。今《经方》《本草》之书咸出焉。”又：“黄帝有熊氏命雷公、岐伯论经脉，旁通问难八十一，为《难经》。”《通志·氏族略二》：“古有岐伯，为黄帝师。”岐伯，传说中的古代医家。见《内经》。此书托名他与黄帝讨论医学，以问答形式写成。后世称中医学为岐黄之书，即源于此。

岐伯为岐山之伯，和黄帝同时代，很可能与黄沮同辈，因而称岐伯；有可能为黄帝臣，黄帝命他著经书；也有可能是黄帝氏族的另一支部落酋长，因为住地相邻，所以经常同黄帝在一起

讨论中医理论,通常为一问一答的形式,所以为黄帝之师。

岐山的记载在典籍上常常见到,如《书·禹贡》:“导岷于岐,至于荆山。”“治梁及岐。”“荆岐既旅。”孔传:三山皆在雍州。《通志·氏族略二》:岐氏,周故都也,今凤翔岐山是也。太王居之,至文王始迁于丰,其支庶留岐,故为岐氏。其实,大禹时期的雍州在荆山中的今歇马镇一带,而秦汉时的雍州才在今陕西和川北,时间差达上千年。岐山的来历为黄帝的后裔、周族的始祖后稷,因生下来是个怪胎,扔了几次没扔成,所以叫“弃”。起初造字较少,同音字通用,后来才造出“岐”字,字义才分开。最早的岐山为后稷居地,在今两峪乡程岐村,在黄帝母亲白民氏国的区域里。

灵山十巫老。灵山十巫老与黄帝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一是灵山即是女娲和西陵母的住地,又是黄帝祖先的修仙之地,与黄帝的居地为邻;二是黄帝战蚩尤初战失利,正在一筹莫展时,遇灵山十巫老教黄帝用十阵法打败蚩尤部落;三是颛顼为帝时,贰负杀窳窳,窳窳被灵山六巫老所救活,说明十巫老为我国医学界的鼻祖。同时也是我国巫术之祖。

从黄帝的活动范围来看都没有超出荆山

黄帝出生地。黄帝出生于姬水,许多典籍都有此记载。《帝王世纪》:“黄帝,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宝……长于姬水,有圣德……”《汉语大字典》(缩印本)对“姬”字的注释为:“姓。相传为黄帝姓。周人之祖后稷亦为姬姓。《说文·女部》:‘姬,黄帝住姬水,以为姓。’朱骏声通训定声按:‘轩猿

子二十五人，惟青阳与仓林氏得姓姬。’”可见黄帝的出生地在姬水。

相传黄帝的母亲在姬水边遇虹霓附身怀上黄帝，又因为黄帝住姬水而姓姬。但古“姬水”这个河名到底在哪里？却很少有人能说清楚。查《辞海》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竟没有姬水的名词解释。从网络查知，得到的信息很简略：一说为陕西省武功县漆水河；一说为陕西省黄陵县沮河；两条河均属渭河的支流等。且不说姬水至今没有定论，就是将上述两地任选一地视为古姬水，对照典籍仍然有许多解释不通和不合逻辑的现象。比如说黄帝出生在陕西，而跑到湖北宜昌讨正妃，又和炎帝大战于河北阪泉，和蚩尤大战于涿鹿地区。在原始社会，原始人有这么大的能量么？在通信靠嘴、交通靠腿的情况下，黄帝是如何得到上述信息的？在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情况下，如何组织上述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完全超出了原始人的行为能力，很难自圆其说。

再从典籍上寻找线索。《书·禹贡》有“雍、沮会同，雷夏既泽”的句子。《尔雅·释水》：“水自河出为灇，济为濳。”又曰：“济别为濳。”吕忱曰：“水决复为汜，广异名也。”《楚辞·天问》：有太阳“出自暘谷，次于蒙汜”的记载。

经考证，古姬水就是沮流河，也称济水或汜水，即今从两峪乡麻坪村到重阳的重岐峡河。其依据是：第一，以地形来讲，姬水发源于熊耳山，而黄帝氏族为有熊氏。“有熊氏”一姓的来源为黄沮出生在今麻坪的西岩洞，是沮水的发源地，此山至今称熊耳山。第二，姬水归于灇水，流入雷泽，符合《禹贡》记载。第三，“水决复为汜”这句话的意思是，汜水的来历为水溢出来后

又流回去。这是一个特定的自然现象,与今重岐峡河地理相吻合。两峪原为高山湖泊,水从土地垭经马槽石出西坪,会雍水入雷泽(重阳湖泊),然后顺今重岐峡河回流至两峪湖泊下。共工领导治水时,决开重岐峡口,导致地质灾害,形成了不周山,也使这一自然现象消失。第四,从“日出暘谷,次于蒙汜”来讲,是讲太阳出时的照射顺序,暘谷即今峡峪河,蒙汜就是重岐峡河。恰峡峪河位于重岐河的东方,太阳所出之处。“蒙汜”为水雾升腾、为重岐峡谷河流的特有景观。第五,今两峪朝元山是位于姬水旁地势高峻之山,是黄帝祖先活动之地,有西岩古洞遗址。第六,《通志·氏族略四》曰:“鸿氏,大鸿之后也,大鸿即黄帝,亦谓帝鸿氏。”为什么黄帝被称为“帝鸿”“大鸿”?分析认为这与黄帝的生长地姬水有关。《国语·晋语四》:“……黄帝以沮水成,炎帝于姜水成。”姬水其实就是今保康重溪峡河,古称沮流河。沮流河是姬流河的转音,即古沮水,发源于保康两峪乡麻坪。恰在今麻坪村上端有一个叫“大水”的地名,位于荆山主脉的聚龙山段。《汉语大字典》对“鸿”字的注解有“大”的意思;还与“洪”字通假。《史记·夏本纪》有“当尧之时,鸿水滔天”的句子,鸿水就是洪水、大水。正因为黄帝生长于“大水”地区,所以称为帝鸿、大鸿。第七,朝元山文化第一期为青阳文化。青阳是黄帝之子,起初在朝元山造字,则可以倒推出黄帝在这一带活动。

黄帝活动地。1. 都城。《帝王世纪》:“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又:“或言故有熊氏之墟,黄帝之所都也,郑氏徙居之……”探讨黄帝的都城,有四个地点:第一处为熊耳山。因为黄帝出生在这里,姬水发源于这里,黄帝的祖先一直

在这一带活动。第二处为今龙坪镇珠砂村的黄龙观。因为此处属黄帝祖母和母亲白民氏国的居地,距熊耳山比较近,此时尚处于母系社会,遗址尚存,黄帝在此建都的可能性较大。第三处在今重阳周公岭,称大熊山。黄帝和西陵女结合后,实现了两个部落的联盟,由于黄帝是入赘性质,所以迁至西陵国居住,但由于此时重阳为雷泽,水未退尽,只好居住在台地上,后人把这个地方叫“轩猿之丘”,建有黄帝城和蚕母娘娘宫,遗址尚存。至于“郑氏部落徙之”,那是在西周时,郑氏方国和吕氏方国在今紫阳村争斗,郑氏输,便搬至轩猿丘居住。周厉王时已迁回荆山,郑君发现周厉王是暴君,又举国迁往南襄,今远安阳坪,称“南郑”。黄帝曾在与周公岭为邻的陈家山居住过,所以有“都陈”之称。四是曲阜,也在大熊山之麓,为黄帝战蚩尤时,此处为西陵母为黄帝所修的行宫,也作为前线指挥部,后人在此建万寿寺,遗址尚存。

《十王经》所记:黄帝在没有称帝前曾叫“楚江大王”。所谓楚江,也叫沮江。以石夹土的山叫“硎”,因黄帝在沮水活动时间长,加上战胜炎帝部落后威信大增,和西陵母结合后,从今两峪搬到今陈家山。因此,《山海经》曰:“轩猿之国,在此邛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在女子国北。”此轩猿之国指轩猿洞,在邛山山腰处;“女子国”是指黄帝嫔妃们的住处。黄帝和西陵母所建的“楚都”也称“轩猿之丘”,在今重阳周公岭山腰处,遗址尚存。据《尚书》记载:黄帝建楚都,共有“五城十二楼”。经考证,“五城”即为“重阳五庵”(东、西、南、北、中),按五行方位设计;据传十二楼至元朝时仍在,后毁于战火。

《帝王世纪》记曰:“黄帝生于寿丘,在鲁城东门之北。居

轩猿之丘,于《山海经》云‘此地穷桑之际,西射之南’是也。”“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颛顼始都穷桑,徙商丘。穷桑在鲁北,或曰穷桑即曲阜也。又为大庭氏故国,又是商奄之地。”“黄帝都涿鹿,于《周官》幽州之域,在汉为上谷。而世本云‘涿鹿在彭城,今上谷有涿鹿,阪泉地又有黄帝祠,皆黄帝战蚩尤之处也。’”上述之地均在今重阳周围找到地名遗存或遗址,揣测为黄帝的临时住所。

2. 昆仑山。西陵母时代的昆仑山遗址在今保康重阳八宝山碧云宫。碧云宫是女娲创造人类时所居之地。《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有早期昆仑之地的记载:“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曰昆仑之丘。其下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经考证,“西海”即古西河;“流沙”即今马良西域河;“赤水”即今峡峪河上游的薛家河;“黑水”即峡峪河上游的范家河。“昆仑之丘”即今八宝山、峽山;“弱水”即今望家沟小河;“炎火山”即水田朱家湾沙漠炎山;“昆仑之丘”就是今陈家山,也是黄帝活动的区域,此记载与今八宝山的地理相符。碧云宫不知毁于何时,后人在山上建白云观,遗址尚存。

3. 崆峒山。因黄帝到达崆峒山,登上鸡头山。紫阳村朱家湾背后山里多空洞,原始人多住在山洞里,因而叫“崆峒山”。据说,当地朱、荀、鲁姓古为“崆峒氏”,其祖先就是“荀芒”,被封为“木神”。荀芒也叫“重”,是颛顼高阳的孙子,卷章的儿子,楚人的旁系祖先。也是最早到重阳开拓发展的祖师之一。黄帝在轩猿之丘居住时,与崆峒山隔河相望。恰崆峒山深处环境僻静,正是广成子论道处。两地相距只不过十

多里路,这对于黄帝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从这个历史记载可得出三个结论:一是最早的崆峒山的确在荆山之中。从历史传说来看,盘古和三皇都在荆山;从有记载的五帝历史来看,都在荆山之内活动,所以说崆峒山这个地名应是最古的。二是通过崆峒山来佐证黄帝的活动痕迹,其访问广成子就是一例。三是通过甘泉宫找到了伏羲和女娲的痕迹,找到了液石成婚故事的原始创作地。同时也找到颛顼为帝的痕迹,那就是对兄妹成婚的处罚,将他们关在崆峒山的山洞里,更加证明在重阳存在着崆峒山。

4. 鸡头山。因为《史记》记载黄帝登上过鸡头山,鸡头山也成为重要的地理坐标。鸡头山位于崆峒山上部,山腰处有甘泉宫。《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往东到达了海滨(东海),登过丸山(白云),并到过泰山(望佛山)。往西到达了崆峒,登上了鸡头山。《山海经·大荒西经》对鸡头山的记载是;“有合州之山,五采之鸟仰天(金鸡观),名曰鸣鸟,爰有百乐歌舞之风。”与《史记》相吻合。

在马良镇紫阳村境内,确有一个鸡头山山名。当地人只要站在崆峒山上,就能看见从长留山而来的一匹山梁,犹如一只雄鸡屹立在五汊河山谷中,形象逼真,惟妙惟肖,“鸡头山”由此而名。山上有甘泉宫遗址。此处的鸡头山有几个特征:一是与崆峒山为邻;二是鸡头山上有金鸡观古建筑;三是鸡头山之外就是华法寺,是蓐收时所建。蓐收是重的儿子,是我国最早制定法律的人,称法王;四是鸡头山距轩辕丘很近。

鸡头山与华夏民族的起源有密切关系。传说,盘古开天辟地以后,又遇到洪水泡天,伏羲和女娲兄妹两人因躲在宝葫

芦里活了下来，漂进了鸡头山。这时世上只剩下他们俩。据说，天帝安排伏羲负责渔猎畜牧生产，安排女娲负责造人。开始，女娲用泥巴做人，但经不住雨水浸泡，一受潮就散架。后来，受野兽繁殖的启示，但没有男人怎么造得出人呢？离开了伏羲还真不行，于是，伏羲就和女娲商量成亲。女娲开始不同意，伏羲换了一种方式，说：“我们两个人一个在东坡上，一个在西坡上，同时向下掀石头，若两个石头合在一起，说明我们有缘，就成亲，若合不到一起，我也不勉强你”。女娲无奈，只得答应了。两人在山上掀下的石头果然合在一起，二人就在山上的一个溶洞里成亲，后人取了一个十分优雅的名字，叫“甘泉宫”。这就是“合州之山”的来历。对于这样一处重要场所，黄帝到此瞻仰为情理之中。

活动边界。《史记》所记：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崆峒，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将这段话翻译为白话文是：黄帝往东到达了海滨，登过丸山，并到过泰山。向西到达了崆峒，登上了鸡头山。往南到达了长江，登上了熊山、湘山。往北驱逐过少数民族荤粥。和四方诸侯在釜山验合过符契圭瑞，然后把都邑建筑在涿鹿山下。

这段话的信息量很大，基本上把黄帝一生东南西北所到过的地方都点了出来，形成了一连串的地名。如果把上述地名都搞清楚，以地名来寻绎黄帝的行踪就会一目了然。

不过，理解上述这段话，要看把坐标放在什么地方。如果放在今西安没有大错，因为司马迁在今西安著《史记》，如果放在黄帝的活动中心重阳那就错了。例如，丸山在南而不在

东;崆峒、鸡头山在东北而不在西;熊山、湘山在北而不在南。我们分析,太史公没到过荆山腹地,不清楚上述地名的位置,他所考察的地方是从荆山带出去的地名。以崆峒山为例,太史公说他往西到崆峒,是以西安为坐标,是甘肃的崆峒山,若以黄帝的活动中心地重阳为坐标,崆峒山则在东北方向,而且相距的很近。正因为古人把地名带散带乱,到司马迁写《史记》时,他已没有能力把各个地名的来历都搞清楚,只好以西安为座标来判断,后来的史学家也以此为准则来注释,造成了很多误区。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炎、黄时期两个部落的边界在哪里?绝对不会在北京之西,凭什么跑到那里(阪泉)去打仗?起码不合乎逻辑。

1. 丸山:即盘古的生殖器睾丸,在远安洋坪一带,古时属西陵国的地盘。从重阳至远安县仅几十公里,对黄帝来说,不是件难事。2. 釜山:《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在直隶涿鹿县西北。《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合符釜山。”釜水:《淮南子·坠形训》:“釜出景。”高诱注:“景山在邯郸西南,釜水所出。”釜丘:“即陶丘。”古时釜、漳二水联用。此景山应为荆山中的景山,荆山中也有漳水。崆峒、鸡头山,前面已解释,不再重复。3. 文中的熊山即熊耳山,现名聚龙山,在保康县龙坪镇境内。《史记·夏本纪》曰:“熊耳、外方、桐柏至于负尾;导潘冢,至于荆山;”《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上列举了11座熊耳山,大都在今河南、四川省境内。相反,湖北保康的熊耳山却未被列上。熊耳山的来历为:首先是有熊氏部落在此居住,尔后是在此山上发现了天然木耳,改为熊耳山。过去做外贸生意的都知道,熊耳仅次于燕耳,居第二等。经考证,大禹治

水全部在荆山中,因而文中的熊山也是荆山中的熊山。黄帝部落为有熊氏,在熊山居住,姬水是黄帝的出生地,恰好位于熊山之下。再者,从血统上讲,颛顼为黄帝之孙,而大禹又为颛顼之孙,为黄帝的第5世孙。血缘关系这么近,又有准确的地名相照应,黄帝在荆山的论点又多了一条佐证。至于其它的熊耳山,分析为黄帝的后裔外迁时带出去的地名,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4. 湘山:即香炉山,属笔误。在今龙坪镇境内,两峪乡长河沟的发源处。《保康县地名志》(1984年版)记:“以山命名。山腰突出部位原有庙,庙内有一只石香炉,故名。解放初期庙被拆毁。”从地图上看,香炉山距聚龙山(熊耳山)仅10公里之遥,聚龙山海拔1852米,香炉山海拔1610米,都处于荆山主脉上,因而黄帝登湘山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5. 岱宗:《汉语大字典》(缩印本)对“岱”字的注释为:“《说文》:‘岱,太山也。’泰山的别称。也叫岱宗、岱岳。《尔雅·释山》:‘河东·岱。’郭朴注:‘岱宗,泰山。’《书·禹贡》:‘海岱惟青州。’《风俗通·山泽》:‘岱者,长也。万物之始,阴阳交代,云触(顶撞)石而出,庸寸而合,不崇朝而偏雨天下,惟其泰山乎,故为五岳之长’。”《淮南子·坠形训》:“中央之美者,有岱岳。”看了这段文字,对泰山的来历一目了然,故可以作出以下判断。一是最早的泰山在荆山,因为它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二是泰山的方位明了,在河东,也在东海。这里的“河”指沮河,“海”指荆山中的东海。三是地域关系明了,那就是属于禹分九州中的青州地界上。探讨考证,青州位于今保康县两峪乡和南漳县板桥镇境内。这里有著名的朝元山、蟠冢山、青龙寨、巨仙宫,是黄帝的祖先和神农活动之地。四

是从“中央之美者”这句话来分析，岱宗就是朝元山，因为朝元山四周有四岳拱卫，唯朝元山最美、最峻。

从以上探讨可以看出，仍然是以前的注释出了问题。第一，黄帝的活动范围就在荆山，根本不可能到河北的涿鹿去合符；荆山中也有涿鹿，黄帝战蚩尤于涿鹿，后有专段探讨此次战争。第二，荆山之中也有釜山与釜水。釜是一种饪食器，相当于现在的锅，有“釜底抽薪”的成语。釜水是形容水呈煮沸的状态，由于荆山喀斯特地貌多，所以泉眼也多，釜山和釜水都指在潘家山一带，这里正是黄帝祖先活动的区域。第三，《淮南子》曰：釜出景，荆山之首曰景山，即今望佛山，也有釜水状的泉眼。第四，《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上有“釜丘即陶丘之语”，陶丘即陶邑，是后来尧帝的封地，与南漳县潘家山为邻，也能证实最早的釜山在荆山。

通过对以上山名、部落名的探讨，基本上把黄帝的活动范围作了一次梳理，这个范围就是东边到了今南漳县板桥、东巩一带，南边到了今远安、当阳一带，西边到了今歇马欧店一带，北边到了今后坪、龙坪一带，大约 6000 多平方公里。因而更多了一些黄帝在荆山的证据。

从黄帝时代的贡献来寻找其住地线索

造居室、创养殖、垂衣裳。造居室就是建房子。《易·系辞》(下)曰：“上古穴居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过》”。“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这里的“上栋下宇”是指吊

脚楼；“杵”为打墙的工具；“臼”为舂米的器具。

黄帝之父在朝阳山建云城时，是用木头搭建的屋子。到黄帝时受到了启示，发明以土作墙的房屋，后人便把这种打墙的方法叫做“黄龙臧圣”，意为是黄帝的发明创造。从“断木为杵”四个字来分析，由于在黄帝时，铁器尚未发明，人们打墙所用的杵头是木头棒子，后受石臼舂米的启示，改为石质的，发明铁器后，才改用铁制的。巧合的是，2014年春，紫阳村在扩修渠道时，出土了一个石质的杵头，印证了这一说法。

创养殖就是发展养殖业。西陵母从小就有宽广的胸怀和远大志向，亲近爱民，不骄不介，有驾驭和管理天下之才能，被推举为西陵国国君。当时，人们已习惯将打来的野兽用火烤熟了吃，但由于保存不善，猎获了野兽，有时吃不完被烂掉了，非常可惜。为此西陵母开动了脑筋，就将捉来的小野猪关在山洞里喂养，取得了成功。为了改善百姓的生活，西陵母就号召家家户户养猪，形成制度，这就是《山海经》中所记的“司彘之国”的来历了。西陵母还在树巢里发现了鸟蛋，并把鸟蛋作为食物，又受到启发，号召大家养鸡、养鸭、养鹅。《山海经》也有记载：“西王母得凤鸟，吃凤卵”，讲的就是这个发明。

垂衣裳就是发明衣服。黄帝以前，人们不会制作衣服，用树皮、兽皮等物围在身上取暖护体。西陵母在一次煮蚕蛹中受到启示，养蚕取丝成功，创造了纺织业，人们从此穿上衣服。后来西陵母进一步开发了植物麻，用葛麻织出了布，叫葛布，使人们结束了披树皮、兽皮的历史。后人为了纪念她，在今重阳坪周公岭上修建了“蚕母娘娘宫”和“嫫祖庙”。

造文字、作书契。造文字即是发明文字符号。玄器为黄

帝的长子,号青阳;成年后,黄帝安排他同百神一起研究创造了文字,接受了仓颉良好的教育。开始造字将其刻画在石壁和石器、树皮、石片上,给社会文明和进步带来了很大的发展。从他开始有了记事,比如将祭天、祭祖、占卜、重大事件,用简单的文字符号记录下来,以防遗忘。到颛顼时代,已完全有记事和书写的 ability 了,历史完全有记载了。因为他创办了文字,后人才尊称他为文殊菩萨。他一生都在研究发展文化事业,为中华文明开启了新的一页。

在黄帝之前,人们受鸟叫、兽吼声音的启示,首先发明了语音,也就是说能讲简单的语音符号。于是玄器就发明了一、二、三、四、日、月、虎、豹、熊、罴等图案,这就是最早的图案文字。这种文字为什么叫“蟠虺(音悔)纹”呢?是因为以神农为首的君子国、黄帝为首的白民氏国的居住中心在蟠冢山一带,神农、黄帝的远祖母都是白氏部落,古居于长留山,也就是今两峪乡长垭至今南漳县板桥镇的蟠家山、延伸到今两峪乡将军山、苦山,这一带虺蛇多,文字以虺蛇图形为主,所以称蟠虺文。

玄器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化新时代,那就是《龙华经》中所提到的“青阳”文化时代。玄器创造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批文字,开启了人们认知事物的新方法,从此人们有了表达的新方式,使文化的记载和传播有了载体。为了传播文化,玄器先后设了两个讲坛:一是天坛,在今两峪乡的朝元山;二是地坛,在今重阳的文祖庙。用于扩大文字结构,创造更多的字。据重阳的老人们说,文祖时代,聚集了大批神人,住两坛从事制纹造字。因当时没有发明纸张,主要刻在石头、陶器、龟板上,所以荆山若留有文字符号,应是那时所为。

作书契即以文记事。除了造字以外,他还开始了理论研究工作。宣扬盘古、黄耄、黄耆、黄沮、伏羲、女娲、炎帝、黄帝、西王母等祖先的功绩,总结蚩尤等人之罪行,用佛、释、道的理论教育后人;以道法管理和惩治坏人,使佛学、释学、道法有了理论依据。

兴封禅、主祭祀。封禅和祭祀都为古代的重大礼仪。《史记·封禅书》曰:“……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史记》引公孙卿曰:“‘黄帝就青灵台,十二日烧,黄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后天子又朝诸侯甘泉,甘泉作诸侯邸”又:公玉带曰:“黄帝时虽封泰山,然风后、封臣、岐伯令黄帝封东泰山,禅凡山,合釜,然后不死焉。”

《汉语大字典》对“泰”字的注释有“极大”“极远”“大中之大”之意。《淮南子·原道》称:“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盘古被称为泰古,伏羲所居的山被称为泰华山,今望佛山。因为盘古开天地的故事起源于荆山,荆山有盘古身躯和内脏的地名照应,雷神是盘古的化身,和华胥女结合生伏羲和女娲,然后是伏羲和女娲成婚,繁殖人类。这个神话故事就是告诉人们,泰山之名最早起源于荆山,与人类始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所以历代君王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不过,荆山之中应还有一个泰山,这个泰山就是东泰山岱宗,即朝元山,这里是黄帝祖先的发祥地,所以黄帝必须到此山祭祀。前面已经指明,鸡头山甘泉宫为明庭之地,亦称亭亭山,到此祭祀是少不了的。不过,还有一处也引起注意,那就是八宝山碧云宫,也叫云云山,因为是女娲修仙处和西陵母的居地,也是祭祀时

少不了的去处。

那么,为什么现在山东的泰山十分出名,而荆山中的泰山却鲜为人知呢?分析是在西周初期的大分封中,周王朝中两个地位显赫的重臣,周公和姜太公的后人,被封到今山东、江苏一带建齐、鲁二国,后来又將仲雍之后的吴国也封那里去,才将泰山之名带过去;再后来,因祭祖不方便,才在东部建相应的寺庙,荆山的祖祭地受到冷落。

尝草木、论经脉、医疾病。《帝王世纪》曰:黄帝“又使岐伯尝百草,医典疗疾。今《经方》《本草》之书咸出焉。”又:“黄帝有熊氏命雷公、岐伯论经脉,旁通问难八十一,为《难经》。”《通志·氏族略二》:“古有岐伯,为黄帝师。”岐伯,传说中的古代医家。见《内经》。此书托名他与黄帝讨论医学,以问答形式写成。后世称中医学为岐黄之书,即源于此。

探寻分析,岐伯为岐山之伯,和黄帝同时代,很可能与黄沮同辈,因而称岐伯;有可能为黄帝臣,所以黄帝命他著经书;也有可能是黄帝氏族的另一支部落酋长,因为住地相邻,经常同黄帝在一起讨论中医理论,通常为一问一答的形式,所以为黄帝之师。

“岐山”的记载在典籍上常常见到,如《书·禹贡》:“导岍于岐,至于荆山。”“治梁及岐。”“荆岐既旅。”孔传:三山皆在雍州。《通志·氏族略二》:岐氏,周故都也,今凤翔岐山是也。太王居之,至文王始迁于丰,其支庶留岐,故为岐氏。根据典籍的记载分析,荆山之中有岐山,因为大禹治水全部在荆山之内;周族的始祖后稷在今两峪乡程岐山,周古公外迁后,至周文王又迁回来,建丰邑、洛邑,这一切都说明岐伯在荆山,

进而证实黄帝在荆山。

铸宝鼎、兴图腾。宝鼎和图腾都是象征性的器物。《史记·封禅书》曰：“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又曰：“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1996年台湾学者周光斗在《贺保康设置五百年》一文中说：“相传‘黄帝都有熊采首山之铜，铸三鼎于荆山之阳。’就是在这里。”证实黄帝时有铸鼎之举。并且提供了两个重要地名：首山和荆山之阳。经考证，首山来源于荆山之首，荆山之首有两处：一处为《禹贡》时的荆山之首，叫景山，即今望佛山为社首之山。另一处为《山海经》中的荆山之首，即在今马良镇崇家山。但作为产铜矿之首山，探寻认为应是指崇山，因距重阳仅几公里。荆山之阳很好理解，山南水北为阳，即荆山南麓。

铸鼎需要铜矿，1991年版《保康县志》记载：“境内还发现有铝、硅、铜、钨金等10余种矿藏线索，尚待进一步探明。”1984年版《保康县地名志》在《两峪公社地图》长河和庵埡大队区域里，标有“铜矿沟”地名，也说明此地产铜。恰以两峪、重阳为中心的区域正处于荆山中段南麓，黄帝在这里得鼎的可能性很大。

图腾是每个部落所崇拜的一种动物，作为本部落的精神象征。华夏民族崇拜的“龙”，是多种动物的综合体。关于龙的形成，这里引用《帝王世纪》中的一段话：“黄帝服斋于中宫，坐于玄扈。洛上乃有大鸟，鸡头、燕喙、龟颈、龙形、麟翼、鱼尾，其状如鹤，体备五色，三文成字，首文曰顺德，背文曰信义，膺文曰仁智。不食生虫，不履生草，或止帝之东园，或集阿阁。”这段话总体介绍“凤”的图腾，但提出了“龙形”，则说明

黄帝时对“龙”已经有了明确的概念。

是什么概念呢？这件事的起因是黄帝战胜了蚩尤后，成为天下的共主。当时天下的部落很多，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图腾，也就是说所崇拜的一种动物。黄帝呢，必须凌架于这些图腾之上，于是他就取各部落图腾的一个部位，组合成一种动物的图腾作为黄帝的象征。由于黄帝的始祖为龙伯，生活在聚龙山，又受到打雷扯闪的启示，于是这种动物设计出来了，为马的脸、牛的鼻、虎的眼、狼的嘴、鹿的角、狸鱼的须、蛇的身、鱼的鳞、狮的鬃、鹰的爪等。而且这种动物的神通广大，可以上天入地，可以腾云播雨，主宰世界。

相传黄帝制出了“龙”的图腾后，还剩下一些部落的图腾没用上，黄帝的正妃西陵母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女人，受到了“龙”的启示，把余下来各部落的图腾经过精心组合，以孔雀的头、燕子的颌、天鹅的身、金鸡的翅、雉鸡的尾、金色雀的羽色……组成了一对漂亮华丽的大鸟。负责造字的仓颉非常赞赏，为这两只大鸟取名“凤”和“凰”，凤代表雌鸟，凰代表雄鸟，暗示“黄”和“皇”。合起来叫凤凰，代表皇后和嫔妃的形象。与黄帝创造的“龙”图腾相配，形成了“龙凤呈祥”的美好象征。

从黄帝时两次战争来分析都发生在荆山之内

炎黄的阪泉大战。《史记·五帝本纪》：“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执五德，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驱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

对于阪泉大战的地点问题,司马迁只提地名,没指何处,后世专家学者多定为河北涿鹿黄帝城东;《线装精典·夏商周》上提了两处:一处在今山西运城解州镇,一处在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台湾学者周光斗认为:“他(黄帝)跟姜性部落的首领烈山氏,曾在阪泉打了一仗,烈山氏败走荆山,他便在荆山立鼎示威,以此为界,然后退回黄土高原。”

以上观点均认为阪泉大战发生在北方黄河流域,笔者认为值得商榷:既然黄帝部落在北方,炎帝部落在南方(随州厉山、荆山),那应该是炎帝部落北上两千里去侵略黄帝部落,在阪泉前线被打败了,然后又退至荆山。在原始社会时期,交战双方有那么大能量吗?炎帝被打败,黄帝理应至追到黄河边上即可,为什么要追至江汉腹地的荆山,还立鼎示威?难道不怕被消灭吗?有人说炎帝部落原来也在北方,那他是什么时候北上的?北方回旋余地大,那他被打败以后不败走别处,偏偏看好几千里外的荆山?这是很值得怀疑的、经不起推敲的情节。近年有保康史前文化研究者首次提出,炎黄阪泉大战的地点在湖北保康两峪至南漳县板桥、澧泉一带。他的依据是:荆山主峰至保康两峪、南漳板桥一带原是炎帝部落的活动范围,厉山即丽山;黄帝的活动范围在保康店垭至马良和平一带;阪泉大战是黄帝部落联盟东出扩张与炎帝部落为争地界而引起的冲突。探寻认为,此说很有道理:第一是因为原始社会时期一切活动都是为了生存,两个部落邻近,只有活动地界或劳动果实之争,才有可能引起冲突;两峪乡的芭桃、白庙村是黄帝母亲、祖母的白民氏国住地,与南漳板桥的青龙山接界,与此为邻的还有南漳县板桥镇青龙寨遗址,都证实阪泉大

战发生在这一带；第二是如前所述，西陵氏部落在今宜昌一带，黄帝部落在今店垭、马良一带，都与南漳的板桥为邻，所发生冲突引发战争符合情理；第三是有遗址、地名体现。炎黄的阪泉之战主要发生了三次大的战斗：第一次是黄帝部落受到夹击而失利；第二次是黄帝部落引水击破火攻；第三次是黄帝部落用星斗七旗阵破解了炎帝部落的跑石阵。恰南漳县板桥、东筑镇有跑石寨、跑石岭地名，可能就是那次战争的遗迹。第四是说明原始部落从山区向丘陵地带过渡的趋势，这是生产力发展后对外扩张的必然。其实，“阪泉”二字系组合地名，即阪桥和灋泉各取一字组成，此二地名都在板桥镇境内。道理很简单，既然是大规模的战争，而且打了三仗，就不可能只在一个地方，只记载一个地名。

黄帝战蚩尤的涿鹿之战。《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记载了黄帝与蚩尤的战争。对于蚩尤，后世多认为是南方（或东方）九黎族首领，有兄弟八十一人，能以金（铜）作兵器，并能呼云唤雨，个个骁勇善战；对于战争之地“涿鹿之野”，多认为在河北省涿鹿市东南；对于战争过程，《中华开源大圣》则认为初战中炎黄部落士兵死伤严重，黄帝一愁莫展，幸遇灵山十巫老用十种兵阵相助，力克蚩尤及九黎军队，蚩尤最后在绝辔沟涧被黄帝部将应龙、常先所杀。

综合后世所提供的信息，令人产生以下质疑：一是如果说涿鹿在今河北省涿鹿市东南，九黎族的活动地域在江淮一带，那等于蚩尤部落北上几千里侵犯炎黄部落，这怎么可能？而《史记》明示是蚩尤属叛乱而不是侵犯，意思是蚩尤部落原属

炎黄部落,既然炎黄部落在黄河流域,那凭什么把战场设在河北以北?二是黄帝在束手无策时巧遇“灵山十巫老”,这样说来涿鹿附近必有灵山,可事实上涿鹿附近并无灵山。

保康史前文化研究者编辑《讲古话重阳》一书中,也有一则专门讲述黄帝战蚩尤的故事:黄帝部落在今西河一线,兵都在今黄龙观;炎帝部落在今南漳县板桥镇,兵都在青龙观;蚩尤部落在今南漳县巡检、峡口一带,兵都在南襄、白云一带;由黄帝之子应龙引水淹了南襄城,消灭了蚩尤的有生力量,蚩尤部落被逼迫逃出阳平关。在阳平关外的五鹿,炎黄军队同蚩尤军队摆开了战场,黄帝用十巫老所授的“十阵法”,历时三年,打败了蚩尤军。蚩尤独自一人跑到深山黄界(今保康九路寨一带)躲藏,被黄帝之子常先和应龙射杀。绝辔沟即决战沟,就是现在保康县百峰的战口河。“涿鹿”二字也系组合地名,即潘涿山和马鹿岩,都在保康境内。现在歇马镇王家塄保留着“九里”的地名,实为“九黎”之误。分析认为所讲的故事更符合逻辑和情理。其一,这一连串的地名都相距不远,符合战争实际;其二,荆山中确有多处灵山,其中有保康县两峪乡三教圣地朝元山。《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对“灵山”的注释为:“释家以灵鹫山为灵山,道家以蓬莱山为灵山。”朝元山古称“蓬莱仙山”,附近有鹫峰山。保康地方经书《龙华宝经》记载得更清楚:“混沌初分,无极始盈,世无人烟,老母(指女娲)在灵山八宝碧云宫化九十六亿灵光,留传人根。”而这个“灵山”即指八宝山碧云宫所在的山,而碧云宫在重阳,距朝元山不到20公里。其三,黄帝在雷泽以夔牛皮制鼓。《绎史》卷5引黄帝内传:“黄帝伐蚩尤,玄女为帝制夔牛鼓八十

面，一震五百里，连震三千八百里。”吴任臣《山海经广注》引《广成子转》：“蚩尤铜头啖石，飞空走险。以夔牛皮为鼓，九击止之，尤不能飞走，乃杀之。”《山海经·大荒经》：“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夔牛则是夔地的野牛。古夔地在三峡、兴山、秭归一带，春秋时为夔国，原为庸国的附属国，后为楚国的附属国。《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记载：“……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就是指的这个地方。在保康西坪的轩猿洞山下，至今还有“古牛石”地名，就是杀夔牛剥皮制鼓的地方。再者，“雷兽”即“雷神”，为三皇之一伏羲的父亲，先住在荆山之首的景山，后住在雷泽（重阳）。以上这些都明确告诉涿鹿之战应发生在荆山之中。

从黄帝活动的遗址、遗迹和文物来定位

轩猿洞。轩猿洞位于今重阳街西2公里、西坪村对岸小地名叫余家岗子处。在山半腰处有一个山洞，两个洞口，有人凿的痕迹。洞内有两厅，正厅约12平方面，为生活区，旁另有一厅，约8平方米，地势高半米，为居室。相传黄帝和西陵女在此洞结为婚姻，也为“洞房”一词的渊源。

轩猿丘。位于重阳街西南的周公岭上。周公岭山腰处有一约近百亩的台地，此地地势较高，显阳，可俯视重阳。因当时重阳盆地水未排尽，叫雷泽，黄帝和西陵母只好选在此处建都

城。此地仍遗留有当时的石头城门口遗址和蚕母娘娘宫遗址。

王子山。位于重阳街南,距重阳街约3公里。重阳八宝山南麓,白龙洞河(古称沁水)和肖家沟流经处。依山傍水,地势很好。相传西陵母在此建女人国,为黄帝纳嫫母等3人,共为黄帝生子25个,所以叫王子山。其中有一个被溺死,小地名叫王子潭;余24人后成为24祖师,被分派到荆山各地开拓发展。西陵母在此山潜心研究八卦,后人在此修建八卦庙纪念,遗址尚存。

万寿寺。居白龙洞河上游,距重阳街约6公里。为黄帝战蚩尤时,西陵母在此修建的行宫。西陵母曾在此为黄帝祝寿、行封、加冕。后人在此地建寺庙纪念。因白龙洞河阻塞,大禹治水时白蜡坪以上为淹没区,只好把寺庙改建在半山处,明清以后把寺庙转至山脚的榔榆沟处,现寺庙部分墙体仍在,遗留有大量的碑和石器。

子孙沟。全名为炎黄子孙沟,现名叫姚家沟。位于重阳街东南角,崇山山脚处,距重阳街约7公里。这里原为西陵国辖区,在炎黄时为两个部落的结合部,炎黄联盟后,两个部落的子孙混合居住,所以叫炎黄子孙沟。这里的文化遗址有四处:一是崇山顶上的石寨,为原始人生活遗址;二是姚家洞,位于崇山临沮水河边处,洞大且深,为原始人和大舜部落居住遗址;三是九阳关,位于姚家沟村与巡检通城河村交界处。九阳关为阳城的重要关口之一,古时在山垭处设有关卡、烽火台及军事防御设施,遗址尚存。四是碑文记载,此山为许由山,即许由隐居处。

文物。保康虽然没有组织专门的文物发掘,但解放以来

发现的新石器遗址达几十处之多；出土的文物较多，品种较全。有石斧、石铲、石镞、石臼、石杵头、石网坠；青铜钺、青铜戟、青铜剑、青铜鼎、编钟等；陶器有三足鬲、十二生肖、陶管等。在紫阳朱家湾发现文化层迭加达几米厚，都能证实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都有人类在这里生存。

从黄帝的葬地来判断在荆山无可置否

《史记·五帝本纪》曰：“黄帝崩，葬峽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帝王世纪》曰：黄帝“战而天下大服。或传以为仙，或言寿三百岁。葬于上郡阳周之峽山。”《史记·封禅书》载：“……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官从上者七十余人。”

黄帝成仙之说不足为信，更不能成为历史研究的依据。黄帝既然是人，总避不开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所以“葬峽山”成为言之凿凿的线索。关于“峽山”的具体位置，由于司马迁、皇甫谧都未作说明，所以历来众说纷纭。分析认为，“峽山说”既然由司马迁提出，还应在有关典籍中寻找线索。《纲鉴·易知录》曰：“（黄）帝采首山之铜，铸三鼎于荆山之阳，鼎成，崩焉。其臣左彻取衣、冠、几、杖而庙祀之。”此记载暗示黄帝死于荆山下，与铸鼎于“荆山之阳”同一地域。而《帝王世纪》指出在上郡阳周的峽山，说法不同。“荆山”在哪里？可由“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得知；还可以从在河南新蔡楚简“昔我先自颛顼，宅兹沮漳，以徙迁处；”和“及江汉沮漳，遂至于淮；”来证实。江汉沮漳加荆山，此地理谁也争不去。所谓“荆山之

阳”即荆山之南，荆山之南应该有“峽山”。

峽山在那里呢？《汉语大字典》（缩印本）对“峽”字的注释为“山锐而高”之意。《淮南子·泰族》：“《诗》云：‘怀柔百神，及河峽岳。’”另有《玉篇·山部》曰：“峽，峻也，形似桥。”查《诗经·时迈》“怀柔百神，及河峽岳”的背景，意思是周武王“能安抚天地众神，能达到黄河及高山”。这句诗有个特定的地域背景，即黄河和高山。探寻认为，此黄河就是指当时的“泗黄”，即今沮水的马良集镇至重阳段，系黄帝活动的中心地带。高山即位于重阳的八宝山，今称陈家山、高家山，《诗经》有“天作高山”之句，注释指是周族的祖居地岐山。《帝王世纪》曰：“宓（伏）羲为天子，都陈”，即于今重阳陈家山。分析认为应是后者。

因为此山在沮水河畔，站在河边望上看，的确是“山锐而高”，古时山上建有碧云宫，为安众神之所。周文王灭崇侯虎部落后，在崇山下建丰邑，在八宝山建神灵之台（灵台），自然能安抚众神。从沮水河边观察，八宝山依次为三个山头，《黑暗传》中也叫笔架山；恰第一至第二山头之间有丈许深涧，古人搭有木桥，大路直通沮水河畔，称桥山为应有此意。

综上所述，峽山就是今马良镇重阳的八宝山，而峽山之北麓今陈家山和余家岗子处的地形很好，很有可能就是黄帝的葬身之地。1996年在此出土楚鼎一尊，为国宝级文物，现存于襄阳市博物馆。峽山南麓的黄坪地形很好，又有黄帝的行宫及曲阜地名黄帝葬于此的可能性更大。而陕西黄陵县的黄帝陵仅仅是纪念性遗迹，不可能成为黄帝的葬地。

对西陵母的寻绎

杨选成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嫫祖。嫫祖为黄帝正妃。”《帝王世纪》曰：“黄帝四妃，生二十五子。元妃西陵氏女，曰嫫祖。生昌意。”从以上两条记载可知，西陵母与黄帝是夫妻关系，因而探讨荆山史前文化必须探讨西陵母。

西陵为古部落方国

古西陵国是一个神秘的部落方国，有关典籍的记载仅只言片语，非常模糊，既没有指明方位在哪里，也没有指明其起止年代，所以探讨此事的文章很少。网络(天山)的资料明确指出：“嫫祖是古西陵的酋长，她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谏诤黄帝，旨定农桑，法制衣裳，兴嫁娶，尚礼义，架宫室，奠国基，统一中原，弼政之功，殁世不忘。是以尊为先蚕。因此嫫祖理应是中华民族的人文母祖。黄帝与嫫祖是我国各族人民祖先的代表，中华民族的伟大象征，已成了华夏儿女不

争的事实。……处于巴蜀交汇中心地位的上古西陵,即现在的螺祖故里至少可以肯定是人类文明起源地之一,是远古东方乃至世界政治文化的中心,是东方‘伊甸园’。”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强调西陵母在我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地域概念上使用了“巴蜀交汇”四个字,仍然没有指明具体地点,这就需要作全面探讨。

地名寻踪。1.《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354页)关于“西陵”的注释为:“古国名。”在“西陵”的地点上记载了两处:一处为直隶(河北)易县永宁山,总称为西陵。别于遵化之东陵也。一处为河南临漳县西三十里,魏武帝之陵也。在“西陵县”条的注释有两处:一处为“汉置。南朝梁废。故城在今湖北黄冈县西北。”一处为“汉置夷陵县。三国吴改曰西陵。晋复为夷陵。故城在今湖北宜昌县东。”以上4条头3条讲陵墓之“陵”,与西陵国无涉;最后一条才与西陵沾边。

2.《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在“西陵峡”条是这样注释的:“在湖北宜昌县西北二十五里。一名夷山,为东峡入峡之首。蜀江之险始此。《水经注》曰:‘江水又东经西陵峡,山水纡曲,两岸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见明,绝壁或千许丈,林木高茂,猿鸣至清,山谷传声,泠泠不绝。所谓三峡,此其一也。’《荆州纪》曰:‘自夷陵沂江二十里入峡口,名为西陵峡,长20里。’《寰宇记》吴志云‘陆逊破刘备,还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即此山是也。’”

3.《史记》载,楚顷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77年)秦将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郡天下,改夷陵,置

巫县。”

4. 湖北省《宜昌市地名志》记载：“宜昌，古称夷陵。据《前汉书·地理志》记载：‘夷陵因县西北有夷山而得名。又据《东湖县志》称：江水至此而夷（平缓），高山至此而陵（渐平），故曰夷陵。’宜昌历史悠久，李家河、紫阳两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现，证明早在四、五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生息。”

5. 《宜昌市地名志》对“西陵山”的记载是：“位于市区北部南津关东南、长江和黄柏河之间，泛指从营盘岗至天灯包之间的山头。为西北至东南走向，当地群众一般把原建有‘西陵山庙’的山头称作西陵山（海拔 105.7 米）。“西陵”一名的含义，尚待考证。”

从网络得知，关于西陵所在地有宜昌说、武汉说、安陆说、四川盐亭说、河南开封说、西平说、荥阳说、浙江萧山等，让人莫衷一是。综合上述资料分析，唯独宜昌西陵说能与黄帝荆山说挂上钩，但也存在扭曲现象。

西陵的含义。“西陵”这个名词包含非常厚重的文化根基及理念，是探究“玄元”及“三皇五帝”文化非常重要的线索之一，将拽起一连串的历史谜团。

经过全面分析后认为，最初的西陵为“西灵山”，是华夏族始祖伏羲和女娲居住的神灵之山。荆山有东灵山和西灵山之分，“东灵山”即保康县两峪乡朝元山，也叫蓬莱仙山，是黄帝系列神仙的居所。“西灵山”即重阳村的八宝山，即伏羲、女娲、西王母的居处，昆仑系列的神灵之山。后来地名演变，尤其是后人将“灵”写作“陵”字后，变成了古西陵部落方国，

隐没了最初的含义,使这一古老的文化元素深深地掩埋于荆山之中。

西陵与昆仑氏族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水经注》所记:“西域的昆仑是山名,南海的昆仑是国名”,首次提出了昆仑国在南海。南海为四海之南。《尔雅·释地》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是讲古“四海”之域居住着上述诸氏族部落。非常遗憾,我国的史学家们至今不知道古“四海”在何处?也不知“南海”何在?他们往往把“西海”同“西域”相联系,把“西域”误认为在新疆的查马干地区,以为新疆的昆仑山是真昆仑,最早的昆仑。以致于考古界、史学界花了很大的精力在皆地区寻找远古遗迹,结果无收获。后来地质界进行综合研究后才认为:“新疆的昆仑不是最早的昆仑”,才纠正了这个误解。但是,最早的“四海”“南海”“西海”“昆仑”“西域”“西陵”在何处呢?专家们仍在苦苦探索。

按照典籍记载所分析,我们认为最早的西陵峡应是位于今南漳县的峡口镇至保康重阳这一段,中途经丸山、白云、通城河(古称通阳城、通天河),全长约20公里,因为这里距西陵山很近。而《水经注》所言,已经把西陵峡定在长江上了,这是严重的误导。人们很早就产生了一种误解,仅把长江称作“江”,把黄河称作“河”,在解读地名时用这两个概念去生搬硬套,只能使人越解越糊涂。其实,因为沮水是黄帝活动的中心区域,沮水最早被称为沮江。在沮水的重阳至南漳峡口段,也有类似三峡的地形,为早期的西陵峡。因为它符合“自夷陵沂江二十里入峡口”的地理特征。若放在今宜昌市,是否符合“沂江二十里入峡口”的地理?值得质疑。

还有一条因素,因为早在“五帝”时期,人们的涉足面比较局限,是以荆山和沮水为活动中心的,而三峡的西陵峡距沮水较远。西陵和夷陵的县名改来改去,肯定都有其时代背景。……考证古西陵和夷陵,“故城在今湖北宜昌县东”,关键是紧扣“县东”,把方位定死了。而从葛州坝水利枢纽以上的西陵峡位于“县西”,所以说是被移位后的西陵峡。

通过梳理以上信息后判断:第一,“西陵”二字的历史渊源久远,来源于西灵山,其真实含意被掩盖;第二,关于西陵的概念因时代背景不一,地点不一,结论不一;有帝王的陵墓所在地,也有县治所在地;第三,将“西陵峡”的界定为长江三峡的第一峡,是古人的误读;第四,西陵国与西灵山有历史的渊源关系。

从“西陵”和“夷陵”的注释来寻找蛛丝蚂迹。前面已把西陵定为“古国名”;《中国历史地名词典》对“西陵县”条的注释为:“三国吴黄武元年(222年)以夷陵县改制,治所在今湖北宜昌市东南。西晋太康元年(280年)又改名为夷陵县。”在“西陵邑”条注释为:“战国楚地,在今湖北宜昌县西北。”在“夷陵邑”条的注释为:“在今湖北宜昌市东南,战国楚地。”说明都是战国时期楚国的地盘。

夷陵溯源。“夷陵”一词也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根基。最早的“夷”为冯夷、蛮夷,是从保康县聚龙山迁去的一支部落,而聚龙山是黄帝祖先的发祥地,楚人的始祖为颛顼,黄帝的孙子。正因为如此,夷陵才有“楚先王墓名”之称,才有秦将“白起烧夷陵”之举。至于“水到此为夷”,“山到此为陵”,那是后人的附会,客观上证实地名已外移。正因为这个附会,掩盖了

“夷”字的本意。后来，古“夷”字与“宜”通假，又变成了宜居的意思，使人更不知道最初的含意了。“陵”为高丘，还可以作陵墓讲，也可以作地形讲。“昌”为昌盛、永昌；意为最适宜人居住的区域，后人改“夷昌”为“宜昌”，表明人们追求美好的愿景，这样一来，却掩盖了历史真像。从“汉置夷陵县，三国吴改曰西陵，晋复改为夷陵，故城在今湖北宜昌县东”的记载来看，行政区划名这样改来改去，肯定都有其时代背景，但已面貌全非了。

确定方位。其实，前面所讲的“巴蜀交汇”已经指明了古西陵国的大体方位，即上古时期的巴国和蜀国都在川东和鄂西北一带。寻找西陵国很关键的一条要把黄帝的因素纳入，因《华阳国志》云：“蜀之帮，媾姻则黄帝婚其族”。再加上黄帝之子“昌意娶蜀山氏女”“黄帝之孙高阳”这两条线索，已经基本界定了。根据这个思路，确定黄帝之妃西陵母所在部落方国的位置，河北、河南、四川、浙江、湖北黄冈的西陵都可排除在外。道理很简单，因为黄帝时期仍处于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十分低下，在没有任何通信条件、交通条件的情况下，怎么可能跑到几百、几千里之外去讨正妃？再加上炎黄大战、黄帝战蚩尤等诸多佐证的制约，就更不可能了。仅剩下今宜昌市的西陵，而宜昌“西陵山”地名则出现的很晚，以地形而名。这样一来，白起拔郢，所占的“西陵”则是西陵国的唯一选项。对于白起所占的西陵，分析认为，第一应是楚国的大后方，因为是白起攻占鄢城以后的军事动作，意在扩大战果；第二与楚国先王的陵墓相距很近，因为“占西陵”与“烧夷陵”是紧密相连的军事行动，意在捣毁楚国的老巢，彻底瓦解楚人的斗志。

由此推论,此西陵一定在楚源地保康或南漳县境内。

从世系上分析,黄帝的正妃嫫祖生昌意,因昌意德衰降居若水(今香溪河),而娶蜀山氏女,分析此蜀山可能位于兴山县境内。后来黄帝、玄嚣去世,誉年少不能接任,西陵母便安排其孙颡项接替帝位。而颡项又是楚人的始祖,后来楚人果然在荆山崛起,而长江西陵峡后来为夔国之地,属庸国的附属国,春秋晚期才成为楚国的附属国,楚国初期的活动中心不会放在他国的地盘上,所以说古西陵国不会在长江西陵峡上。

再从时间背景上分析,西陵母和黄帝同时代,黄帝则为五帝之首,推测在公元前 2600 年前后。而西陵作为地名出现则在战国后期,白起占西陵则在公元前 277 年,也就是说历史已经过了 2300 多年,一方面说明西陵国很古老,另一方面则说此时西陵国早已不存在了。分析造成西陵国消失的原因,则是黄帝部落与西陵国的联盟,西陵国变成了黄帝的基本地盘。也就是说,西陵国消失于黄帝称帝后。

夷陵的位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对“夷陵县”的注释为:“本楚先王墓名。汉置县,故城有五。皆在湖北宜昌县。一在县东。晋宋以前故城也,《史记·六国年表》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拔郢,烧夷陵。《汉书·地理志》:‘南郡夷陵,都尉治’吴改曰西陵,寻复旧。”在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时期》地图中,“夷陵”和“西陵”的地名标注在今宜昌市东、西两个方向,说明是按后来的典籍为依据。

从白起拔郢之战的背景来分析。从夷陵为“楚先王的墓名”这句话来讲,已经找到了过硬的佐证。清华楚简《楚居》上记载,多位楚王曾居“夷屯”。按照这条线索来思考,楚先

王居夷屯,死后葬地为夷陵。在公元前 277 年的秦楚大战中,秦将白起拔郢、烧夷陵,占据了楚国的老巢,并捣毁其祖宗的陵墓,企图以此来瓦解楚人的斗志,灭掉楚国。我省的荆楚史研究表明,楚国的发祥地在保康县南部的沮河流域,所以说最早的西陵只能靠近沮水,而非长江。为此,笔者 2011 年在研究早期楚文化中曾撰写了一篇文章,为《从白起拔郢来分析夷陵的位置》,见《荆山楚源文集》(上)152 页,此文将夷陵的位置定于保康县店垭镇格栏坪村,在古西陵国的地界内。

原来以为白起拔郢、占西陵、烧夷陵的进攻路线为从江陵、顺当阳沿长江边到宜昌占西陵,然后顺沮水进山烧夷陵。而保康县荆山史前文化研究认为,白起在进攻郢地的同时,另派了一支奇兵走南漳东巩兵马峡,直接占领西陵,烧了夷陵(见《讲古话重阳》150 页)。这个观点很有道理,因为从时间上分析,占西陵在拔郢的前一年,第二年才拔郢、烧夷陵,很可能秦军和楚军在郢地大战的同时,白起就出奇兵占了西陵。按这个思路分析,西陵在重阳或在南漳县峡口镇的可能性更大,值得重视。2007 年,店垭镇格栏坪村编修村志,反映该村有九进楚王殿遗址,遗留有筛子口面大的礮墩,地下还有石条、碳屑,我们怀疑此处就是夷陵。因没有考古发掘,尚不能定论。

古西陵国的范围。因为西陵国属昆仑氏族,属于正统的华夏族祖先,所以在蛮荒时期势力很大,所占据的区域较大。今湖北宜昌市夷陵区远古属西陵国,是西陵部落的中心区域,也是“西陵之女”嫫祖的故乡。今宜昌西陵峡口风景区的西陵山上、仙人溪畔的嫫祖洞里,以及黄牛岩上的轩辕洞和玄器洞中,处处留有后人纪念嫫祖的遗迹。远安县苟家垭因嫫祖

线索多,已更名为嫫祖镇。

古西陵国的地界已深入到保康县境内,因为今宜昌市夷陵区与远安县西北部、保康县的店垭、马良镇地界相连。到黄帝时代已经统一了荆山和西(睢)山,安排昌意到“若(同弱,代表太阳落山之意)水”,主管西山区域,后来才延伸到长江三峡,所以说这一带属西陵国的范围,也称“南海”。分析认为,最初的“西域”是远古时村邑,是以重阳(雷泽)为中心划定的方位,就在今保康重阳陈家山(八宝山)西侧,以方位而定。黄帝战蚩尤时,西陵母同黄帝生活的行宫叫万寿宫,后来更名为万寿寺,同西域山水相邻,同属西域。在今兴山县有“高阳”地名,就是颛顼的封地,属西域的边陲。

西陵国是昆仑氏族的后裔

昆仑释义。“昆仑”的文化内涵十分厚重。从网络的资料得知:“如果按照地域系统划分,我国神话大体上可分为4大系统,即由西王母、盘古、女娲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西方昆仑神话、东方蓬莱神话、南方楚神话及中原神话。其中昆仑神话是中国神话的主体部分。”现在看来,这段论述并不准确,其实4大神话的根基都出自荆山,因为最早的昆仑山、蓬莱山都在荆山;楚国发祥地在荆山,神话出自荆山;中原神话是指炎黄神话,恰恰他们都发祥于荆山,见汪青祥著《黄帝在荆山》一书,可以作为这一观点的支撑。

最早的昆仑山指西灵山,其地点在今保康县重阳村的陈家山。灵山即神灵之山,相传今重阳还是一片雷泽的时候,伏

羲和女媧便住在这座山上,后人在山顶上建碧云宫纪念,就是条线索。古西陵氏族和夷陵氏族的住地都属南海范围。

袁珂著《中国神话传说词典》(155页)对“西王母”的注释有:“部族名。《太平广记》卷二〇三引《风俗通》:‘舜之时,西王母来献白玉琯’。”对“西王母山”的注释为:《穆天子传·卷三》:“天子遂驱升于(燕)山,乃纪丌迹于(燕)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

相传西陵母是伏羲和女媧之后裔,出身于昆仑世族。因为其历史太久远,成为一个神秘的氏族,昆仑山也成为一座神秘的山。《辞海》(缩印本)对“昆仑”的注释为:“广大无垠貌。”《太玄·中》:“昆仑磅礴,思之贞也。”司马光注:“昆仑者,天象之大也。”根据上文所提供的线索,昆仑山的来源为人祖所居住之地,根据《山海经》记载,荆山之中起码有三处被称为昆仑山。

昆仑山的准确位置。《山海经》上多处提到昆仑山,根据探讨,此地理特征和物产而言,第一昆仑山为泰华山,即华胥女生伏羲、女媧处;第二昆仑山为朝元山,即黄帝与神农祖先活动之地;第三昆仑山为重阳陈家山,即女媧、西陵母居地。正因为荆山在远古时期有三座山被称为昆仑山,而此昆仑山又深深地藏在荆山之中而鲜为人知,才布下了这一旷古之谜。后人称西灵山为神灵之山,周文王管理西部的时候,在山上修建了灵台。“灵台”为神灵之台,《诗经·大雅·灵台》上记载了这件事,暗示周文王知道这个历史之源,才有修建灵台之举。

与黄帝成婚并实行部落联盟

《史记·五帝本纪》：“嫫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此处记载了黄帝和西陵女的婚姻情况。因为古西陵国的祖先可追溯到伏羲和女娲，是这一带最早的氏族部落，所以占据了广阔的区域。到了黄帝时代，西陵女是西陵部落最杰出的代表，这样造就了一桩伟大的婚姻。

这里的“西陵女”是指西陵古国的女子。没有结婚以前的女青年统称女子，结婚、有了孩子以后就改称西陵母；特别是成为黄帝的正妃以后，受到大家的尊敬。至于嫫祖，一是姓氏，二是指养蚕抽丝的发明者，是尊称。

分析当时社会背景是这样的，西陵氏国因为是伏羲女娲之后，所以势力强盛，占据着荆山南部沮水以西的广大地区。而黄帝部落是从荆山主峰拓展下来的，占据着聚龙山以南今龙坪、两峪、马良西坪一带，但触角已经伸到了古泗水（沮水的重阳到马良街段），与西陵氏国隔河相处。由于西陵女发明了养蚕纺织技术，使该部落之人民率先穿上了衣服，黄帝部落很羡慕，邀清西陵女去该部落传授纺织技术，由此产生交往，发展成婚姻。此时西陵女是西陵国的首领，属母系社会；黄帝为轩辕国的部落首领，已过渡到父系社会。久而久之两个氏族部落必然产生通婚，黄帝入赘来到西陵国，和聪明、美丽、擅栽桑养蚕的西陵女结为夫妻，应是合情合理之事。实现两个部落的联盟也顺理成章。

黄帝和西陵女结婚时，先居住于轩辕洞，为“洞房”一词的来源。其地点在马良镇西坪村高家山半岩中。后迁至轩辕

之丘,在今重阳村周公岭的台地上,开始搭建茅草房。西陵母在此植桑养蚕,缝织衣裳,于是就有了“嫫祖”之称。此地有黄帝城遗址和蚕母娘娘宫遗址为证。西陵母曾在八宝山组建女人国,纳方雷氏等次妃4人,供黄帝繁衍后代,共为黄帝生25个王子。现距轩辕丘仅3公里的店垭镇白蜡村有王子山、辕翼山地名,可以寻找黄帝和西陵母婚姻的踪迹。

黄帝和西陵女的婚姻从某种角度来讲是一桩政治婚姻,它的真正意义在于西陵部落与黄帝(白民氏)部落联盟的形成。因为在原始社会后期,社会分工日益明确,各种职业概念日益固定,如打猎、建房、制造工具亦青壮年男子所为;而纺织、采集、家务劳动亦妇女所为,两个部落实现联盟有利于优势互补,整合人力资源,促进社会进步。另有两个重要的象征性意义:一是象征着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开始;二是部落联盟的形成,即两个邻近的部落联合起来,形成更大势力的方国。

西陵母和黄帝成婚以后,担当起贤内助的角色,配合黄帝完成统一部落的大业。

而此时,正值蚩尤部落作乱,突破了炎帝(榆罔)所设置的关卡隘口的封锁,流窜到今远安县西北部一带,和炎帝部落争夺下冀的区域。之前炎黄的阪泉之战,已实现部落联盟,黄帝和西陵女的婚姻使西陵氏部落加入,范围更大了,势力更强了。蚩尤和榆罔的战争迫使黄帝部落的介入,黄帝亲自挂帅,拉开涿鹿之战的序幕。西陵母配合黄帝发动了这场战争,并积极协助黄帝搞好后勤工作。在黄帝战蚩尤时,西陵母曾于今保康县店垭镇黄坪村建行宫,搞后勤保障,等待黄帝凯旋。

在今店垭万寿建有万寿宫和九井寺,这些古建筑都是黄帝和西陵母的生活遗址和后人的纪念性遗迹。历经三年,黄帝终于打败了蚩尤,统一了荆山各部落。黄帝凯旋时,西陵母在万寿行宫将亲手缝织的一件黄丝绸衣服披在黄帝身上,为黄帝加冕、祝贺,以示崇尚黄土之传统,黄帝正式成为统领荆山各部落的帝王。

造福人寰

西陵母时代虽然过去了数千年,她的丰功伟绩在荆山地区仍有流传,她所居之地都有遗址可寻。

兴养殖。西陵母从小就有宽广的胸怀和远大志向,亲近爱民,不骄不介,有驾驭和管理天下之才能。相传女娲后期,将西陵国交给西陵女管理。由于火的发明,当时人类已有吃熟食的习惯,人们将打来的野兽用火烤熟了吃。但由于保存不善,猎获了野兽,有时因保管不善被烂掉了,非常可惜。为此西陵母开动了脑筋,就将捉来的小野猪关在山洞里喂养,取得了成功。为了改善百姓的生活,西陵母号召家家户户养猪,形成制度。《史记·货殖列传》:“泽中千足彘”,这句话有两层含意:一是“泽”指大泽、雷泽,即重阳盆地;二是“千足彘”,彘为猪,千足彘即 1000 只足,折合 250 头。裴姻集解引韦昭曰:“二百五十头。”这就是《山海经》中所记的“司彘之国”的来历了。相传西陵母还在树巢里发现了鸟蛋,并把鸟蛋作为食物,又受到启发,号召大家养鸡、养鸭、养鹅。《山海经》也有记载:“西王母得凤鸟,吃凤卵”,所记载的就是这个发明。

创纺织。西陵女在一次煮蚕蛹中受到启示,养蚕取丝成功,创造了纺织业,人们从此穿上衣服。西陵母在这里发现并开发了植物麻,用葛麻织出了布,叫葛布,使人们结束了穿树皮、兽衣的历史。后人为了纪念她,在今重阳周公岭上修建了“蚕母娘娘宫”和“嫫祖庙”。故《路史·后纪五》记载:“黄帝元妃西陵氏曰嫫祖,以其始蚕故又祀先蚕。”

启科技。西陵母继承了伏羲的事业,潜心研究八卦。西陵母在怀昌意时,研究出了“先天八卦”,为人类发明了一份科学成果。后人为纪念她,在今店垭镇白蜡村肖家沟修了八卦宫,遗址至今尚在。她和黄帝在轩辕丘时,还在子午岭(周公岭)同黄帝一起开始测定时辰,用立竿见影的方法,确定出了“子、午”的方位。目前,子、午线路都很清晰,楚都五行八卦建筑布局也非常明朗,见证了我国的古文明。

治恶吏。黄帝去世后,西陵母以王母的身份,视察荆山和西山广大地区,解决民事纠纷案件很多,深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帝王世纪》也记载着一则西陵母的感人故事,相传汶山一官员欺压百姓,曾受到西陵母的惩治。分析此汶山在南漳县峡口镇白云一带,距保康县重阳仅20公里。在人们的心目中,从古到今对她都充满着敬意。

制图腾。相传黄帝制出了“龙”的图腾后,还剩下一些部落的图腾没用上,黄帝的正妃西陵母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女人,受到了“龙”的启示,把余下来各部落的图腾经过精心组合,以孔雀的头、燕子的颌、天鹅的身、金鸡的翅、雉鸡的尾、金色雀的羽色……组成了一对漂亮华丽的大鸟。负责造字的仓颉非常赞赏,为这两只大鸟取名“凤”和“凰”,凤代表雌鸟,凰代

表雄鸟,暗示“黄”和“皇”。合起来叫凤凰,代表皇后和嫔妃的形象。与黄帝创造的“龙”图腾相配,形成了“龙凤呈祥”的美好象征。

西陵母最早生活之地在今重阳八宝山一带。八宝山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称呼:分别为昆仑山、高山、峤山、天台山、嵩山,上建有巨大的古城堡。有碧云宫、白云观、瑶池、灵台等,还有“永昌寨”“轩辕洞”遗址。在核心区域里,还有“螺辟洞”“轩辕丘”,西陵母同黄帝在这里建有石城,叫黄帝城,后人则称这匹山梁为子午岭或子午城。

在昆仑山修仙

西陵母被神化。《云笈七箴》卷 100 辑唐王 谦《轩辕本纪》:“帝周游行时,元妃螺祖死于道,帝祭之以为祖神。”《路史·后纪》卷五:“(黄帝)元妃西陵氏曰螺祖,以其始蚕,故又祀先蚕。”《辞海》(缩印本 2063 页)对“西王母”的注释为:“亦称金母、王母娘娘、王母或西姥。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女神,后为道教所信奉。在《山海经》里,她是一个豹尾虎齿而善啸的怪物。在《穆天子传》里,则是一个雍容平和、能唱歌谣的妇人。到《汉武内传》里,却成为年约三十、容貌绝世的女神,并把三千年结一次果的蟠桃赐给武帝。《神异记》里更为她塑造了一个配偶东王公,一年一相会的神话故事。《太平广记》说东王公和西王母分管男仙、女仙的名籍。在后代小说、戏曲里,又称为‘瑶池金母’,每逢蟠桃熟时,大开寿宴,诸仙都来为她上寿。旧时民间因将西王母作为长生不老的象征。”

网络资料则说：“西王母是神话中最原始的女神，因此是中国神话体系中十分重要的一位神，对其信仰在战国时早已形成。汉代是西王母信仰的鼎盛时期，它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较大范围和较长时间里流行、具有民间宗教崇拜性质的、有着常人形态的神，故又被海外学者称为‘中国第一神’。”总而言之，人们已经把她神化了。

立地称佛。西王母与我国的佛教的起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查《汉语大字典》，对“佛”字有下列注释：1. 佛佗的简称，意为‘觉者’。又特指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后汉记·明帝纪下》“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汉言觉，将悟群生也。《后汉书·西域传》：‘西方有神，名曰佛。’”2. 佛教徒称修行圆满的人。如：“立地称佛”。

因为西王陵母已被神化，所以寿岁很高。相传黄帝驾崩后，西陵母晚年移居泰华山华盖宫，因为这里是人祖伏羲和女娲的出生地；她也经常回瑶池，关注天下政事。因其儿子昌意德性欠佳，她主动扶持方雷氏之子玄器（青阳）为帝。玄器去世后，其后人啻年岁尚小，她又扶持昌意之子颡项为帝。

西陵母到泰华山修仙后，改称西王母。人们编织这一神话故事的本原是，既然黄帝升天，肯定当了玉皇大帝，那么她的妻子也要升天，当王母娘娘，于是就有了修仙的说法。恰好印证了“西方有神，名曰佛”的记载。相传西王母一直活到西周时期，这个长寿之谜人们无法说清楚，也没必要搞清楚。古人认为西王母是凤体，已成仙，因而才有如此高寿，只不过说明了人们对西陵母的敬仰之情。

西陵母修仙之说绝不是空穴来风，有如下古籍为证：保康

县朝元山古经《龙华宝经》曰：“天上(今朝阳)有个龙华会,万祖朝贺玉皇宫(今两峪朝阳天元宫)。大地有个龙华会,千门万户愿相逢。人身有个龙华会(今八宝山碧云宫,人皇女娲之位),性命交宫出昆仑”(八宝山造人,出昆仑世族)。又：“蔗柏点杖,钥匙开通,自从海底,点到昆仑。”“海底到昆仑”是说八宝山古称地东海,像一支笔,直至高峰,古人也称其为笔架山,《黑暗传》有记。《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西王母早期昆仑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西域河古为流沙河),赤水之后(今黄马河),黑水之前(今陀屿河),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高山(八宝山、峽山等)其下,弱水之渊环之(今望家沟河),其外有炎火之山(沙漠炎山)。有人戴胜(玉),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皆有(八宝山)。《山海经·海内经》有记：“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司彘之国。黄帝妻嫫祖,生昌意。”若明若暗地表明西王母就是嫫祖西陵母。

西王母晚年隐居(修仙)之地也称昆仑,就是今天的望佛山。《山海经·海内经》曰：“在西北帝之下都(今大石脑,下野之都之意),昆仑之虚,方八百里(折今约70平方公里左右),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树很大),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九层宫殿),门有开明兽守之(青狮白象),百神之所在。有八隅之岩(有8条路上山,每条路上有悬岩),赤水之东(今香溪河),非仁羿莫能上岗之岩”。此记载与望佛山、大石脑的地理非常吻合。后来周穆王西部巡视时,专程上山看望西王母,在《穆天子传》中记载很清楚,地址也很清晰。景山曾经叫华盖山,周穆王看望西王母后,改称

望佛山,即意为西王母是修行圆满人,已立地称佛。而这个“佛”若以去世的时间论,要早于西汉 2600 年;若以周穆王西巡时上山看望的时间论,要早近 800 年,可见这里才是我国佛意的源头。

汪青祥著《讲古话重阳》书中有“望佛山上华盖宫”一文,对望佛山的古寺庙有具体描述:“古时望佛山顶的庙宇金碧辉煌,四周是‘四山五岳’拱卫,庙宇背靠西北,面向东南,分前庭后殿,石门框架。地平以斗砖铺成,琉璃瓦顶;中供古佛,即伏羲;左供雷神、火神(祝融);右供哪吒、山神;殿前悬挂神钟,支贡鼓、拜神台;厅前有 3 个大石头,代表天、地、人。距此一里多路有古佛道场。还有‘南岩宫’,山上沟里还有拜月台,这些都属于古庙宇的配套建筑。”无独有偶,董福礼、皮忠良著《荆山景海拾贝》书中的“景山更名趣闻”也有类似的记叙。

《保康县地名志》(1984 年出版)对“望佛山”的介绍是:“据《保康县志新纂》记载:‘望夫山,一作望佛山,西南百八十里,为邑群山之祖。’……明朝中期,此山修有祖师大庙,远近百姓前来烧香许愿,望佛求神,故又称望佛山。”分析这段话有明显的漏洞,既然供奉的是祖师爷,是道教的祖先,何来的佛?如果说供奉的是伏羲,当为人祖,与“佛”又有什么关系?所以说,把西王母称作“佛”应为理所当然。

有一件史事应该引起注意,那就是《诗经·殷武》篇所记载,使用了“挾彼殷武,奋伐荆楚”;“陟彼景山”,“寢成孔安”等带明显人物和地域概念的诗句。述说在商朝中后期武丁时代,武丁帝曾率兵南下讨伐荆楚,这一仗打了 3 年,相传捕捉

了3万俘虏到殷都作奴隶,而且战后在景山建庙安邦。分析这件事有几个关键点:其一,是什么原因导致武丁要大规模地讨伐荆楚?其二,为什么要捉那么多俘虏到北方去作奴隶?其三,为什么打完仗以后还在景山建庙?以笔者的理解,因为荆山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文化先进,而殷武要实现中兴,就必须到荆山来虏掠人才,这样引起了荆山人民的奋力反抗,导致战争。再就是景山上原来就建有纪念人祖伏羲、女娲、西王母的华盖宫建筑,到殷商时已经破败不堪,所以武丁要重建用以祭祖。

综上所述,西陵母在荆山的理由是比较充足的:一是古西陵国的方位确定,无可置否;二是由于住地相近,她和黄帝的婚姻符合情理和逻辑;三是由于两个部落为邻,相互通婚和实现部落联盟则顺理成章;四是有一系列的遗址可作支撑,例如她和黄帝结婚之处的轩辕洞、养蚕织布之处的蚕母娘娘宫、修建集居之地轩辕丘黄帝城、祭祀之所碧云宫、行宫之地万寿寺、晚年修仙之地华盖宫等;五是有众多的地名为佐证。如轩辕丘、八宝山、王子山、昆仑山、望佛山、朝云之国、司彘之国,这些地名与典籍的记载高度吻合。

结论:西陵母在荆山。

文祖玄器在荆山

杨选成

探讨五帝的踪迹,也离不开探讨玄器。玄器,即少昊。号青阳,黄帝之长子,是远古时华夏部落联盟的首领,同时也是东夷族的首领之一。生于江水,其弟昌意生于若水,其母嫫祖,华夏部落联盟首领,同时又是昆仑氏首领。玄器被后人尊为帝,列入“五帝”系统,为中华共祖之一。

玄器的世系

《史记·五帝本纪》(京华出版社)记载:“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嫫祖。嫫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器,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

《帝王世纪》(第二)所记:“少昊帝,名挚,字青阳。姬姓也。母曰女节。黄帝时大星如虹,下流华渚。女节梦接意感,生少昊,是为玄器。降居江水,有圣德,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谓之穷桑帝。”

网络资料载明：“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子，其中有二子为正妃嫫祖所生，长子为玄器，次子昌意。黄帝之子玄器，为姬姓，名挚，后来继位于天子，修太昊之法，后人称之为少昊氏。玄器死后，葬于曲阜的云阳山。”

网络资料记载的很详细，玄器的后代为 19 支，前 4 支分别为：1 支：玄器—嵎极—帝啻—契（约前 2096 年）—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王亥—上甲微—报乙—报丙—报丁—主壬—主癸—商太祖成汤（商朝首任帝王）。2 支：……昌若—曹圉—冥—王恒（商部族首领，前 1775——前 1770 年在位）。3 支：……帝啻—弃（后稷，我国农业开创人）—不窟—鞠—公刘—庆节—皇卜—差弗—毁谕—公非—高圉—公叔祖类—古公—季历—姬昌（周文王）—姬发（周武王，西周开国君主）。4 支：……帝啻—尧（放勋）—丹朱。

从上述记载可以判定：1. 玄器是黄帝的儿子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至于他是嫫祖所生，还是女节所生，嫫祖和女节是否为一人？不在本文探讨之列。2. 从以上的世系可以看出，玄器的后代不乏有在中国历史上地位显赫之人，如啻、尧为五帝之一；汤是商王朝的开创者、周文王、武王是西周的创始人。3. 网络资料还说玄器为东夷族的首领，这句话里包含着重大的文化线索。首先了解“东夷”一词的含义。《辞海》（缩印本）对“夷”字的注释：“中国古代对东方各族的泛称，亦称‘东夷’。如夏至周朝有九夷之称。郭璞《尔雅注》：‘九夷在东’。”从这个注释可以看出来，九夷即东夷。但问题是，当时决定东西南北的中心点在哪里？不同的中心点决定着具体地点的不同方位。探讨认为，华夏民族的发祥地在荆山，是以重

阳为中心的子午线划定东西南北方位。具体说,今重溪峡河以南,沮河重阳至洋(阳)坪以东,为东海,居住着夷族部落,所以称东夷。就具体部落来讲,以啻帝为代表的白民氏部落、以后稷为代表周族、以汤为代表的殷商族、以尧帝为代表陶唐氏族、以大舜为代表姚族、以吕望为代表的姜、羌氏族,都在重阳以东居住,都属东夷的范畴。后来,或迁徙,或分封,上述部落四分五散,其中当时比较显赫的两大家族——周公、姜太公的后人被分封到荆山的东部(今山东、江苏)一带建齐、鲁二国时,沿袭了“东夷”的说法,但时过境迁,内涵却大不一样了,由此蒙蔽了后人。

玄器的出生之地

《史记》和《帝王世纪》都记载玄器出生于江水,那么,这个“江”是何所指呢?在江水的何处呢?探讨认为就在今保康县的重阳,理由:一是沮水原被称为沮江。因为沮水流域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所以尊称为“江”。《汉语大字典》对“江”字的注释除了特指长江以外,还泛指大河流的通称。孔颖达疏:“江以南,水无大小,俗人皆呼为江。”二是重阳村背后有轩辕丘黄帝城、蚕母娘娘宫,均为黄帝和西陵母的生活性遗址。三是有王子山、辕翼山等地名遗存,距重阳仅3公里之遥,相传是黄帝25个儿子的成长地。四是周围有玄器之母西陵山、西陵国的线索。五是有《史记》上记载很早的文祖庙遗址。六是有玄器后代的诸多线索。如啻帝、尧帝、后稷、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的线索。至于网络资料说玄器出生地的江

水在今四川绵阳地区,昌意是雅安人,西陵母是绵阳人等,此说是后人的附会,不可信。首先是此地是否为古西陵国的区域?是否具备上述6个条件?其次是具备其他佐证材料,如黄帝部落与西陵部落为邻和联盟的条件?是否具备与炎帝部落为邻和阪泉大战的地理条件?是否具备黄帝战蚩尤的地理条件?是否具共工撞倒不周山的地理条件?是否有“灵山十巫老”的线索等等,若没有这些重要因素,是无法立论的。

玄器的执政之地

《帝王世纪》对玄器的执政地记载的很清楚,为“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我们可以分别找出“穷桑”和“曲阜”之所在。

穷桑。“邑”字很好理解,为人口集居的地方;古代行政区划名,三十家为一邑;泛指一般的村邑;再就是封地也称邑。玄器以帝王之子的高贵身份,所住之地有三处可供寻绎:一是轩辕丘,在今重阳街背后周公岭半山腰处。因为黄帝和西陵母在此建城,还有蚕母娘娘宫遗址,西陵母在此植桑养蚕,玄器为长子,在此成长的可能性大,称“穷桑”顺理成章。二是邛崃山麓。在重阳之西约2公里的西坪村对岸,重阳陈家山也称邛崃山,在重阳(雷泽)之水未退尽时,这里已成为陆地,西陵母在此植桑;“穷”“邛”同音,简称穷桑。《山海经》称:“轩辕之国,在此邛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在女子国上北。”即在此。三是王子山。在重阳之南约3公里白蜡村处,为黄帝妃子们居住之地,叫“女子国”。同时也是黄帝儿子们

的集中居住之地。有肖家沟地名，“肖”“器”同音，相传为玄器后代的居住之地。

曲阜。曲阜之地与黄帝及其后代们关系密切，但究竟在何处至今扑朔迷离。其实在荆山寻找曲阜并不难，分析认为，就在今店垭镇白蜡村，距重阳村约4公里之遥。曲阜是以地形而名，即流入重阳的白龙洞河古时为沁水，意为流入中心之水。白蜡坪为山谷间的小盆地，地形很好，在重阳坪水未退尽时，这里适合人口集居，所以被玄器选为都城。白龙洞河到重阳之间有一段峡谷，弯弯曲曲，八拐九湾，当地俗语为：“三包九锁十八滩，青狮白象把门关。”“阜”指厚土包，白蜡有“三包”，称“阜”为应有之意。后来尧帝派大鲧在此治水，以土垒坝，结果屡垒屡溃，治水失败，被大舜所杀。但“曲阜”地名却沉淀下来。探讨认为今山东省的曲阜为西周初期周公或姜太公的后人带过去的地名，距玄器时的曲阜在时间上相差1500年以上。周公和姜太公在重阳都有封地，周公的封地为周公岭，在今重阳街及背后的山梁；姜太公的封地在紫阳吕家台，把曲阜地名带至今山东不足为奇。

这里顺便提及，周族在夺取商朝天下以后，将同宗和亲朋分封到全国各地，当这些家族外迁的时候，纷纷把原居住地的地名带走，以示不忘祖宗的功德，但这样一来，却造成了全国性地名混乱，为后世的历史研究设置了重重障碍，这是当初所始料不及的。

玄器的功绩

历史上记载玄器事迹的文字并不多,大概大家根据《帝王世纪》“黄帝垂衣裳,仓颉造文字,然后书契始作”这句话,都知道仓颉造字,而忽视了玄器。其实在保康重阳,留下了玄器的传说和痕迹。

黄帝讨灭蚩尤后被尊为帝,统一了整个荆山地区。所以他分封大儿子玄器管理荆山,分封二儿子昌意管理雎山(西山),以沮水为界。黄帝和西陵母在“万寿宫”坐阵,管理“朝云之国”。

玄器之所以被称为文祖,是因为他创造了文字,又称为青阳文化。青阳是玄器的号名。所谓青阳文化,是组合名词,以玄器一生活动的两个重要地域概念而名。“青”字来源于清水河,清水河就是沮水。《黑暗传》唱词有“……三番清水泡了天,末叶先师他先占”,指的就是这条河里涨大水。三条河都流入重阳,也称雷泽,是早期雷神活动之地。“阳”字来源于朝阳山。朝阳山在两峪,是黄帝之祖父黄沮(元始天尊)的活动之地;玄器先在朝阳山,后来在重阳文祖庙造字,两地相隔仅30多里,为我国文字的起源地。

在黄帝之前,人们受鸟叫、兽吼声音的启示,发明了语音,也就是说能讲简单的语音符号,于是玄器就发明了一、二、三、四、日、月、虎、豹、熊、罴等图案,这就是最早的图案文字,也叫象形字。

玄器在两峪朝元山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文字,《龙华宝经》称之为青阳文化。开启了人们认知事物的新方法,

从此人们有了表达的新方式,使文化的记载和传播有了载体。玄器开创了历史上第一个文化新时代,那就是《龙华经》中所提到的“青阳”文化时代。为了传播文化,玄器先后设了两个讲坛:一是天坛,在今两峪乡的朝元山;二是地坛,在今重阳的文祖庙。用于扩大文字结构,创造更多的字。据重阳坪的老人们说,文祖时代,聚集了大批神人,住两坛从事制纹造字。因当时没有发明纸张,主要刻在石头、陶器、龟板上,所以荆山若留有文字符号,应是那时所为。青阳还接黄帝之位当过帝王,因他痴迷于造字,不务政事,加上在位时间很短,仅9年,所以史书上无记载,前史书和有些资料上提及了此事,不被人们注意。玄器去世时,少昊的年纪还很小,无法接替帝位,而远在若水(今香溪河)的颛顼有才有德,可担当重任,因此,西陵母作主,让颛顼从西山来到荆山接替帝位。

玄器与宗教

《辞海》(缩印本)对“宗教”的注释为: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相信并崇拜超自然的神灵,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虚幻的、歪曲的反映。宗教产生于史前社会后期,最初的宗教形式是自然宗教,如原始拜物教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宗教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演进,由崇物教而到多神教,由氏族图腾崇拜到民族神和民族神教,最后出现了世界性的宗教。

玄器被佛界尊为文殊菩萨。《辞海》(缩印本)对“菩萨”一词的注释为:“梵文‘菩提萨垂’音译的简称,意译为‘觉有情’,即‘上求菩提(觉悟),下有化情(众生)’的人。或译为

‘大士’，即‘发大心’的人。指达到自觉（自身得到解脱）、觉他（使众生得到解脱）两项佛教修行的果位者。原为释迦牟尼修行尚未成佛的称号，后广泛用作对大乘思想的实行者的称呼。一般对所崇拜的神像也称为菩萨。”《广韵·模韵》称：“菩，梵言菩提，汉言王道。”

古时，两峪朝元山山门石刻对联有“三教宗师”和“三期龙华”这两个词，许多人不解其义。单一个“三教宗师”就是了不起的事情，古时全国众多的寺庙，恐怕敢称三教宗师的为数不多，很值得探究。根据《龙华宝经》和《龙华宝忏》的注解，“三期龙华”也叫“三阳文化”，即儒、释、道是中国历史上宗教的发源地，与玄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三阳文化”中第一期为青阳文化。玄器和苍颉一起在朝阳山天元宫创造文字，著书立说。后青阳被封在江水之滨，继续造字，也是儒教的宗祖，所以也叫“文祖”。据传，他在这里主持编纂了最初的《黑暗传》《龙华经》等青阳文化精典达七十多种，近千卷（册）（后人语，因当时尚无竹简，所以无此术语）。从他开始整理、推广佛意，主持祭祀，管理荆山一带的政务；他继承黄帝的遗愿，用人祖教化百姓，深受人民的爱戴，因而后人称其为“文祖菩萨”。又因其经义是佛教的基本理论，被尊为佛教的创始人之一。在陕西省著名的旅游景区法门寺里，所供奉的16个菩萨中，就有文殊菩萨的铸像。由此可见，我国的佛教也是信奉玄器的。朝元山敢称“三教宗师”，其道理也在于此。

玄器留在重阳的遗迹

玄器造字的功绩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人们在今紫阳村建文祖庙纪念他，使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文祖庙位于重阳紫阳村靠近峡口处的台地上，占地约10亩，古时建筑很宏伟，香火很旺盛，现仍遗留有部分石器。

《白话史记》(哈尔滨出版社)里几次提到文祖庙，如第4页所记：“正月朔日，舜在文祖庙接受了尧禅让的帝位。”第7页记载：“……于是舜就来到文祖庙，召集四方诸侯进行谋划。”由此看来，文祖庙建的很早，起码在尧帝时已经有了，而且还是祭祀祖先和举行重要活动的场所。据说元军和白莲教都放火烧过文祖庙，清朝时朝廷又拨款重建。不幸的是，解放后因年久失修，破烂不堪，加之在破除封建迷信的大背景下，毁于“大跃进”运动，将其庙宇拆毁，砖头瓦块建了公社粮管所。庙里现在仍留有两块石碑：一块是明朝嘉靖皇帝拨款维修宫殿的功德碑；一块是记载清朝光绪帝在此祭祀的石碑。不想这样一处与华夏文明有着密切关系的建筑，却毁于他的一些无知的子孙们，现在唯一可以见证那个远去的时代的，是遗址上的古碑、石香炉、石门坎和断砖残瓦。

玄器的葬地

网络的资料载明，玄器葬于云阳山。那么，云阳山在哪里呢？查袁珂先生编著的《中国神话传说词典》，有两条线索可以参考。(一)云雨山。《山海经·大荒南经》：“大荒之中，

……有云雨之山。禹攻云雨。郭璞注：‘攻谓槎伐其林木。’按：所谓‘禹攻云雨’、‘槎伐其林木’，当是禹治水在此山伐木开山之意。”（二）云阳先生。“《汉唐地理书钞》辑《遁甲开山图》：‘绛北有阳石山，中有神龙池。黄帝时，遣云阳先生养龙于此，为历代养龙之处。国有水旱不时，即祀池请雨。’《汉学堂丛书》辑同书云：‘沙土之浦，云阳之墟，可以长生，可以隐居。沙土即长沙也；云阳，古仙人也。’可作上文之补充。”

通过上述线索，分析“云阳”之地当为马良镇的云旗（起）山，理由如下：其一、仙人居住之地。云阳为古仙人名。《保康县地名志》（1984年版）载：“云起山主峰较高。清晨，云海雾涛，茫茫一片，雨后初晴或傍晚，山谷间飞瀑湍湍，云聚云散。山谷平端处，天坑较多，大雨之后，水从天坑流入地下，又有烟雾从天坑内什腾起来，好象云雾起于此山，故名‘云起山’。”其二、地域接近。《保康县地名志》关于“云起山”的介绍为：“马良公社南部，东北距马良（集镇）11.5公里。”查保康县地图，云起山刚好在店垭白龙洞河（沁水）源头。而“曲阜”位于其河谷的中游的盆地。其三、有大禹治水的线索。即“禹攻云雨，槎伐其林木。”不仅如此，还有大鲧治水的遗迹，后面有专文叙述。其四、也有黄帝的线索。黄帝为大鲧的太祖，云起山山脚处便是黄坪，黄坪有万寿寺，为黄帝和西陵母的行宫。而云阳先生为黄帝时期的仙人，受黄帝所遣在此养龙。其五、文中有“沙土之浦”之语，分析此“沙土”为《山海经·海内经》中的“流沙”，即今马良镇的溪峪河，而不是长沙。其六、有“祀池请雨”处遗址。在云起山与望粮山之间有一水池，当地的确有在此求雨的传统习俗，解放以后才逐渐淡化。所以说，玄器葬此山山麓处黄坪的可能性很大。

对颡顼在荆山的释疑

杨选成

颡顼是黄帝的孙子,在五帝中排名第2位,楚人的始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影响深远的帝王。

世族寻踪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黄帝崩,葬峽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颡顼也。”

《帝王世纪》载:“帝颡顼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姬姓也。母曰景仆,蜀山氏女,为昌意正妃,谓之女枢。金天氏之末,瑶光之星贯月如虹,感女枢幽房之宫,生颡顼于若水。”

网络资料对颡顼的介绍为:“颡顼,本名乾荒,号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中国上古部落联盟首领,‘五帝’之一。颡顼始自穷桑,而迁都于商丘,后居于帝丘。《国语·楚语》说颡顼继少昊之后主政。《山海经·大荒东经》神话中说少昊育颡顼于东海。后来的虞(舜)、夏、秦、楚都成了他的子孙,成为黄帝系下与帝喾并列两系中的一系。成为中华民族

人文共祖之一。”

在保康流传的《黑暗传》唱词中有：“提起颛顼也有名，他是轩辕后代根，他是昌意所亲生，母亲昌意女佳人，夜得奇梦祥瑞生，不觉腹中有了孕，生下颛顼一帝君。孙接祖业把位登，国号高阳氏，封为水德君，七十八年把位登，葬于濮阳一座城。”

网络资料还记载有，颛顼之后有 10 个氏族系列。分别为：古蜀王；魍魎；橐杓；大鯨；大舜；昆吾；熊绎；熊训；端木豆；重黎。

颛顼的出生地

《辞海》(缩印本 2082 页)对“颛顼”条的注释为：“传说中古代部族首领。号高阳氏，生于若水，居于帝丘。”网络资料却表明“始自穷桑”，而《山海经》上说“育于东海”。作以下分析：第一，颛顼出生于荆山，这是肯定的。理由有三：一是因为他爷爷黄帝、他父亲昌意都在荆山。二是在河南新蔡出土的楚简甲三 11 号、24 号简记：“昔我先自颛顼，宅兹沮漳，以徙迁处；”甲三 268 号简记有“及江汉沮漳，遂至于淮；”乙四 9 号简记有“渚沮漳，及江，上逾取。”以上已经界定在荆山。三是其父亲昌意降居若水，颛顼生于若水，若水就是今香溪河，是荆山与大巴山的界河。颛顼号高阳，而香溪河畔有高阳镇，为颛顼在此留下的历史印记。现在有资料把若水定于四川省雅安地区，这是非常荒唐的说法。雅安在成都西南，距今西陵国直线距离上千里，千山万水之隔，况且黄帝时期的触角从来没有到过今四川省的范围，更不会把正妃西陵母的儿子封到那么远的地方。第二，“始自穷桑”与颛顼的出生地并

不矛盾,因穷桑是黄帝和西陵母的居地,孙子与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也无可厚非。第三,“育于东海”,这个“育”可以理解为教育培养。因为《帝王世纪》曰:“父昌意虽黄帝之嫡,以德劣,降居若水为诸侯。及颡顛,生十年而佐少昊,十二而冠,二十年而登帝位。”之前玄器有过9年的执政,而且在文祖庙从事造字,将颡顛带在身边培养也无可厚非。从方位上讲,朝元山、文祖庙都在古东海地界上。

曾经为帝王

司马迁对颡顛赞赏有加,以“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治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之语。其大意是:宁静渊博而很有智谋,疏旷通达而知道各种事理,养育万物充分发挥土地的作用,依照四时决定行动以便效法自然,对鬼神尽心敬事来制定尊卑的义理,治理四时五行之气来教化民众,洁心诚意来进行祭祀。

《中华上下五千年》(山西古籍出版社)所记:颡顛“为人聪明,懂得许多事情,有智谋,善于利用鬼神迷信来管制部族成员,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线装经典·夏商周》上说,“颡顛号高阳氏,他文武双全,有着非凡的经历、超人的力量,以及至高无上的权力,是一位泽被宇内、功德盖世的帝王。”

《帝王世纪》云:“颡顛在位七十八年,九十八岁,岁在鹑火而崩。”从上述记载完全可以看出,颡顛曾经为帝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且历史对他的评价很高。

治世的功绩

编纂书籍。据保康县荆山史前文化研究者汪青祥讲，颛顼接替了黄帝和文祖的事业，重新维修了天坛，又在重阳建了地坛，位置在今紫阳村靠近峡口一台地上。进一步构造文字。他安排人开始撰书，开启了人类最早的原始记录。如《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太岁经》《雷祖经》《女娲经》等，都出自高阳和高辛时代，于上坛所撰。《山海经》中的“海经”《九阳真经》《五龙真经》等书出自下坛，也是从高阳为帝时着手，到夏朝时才完成。华夏有了传书，高阳功不可没，因此众人都叫他颛顼帝。“颛顼”实为“撰书”之意。

明确五行官的职责。《史记》有“养材以任地”之句，是讲他继位后，用人所长，以蓐收为金正，荀芒为木正，玄冥为水正，祝融为火正，荀龙为土正，各司其职。首开我国古时以阴阳五行为官职的记录。

制定 24 节气和历法。《史记》中有颛顼“载时以象天”之句，其意是他安排人根据一年四季的变化，制定了 24 节气和 365 天的年度，用于指导农业生产。荆山史前文化研究者汪青祥说，我国 24 节气与重阳坪的农时十分吻合，很有可能是以重阳坪为地标而制定的。

网络资料载明：“《颛顼历》完成于秦献公十九年（公元前 366 年）。该历以夏正十月为岁首，闰置于九月以后，以该年正月初一日刚好立春为节气的计算起点。《颛顼历》有两大特点：一是其时秦政权尚僻处于雍州，不与诸侯各国交往。诸侯自大，也以夷翟之邦视秦国，所以它实行的历法，直到秦统

一天下后才推行到全国。但又因汉行秦历,才使《颛顼历》一跃而奉为历法‘正统’。二是其时古四分历理论已非常成熟,所谓《颛顼历》,只不过是月建有差,历策却仍是一个师傅下山的‘畴人’用古四分历方法拟定的。由于前367年夏历十一月初一日干支为乙卯,是用古四分历逐步推出,而《颛顼历》历家又称之为‘乙卯元’。可知,《颛顼历》不过是古‘四分历’或迳是《殷历》的一支而已。”

始定九州。据《乾隆御批纲鉴》记载,我国九州的设置区划,创置于颛顼。虽相传黄帝时有九州十二国,但不见其具体内容。黄帝战胜蚩尤部落后,在此基础上,颛顼确定兖、冀、青、徐、豫、荆、扬、雍、梁九个辖区,名为九州。

具体划法:1.(沮黄)河、济(姬水,今保康县两峪乡一带)为兖州;2.(帝丘)东南(今南漳县巡检一带)为冀州;3.东方(今南漳板桥青龙山一带)为青州;4.泗上(泗黄,今保康县马良集镇一带)为徐州;5.河(沮)、汉(漳,今南漳县板桥镇)为豫州;6.南方(板桥之南,今远安、当阳一带)为荆州;7.西南(今保康县店垭镇一带)为扬州;8.北方(今保康县歇马、后坪镇一带)为雍州;9.西方(今保康县马桥镇、神农架林区一带)为梁州。

这说明颛顼所定九州与《禹贡》所载的九州基本相同。虽无法考证《乾隆御批纲鉴》的内容和背景,但此说矛盾并不大,因大禹是颛顼的孙子,血缘关系明显。推测为颛顼时所定,大禹时仍继承,中间只有啻和尧两个帝王,在时间上间隔的不太久,其间行政区划没有大的变动也算说得过去。

《帝王世纪》集校《前言》有“岱尔秦汉,九流未泯;上稽牛

首,下屹当涂”这句话。保康县史前文化研究者汪青祥解释其意是:截止到秦汉时期,荆山上至今欧店的牛耳山,下至当阳的当涂,这一带的山名、水名并没有改变。

平叛乱。《帝王世纪》又曰:颛顼“平九黎之乱,以水承金,位在北方,主冬。”分析这句话意思为,黄帝战蚩尤后,虽蚩尤兵败被杀,但与九黎族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黄帝时也没有将九黎部落纳入其行政治理范围,以致于把这个难题留给颛顼,让他面临平息叛乱或安抚九黎族之民。考证九黎族部落之所在,分析认为就在今歇马镇九里一带,距颛顼的执政地穷桑仅一山之隔,约上百里路程。这里山高沟狭,民性彪悍,加上黄帝杀蚩尤时已种下的仇恨仍未消除,颛顼采用恩威并重的方法,最终使其臣服。

规范祭祀活动。传说在黄帝晚年,九黎族信奉巫教,崇尚鬼神而废弃人事,一切靠占卜来决定。百姓家家有人当巫覡搞占卜,人们不再恭敬诚意地祭祀上天,也不安心于农业生产。颛顼为解决这个问题,决定改革宗教,他亲自净心诚意地祭祀天地和祖宗,为万民作出榜样。又任命南正负责祭天,以和洽神灵。任命北正黎负责民政,以抚慰万灵。引导百姓尊重自然规律从事农业生产,鼓励人们开垦荒地,禁止民间以占卜来通人神的活动,使社会恢复正常秩序。

治理水患。《山海经·海内经》称:“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訖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这条记载说明共工是炎帝的后人。黄帝为帝时,荆山之中有许多山谷相连,水无处排泄,形成湖泊,水患严重,泛滥成灾。当时共工为管水的大臣,负责治水。

为治理朝元山下的湖泊,共工与颛顼的意见相冲突。颛顼的意见是挖开土地垭,湖水从马槽石、西坪排入沮水;而共工嫌这个方案太费工,主张挖开重溪峡口,水直接排入雷泽。县官不如现管,结果共工指挥民工挖开峡口,导致重大的崩岩地质灾害,还淹没了下游的农田和房屋,这就是“共工撞倒不周山”的事实真像。有典籍记载不周山在甘肃,毛泽东诗词中也有“不周山下红旗乱”之句,这是误解。如果此论点成立,那么请问那里是否有黄帝、炎帝、西陵母、玄器、颛顼等人的线索?是否有后来大鲧、大禹治水的线索?是否有江、淮、河、济四渎的地理?若无上述起码的证据链,其论点是无法立起来的,也无法自圆其说。

颛顼与巫术

我国的巫术起源很早,而且与颛顼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对巫术的注释。《说文》注:“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古者巫咸初作巫。”又:“灵,灵巫,以玉事神……”《汉语大字典》对“巫”字的注释为:“旧时以装神弄鬼替人祈祷为业的人,女称巫,男称巫覡。”《楚辞》上讲,女巫同冰夷相识,恩爱相加。冰夷起码能追溯到黄帝时期。据汪青祥说,男覡姓竹,在今南漳县巡检镇竹坪居住。

起源。从原始社会后期到秦朝,由于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能力非常低下,总认为有神明在主宰这个世界,希望能与神明沟通,所以,使用巫术这种虚构的、超自然能力的行为则很受尊崇。巫师则被认为是一种掌握了某种超自然法力的或具

有特异功能的人,只有通过他才能与神明沟通来祈福禳灾或达到某种目的。后来,随着人们需求面的扩展和需求量的增大,巫术活动便发展到占筮、天官、医治、祈雨、祓禊、娱神、降神、诅咒、设蛊、算命、相面、祭祀等各种活动。相传巫咸是商王太戊的大臣,是用筮占卜的创始者,也是占星家。《史记·殷本记》载:“帝太戊立,伊陟为相……伊陟赞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太戊》,……帝祖乙立,殷复兴,巫贤任职……”从而推动了巫术的发展。

早在黄帝时期,就出现了“灵山十巫老”。当年黄帝战蚩尤,由于蚩尤部落武器先进,作战勇敢,炎黄部落损兵折将、无计可施时,巧遇灵山十巫老的帮助,用十阵法打败了蚩尤部落。这件事足可见灵山十巫老的神通广大,不仅会巫术,而且还会排兵布阵。那么,灵山十巫老在哪里呢?史称“荆山九灵”只找到了3处:为西灵山、朝元山和鹫峰山。因为《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对“灵山”的注释为:“道家以蓬莱山为灵山”、“释家以灵鹫山为灵山”。两峪朝元山古称蓬莱山,灵鹫山就是鹫峰山,在马良镇五虎。西灵山就是重阳陈家山,西陵母的住地。

颛顼敬鬼神。巫术与鬼有密切的关系。颛顼是黄帝之后的第二位帝王,也是楚人的始祖。《史记》上讲他“对鬼神尽心尽事来制定尊卑的义理”,说明他已经在建立用“巫”来统治民众的理论。《拾遗记·神农氏》有:“奏九天之和乐,百兽率舞,八音克谐。”《帝王世纪》记:颛顼“命飞龙效八风之音,作乐五音(巫音)。”《竹书纪年·帝舜元年》有:“即帝位……击石拊石,以歌九招,百兽率舞。”这些都是古人敬天敬神场

面的真实写照。在保康县南部传承的、已被定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沮水巫音》，很可能就是颛顼时祭祀天地和神仙的乐曲的起始，后来逐步完善，被楚国定为宫廷乐曲。

颛顼的活动范围

《山海经·大荒南经》载：“有国曰颛顼，生伯服，食黍。有鬲姓之国，有苕山，又有宗山，又有姓山，又有壑山，又有陈州山，又有东州山，又有白水山，白水出焉。而生白渊，昆吾之师所浴也。”

这段话记载了颛顼曾经在这里坐位，与“自穷桑徙商丘”的记载相吻合。接着介绍这一带的出产之物和地理：“黍”是指红高粱；“苕山”是山上出红薯；“宗山”是山上有棕树；“壑山”是指山上的沟很深；“陈州山”为程岐山，在两峪乡境内；“东州山”为东坡岭；“白水山”为大包寨；“白渊”为东汉河，白民民国居地。这一片的地名与两峪乡的地理相吻合。

《帝王世纪》所载：“颛顼氏自穷桑徙商丘，于周为卫，在《禹贡》冀州太行之东北，逾常山，及兖州桑土之野，营室东壁之分，豕韦之次。”《五帝本记》所记：颛顼“东至幡木，南至于交趾，北至幽陵，西至于流沙”。考证这些古地名所在，可以对颛顼的活动范围作大致界定。分析认为都在荆山范围之内。对“穷桑”地名，前面已作解释，这里不再赘述。据保康县荆山史前文化研究者汪青祥称，“商丘”地名在今南漳县板庙镇龙王冲，他在《讲古话重阳》之书“神农封山大森林”一文中讲，帝喾有两个儿子伯阍和实沈，因闹不团结，尧帝只好

将兄弟俩分开,将伯阏封到商丘。请注意,这个商丘就是后来商汤的祖居地,与板桥镇殷家山很近,这就是后来商朝为什么冠以“殷”的根由。也说明颛顼势力开始向沮水以东渗透。而河南的商丘是商朝都城迁徙中带去的地名,因为它的证据链缺失,所以将河南濮阳定为颛顼的故里是站不住脚的。“于周为卫”是讲将周族(后稷)部落的封地作为护卫,也就是说为邻。那么后稷的封地在那里呢?起初在今两峪乡程岐山,距殷家山仅10公里。“冀州太行”的意思是太行山在冀州范围内,古冀州分上冀、中冀和下冀,中冀在兖州的地界上,而兖州在今两峪乡。分析此太行山指今荆山的聚龙山段。“常山”即常羊山,在今五虎(乡)境内。“东壁”一词,分析与东海和东君、东王公有关,也可以分析为东方之崖壁,即南漳县板桥镇殷家崖。“豕韦”是夏朝时的部落名,彭祖的后裔,夏朝的同盟国。这里可以理解为该部落的住地,分析也在殷家山附近。有典籍记载商汤曾灭豕韦,因为汤伯在重阳灭夏(桀)朝,商朝初始的都城仍在保康县重阳,如果不是利益冲突,商汤是不会讨灭豕韦的。“蟠木”就是在今南漳县板桥镇蟠家山,最早的蟠豕山,将“蟠豕”写成“潘家”是后人的笔误;“交趾”即盘古的脚趾,今宜昌市的云池;“流沙”即今保康县马良镇的西峪河,《山海经》中有记载;“幽陵”在今保康县歇马镇玄虎,属于最古的幽州。从上述一系列地名来分析,颛顼在荆山的活动地域并不大,仅在以保康重阳为中心方圆两百公里的区域里。

颛顼的葬地

寻找颛顼葬地的具体地点并不难,有关典籍上如下记载:《史记》仅用“颛顼崩”3个字,没指葬何处。《帝王世纪》所记:“颛顼在位七十八年,九十八岁,岁在鹑火而崩。葬东郡顿广阳里。”另据《山海经》所记,颛顼死后葬于附禺山。颛顼逝世后,被安葬在西山附禺,《山海经》称乌隅为附禺,实际上有点儿区别。乌(巫)隅是十巫老的住地,古称濮阳,为濮地之阳,在谭其骧著《中国历史地图集》上有标注。附禺在乌隅之旁。在今马良镇云旗山一带,而乌隅却在马良镇水田一带,相隔仅几公里。《山海经·大荒北经》曰:“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东海(重阳以东)北海(保康后坪、城关)以外,马良镇的老荒扒之中,黄马河与沮水之间,今云旗山和赵家山一带,颛顼和他的九个妃子埋葬在这里,这个记载与《黑暗传》所“葬于濮阳一座城”的歌词相符。至于《帝王世纪》里提到的“东郡”,在《春秋传》中曰:“卫,颛顼之墟也,谓之帝丘。今东郡濮阳是也。”仍然指濮阳。

还有其它线索可作印证。这里在沮水以西,有西灵之山,原是昌意的封地,颛顼继承。有玄囂的葬地云阳,有昆吾和彭祖封地,还有丹山、丹水、彭城等地理座标,关键是要对照典籍的记载到实地考察,而不是坐而论道,一定会有惊人的发现。

寻找帝喾在荆山的踪迹

杨选成

帝喾即高辛，也叫白帝。在五帝中排位第三，也在荆山也留下了许多活动的踪迹。

高辛的世系

《史记·五帝本纪》曰：“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蟠极，蟠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自玄嚣与蟠极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高辛于颛顼为族子。”又记：“颛顼崩，而玄嚣之子高辛立，是为帝喾。”

《帝王世纪》曰：“帝喾高辛氏，姬姓也。其母不见。……年十五而佐颛顼，三十登帝位，都亳。”

玄嚣的儿子为喾。帝喾后世拥有庞大和极其显耀的世系，其后代都有天下之份，在我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列举如下：喾的元妃叫姜源，生一子，名弃，史称后稷，是我国农业之祖；其后代姬昌，是我国历史上很显赫的贤德之王；其姬发（周武王）推翻了商王朝，建立了西周王朝。次妃简狄，生一

子,名契,为商朝的祖先,后代成汤推翻了夏王朝,建立了商王朝。第三妃名叫庆都,又名陈都氏、陈酆氏,生子放勋,即尧帝,为五帝之一。四妃常仪,取訾氏。生子摯,也曾登过帝位。

据有关资料表明,啻的几个儿子,契繁衍 400 多个姓氏;后稷繁衍 1000 多个姓氏;尧繁衍 60 多个姓氏,合计达 1500 多个。而且有不少大姓,如王、刘、杨、周、吴等。

又据有关资料表明,“相传帝啻生于穷桑(西海之滨),其祖父玄器,是(黄帝)次妃女节的大儿子。父亲名螭极,帝颡顼是其伯父。”

从血缘关系上讲,帝啻的曾祖父黄帝居于轩辕之丘,即在今重阳周公岭;言“都陈”,即在陈家山建过都;曾祖母西陵母居女子国即陈家山南麓,这里有王子山地名,碧云宫位于陈家山山顶处;祖父玄器“始自穷桑”即陈家山的另一个山头;伯父颡顼“邑于穷桑”也在这里;文中虽然没有父亲螭极的什么信息,但这个“螭”是否就是黄帝的葬地峽山的“峽”字异写呢?应该作为一条重要的线索考虑。

帝啻的出生地,正史上没说,网络资料说相传在穷桑。“穷桑”之地在探讨玄器、颡顼时都涉及到这个地名,分析认为在今马良镇西坪村,小地名叫余家岗子的可能性大。《山海经》称:“轩辕之国,在此邛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在女子国之北。”即在此。“女子国”是西陵母在此山为黄帝设嫔妃之住处,在重阳陈家山之南。此地有王子山地名遗存,是黄帝 25 个儿子们成长的地方。有其子必有其母,所以称女子国为应有之义。那么,“西海之滨”又是怎么回事呢?分析认为,西海之滨是指“穷桑”的方位。重阳周公岭和重溪峡河正

好处于子午线上,将荆山划为东南西北四部分,即称为“四海”。而邛崃山正好处西面的起点处,所以叫“西海之滨”。此范围也叫“西域”,而且是我国最原始的“西域”之地,现新疆和青海的西域是西汉以后才叫成的,比这里要晚几千年。

《山海经》中的大泽指雷泽(重阳),说明至白帝时,其部落已逐步渗透到低山,而且进入重阳盆地的边缘。在紫阳村,古人为了纪念文祖菩萨专门建造了文祖庙,很宏伟,遗址尚在。而文祖是黄帝的长子玄嚣,帝喾之父,这也可以作为帝喾在重阳的一条佐证。

受封为国

《帝王世纪》曰:帝喾“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曰逡。”典籍记载的很清楚,他是黄帝的曾孙,身世不凡,有着很高贵的血统,为他后来称帝铺平了道路。更为奇特的是他长相奇异,一生下来就会说话,而且知道自己的名字,说明他得到天赋,也可以理解为被神话。

《山海经·大荒东经》载:“有白民之国。帝俊(少典)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山海经·海外西经》记:“白民之国,在龙鱼(今两峪集镇)北。白身,披发。有乘黄……乘之寿两千岁。”“有大泽之长山,有白氏之国。”又:《山海经·大海东经》有:“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于此,弃其琴瑟。有甘山者,有甘水出焉,生甘渊。”

白民氏国的区域,分析就在今两峪乡东部的芭桃、马良镇

的五虎一带,有以下的地名线索为依据:“龙鱼”即两峪的地理特征。两峪即两鱼,为东汉河、西汉河的两条龙脉,实际上是伸到河心的两匹石质小山梁,此两个小山梁在上世纪农田基本建设中被炸掉改了田,当地人至今记忆犹新。“大泽”指重阳雷泽。《山海经》中记载有“雷神在雷泽,鼓其腹,在吴西。”“长山”指长岭、长留山,即从荆山主脉龙坪延伸而来一匹巨岭,落脉于重阳(大泽)。“东海”指在今重阳以东地区,已有专文叙述;“大壑”即大沟,指峡峪河峡谷;“甘水”即鹫峰的滴水;“甘渊”指峡峪河,也叫旻谷,即羲和浴日处。郝懿行说:“白帝少嗥其神居长留山”。长留山就在今两峪乡的白庙、长埡、五虎一带。

通过对以上典籍的记载来分析,白民氏国是炎帝和黄帝祖母之国,也就是说,是史前三皇后期华夏族的发祥地。从两峪朝元山、白果园、长埡、到鹫峰都是白民之国的地界,是黄耆、黄沮、燧人氏的居住地。白民氏国当时是个大部落,其中心区域在长埡一带,这里有白庙大遗址,当地群众把白庙说成百庙,说古代在这里建了100座庙,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其实是纪念白帝尝的庙宇,由于后人的误判所致。

黄帝成年后,做了少典部落的首领。因其祖母属白民氏国,于是白民氏国的人兴旺发达,地盘越来越大,在蚕食中侵占了炎帝部落的利益,成为炎黄大战的导火索。到后来,实现了炎黄部落联盟,黄帝的儿子玄嚣、孙子颛顼也在荆山执政。作为颛顼的侄子,并且一直跟着颛顼帝的高辛,就被封为白民氏国的国君(部落酋长),不可能另起炉灶,迁居到荆山以外去。

政绩昭著

帝誉才智过人，所以接任颛顼成为第三位帝王。他能顺应天时地利，爱护百姓，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因而深得人心。《线装经典·夏商周》上介绍：“他生而神灵，自言其名，长大成人后继承了颛顼的帝位，因他兴起于高辛，史称高辛氏。”因而《史记·五帝本纪》有“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意，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获得了历史的好评价。

一是治理洪水。古时候由于荆山地区水流排泄不畅，所以经常发大水。高辛治理洪水的办法是垫，即加高地势。这种办法是治标之法，有一定效果。但有时候刚刚把一个地方垫高为居地，洪水一来又冲毁了，老百姓仍然无法安居。相传誉帝看到这种情况，一气之下跑到天庭，向玉皇大帝反映，并和玉皇大帝据理力争。玉帝觉得誉帝说的有道理，便派天神下凡，把洪水排泄掉，使被水淹过的地方重新成为陆地，百姓们重建家园。很明显，这个故事是神话，为后人杜撰，不足为凭，但可以说明一个问题，誉帝为了百姓利益，不畏权势，敢于说实话，报实情，这是值得称道的。

二是增加食物。在誉帝执政时期，还没有大规模地种植粮食的举措，人口逐步增多，而野生动物却在减少，所以食物很短缺。他一直在寻找可食用的物品，增加食物的品种。如发现了红薯，《山海经》上称苕山。《山海经》上讲食黍，说明此时也发现了红高粱这种粮食。《帝王世纪》所记：“帝誉氏都亳……”，“亳”与“燹”字通假，棘下生人，说明此时荆棘果

(俗称木楂果)已经是重要食品了。《山海经》上还特意介绍了苦梨子(乌梅)这种山果,称“食之不劳”,推测也是一种普遍食用的食品。

三是创作音乐和舞蹈。帝啻性格开朗,乐观,因而高辛又有“高兴”之意。《山海经》上记载他“弃其琴瑟”,亦说明此时已经有乐器了。相传他酷爱音乐,命令乐师咸黑创作了“九招”“六列”“六英”等歌曲;吩咐乐垂制作鼙鼓、钟、磬等乐器;又指挥64名舞女身着色彩斑斓的衣裳,伴着歌曲翩翩起舞。当宫廷奏响音乐的时候,凤凰、大翟等稀世仙鸟都飞来翩翩起舞。在古人看来,只有德高望重,品行卓越的人方能招来凤凰,帝啻就是这样的人。

四是富有智慧,巧妙破敌。有典籍记载他从15岁起就跟着颛顼学习执政,通过言传身教,积累了智慧,增长了才干。有一件突出的事例,讲他帮助颛顼化解危局。相传一次有9个部落(方国)约定来攻打颛顼的部落,形势很危急。颛顼看到啻的头脑灵活,足智多谋,想考验他一下,便让他出破敌之策。啻分析说,9个国家同时攻打我们,我们若处处设防,首尾难顾,很难取胜。但9个国家虽然表面上行动一致,内心却各有盘算,都想独占我们的财富,他们必然彼此提防,这种情况有利于我们使离间之计,让他们先起内讧,然后再各个击破。颛顼依计而行,对几个行动积极的国家放出流言,让他们互相怀疑,互相牵制;稳住行动迟缓的国家,让他们互相观望。结果这些国家很快中计了,互相打成一锅粥,颛顼及时派出部队全线反攻,很快粉碎了9个国家的进攻。

五是封犬丘国。有一件奇事值得一提。相传有一次,帝

喾携妻子南巡，走到云梦泽时，传出吴将军（房王）叛乱。这时调兵已来不及，帝喾便采取了擒贼先擒王的策略，许诺谁能取下吴将军首级将得到重赏。结果帝喾的神犬将吴将军咬死，很快平息了这次叛乱。《后汉书·南蛮传》也有此记载。荆山史前文化研究者汪青祥说：狗头国就是犬丘国，位于距重阳仅6公里的重岐峡，后来又被封到房子国，就是今房县。保康县流传《黑暗传》歌词里也有王犬立功受封的情形，摘录如下：“王犬领命见房王，正遇房王睡的香，一口咬下房王头，含回首级来复命……王犬立即来谢恩，竟与美女成姻亲，生有五男并六女，才是狗头国的根。”

“八元”助政

《史记·五帝本纪》曰：“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谓之‘八元’。……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有学者特别指出，舜任命“八元”辅佐政事，使政事减少失误，引导社会风气。

何谓“八元”？《辞海》（缩印本）注释为：“古代传说中的八个才德之士。《左传·文公十八年》：‘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奋伯、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八元”和“八恺”都是上古时代的才子。古语还有“才高八斗”之句，也说明他们文才之高，无人能比。

现在不探讨八元如何辅政，而是通过八元的居地来分析喾的执政之地。保康县荆山史前文化研究者汪青祥著《讲古

话重阳》一书有“才子隐居八斗坪”一文。八斗坪是个地名，位于重阳至马良集镇之间，沮水河边。这里是一处狭长的谷地，背靠大山，面朝沮河，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因他们有才能、有功劳，被封于八斗坪刘家台子一带。八斗坪距高辛的执政之地仅 10 公里之遥，符合情理。除了“八元”之外，据传辅佐颛顼的“八恺”也在这一带居住。

后来为什么改为“八斗坪”了呢？传说，这 16 位才子官越做越大，个个都手握重权，多次得到了帝王的赏赐，但后代却出了些不肖子孙，好吃懒做，赌博成瘾，债务缠身，家产逐渐抵光。一位秦姓的庄主见机用八斗银钱买下了这个地盘。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个坪可撒八斗芝麻种，可见面积不小。“八斗坪”这个地名便从此沉淀下来。

行踪分析

《史记》没有记载啻帝以哪里为都，只有封地在故白民氏国地域里。《帝王世纪》曰：“三十登帝位，都亳。”又：“帝啻氏都亳，今河南偃师是也。《禹贡》外方之城嵩之北。或言在梁，非也。”《帝王世纪续补》曰“帝啻作都于亳，偃师是也，王莽之所谓师氏者也。”

《史记·郑世家》：“高辛氏有二子，长曰阍伯，季曰实沉，居旷林，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迁阍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

寻找帝啻的踪迹，有两个地名值得注意，即“商丘”和“亳”。最早商丘在哪里呢？作如下分析：玄鸟是古佛鸿钧老祖

的后人，玄天的胞妹，称玄鸟，名鸷英，商族的始祖。今马良镇鸷峰村古时建有鸷峰庵，相传鸷英与喾的两位夫人简狄、胎女在此居住。她们俩各为喾帝（高辛）生了个儿子，长子叫“伯阍”，次子叫“实沉”，长大后也被封居住在这里。可是弟兄两个闹不团结，成天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吵闹闹，甚至发展到大动干戈。尧帝知道后只好让他俩分开，把伯阍封到商丘（今南漳县板桥镇龙王冲），把实沉封到大夏（今重阳）一带，把大森林封给了唐国，叫“唐庵国”；其国主叫“唐叔虞”，后被周成王所灭，又将其地封给了太叔仲雍。

由于商丘是颛顼的势力范围，距白民氏国比较近，则可以倒推帝喾的势力范围已经覆盖到这一带。至于河南的商丘，分析是其后人北迁时带过去的地名。

“亳”字的来历不简单，因为它与蟠冢山的“蟠”同音，又是商族人的始居地，与华夏民族的发祥地有很密切的关系。蟠冢山是一个很值得追寻的山名，理清了蟠冢山地名的来龙去脉，能使人们对远古时期人口流向有一个大致把握。

《汉语大字典》（缩印本）对蟠冢山注释为：“在今甘肃省天水市与礼县之间。古人认为该山是汉水的上源，此即班固、郑玄、酈道元等人所谓西汉水所出蟠山。《尚书·禹贡》‘岷蟠既艺’。孔传：‘岷山、蟠冢皆山名，水去已可种艺’。孔颖达疏：‘《地理志》云：蜀郡有湔道岷山，在西徽外，江水所出也；陇西郡西县蟠冢山西，汉水所出，是二者皆山名也。’《晋书·张载传》：‘远属荆衡，近缀岷蟠’。”

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对“蟠冢山”条介绍为：1. “在陕西沔县西南，接宁羌县界，汉水所出。《尚书·禹贡》‘蟠冢导

漾’即此。亦称蟠山。《水经注》汉中记曰：‘蟠冢以东水皆东流。蟠冢以西水皆西流。故俗以蟠冢为分水岭。’2. 在甘肃天水县西南六十里。《汉书·地理志》西县有《禹贡》蟠冢山，西汉水所出。3. 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蟠冢有二，一在陕西汉中府宁羌州北九十里；一在巩昌府秦州西南六十里。’”

自古就有禹分九州之说，是根据《尚书·禹贡》而来；在大禹治水中，曾数次提到蟠冢山。1. “东到华山之南，西到黑水之滨的地区是梁州；岷山、蟠冢山经过治理可以种植……”2. “开通了九条山脉的道路……熊耳山、外方山、桐柏山直到负尾山；开通蟠冢山直到荆山；”3. “疏通了九条河流……从蟠冢山开始疏导漾水……”

《五帝本纪》所记：颡项“东至蟠木，南至于交趾，北至幽陵，西至于流沙，”考证这些古地名所在，都在荆山范围之内。蟠木就是今南漳县板桥镇蟠家山，即最早的蟠冢山；交趾即盘古的脚趾，今宜昌市的云池；流沙即今保康县马良镇的溪峪河；幽陵在今保康县歇马镇玄虎，属于最古的幽州。《祖师经》曰：“伏者五帝发源于青龙。”南漳县板桥镇的潘涿山正是青龙山，下有“五皇垭”“东瀛庵”等地名和遗址。

在对荆山地区的历史研究中，也获得了关于蟠冢山的两条信息：一条是在今邻近保康县两峪乡的南漳县板桥镇有潘家山。潘家是蟠冢之误。这一带是白民氏国的驻地，帝喾和尧舜封地都在这一带，古青铜器上的蟠虺纹就起源于这里。另一条是古妫水，《山海经》上叫黑水，就是今保康县马良镇峡峪河，上游由两条河组成，一条叫黑水，又叫姜水，为神农采姜之处；另一条叫赤水，今薛家河；《山海经·大荒南经》记

曰：“大荒之中，有不姜之山，黑水穷焉。又有贾山，汜水出焉。又有言山。又有登备之山……”也是指的这条河。

综合上述诸多线索，提出如下见解：

第一，最早的蟠冢山在荆山之中。依据有：一是蟠冢山（潘家山）的所在地是华夏始祖活动的地方。黄帝出生于姬水，古姬水就是今聚流河，距蟠冢山不到 20 公里；后来帝誉、尧、舜都在此一带执政，相距更近；神农娶涂山之女，涂山距蟠冢山也很近；古黑水的发源地就在蟠冢山。二是“蟠”与“亳”“棘”同音。《汉语大字典》关于对“棘”字注解是，《说文·人部》“棘，犍为蛮夷。”其实，当地对这个字还有一种解释，棘果为野果，可以充饥，棘下作人，意为靠野果子生存。这是原始社会生活的写照。至于“亳”，《汉语大字典》的注释为：“《文源》称：‘亳与毛不同音，亳字当为殷（商）汤所居的邑名，’意为京宅。”古邑名，商汤时都城。有三处：谷熟为南亳，汤都，今河南省商丘市东南。蒙为北亳，汤受命为盟主之处，今河南省商丘市北。偃师为西亳，盘庚迁都于此，今河南省偃师县西。不过，重阳熟读古籍的老先生则称，商都八迁，起初的五迁都在荆山中。最早的南亳可能在今南漳板桥镇一带，因为商汤是从这里起兵讨灭夏桀；或者说后来迁都于远安、当阳一带的平原上。为什么这样讲呢？殷商之祖位于蟠冢山，汤伯灭夏桀后把族人迁往丰腴之地的远安、当阳，建立权国，符合情理。这也说明从原始人到夏朝，华夏始祖一直在荆山活动。典籍记载，权国国君为商武丁之后，武丁曾讨伐荆蛮，这恐怕不是巧合，而是有意识的行为，后楚武王报仇，首先灭了权国。

第二，陕西的蟠冢山是从荆山过去的。前面已经分析过，

荆山之中的蟠冢山与华夏始祖关系密切,从一系列的证据都可以说明这件事。殷商后期,由于荆山之中人满为患,氏族部落纷纷外迁,另谋生路。在这种情况下,把地名带过去是件很容易的事。笔者分析,有可能是周古公或羌族所为。

第三,对蟠冢山地名外移时间的分析。蟠冢山的外迁时间不会太早,因为一下子迁徙的那么远,肯定是荆山附近的好去处都被人占据。从商汤伐夏桀的情况来看,应在商汤以后,这一时期的人口迁徙频繁,已经形成了潮流。周氏部落外迁的信息应该引起注意。该部落也是黄帝之后裔,后稷是周氏之祖,传到古公时已整整 12 代,在汾地(远安县苟家埡)居住,这时荆山北部的獯育族屡屡去侵占周族的利益,古公仁慈,不忍心杀戮,便举族远涉千里迁到岐下居住。这个岐下在宝鸡,距天水很近。《史记》上讲,汾地的人们全部扶老携幼到岐下归附古公。这就提供了一种可能,即蟠冢山地名就是那时带过去的,或者说是归附古公的其它部落带过去的。因为荆山是三皇五帝的发祥地,文字、语言先进,把荆山中的地名带过去在情理之中。

历史上“姜”和“羌”都是大部落,是神农的后裔。两峪乡有姜家大洞遗址,商的元妃叫姜源;羌姓部落住涂山,有羌岐岩地名,距周族的汾地很近,受古公影响,举族迁到陕西或甘肃不足为奇。再加上“成汤驱羌”及后来分封,把羌姓部落迁到那里去也有可能。这个推论也可以作为西羌人溯源的主要线索。

至于西迁的准确时间,分析在殷商末期,因为古公下传三代就是周文王。周文王是殷商的掘墓人之一,约在公元前

1100年。而《尚书·禹贡》成书于战国时期,约公元前400年左右,有700年的时间差。

第四,古语有“远属荆衡,近缀岷嶓”这句话。为什么远属荆衡?荆(山)州和衡山与嶓冢是什么关系?远可追溯到什么时期去?可惜没有这方面的探讨文章问世。不过,这句话也透露出嶓冢山在很早以前属于荆山和衡山系列,而荆山和衡山(宜昌夷陵)都在南方。至于“近缀岷嶓”就很好理解了,肯定是后人的连缀,因为有了这个地名,就不计其余地生拉硬扯,在历史、在现实这类例子很多。

第五,还有一条重要原因,即古公外迁时还没有统一的文字。周族和羌族是什么文字不知道,荆山文化从那时就开始流失,这可能是荆山中的嶓冢山反而没有被《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收录的主要原因之一。

啻与凤的关系

啻的长相奇特之一是他头似鸟,全身毛发密布。大概由于他生着个鸟头,所以他很爱结交五彩鸟。五彩鸟分三种:一种是凤鸟,另一种是鸾鸟,第三种是凰鸟,实际上,他们是古代经常提及的凤凰。五彩鸟长得像鸡,生着五颜六色、绚丽多彩的羽毛,它们不食人间烟火,经常自己起舞,自己唱歌,只要一现身世间,天下就会太平祥和。啻帝能招来凤凰一起跳舞,客观上说明他为帝时属于太平盛世。

凤凰是传说中的一种瑞鸟,四灵之一,百禽之王。《大戴礼·易本命》云:“有羽之虫三百六十,而凤凰为长。”《山海经

·《大荒西经》中记载一种鸟叫五彩鸟,有三种名称:皇鸟、鸾鸟和凤鸟。《毛诗·陆疏广要》释之云:“龙乘云,凤乘风,……众鸟偃服也。”可见它和龙一起构成了龙凤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凤凰是一种图腾,相传为西陵母所创。楚人雄居南方,崇凤。《尔雅·释鸟》所记:凤“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莫宿凤穴,见则天下安宁。”上述地名在保康县都可以找到,在多篇文章中已作探讨,这里不再重复。保康县带凤的地名很多,关于凤凰的传说更为普遍。就在啻帝执政地五虎、历山一带,就有东风头地名,而且被作为行政村名。而这个地方正是神农所创办的君子国之地,是否与若干年后的啻帝有什么内在联系呢?有待深入探讨。

帝啻在位70年,到105岁那年去世,他的儿子挚接替了帝位。通过分析认为,有充足的理由说明,啻帝在荆山活动及坐位的论点是能够成立的。

探讨尧帝在荆山

杨选成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到五帝，人类走过了漫长的路程。到尧帝时，社会形态已开始进入奴隶社会，由小部落向大部落发展，并向部落方国过渡。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尧帝充满赞誉之词，称“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

身世神奇

《史记·五帝本纪》曰：“帝尧者，放勋。”《帝王世纪》所记：“帝尧陶唐氏，祁姓也。母曰庆都，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名曰放勋。”尧的母亲是啻帝（高辛）的第三个妃子，叫庆都，她的父亲（尧的外公）是伊耆侯。尧是啻之子，姓伊祁，号放勋。啻有5个儿子，长子曰摯，次子曰弃，三子曰契，四子曰尧，五子曰台玺。

关于尧的出生，也有一个神话传说。庆都虽然出嫁了，但经常在娘家住。有一次，庆都和父母在一个湖泊里游玩，正午

的时候,忽然一阵狂风卷着一片红云吹来,在船周围形成了一股龙卷风,似一条小龙扶摇直上,升至半空。当天夜里,庆都正在睡觉时,忽见一条赤龙向她扑来,她立刻被吓昏了过去。第二天早晨醒来,她发现身旁留有一张画像,朱红色,脸蛋上尖下圆,八采眉,长发下垂,画旁还写有“亦受天佑”四字。此时,庆都已感到有孕在身了。

过了足足14个月,庆都生下一男孩。这个男孩长相与那张画一模一样,他就是后来成为圣明之君的尧帝。这显然是杜撰而来,大凡古人在歌颂某一位英雄人物时,一定赋于其神话传说,以神仙下凡或神仙托生来渲染气氛。

但是,探讨尧的出生地,这个故事提供了三条重要线索:

第一条是尧的外公伊耆侯,也就神话故事所提供的地域背景。故事讲庆都和父亲在一个湖泊里游玩,遇到一股狂风卷着红云扑来。通过分析,认为这个湖泊就是雷泽,也就是现在的马良镇重阳坪。《山海经》上讲,“雷泽中有雷神”。帝喾的执政之地在长山,长山的落脉于雷泽,庆都的娘家就在雷泽岸边居住,所以才有条件坐船游玩。

第二条是丹陵,尧的出生之地。毫无疑问,丹陵是一个地名。那么丹陵在哪里呢?查遍《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国历史地名辞典》《中国神话传说词典》和《辞海》,竟然都没有收录“丹陵”这个名词,说明古人也没有确定丹陵在哪里,因此不得不对这个地名进行揣测,认为此丹陵之地就在马良镇重阳村的西庵。其理由如下:一是此一带属丹山。《山海经·南山经》曰:“又东五百里曰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因这一带在地质上属丹霞地貌,所以称丹山。丹水是后

来尧子朱的受封之地,是为丹朱。丹山之南有丹阳,后来楚熊绎所居处。丹陵紧邻丹阳,陵为高丘,疑为陈家山台地,高丘之下就是西庵,邻近重阳湖泊,与庆都父母的住地相吻合。这就说明了庆都在娘家生了尧。

第三条是陶唐。尧帝为陶唐氏,是以封地为姓氏。这里的“陶”为今南漳县板桥镇陶家寨,邻近誉帝的执政地长留山。怀疑此地为我国陶器的起始。陶为陶土,繁体字的“尧”为3个“土”字架在“兀”上,像个支架,使其腾空,暗示着烧制陶器。唐为唐国,最初在马良镇鹫峰村,先为誉帝妃子简狄和貽女的住地,后为誉的两个儿子伯阙和实沈的封地,在探讨誉帝时已经把唐国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了,这里不再赘述。

建都平阳

《帝王世纪》有记:尧“年十五而佐帝摯,受封于唐,为诸侯。尝(常)梦攀天而上之,故年二十而登帝位。以火承木,都平阳。置敢谏之鼓,天下大和。命羲和四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岳。”尧是我国古代最圣明、善良的帝王。尧为帝时,以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而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他所住的宫殿是用粗木料垛成的,椽木檩条都是粗糙的木料加工而成,屋顶用茅草铺盖修葺而成。因而《淮南子·精神训》称:“茅茨不翦,采椽不斫;朴桷不斫,素题不杆。”他吃的是粗糙的米饭,喝的是野菜汤,穿的是用葛麻布织成的衣服,冬天为了御寒,常披着一张普通的鹿皮。平常使用的锅碗瓢勺等用具,也都是自己亲手制作的。以致于后人熊绎以他为榜样

艰苦创业。由于他勤俭朴素,见微知著,任人为贤,非常关心老百姓的疾苦,将天下治理的井井有序,政通人和。哈尔滨出版社出版的《白话史记》说:“他(指尧帝)的仁爱如天之涵养,他的智慧如神之微妙。……能够宣明恭顺的德行,因而能亲密地团结九族。九族既已团结和睦,就能够明确地划分百官的职责。百官资绩昭明卓著,万邦诸侯融洽和谐。”

尧以自己的以身作则带动了大家的艰苦创业。比如司徒舜,司马契,农师后稷等官员,都能够做到尽职尽责。特别是尧的弟弟、周族的祖先后稷,尽力发展农业,广种粮食,解决了食物短缺的问题,使百姓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在尧为政期间,无论是水旱灾害,还是酷暑严寒,老百姓都毫无怨言,团结友爱,和睦相处,共度难关。

探寻尧的执政之地,也有两条重要线索,即“平阳”和“四岳”。尧帝都平阳,那么“平阳”在哪里呢?就在马良镇的西坪村。依据有三:一是地理位置好。啻帝在两峪山上执政,而其妃子庆都却住在娘家,其娘家居住于丹陵,和西坪仅一水之隔。西坪即西平阳,位于重阳以西,后人称西坪,唐朝时曾在此设过平阳县。二是重阳当时为大泽,水未退尽,还不能居住,相比之下,平阳条件优越。三是方便管理。因此时沮水两岸的部落很多,平阳处于相对中心的位置,所以尧设都于此。“四岳”即以重阳八宝山四周的4座高山。《毛传》:“岳,四岳也。东岳,岱;南岳,衡;西岳,华;北岳,恒。”八宝山因为是伏羲、女娲、黄帝、西陵母居住之地,古时为中岳,也称嵩山,所以称“崧高维岳”,其周围必有护卫之山。“东岳”为今南漳板桥镇的荆山顶,称岱连山;“南岳”为今宜昌市夷陵区的太平顶,

称衡山，故荆衡连用；“西岳”为今歇马镇的望佛山，称泰华山；“北岳”为今保康龙坪镇的聚龙山，亦称恒山。与《毛传》的注释相一致。

选贤任能

接班人的问题历来是帝王的大问题、国家的大问题。然而，尧帝最值得称道的是他没把帝位传给他的儿子丹朱，而是传给了盲人的儿子、孝顺友爱的舜。为了考验舜的德行，尧把两个女儿嫁给舜，居妫水。舜将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的关系都处理的很好。这样，三年之后，尧才将帝位传于舜，又辅佐舜执政二十年才放手。

对于这件事，《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很详细。尧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岳应曰：鄙德，忝帝位。尧曰：悉举贵戚而疏远隐匿者。众皆言于尧曰：有矜在民间曰虞舜。尧曰：朕闻之，其何如。岳曰：盲子者；父顽，母嚣，弟傲，能和以孝，丞丞治，不至奸。尧曰：吾其试哉。于是尧妻之以二女，观其德于二女。舜飭下二女于妫汭，如妇礼。尧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遍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召舜曰：汝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让于德不怍。正月上日，舜受终于文祖；文祖者，尧太祖也。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

以上记载的大致意思为，尧召集四方的诸侯问，将来有谁可以接他的帝位，不管是亲戚还是民的百姓都可推荐，诸侯都

说舜可以。于是尧便把他的两个女儿下嫁给舜以测试其德性,舜果然处理得很好;尧又用五典来检验舜,结果也符合五典的要求;尧又让舜去管理百官,舜把百官管理得井井有条;尧让舜接待四方的宾客,四方的宾客都敬重舜;尧又让舜到艰苦的地方接受考验,结果舜都应对自如。在经过上述一系列的考验合格后,尧便在文祖庙里把帝位传给舜。

通过尧帝挑选舜作为他接班人的这段史实,可从中得到两条线索:一是大舜的籍贯问题。大舜是历山人,历山就在今东风头村;在重阳一带,“大舜历山葬父母”的说法由来已久,至今仍在流传,已有专门探讨。二是文祖庙。文祖庙在今紫阳村一台地上,距都城平阳仅5公里,遗址尚存。在探讨玄器时有叙述。

首开流放之举

《史记·五帝本纪》曰:“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讙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此段内容很清楚,即舜向尧帝提的流放建议,尧做出的决定。

首先说“迁三苗于三危”。三苗部落原居住在江淮、荆州一带,但此江淮、荆州不是今江淮、荆州,而是大禹以前的江淮、荆州。“江”为沮江,今沮水;“淮”为淮水,在今宜昌市境内;“荆州”为荆山之山麓,为今远安县洋坪、苟家垭和南漳县的巡检、峡口一带,这一带属丘陵地带,条件要比山区好。至

于“三危”地名的来历,分析有多处危崖耸峙的地形,意为地势险要,荒无人烟。三危地区在今歇马镇百峰、九里及兴山县榛子树岭一带,正处于平阳的西部,这里原是九黎部落的住地,自然条件比较差,尧把三苗部落迁来这里,有两个意图:一是将条件好的地方腾给帝王的后裔居住;二是开辟蛮荒之地,以改变西戎的人口结构。

再说“放讙兜于崇山”。崇山即今崇家山,位于重阳(雷泽)以南,这里原来居住着南蛮各部落。从“放讙兜于崇山,来改变南蛮的习俗”这句话来分析,与其说贬,不如说分封,因为讙兜还承担有“改变南蛮的习俗”的责任,他有这样的责任,必定委任以相应的职务。从放讙兜到崇山到周文王灭崇国,其间整整 1000 年时间差。在原始社会,早期多处于游牧状态,经常迁徙,但到了奴隶社会,部落方国一般情况下有较稳定的居住区域。尧帝以后这里的南蛮部落变成了崇部落方国,殷商末期其国君崇侯虎为纣王的宠臣,因其在纣王面前献谗言而招祸,其国被周文王所灭。

最后说“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共工是炎帝后裔,同时又是职务名称,在颛顼为帝时为负责治水的官员,因为他治水的方法有问题,所以尧帝要流放他。流放在哪里呢?在幽陵。幽陵即大禹时的幽州,在保康县城关镇一带,相传共工在此建了康回国。今城关镇有九皇山,相传共工在此筑台,疑为烽火台,有遗址。

至于“殛鲧于羽山”,不属于流放。笔者在《荆山古文化之谜》一书中有“大鲧治水在何处”一文,已对杀大鲧于羽山一事作了探讨,在本书也有专文叙述。

创造围棋

史书有“尧造围棋，以教丹朱”的记载。相传上古时期尧都平阳，平息协调各部落方国的关系以后，农耕生产和人民生活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但是有一种心病使尧忧虑，儿子朱已有十几岁了，眼看快要成人，却整日里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经常招惹祸端。尧帝心想，要想使朱归善，需先稳其性，静其心，教他学几样本领才行。起初尧让人教朱打猎，朱不喜；尧说：“你不愿学打猎，就学布兵征战的石子棋吧，学会了用途大着呢！”说着就在一块平地上画了一个棋盘，捡来一些黑白石子，分成两组，教朱进行前进后退围堵的作战谋略。

在尧的开导下，朱学围棋很专心，也不到外面闲逛了，有了明显的转变。尧对朱的师傅散宜氏说：“石子棋包含着很深的治理百姓、军队作战和利用山河的道理，朱如果明白了这些道理，接替我的帝位，是自然的事情啊。”（摘自《中华开源大圣》）

谁知朱以前自由散漫惯了，围棋还没学透，又听信那帮不三不四朋友的话，觉得下棋太单调，太受拘束，还得动脑筋，又犯了老毛病，终日朋淫生非，尧帝十分伤心，于是就有了流放朱于丹水的举措。

其实尧帝发明的围棋起初是和尚棋，即荆山农村因地制宜的娱乐方式之一，多为农活休息时两人玩，至今仍在流传。棋盘可画在平地、石板上，棋子可因地制宜采用石子、短棒、硬币、纽扣之类的物品。棋盘分两部分，下部为长方形或正方形，划五条横线、五条竖线作路。上方为一个棱形图案，内划

一条横线、一条竖线，棱形底角与正方形上边中线相交。甲乙双方各出5颗棋子，有明显区别，摆在正方形五条横线的一端，走棋时每步只能走一格。下棋分两个步骤，第一步双方互相攻防吃子，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吃子有两种方式：一是夹。即用两颗子夹击对方中间一颗子，变为己有。二是挑，即用中间一颗子挑掉对方两边的两颗子，变为己有。第二步是逼。即拥用绝对优势的一方把对方棋子向棋盘尖上逼，每个路口都布上棋子，既不能让对方溜掉，更不能让对方钻空子反击，一步一步将对方仅有的一颗棋子逼上棱形的塔尖作和尚为赢。

治理水患

《史记·夏本纪》记载：“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尚书·尧典》上说：“尧之时洪水为患为甚”。《寰宇通志》有记：“尧时上游之水无所痒，雍而四出”。《晋乘搜略》曰：“尧时黄水为患，震及帝都。”

通过上述记载，给人一个清晰的印象，即在尧为帝时，洪水灾害是很严重的。所谓“浩浩怀山襄陵”，“怀山”在南漳巡检，“襄陵”即南襄阳，在今远安县洋坪。此两个地名都在沮水下游，则说明沮水为患。尧帝对此非常关切，征询四岳官员的意见，问谁可以治理水患，大家都推荐了鲧。尧觉得鲧这个人靠不住，不适宜承担这项重要工作，但四岳的官员坚持让鲧去试一试，尧只好任命他去治水。鲧治水9年，毫无功绩。

大鲧治水在哪里呢？通过近几年的深入探讨，终于找到

了答案。相传,今重阳就是后来夏朝的都城——阳城,而流入阳城的沁水(今白龙洞河)泛滥成灾,威胁着下游的安全,所以尧帝安排鲧治理。当地群众对白龙洞河有“三包九锁十八滩,青狮白象把门关”的形象说法,指的是这条河流的复杂地形。鲧治水之住地的羽山,距重阳(阳城)仅五六公里之遥,说羽郊符合事实。

由于鲧治水的方法不对,他采取堵而不是疏,导致越堵水越大,一旦破坝,洪水的危害就更大,损失更惨重。在今白龙洞河的上游,就有“千拦沟”的沟名,分析鲧在此筑过坝。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拦”字在保康是方言,读“担”音,即“挡”的意思。老百姓至今把放水叫拦水。把“阻拦”叫“担(音)住”。千拦沟的实际地名应为千担沟。是什么原因造成一尔再、再尔三的拦住呢?其实就是大鲧治水屡拦屡溃的真实写照。

《山海经·海内经》曰:“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这一记载在地名和遗址上使传说故事得到印证。与万寿相邻的今榔榆沟古称羽渊。祝融杀鲧的遗址现叫“杀人沟”,其地名仍在。当年鲧被流放于羽山,舜帝派祝融将鲧杀了,变成了一条僵龙,每天在太阳底下晒。因天气热,苍蝇很多,当地老百姓看了很同情,鲧虽然治水不力,但没有功劳有苦劳,于是就自动给僵龙搭凉棚。据说当年搭凉棚的石基座还在,2013年才被修高速公路的路基所埋。这条黄龙在这里呆了三年才托生走。虽然这个故事有神话成份,但当地人都熟知石基座一事,没有做假之嫌。

关于“窃帝之息壤”一事,在当地也有传说和地名印证。

相传有一古帝埋在羽山的一匹山梁上,这匹山梁土地瘠薄,风水上叫“老鼠子尾巴”。结果大鲧在治水时派人取土,无意中把这座坟给挖开了。古坟里的尸骨瞬间变成了一对白蜡,一支飞到下白蜡坪,另一支未飞出来,叫上白蜡坪,也就是现在的黄坪。《保康县地名志》(1984年版)关于“白蜡”条记载:“……处白龙洞河西岸平地,余姓居此。据传,早年此地挖出一对白蜡,又名‘白蜡坪’。”

其实“白蜡”是死者的腿骨,形似蜡。墓地在没有挖开前,处于密封状态,挖开时从墓中飘出一股烟气,属自然现象,而古人不知道其中的奥秘,以为白蜡会飞,实属误传。现白蜡的地名仍在,并且作为店垭镇的一个行政村名,这件事后来成为大鲧的一条罪责。

不过,通过“白蜡”的故事,加上千担沟、羽山、羽渊等地名,再加上治水遗址的地理特征,为大鲧在此治水提供了过硬的佐证。

制定历法

《尚书·尧典》上说,尧任命羲氏、和氏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行情况制定历法,然后颁布天下,使农业生产有所依循,叫“敬授民时”。他派羲仲住在东方海滨叫旸谷的地方,观察日出的情况,以昼夜平分的那天为春分,并参考鸟星的位置来校正;派羲叔住在叫明都的地方,观察太阳由北向南移动的情况,以白昼时间最长的那天叫夏至,并参考火星的位置来校正;派和仲住在西方叫昧谷的地方,观察日落的情况的情况,

以昼夜平分的那天叫秋分；派和叔住在北方幽都的地方，观察太阳由南向北的移动情况，以白昼最短的那天作为冬至，并参考昴星的位置来校正。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确定后，尧决定以 366 日为一年，每 3 年置一闰月，用闰月来调整历法和四季的关系，使每年的农时正确，不出差误。

探讨我国历法的制定，有 4 个决定性的地理座标，分别是暘谷、昧谷、明都、幽都，只要找出上述 4 个点，便可以找到尧在平阳的佐证。毫无疑问，上述 4 个点是围绕平阳都城分布在四周，东西南北 4 个方位。即东方日出的暘谷在今峡谷河，原属神农君子国的地界，也是昆吾之师羲和浴日处。南方明都可能在今远安县苟家垭一带。西方昧谷为太阳落山之处，在今鸡冠河峡谷。北方幽都即古幽州地界上，即今后坪镇一带。难怪重阳的老百姓都说，24 节气与重阳的农时十分吻合，原来其玄妙在此。仅此 24 节气就可以作为推论尧都在平阳过硬的佐证。

与南蛮战于丹水之浦

据《竹书纪年》所记：“帝（尧）使后稷放帝朱于丹水”。史籍多记载尧帝之子朱的“不肖”行为，由于他出生于帝王的家庭，各方面条件都好，从小娇生惯养，长大后没有严格管教，结交了一帮不三不四的朋友而学坏了，得不到人们的拥护，因而失去了继承帝位的资格。尧帝把位传给舜以后，为了让舜有一个好的执政环境，于是便把他的这个不争气的儿子下放到丹水之浦做了个地方官。

《吕氏春秋·召类》有“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的记载。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丹水》中也说：“丹水之浦在今河南淅川县西南，那里就是丹朱受封之地。”但近年来保康县荆山史前文化研究提出，荆山之内也有丹水，就在马良镇鸡冠河出口处，是因丹霞山而来；而且在丹山之南还有丹阳，后为楚熊绎所居。当年尧帝在今平阳坐位，把他的儿子朱下放到鸡冠河河谷地带，两地相距仅10公里。

如果按老观点来分析，其实（淅川）丹水之浦的地方并不差，这里交通方便，水旱两路并行，向东北可直达中原，向西可通西安，向南直下江汉。当时这里居住着濮人和南蛮，因为丹朱的行为仍不检点，不能很好地行使职权，仍然服不了众，老百姓对他的意见很大，继而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抗，尧帝不得不率部来平息此乱。但问题是这时尧帝的都城在哪里呢？行军路线是咋样的？南蛮哪个部落在此居住？如果按某些学者的观点，尧都在晋西南临汾，那就要问，我国几十年的研究和考古为什么找不到关键性证据？这里三皇五帝的线索是否都俱全呢？尧帝为仁爱之君，凭什么要把他的儿子流放于千里之外呢？其它佐证如24节气是否合得上呢……

《竹书纪年》又记：“帝陟于陶，帝子丹朱避于房陵，舜让弗克，朱遂封于房，为虞宾。”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帝尧辅佐帝舜二十多年后，不幸在他的老家去世，虞舜正式即位。尧帝的儿子丹朱因名声不好，怕人们说他想和舜争夺帝位，便躲到了很偏僻的房子国。舜再三推让帝位，但老百姓和各部落首领们都拥护舜，不拥护丹朱，舜只好就位。于是他顺水推舟地封丹朱为管辖房地的官员。房地也叫房子国，因房南有一山洞，

其石室如房，是原始人居住的好去处，取名房山，也称吴房；后来又因丹朱之子名陵，继承丹朱的封地，房陵地名由此而生。

如果用本地学者的观点来分析则更符合情理：一是先由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然后再由朱来管理；或者说丹朱在这里惹了乱子，需要尧帝来替他摆平。二是两地相距很近，便于帝王控制，都城平阳距丹水之浦的地方仅 10 公里，这在远古人来说符合情理。三是丹朱避舜难于房陵，即从山内向山外迁徙，距离也不远。在明朝保康建县以前，房陵的边界至界山，距马良丹水之浦不到 10 公里，符合逻辑。因为在此以前，尚没有部落外迁的信息，其实五帝统治时期的范围很狭小，不可能一下子跳跃式外迁几百上千里。由此可见，今马良集镇为丹水之浦更符合逻辑。

葬地分析

《帝王世纪》所记：尧“辛巳崩。年百十八，在位九十八年。”“尧与方回游阳城，而崩。”又：“尧葬谷林，谷林即城阳。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还有：“尧葬济阴成阳西北四十里。墨子以为尧堂高三尺，土阶三等，北教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阴。《山海经》曰：‘尧葬狄山之阳，一名崇山’。”《史记·五帝本纪》曰：“尧崩，三年之丧毕”。

从以上这段话所提供的地名信息，分析如下：“阳城”即以重阳为中心的区域，后有专文；“谷林”地名分析距水较近，重阳为四水归池之地，很可能尧时已经开始种水稻了；但这个“谷”也可能为苞谷，即玉米，与后稷在这里推广农业有关系，

保康县农村至今还有“苞谷长得象竹林”之方言。“城阳”可能指方位，即都城之阳，都城之南，重阳位于西平阳的东南方，暗指阳城。“济阴”也是指方位，“济”为济水，即姬水、汜水，为今流入重阳重岐峡河，济阴即济水之北，而平阳也位于重岐峡河之北。“蛩山”是一个山名，“蛩”字指一种兽名，青色，状如马。蛩山指山上有这种异兽。“狄山”也是一个山名。《山海经·海外南经》曰：“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爰有熊、罴、文虎、醯、豹、离朱、视肉……”根据这条线索分析，可能为崇山的山麓处。因为一是这里位于平阳的南方，崇山之下便是重阳坪；二是曾为灌兜的封地；三是距平阳较近；四是这里距大舜的居地也很近，所以把尧葬在这里的可能性很大。总之，尧葬于今重阳附近，不会在他处。

尧帝在荆山的综合线索

《史记·封禅书》曰：“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尧帝与黄帝有血缘关系，因而可以将尧帝在荆山作为一条重要线索。

尧帝是喾的儿子，喾接颛顼之位，颛顼则是黄帝的孙子。河南新蔡出土楚简甲三 11 号、24 号记有“昔我先自颛顼，宅兹沮漳，以徙迁处”；甲三 268 号有“及江汉沮漳，遂至于淮”的记载，够此地理特征的仅湖北荆山，别无他处。喾帝的执政地在今两峪一带，所以尧不可能出自他地。

尧后来的封地在陶唐，据考证，陶为陶家寨，在今南漳板桥镇境内，唐地在今鹫峰一带，距两峪较近。

大舜住厉山，邻近两峪和西坪，所以尧帝考察舜很方便。

尧将他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于大舜，在五虎有“娥皇堙”地名遗存，这里正是尧的所封之地。

尧帝在文祖庙里举行交接仪式，文祖庙遗址在今紫阳村一台地上，距尧的初封之地鹫峰庵也很近。

尧使后稷放朱于丹水，此丹水在今马良集镇，距尧执政之地仅10公里。

因为相距较近，“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才符合情理，如果相距太远，则不符合那时社会发展的规律，也不符合战场形势。

尧的弟弟后稷在今两峪龙潭河设农坛，发展农业，也从客观上证实尧之父帝尝在两峪坐位，那么与尧地相距不会太远。

尧在执政时期建都于平阳。平阳在重阳之西，邻近重阳，地势很好，适合建都。

尧帝时安排大禹的父亲大鲧治水，所治水之地在重阳。《帝王世纪》曰“禹铸鼎于荆山，在冯翊怀德之南，今其下有荆渠也。”这句话证实大禹在荆山铸鼎。

后来“丹朱避舜难于房陵”，古房陵之地与保康县马良镇连山接界，则说明尧的活动之地始终没有超出荆山。

对襄汾尧都的质疑

近年来山西省临汾市所印发的宣传资料，关于陶寺遗址的介绍有这样一段话：“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陶寺村南，大量的考古发掘，证实了陶寺遗址是中国史前功能区划最完备的

都城,使尧都平阳成为信史,为中华 5000 年文明史提供了关键证据。陶寺遗址就是尧的都城的发现和认定,说明山西临汾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

笔者对此论点提出质疑。

确定尧都需要具备很多的相关条件。笔者认为仅以陶寺遗址就断言尧都在此还显得有些草率,还有一系列问题有待研究。因为尧在五帝中排位第三,是实实在在的血肉之躯。既然是自然人,又是帝王身份,绝不会孤立存在,一定会和当时的社会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是从血缘关系上讲,尧是啻之子,啻又是玄囂之子,此地是否有他们的线索?二是尧生于丹陵,此地是否有丹陵?三是尧被封于陶唐,此地是否有陶唐的线索?四是尧的女儿为娥皇和女英,此地是否有她们的线索?五是尧的同父异母兄弟后稷,为我国农业之祖,这里是否也有他的线索?六是尧的接班人为舜,此地是否有舜的线索?七是尧曾有流放“四凶”的举措,那么,“幽陵”“崇山”“三危”“羽山”又在临汾的哪些地方?八是尧舜禅让的地点在文祖庙,此地是否有此遗址?九是大舜住厉山,此地是否有厉山?十是此地是否有妫汭二水?十一是尧子丹朱避舜难于房陵,此地是否有房陵之地?十二是尧曾安排鲧治理水患,此地是否有鲧治水的确切地点?若上述相关问题在陶寺及附近找不出答案,那么尧帝之都的结论则大打折扣,而在湖北荆山,上述线索都存在。

陶寺为尧都之说存在破绽。华夏文明拥有一系列的主流文化作支撑,因而作为尧都也必须具备。陶寺遗址视为重要线索的彩绘蟠龙陶盘,被定为图腾文化的标志,古观象台被作

为观天授时的证据,此两条也并非无懈可击。1. 图腾文化早在黄帝以前就已经形成,即每个部落崇拜一种动物,其中就有龙。例如:辽宁阜新出土了距今七、八千年的“龙型堆塑”,内蒙古敖汉旗出土的距今七千年以上的龙纹陶器,陕西宝鸡出土的距今七千年以上龙纹彩陶细颈瓶,河南濮阳出土距今五千的龙形贝壳图。再如,《帝王世纪》(7页)记载:“黄帝服斋于中宫,坐于玄扈,洛上乃有大鸟,鸡头、燕喙、龟颈、龙形、麟翼、鱼尾,其状如鹤……”这段话虽然描述了凤的形象,但却提出了龙型;另外,黄帝有个叫“翼龙”的儿子,也说明早在黄帝之前,就已经形成“龙”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陶寺的龙图案绝非是最先形成的龙图腾的证据。2. 观象台之说的证据仍不足。临汾的宣传资料介绍说:“陶寺古观象台形成于公元前2100年。”分析这个观象台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时间上存在着差距。《中国历代纪元表》载明,夏代约从公元前2200年开始的,也就是说陶寺的观象台形成于夏代大禹之后,要比尧帝晚约200年。二是《尚书·尧典》上说:“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羲氏、和氏观天分东南西北有4个座标,分别是昴谷、明都、昧谷、幽都,请问陶寺附近是否能找出上述地点来?三是既然是敬授民时,那么与指导农耕一定有密切关系,与24节气的农时一定相吻合。2016年省荆楚文化研究会组织我们赴陶寺考察,笔者注意到,在陶寺考察是6月22日,即夏至节的第二天,当地刚毁麦茬,玉米苗刚出土,比保康重阳要晚近一个月时间。以芒种为例,芒种即忙种,又要收,又要种,重阳自古有“芒种一半茬”之说,所以很忙。如果说陶寺为中国之中,是“敬授民时”

之地,为什么与24节气中的农时合不上?而重阳却刚好相吻合?3.临汾的宣传材料上有“尧都平阳”之语,因此“平阳”地名成为决定尧都的重要因素。《帝王世纪》(10页)载:尧“年十五而佐帝挚,受封于唐,为诸侯。尝梦攀天而上之,故年二十而登帝位。以火承木,都平阳。”查《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215页)“平阳府”一处,位于山西临汾县西南。“平阳城”有5处:分别为山东新泰、山东邹县、河南滑县、河南临漳、陕西岐山;“平阳县”有13处:分别为山西临汾、山东邹县、湖北郧县、河南信阳、湖南桂阳、湖北均县、湖北孝感、湖北某境、陕西眉县、河南某境、安徽某境、河南汝南、浙江温州。《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平阳”条却记在广西来宾县。凑巧的是,在湖北保康也有“平阳”的地名。在保康史前文化研究者汪青祥所著的《讲古话重阳》一书中有两处提到“平阳”:一处为“女娲登岸西平阳”,是指女娲巡视天下,从这里上岸。一处为“阴阳八卦布阳城”,是讲“平阳”是夏都阳城的9个村邑之一。《湖北省建置沿革》曾有记载,唐初时曾在保康重阳设重州,领6县,其中有平阳县,位置在今西坪村。可惜,这些重要的线索却鲜为人知。

通过考察,可以对山西临汾是尧都的论点提出上述质疑。孤证难立,山西陶寺为尧都之说很难服人。

荆山创世神话古遗址浅谈

陈静茂

研究荆楚文化必须先了解荆山远古文化。因为荆山很古老,出自《禹贡》,在《禹贡》这篇文章里曾4次提到荆山,说明早在禹时期,荆山就被列为天下名山之列。然而,以保康重阳坪为中心的古荆山,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其根据是当地代代流传的创世神话故事、古籍的零星记载和大量的遗址遗物。经推测,荆山大体上有上万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其远古文化源远流长,民间传说故事很多。笔者跟随省荆楚文化研究会调研组到保康考察史前文化,感触颇深,现撰写此文,以飨读者。

盘古的身躯化作荆山

盘古开天地的神话传说由来已久,但真正从哪里起源却没有典籍记载。《中华成语辞海》(吉林大学出版社)777页对盘古开天地的解释为:“盘古氏,相伟氏,相传是人类的始祖。盘古氏开天地,指最古老的时代。”《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144页对“盘古氏”的注释为:“神话中开天辟地的人。传说生

于天地混沌中,后来天地开辟,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他日长一丈,如此一万八千岁,天就极高,地就极低。南朝梁任昉所著《述异记》又说,所有日月、星辰、风云、山川、田地、草木、金石,都是他死后,由身体各部变成。”被誉为汉民族的部落神话史诗,在安康传唱了几千年的《黑暗传》唱词里也唱到:“盘古出身奇迹生,结束黑暗与混沌;玄元制下先天数,又化青护和昆仑;两山相交高万丈,阴阳交感奇才生;青赤二气结成团,浑暗之中元物成;当日玄元斩浪荡,尸分五处血流淌。”又唱到:“鸿钧将笔拿在手,左右不停画人身。一画二画请出世,三画四画出头顶,五画六画眉毛生,七画八画七窍明,九画十画四肢动,十一十二画眼睛,十三十四画骨节,三百六十零五根,十五十六画汗毛,十万八千有余零,画的顶平额角起,画的肝肺手连心,画的元气满盈盈,画得五行各安身……”

在安康荆山,我们发现了盘古的身躯和地名。盘古的头部在景山。景山有大石脑的地名,古语也有“荆山之首曰景山”的句子,“首”字就是指头部。茅山代表盘古的头发,茅山在马桥镇和歇马镇交界的地方;太阳山、月亮潭代表盘古的眼睛,太阳山在马桥镇中坪;月亮潭在后坪。汪家沟、老架山、千家林、关山、庞家山是盘古的身躯。这些山名分别在荆山的两大干支上,也就是荆山和睢山,在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上都有标示。盘古的两个上肢一个在县内城关镇九皇山,一个在今远安县的望家乡。更有趣的是,就连“左膀右臂”这个说法都与盘古有关。两处都有36拐的山路和36膀的地名;两座山峰上都有古庙宇,都是36步台阶上正殿。盘古的两条腿伸的很远,左腿顺荆山山脉伸到南漳和荆门,右腿

顺古睢山山脉伸到宜昌和当阳。盘古的肠胃为沮水歇马段，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渭(胃)水，至于今北方的渭水地名估计是后人从保康移植过去的。

毫无疑问，盘古的身躯在荆山，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也源于荆山，折射了当时人们认知世界的局限。现保康传承的《黑暗传》，用很大的篇幅来描述盘古开天地的情节，而许多地名都可以在保康找到源头，就可以证实这个问题。

古人类云城大遗址

荆山古云城大遗址，虽然经过几千年的风雨冲刷，但仍残留着大量古人类生活的遗址和遗物。现在到两峪、歇马、店垭和重阳民间，仍然可以充耳听故事，俯首拾文物，举目看遗迹。

朝阳山天元宫遗址。相传朝阳山是历史上人类最早的发祥地，要早于黄帝数千年。天元宫的占地面积在300亩以上，建筑面积近百亩。主宫门上方嵌有“云城之地”的匾额，其石刻门联分别书以“三期龙华道成朝元地”“万灵归根品定极乐天”和“万福来朝”“三教宗师”。现朝阳山的经书《龙华宝经》和《五公真经》有记载：“生天生地生佛生仙，道祖元阳铁师上帝、鸿钧老祖、古佛天尊、玄元圣祖、显道天尊等仙祖。”《山海经·海外东经》也有记载：“朝阳之谷，神曰天昊，是为水伯。在虹虹北两水间。”其意有二：一是指方位，即两峪的东汉河和西汉河；其二是称虹虹为神兽，八首人面，八足八尾，(背)青黄。由此可见，此时的人类还没有定型，半人半兽的状态。

华盖宫遗址。位于今歇马镇望佛山，是继朝阳山天元宫

云城之后的第二大遗址。望佛山古称“天帝山、太华山、昆仑山和泰山”，是太阳落山之处。此山雄伟高耸，似一根雨伞把子，支撑着天，故名“华盖”。华盖宫的创始人为伏羲，为人类创始人之一。相传，今歇马一带盆地远古时为湖泊，住着一位雷神，喜怒无常，以呼风唤雨为乐，经常行风走暴，引发山洪，祸及下游华胥国的百姓。华胥国公主找到雷神评理，雷神反而要华胥女嫁给他为妻后才能安分。华胥女和雷神结合后生下伏羲，为人面蛇身。因而伏羲有“龙之性，华是命”之说，“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盖出于此。伏羲长大之后在天帝山继承了雷祖之位，并在山上建起子华盖宫宫殿，相传古时候规模很大，明朝以后才衰败。《山海经·海内西经》上记载：“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下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有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其记述与遗址情形相符合。

八宝山碧云宫遗址。八宝山位于重阳陈家山，古称“碧瑶山、波母山”。相传，创始人为女娲，在这里开始修建行宫，因修建在山顶上，所以也称“上方宫”。女娲也是人祖之一，人头蛇身，她和伏羲兄妹成亲，繁衍人类。还相传她捏土为人、炼石补天、规定婚姻制度等等。女娲升天后，西陵母在此居住了很长时间，修建了万寿宫；同张天师修建的灵霄宫遥相呼应。古时在碧云宫敬神有讲究，香客必须先到上方宫上香，然后再到灵霄宫签到，经万寿宫许愿，才能上山拜轩辕洞，沐浴后再进碧云宫。如今虽然古庙宇荡然无存，但遗址俱在，遗物仍可找寻。同时，在重阳有许多与女娲有关的传说故事和地名遗存。例如，有洪水泡天，人类仅剩女娲和伏羲兄妹俩；

女媧与伏羲滚石为凭的石滚垭、滚石坡；有成亲之洞鸡头山甘泉宫；有西陵母戏弄共工的难修城；还有共工怒撞不周山的遗址与传说，这些都可证实重阳是人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店垭神农宫遗址。三皇之一的神农也在荆山留下了痕迹。在距重阳仅 10 公里的店垭镇有神农洞、神农宫和神农观遗址，遗址的面积较大。甚至还保留着神农村的行政村名。相传，神农“架木为城，采尝百草，救民夭疾，教民稼穡”的神农架，与店垭镇相距仅 100 多公里，而且同处于大巴山山脉，而荆山属大巴山余脉。

另有黄帝造鼓之说，相传，黄帝用东海夔牛的皮蒙鼓，用雷神的骨头做鼓槌，其响声能传 500 里。这个说法可以印证三个问题：一是古东海在荆山附近；二是夔地距雷神的住地不远；三是黄帝也在荆山居住过。

古人类阳城大遗址

历史进入五帝时期，荆山重阳迎来了耀眼的辉煌，从黄帝部落起，大都居住在重阳，夏朝的都城也设在这里，为阳城。一是伏羲得太极图于重阳。从重阳的地图可以看出，以沮水河流为界，重阳和紫阳阴阳两极分明。首先是在重溪峡河的作用下，将沮水抵向重阳一侧，形成了重溪峡口河滩和穆陵头台地。没距多远，又受到白龙洞河的冲击，沮水拐向紫阳方向，形成了重阳的大片滩涂。可是在紫阳五汊河水的作用下，沮水又抵向重阳和潮水，这样在约两公里的河段上，沮水连续拐了两个弯，形成了“S”形状，加上周围地形的衬托，太极图

就这样形成了,所以阳城的地形也叫“太极城”。二是阳城的建设是高人所规划。其布局是按五行方位布局的,分东、西、南、北、中五个城区,即“东阳”,在紫阳村一、二组境内;“南阳”,在潮水村五组和姚家沟一带;“西阳”,在重阳八宝山山脚处;“平阳”(北阳),在西坪村境内的白果树一带;“中阳”,也叫固阳,在周公岭山脚处和徐家湾;“崇阳”,在潮水观音阁。五庵的设置是:东庵,在紫阳村一组;南庵,在潮水村处;西庵,在重阳村一组;北庵,在紫阳村八组;中庵,在周公岭山脚处。另外在阳城外还设有四庵,其遗址都可以找到。三是按八卦方位布置城区。众所周知,八卦是玄元老祖所发明,而阳城既为夏都,按八卦布局也就不足为奇了。中轴线由观音庙(潮水村六组)为起点,向北经地藏庙(紫阳七组)到老官庙(八斗坪刘家台),绵延 10 公里。

古楚都丹阳城大遗址

楚人的远祖是五帝之一的颛顼,号高阳,兴山有高阳镇地名,当为高阳的封地。下传到鬻熊时迁至丹水之侧的淅川,周王朝初建立时,熊丽又迁回荆山之中,到周成王七年后才封楚为国,熊绎居丹阳。从居住地域上讲,有楚人祖先颛顼在荆山的依据。河南新蔡出土的楚简甲 11 号、24 号简记:“昔我先自颛顼,宅兹沮漳,以徙迁处。”甲三 268 号简记有“及江汉沮漳,遂至于淮。”乙四 9 号简记有“渚沮漳,及江,上逾取。”充分说明颛顼居住在荆山沮漳水之间,而重阳一带是沮漳水之间最好的地形。

楚人刚到荆山时是没资格住进重阳的,后慢慢渗透,挤进

了重阳。为此,周王朝从成王开始,曾三番五次地伐楚,是因为楚人袭占了周族的领地。册封为国后,在穆陵头建都城,改紫阳为丹阳。穆陵头是重阳最好的台地,很适合建都城。现城址的痕迹仍很明显,遍地是文物,在穆陵头后坡上,古墓葬遍地都是。还遗留了几个关键性地名,分别是周公岭、殿皇庙、穆陵头、卞和墓。“周公岭”是周公在重阳的住地,“周公旦奔楚”是在遭谗言情况下,回老家避难。“殿皇庙”是楚人祭祀祖宗、前贤、天神的场所,属国家级建筑。“穆陵头”是楚都城的隐语,是秦国灭楚后高压政策的产物。卞和墓是遗址,即卞和的葬地。卞和是楚国的有功之臣,虽然他献玉时楚都已迁至山外,但重阳是旧都,是楚国的大后方,将卞和安置在这里养老是优待措施。

能够辅助说明重阳是楚都城的证据还有方城山军事遗址。楚国在重阳建都以后,所面临的形势很复杂,也很严峻。除了受到周王朝不时的打压以外,还有西北方的庸国,号称南蛮之首,对楚国虎视眈眈;还有东方的罗国、卢戎国,南方的权国,他们都是周王朝的卫星国,对楚国怀有敌意,因而不得不防。所以楚国设置方城山军事大屏障,寨、堡、关、观星落棋布,为有备无患的措施。至于后来,楚国向外扩张,楚都外迁,以秦岭、伏牛山为屏障设置方城山,拱卫楚都鄢郢,重阳周围的方城山暂时失去了军事价值,但作为遗址,可以见证这一阶段的历史。

重阳古州府遗址

重阳被定为州城所在地是唐朝初期时的事,据《湖北省

建置沿革》载：“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分南漳立荆山县，置重州。领荆山、重阳、渠阳、土门、归义、平阳六县”。既然在重阳设置州城，肯定要建城，惟穆陵头是州城的最佳选择，一是有楚都丹阳城的基础；二是从风水上讲，坐北朝南，符合建城惯例；三是地形好，适合建城。我们分析就当时的情况，重州是划襄州南漳县和房州永清县的地域而设，地域比较狭小，自然条件也很差，除了有少量的山谷盆地外，绝大部分为山地，发展农业的局限性很大。这不，很快就出现问题了，“唐武德二年，（实际是当年），朝廷下诏撤销了归义、土门两县，并入永清县；七年省渠阳入荆山，省平阳入重阳，贞观八年（635年）省重阳入荆山。”如此说来，连重阳县都被并掉了，那重州更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推算重州从设置之年起，连头带尾16年。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又在财政拮据的情况下，州城建设也不会好到那里去。据《中国历史地名词典》所记：“重阳县，西魏置，治所在今湖北南漳县。”计算其准确时间应为公元554年，到贞观八年重阳并入荆山县，其间是81年，用80年时间来建设一座县城，应该是具有一定的规模，但是，不管怎么样，跟不上古阳城和楚丹阳了。

重阳历史文化线索

重阳地名的来历。主要有四种说法：一是称重阳为“九阳城”或“九庵城”，“九”为阳数之极，双九即为重阳；二是苟芒为五行中的木神，名为“重”，在紫阳村的华法寺坐位，山南水北为阳，紫阳正处于荆山之南，沮水之北，所以叫重阳；三是

太公望等先祖祭祀“八神”时,祭天主上两峪朝阳山,祭地主在水泽中的圆形山包上,即潮水莲花台,如此祭天主、地主于一地,“下地贵重阳”,重阳地名由此而生;四是楚人为纪念其祖先重黎(祝融)而取,因其祖先祝融(也称火王)在此居住过。但真正以哪种说法为准,有待进一步考证。

重阳文物古迹。古寺庙:有碧云宫、观音阁、莲花台、文殊宫、普贤寺、甘泉宫、华法寺、地藏观、齐庙、老观庙、万寿宫、龙王宫、上方宫、灵霄宫、童母观、蚕母娘娘宫、殿皇庙、卞和庙、火神宫、三世佛宫、神农宫、三仙宫、楚王殿、药王殿、祖师殿、白云观、香隆观、大天寺、黄龙观。古庵:有东庵、南庵、西庵、北庵、中庵、云白庵、宝儿庵、童灵庵、鹞峰庵、伯邑庵。古关隘:有九阳关、白云关、阳平关、老岭关、大荒关、界牌关、玄武关、景远关、寒谷关、牌头垭关。古遗址:有原始人居住过的溶洞近百个、古墓葬上百处、古石刻 20 处、古地名 30 个。古书籍:有本地《龙华宝经》《龙华宝忏》《祖师经》《五公经》《五叶真经》《八队经》《九阳真经》《十王经》《女娲经》《血湖经》《螺祖经》《太岁经》《司命经》《火王经》《水龙经》《石木经》及多种版本的《黑暗传》等近百种。

(陈静茂,保康县档案局馆原局长,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会员)

谈中国古史应当重写

季羨林

去年夏天,我应人民日报社和日本朝日新闻社的邀请,到长江豪华游轮峨嵋号上去参加一个有关 21 世纪文化的国际研讨会。我们途经武汉和荆州,然后在宜昌上船,开始学术讨论。

在武汉,我们参观了黄鹤楼和博物馆。在博物馆里,我看到了许多出土的文物,其中有许多青铜器和名震世界的编钟。我大为惊诧,简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心中兴奋,非言语所能表达。

我们从武汉到了荆州。在那里又参观博物馆,看到了更多的更精美绝伦的从古墓里出土的青铜器,我的惊诧又上了一个台阶。在这里又看到了编钟,并且听了演奏。这一套编钟计 65 件,分层悬挂着。这套编钟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音域最宽的、具有 12 个半音音阶的特大定调乐器。美国音乐家麦克·克来恩教授说:“曾侯乙编钟是我们精神世界的圣山”,并誉之为“世界第八奇迹”。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也说:“希腊的乐器是全世界都承认的,可是希腊的乐器是竹木的,到现在不能保存下来,只有中国的乐器还能够使我们听到两千年前的声音。”可见世界上音乐大家对编钟评价之高。

能产生“世界上第八奇迹”和其他许许多多精美铜器的地方，一定会有异常雄厚的文化基础和经济基础，这是不辩自明的。古代的楚国是文化辉煌之邦，这已经是十分明显的了。

我在参观时一个强烈的想法就是：中国古代历史必须重写。

楚国，也可以泛泛地说中国的南方，在中国过去的历史著作中占的地位怎样呢？有目共睹，它没有占到应有的地位。在所有的中国通史中，比如郭沫若的、范文澜的、吕振羽的、翦伯赞的、尚钺的，以及比这些书更早一点的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统统都是文化北方中心论。黄河流域确实是中华文化发源地，但是最晚到了周代，楚文化或南方文化已经勃然兴起，再重弹北方中心论的老调，已经不行了，已经不符合实际情况了。

从别的方面着眼，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我在这里只举一个例子，这就是《楚辞》。像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如果没有丰厚的、肥沃的，而且又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土壤，是决难以出现的。屈原的著作幻想瑰丽，描绘奇诡，同代表北方文化的《诗经》，文风迥乎不同。勉强打一个比方，北方接近现实主义，而《楚辞》则多浪漫主义色彩，这一点恐怕是许多人能接受的。

屈原的作品中，无论是在词句方面，还是在内容方面，都有一些北方作品中不见的东西。比如《天问》中的许多神话，根据中外一些学者的研究，同外国的颇多相似之处，其中很可能有相互影响的关系。又如《离骚》一开头就有“摄提贞于孟陬兮”这样的句子。“摄提”一词，确有点怪，是否与天竺天文有关？学者们有这个说法，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来,我不再一一列举了。我的意思只是想说明,至晚到了周代,楚文化或南方文化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同域外的文化交流也已经有了一些。在这些方面,至少可以同北方文化并驾齐驱。然而在学者们的历史著作中,从而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南方仍然是蛮荒之地,在文化上上不得台盘,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实情的。这样写出来的中国古代史是不完全的,所以我就主张:中国古史应当重写。

(季羨林,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是北京大学终身教授)

重写中华古史建议书

季羨林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对于中华古史，传统的说法是“上下五千年”，以黄帝为始祖，故我们自称“黄帝子孙”或“炎黄子孙”；以黄河流域为发祥地，故称黄河为“黄河母亲”。此说为两千年前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所提出。他能摆脱神话的羁绊，塑造一位人文初祖黄帝作为古史的开端，在当时已属创见。至于以黄河流域作为古史的中心，则是限于他所掌握的史料与所见所闻。他连商代的甲骨文也无缘得见，更远的古史，自然无从了解。近数十年来，由于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不断发表，古史的本来面目已经逐渐揭开，中华文明史的开端应该更向上古延伸。中原仰韶古文化遗址、龙山古文化遗址、东北红山古文化遗址、西北大地湾古文化遗址等距今都已超过 5000 年，其中也都出现了一项或多项文明因素。东南河姆渡古文化遗址出现了距今 7000 年的早期海洋文明；湖南彭头山古文化遗址出现了距今 7000 年以上的早期农耕文明。我们拥有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与 1 万年的文明启步，这已成为考古学界的共识，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也绝不止黄河流域一处；就现已发现的文明源头而

言,即可归纳为六七个不同的区系类型。应该说中华文明是多源的。

这里有华侨、华人、美国的、台湾的、新加坡的、意大利的等等有7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人100位史学教授签名中国古史的重写,名字都签在这里,我就说我们干的事不是没得事找事干,理直气壮就是要为中华文化补充内容,填补空白,纠正误差,还原真实,要争取国际上的话语权,就是这个目的。